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 — 一九四九)

第十九册

#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九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 目 录

- 元旦献词 ..... (1)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 陕甘宁边区政府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 (5)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各根据地  
     秘密交通的指示 ..... (8)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
-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 (10)  
     ——关于成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事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
- 附一：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 ..... (11)  
         (一九四二年一月公布)
- 附二：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 ..... (12)  
         (一九四二年一月公布)
- 《文化课本》序言 ..... 毛泽东 (15)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 ..... (16)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 (19)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 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附件…………… (23)
-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 …… 周恩来 (28)  
(一九四二年一月)
- 整顿党的作风 …… 毛泽东 (30)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 …… (47)  
(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
- 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 (50)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 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法币贬值各根据地应采取的对策的指示 …… (55)  
(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
- 关于根据地各级青委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 …… (59)  
(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
- 关于根据地各级妇委组织工作条例 …… (63)  
(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
- 反对党八股 …… 毛泽东 (66)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 …… (81)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 (第一号) …… (84)  
——总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 (第二号) …… (88)  
——军事教育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  
(第三号) ..... (95)  
——政治教育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  
(第四号) ..... (98)  
——文化教育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 华中各根据地今后的任务 ..... 刘少奇 (101)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十六日)
- 毛泽东关于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  
为工作中心给周恩来的电报 ..... (126)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
-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讨论过去中央路线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 (128)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 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 ..... 陈 毅 (129)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 周恩来关于对日寇南进后时局的估计  
给毛泽东的复电 ..... (138)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  
(第五号) ..... (140)  
——各种干部的业务教育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 (146)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 如何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团体成为更广泛的  
群众组织 ..... 蔡 畅 (152)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
- 刘少奇给薛暮桥的信 ..... (157)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 (162)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
- 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 ..... 刘伯承 (164)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
- 到什么地方学习 ..... 陈 云 (166)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 第十八集团军关于揭发和打击敌寇  
毒化政策的指示 ..... (171)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 毛泽东 (172)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  
讲话要点 ..... (181)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 致读者 ..... 秦邦宪 (183)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 再论我们怎样学习 ..... 徐特立 (187)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研究讨论中央决定  
与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 (193)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



- 与使用的决定 ..... (198)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
- 我们对于孩子和母亲的态度 ..... 邓颖超 (200)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
- 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 ..... (205)  
(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 ..... (209)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  
一九四二年四月边区政府公布)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  
时间的通知 ..... (228)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  
指示 ..... (229)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
- 关于整顿三风 ..... 毛泽东 (230)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五一节的指示 ..... (241)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总结精兵简政  
经验的通知 ..... (244)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指示 ..... (247)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 克服困难向前迈进 ..... 朱 德 (253)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
- 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

- 斗争的指示 ..... (257)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
- 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国营工厂的劳动性质  
与职工会任务 ..... 邓 发 (263)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
- 整顿三风要联系实际 ..... 张闻天 (269)  
（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撤回在新疆的部分人员问题  
给陈潭秋的指导 ..... (273)  
（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
-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 ..... (275)  
（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敌后实行义务兵役制  
问题的指示 ..... (279)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
- 中央军委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司令部的决定 ..... (280)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 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 ..... 彭 真 (281)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毛泽东 (286)  
（一九四二年五月）
- 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 ..... (315)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 ..... (321)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  
学习运动的指示 ..... (326)  
(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
- 附一：中央直属系统四个月研究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 ..... (327)
- 附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 ..... (329)
- 毛泽东关于联防司令部成立及整风学习等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 (331)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
- 悼左权同志 ..... 朱 德 (333)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
- 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  
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 ..... (336)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
- 周恩来关于国民政府军委汇报会等情况  
给毛泽东的电报 ..... (342)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
- 胜利在望，团结向前 ..... 朱 德 (344)  
——为纪念抗战第五周年而作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  
问题之指示 ..... (351)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 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 (354)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 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  
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 ..... (359)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 毛泽东关于山东的重要性问题

给刘少奇的电报 ..... (363)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

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 ..... 任弼时 (365)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

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 ..... 彭德怀 (372)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

## 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

创造条件 ..... 刘少奇 (378)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

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 ..... (388)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从现在去认识过去 从过去来了解现在 ..... 聂荣臻 (390)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 ..... 罗荣桓 (406)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以团结力量建设战后新中国 ..... (412)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 毛泽东关于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

给陈毅的电报 ..... (417)

(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 ..... (418)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

## 周恩来关于蒋介石欲约毛泽东在西安晤谈问题

给毛泽东的电报 ..... (419)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

## 周恩来关于先由林彪或朱德出面谈判

- 
- 给毛泽东的电报 ..... (421)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  
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 (422)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 关于反“扫荡”的准备问题 ..... 刘伯承 (431)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日)
- 毛泽东关于同蒋介石会面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 (441)  
(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
- 周恩来关于毛泽东同蒋介石会面问题  
给毛泽东的电报 ..... (442)  
(一九四二年九月五日)
-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 毛泽东 (444)  
(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 毛泽东关于答复同蒋介石会面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 (448)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
- 周恩来关于目前国共合作中我之方针  
给毛泽东的电报 ..... (449)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
- 毛泽东关于目前任务是促成国共谈判  
给周恩来的电报 ..... (451)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 毛泽东关于设法同国民党军改善关系  
给陈毅的电报 ..... (453)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 毛泽东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

- 给何克全的信 ..... (454)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 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 ..... (456)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
- 党与党报 ..... (461)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 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 ..... 陈 云 (466)  
（一九四二年九月）
-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 ..... 张闻天 (472)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 毛泽东 (475)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党员察看处分执行办法的规定 ..... (480)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 刘少奇关于新四军今后应采取背靠山东的  
战略方针给陈毅等的电报 ..... (482)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 宗派主义在对党外关系上的排外性 ..... 董必武 (483)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 评柏林声明 ..... 毛泽东 (487)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
- 总政治部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的  
指示 ..... (492)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 ..... (497)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 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整风等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 (499)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周恩来关于林彪见蒋介石及同张治中、刘斐

谈话情形给毛泽东的电报 ..... (499)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关于整军问题 ..... 贺 龙 (501)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施行宽大政策的解释 ..... (512)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 毛泽东 (514)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 周恩来关于东江游击队工作方针

给尹林平的电报 ..... (515)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

提高领导 改造作风 ..... (518)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解放日报》社论)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 ..... 陈 云 (522)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 总政治部关于在对敌工作中对付敌人特务宪兵

办法的指示 ..... (532)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 建设根据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改进

党政军民关系 ..... 徐向前 (534)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 (543)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十中全会 ..... (547)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苏中反“清剿”斗争总结 ..... 粟裕 (549)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  
工作的指示 ..... (558)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
- 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 刘少奇 (561)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各地出版报纸刊物的指示 ..... (569)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
- 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国共关系的报告提纲 ..... (571)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于重庆）
- 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 ..... (578)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央总学委关于文风问题的通知 ..... (581)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  
给周恩来、林彪的指示 ..... (582)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 附一：周恩来、林彪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的请示 ..... (583)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 附二：林彪关于同蒋介石谈话经过的报告 ..... (584)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 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 ..... 彭德怀 (586)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 ..... (596)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边区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

- 
-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 毛泽东 (616)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 毛泽东 (621)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 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 ..... 林伯渠 (631)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 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笔记 ..... 任弼时 (640)  
(一九四二年)

## 元旦献词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全国军民在艰苦的长期抗战中，又踏进了新的一年。过去一年内，我前方将士后方同胞，牺牲奋斗，含辛茹苦，为国家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国际形势大变，我国抗战之舟，正随着国际怒涛之汹涌澎湃，而鼓浪前进。世界和中国，都是处于历史的转变关头。值此岁序更新之时，应当检讨既往，展望未来，确定一年奋斗之大计。

一九四一年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就是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营最后形成。苏德战争爆发，使世界战争的性质，为之一变。太平洋上日寇对于英美海盗式的袭击，将一切列强全部牵入战争漩涡。于是烽火弥漫全球，而人类从血与火的斗争中争取自由解放的事业，也奠定了始基。

希特勒曾在欧洲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到去年才在苏联遭遇了初次的挫败。德军由进攻转为防御。英勇的红军，取得了主动，开始了战略反攻的初步形式。德军许多高级将领之被撤职，表明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心日趋动摇。纳粹凶焰虽受打击，但其侵略野心和贪欲则并未停止。在太平洋上，由于日寇的狡诈偷袭和民主国家的准备不足，侵略者暂时取得了优势。这种情况虽不能影响战争全局，但对于民主国家，不能不增加若干

困难。罗丘<sup>33</sup>二次会谈，就是针对这种形势而谋应付之方策，使民主阵线无穷尽的资源和人力，在统一的计划之下，充分发挥其威力。

这就是一九四一年国际形势的轮廓。

一九四二年将是两大营垒间空前激战的一年。纳粹德国虽受很大消耗，但其基本力量还未消灭。希特勒为了保持其垂危的统治，必将进行更疯狂的冒险。苏联战场上，残酷的战争正在前面。在其他地区，纳粹亦可能发动新的蠢动。日寇在太平洋上，将继续其海盗行为，并可能加强其已得之优势。他在中国必将加强对我沦陷区的控制和掠夺，加强南北傀儡组织的卖国活动。在正面他还可能对我举行新的进攻。另一方面反侵略阵线的雄伟无比的力量，将日益发挥其作用。苏联红军将继续反攻，配合着英美的协助和被占领区域的游击战争，给予纳粹匪徒以致命打击。美国巨大的生产机构将为民主国家而加强其工作。英国人民将继续表现其豪勇的气概。中国将在亚洲大陆的战争中，尽其应有的作用。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将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程度。法西斯侵略者将遭受严重的挫败，民主国家将能获最后胜利之先机。

这就是一九四二年国际形势演变的远景。

国际新形势造成了对我国抗战的有利局面：第一，日寇的敌人增加了，中国的朋友增加了，因此中国抗战胜利将更有保障，而悲观失望的情绪，将愈益失去基础。由于我国对日德意的宣战，亲日亲德分子的阴谋活动将更为困难。伪军和伪组织将日益动摇而增加其对于祖国的倾慕。第二，中国与民主国家并肩作战，为了反侵略阵线的共同利益，为了使中国能够成为民主阵线中坚强的一员，中国必须加强团结，加强民主化的改革。这在某种范围内，就不能不影响我国抗战建国的方向。

但国际形势对于我国，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国际形势的好转，抗战胜利的更有把握，已在一部分人中引起速胜和轻敌的情绪。他们过小估计日寇与侵略集团的力量，以为不经长期艰苦的斗争，就可唾手取得胜利。这种情绪的发展，必然是懈怠、观望、等待别人，放松自己，而结果就是使抗战胜利的事业遭受损害。此外日寇在西南太平洋上的暂时优势，将会加强对于我国的封锁，使我们在取得友邦物资接济上发生困难。这对于今后的抗战、反攻的准备，也是有重大影响的。

国际形势发展预示我们：中国必然胜利，但胜利并非唾手可得，中国不是单独胜利，而是与民主集团共同胜利。胜利的迟早，决定于各个民主国家的努力，也决定于我们的斗争。中国努力的程度，不仅影响自己的胜利，同时影响民主集团的胜利。在这种整个国际形势之下，法西斯主义覆亡，民主制度昌盛，这又不能不决定中国将来应走的道路。瞻望世局，顺应潮流，我国应当配合民主集团，积极努力，在反侵略战争中，奠定民主政治的新中国的基础。

中国反抗日寇，五年于兹。日寇在华已有重大消耗，寇军百万，深陷泥淖，我们对于反侵略阵线，可谓已有贡献。不过以我国战场之广大，人口之众多，以及我国对于日寇地理的接近，我沦陷区对于日寇之重要，空前激烈的反侵略战争，对于我国将提出新的任务。新的任务要求我们迅速准备反攻。这是对于民主集团最有效的配合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牵制日寇使他无法集中全力，向英美进攻，并且增加其消耗，促其最后崩溃。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内部团结。因为反攻必须群策群力。而必须自己的团结，才能促成民主集团的团结。其理自明，无待赘言。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加强民主改革。因为欲求群策群力之发挥，舍民主无他途。而且中国是历史上民主传统缺



少之国家，欲求中国能在民主集团中，与各国并驾齐驱，则必须急起直追，在民主改革上，多所努力。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加强敌后工作，对敌后军民增加援助。今年是敌我猛烈争夺沦陷区的一年。沦陷区是日寇的生命线。他的困难愈大，则他依赖于沦陷区者亦愈多，而其控制亦愈紧。必须利用沦陷区同胞抗战信心的高涨，加强对于他们的工作。对于敌后艰苦奋斗的军民，应给予一切必要援助，使他们成为配合全国反攻之劲旅。最后，新的任务又要求我们发展民族经济。日寇加强封锁，固然使我们物资感受困难，而同时却对于民族经济之发展，造成有利条件。无论军队需要，民生日用，都要求民族资本在经济中发挥作用。政治机构必须适应这种需要。这是抗战之利，也是建国之利。

今年应是我们苦战五年的民族除旧饰新、翻身抬头的一年。激烈的斗争，沸腾的工作，都在等待我们。我们要善于把握时机，完成任务。这里主要的关键，就是反对速胜、轻敌、等待、松懈的情绪，提高严肃、紧张、积极、战斗的精神。

根据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 注 释

（1）指罗斯福、丘吉尔。

# 陕甘宁边区政府 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第一条 本条例以保障边区人民之人权财权，不受非法之侵害为目的。

第二条 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

第三条 保障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及依法之使用及收益自由权（包括土地房屋债权及一切资财）。

第四条 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权，于土地未经分配之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

第五条 租佃及债权债务双方，须遵照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一切租佃债约的缔结，须依双方自愿。

第六条 边区人民之财产、住宅，除因公益有特别法令规定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非法征收、查封、侵入或搜捕。

第七条 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处罚，但现行犯不在此例。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

非法行为之权。

第八条 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逮捕人犯应有充分证据，依法定手续执行。

第九条 非司法或公安职权之机关、军队、团体或个人，拘获现行犯时，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连同证据送交有检察职权或公安机关依法办理，接收犯人之检查或公安机关应于二十四小时内侦讯。

第十条 逮捕人犯不准施以侮辱、殴打及刑讯逼供、强迫自首，审判搞证据主义，不重口供。

第十一条 司法机关审理民刑案件，从传到之日起，不得逾三十日，必为判决之宣告，传当事人不受积延讼累。但有特殊情形，不能即时审判者，不在此例。

第十二条 司法机关受理民事案件，非抗传或不执行判决及有特殊情形时，不得扣押。

第十三条 除戒严时期外，非现役军人犯罪不受军法审判，如军人与人民发生争讼时，刑事案件在侦察完结后，军人交军法处，非军人送司法机关依法裁判，民事诉讼则由司法机关办理。

第十四条 人民诉讼，司法机关不得收受任何费用。

第十五条 被捕人犯之财物非经判决不得没收，并不得调换或任意损坏。

第十六条 区乡政府对该管区居民争讼事件，得由双方当事人之同意为之调解，如不服调解时，当事人得自由向司法机关告诉，不得拦阻或越权加以任何之处分。

第十七条 区级以下政府对违警以外任何案件，仅可进行侦察及调解，绝无审问拘留与处决权。

第十八条 边区人民不服审判机关判决之案件，得依法按

级上诉。

第十九条 各级审判机关判决死刑案件，已逾上诉期限而不上诉者，须呈报边区政府审核批准方得执行，但有战争紧急情形不在此限。

第二十条 边区人民曾因反对边区逃亡在外者，自愿遵守边区法令返回边区，一律不咎既往，并受法律之保护。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解释之权属于边区政府。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经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由边区政府公布施行。

根据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  
刊印。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

各局各区党委：

为着保证将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干部能迅速而安全的互相传送，除利用各根据地内运输司令部之武装交通兵团公开护送外，所有各个根据地之间，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路线。对于这一工作，特有以下规定：

(一) 由延安到各根据地应建立下面两个主要秘密交通干线，即一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由原平线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

(二) 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冀鲁豫、山东、苏北、华中等地最高党的组织，应即选派能力较强、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到与各邻近边区主要来往方向之边界建立强有力的对头交通据点。同时，每个据点应选派两个有社会经验秘密技巧的交通员向对方联络，各区应互相商讨对头交通据点之方位以及交通联络方法。

(三) 秘密交通线应采二至三线的设置与各种形式的掩护，不要单纯化与规律化。因此必须经常详细调查与研究封锁线及其附近敌伪情形与弱点，尽量利用他们的空隙去布置交通工



作，同时应多方搜集敌伪的身份证、护照等文件以及化装衣物，以备应用。

（四）在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秘书处之下，应指定专人设立交通科，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交通工作。

（五）应注意保证秘密交通路线的巩固与安全，所有交通人员通过秘密交通线时，在注意社会掩护与秘密技术之下，做到像本地人一样能经常来往。

（六）秘密交通线建立后，除整批干部与文件仍应由运输司令部派兵护送外，只有少数人员与文件才可经秘密交通线往来。

（七）电到后，望即讨论执行，并将执行情形电告。希望在二个月内能将各区间之秘密交通线建立完整，并能使用。

中央书记处

一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 ——关于成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事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

财政厅霍维德副厅长：

查我边区对于鸦片与毒品一贯悬为厉禁，惟抗战以后，由于敌区烟毒偷向我后方运售，遂已波及边区，若不重申禁令，难免死灰复燃。本府为贯彻禁政，根绝烟毒计，当经第四次政务会议决议，设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专司其事。并通过“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及“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各一种，以利进行。所有禁烟督察处处长一职，决定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除将任命状、禁烟督察处关防、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及查获鸦片毒品办法随令颁发外，仰即遵照组织，厉行查禁，并将成立情形启用关防日期印模一同具报为要。

此令

附件：组织规程一份

查获办法一份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代行折 周 文

## 附一：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

（一九四二年一月公布）

第一条 本规程依照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命令制定之。

第二条 边区禁烟督察处分设下列各级组织：

- （一）禁烟督察处；
- （二）禁烟督察处督察分处。

第三条 禁烟督察处设处长一人，承边区政府之命，领导分处执行边区鸦片以及鸦片代用毒品之查禁事宜。

第四条 禁烟督察处之内部组织及其执掌如下：

- （一）秘书室承处长之命，执掌下列事项：

关于文件之撰拟、缮校、收发、保管；

关于经费之收支、物品之购置、分发与其他应办之庶务；

关于人事之进退登记与勤惰之考核。

- （二）第一科承处长之命，执掌下列事项：

关于毒品案件之处理；

关于毒品及烟具之没收与销毁；

关于查缉毒品奖金之核发。

- （三）第二科承处长之命，执掌下列事项：

关于烟民之调查、登记与烟民证之发给；

关于烟民戒毒之督劝与调验。

（四）督察队承处长之命与分处长之指导，分驻各地，执掌下列事项：

关于毒品之查缉；

关于毒品案犯之看守与解送；

秘书室设秘书一人，科员文书各若干人。各科设科长一

人，科员若干人。督察队设队长一人，指导员一人，检查员分队长及队员各若干人。

第五条 督察分处设分处长一人，承督察处长之命及地方行政长官之监督，执行该分处所辖境内毒品之查禁事宜。

第六条 督察分处内部之组织及其执掌事项：

（一）文牍股承分处长之命，执掌第三条第一款所列事项；

（二）第一股承分处长之命，执掌第三条第二款所列事项；

（三）第二股承分处长之命，执掌第三条第三款所列事项。

前条督察分处只在重要城市设立，不普设各分区县市。

第七条 督察处督察分处得因工作之需要，于各重要地点设立检查站，酌派督察队驻守。

第八条 督察处督察分处之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九条 本规定如有未尽事宜，得临时呈请边区政府修改之。

## 附二：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

（一九四二年一月公布）

第一条 本办法为贯彻边区禁政，肃清边区境内之烟毒制定之。

第二条 凡查获鸦片毒品（吗啡、白面、高根、海洛因，以及制成的毒品药丸等），悉依本办法之规定处理。

第三条 无论部队、机关、团体或个人，皆有协助政府查获吸食或贩卖烟毒（以下简称烟毒）之责，但查获烟时，须将烟毒与人犯随时转送边区禁烟督察处或分处（以下简称督察

处)处理,一切非禁烟机关,概不得私自处罚人犯或没收毒品。

未设督察处之县市,查获烟毒,须随时送交当地政府转送该管分区或距离较近之禁烟机关处理。

第四条 督察处受理烟毒案件后,除将烟毒品妥为储藏准备销毁外,其人犯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内转交司法机关讯办。

第五条 凡查获烟毒者,概按下列规定予奖励:

(一)亲自查获烟毒案件送交督察处或当地政府者,给予奖金之全部;

(二)事前闻悉或目睹,随时向督察处或当地政府密报(书面口头均可),因而缉获者,给予密报人奖金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分给协同办案之在事出力人员。

(三)奖金之等额如下:

1. 查获烟毒不满五十两者,每两以二十元给奖;
2. 五十两以上不满百两者,每两以十五元给奖;
3. 百两以上不满五百两者,每两以十元给奖;
4. 五百两以上不满千两者,每两以五元给奖;
5. 千两以上者,每两以二元五角给奖。

(四)伪制代用品,如烟底等物,依前列烟毒十分之一给奖。

第六条 前条所列之奖金经督察处批准后,领奖人可随时向督察处或当地政府领取。

第七条 无论部队、机关、团体或个人,如将查获之烟毒原包顶替或从中偷换其一部分者,除扣发其奖金外,如系部队、机关或团体,由督察处随时呈报边府处理,如系个人,则送司法机关依法惩办。

第八条 查获贩运吸食烟毒人犯,除将人犯移交司法机关



办理外，其烟毒及烟具全部没收销毁之。

第九条 凡公安或其他与查禁烟毒有关机关，如查获贩卖或吸食烟毒人犯，应造具赃证清册连同人犯、烟毒、烟具一律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条 凡司法机关受理之贩卖或吸食烟毒案件，应于判决后，将烟毒及烟具全数移送禁烟督察处（或分处）处理。

第十一条 因施行查缉职务而侵占他人烟毒无关之财物者，依诈欺论罪。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  
刊印。

## 《文化课本》序言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

毛 泽 东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sup>〔1〕</sup>、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 释

〔1〕即何克全。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 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 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 subjective 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

---

\* 这个宣传要点是毛泽东在全党即将开展普遍整风之时起草的。

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

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 土地政策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行以后，曾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支持了敌后的抗战。凡在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彻底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而且能够保持工作的经常状态，安定社会的生活秩序，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但是这一政策，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在有些根据地内，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而在另一部分地方，或则还只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既未发布法令，更未动手实行。或则虽已由政府发布了法令，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在这些地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也就不能真正将群众组织起来，造成热烈抗日的基础。在这些地方，抗日根据地就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但是在另外若干地方，则又犯了某些“左”的错误，虽然这种错误只发生在一部分地

方，并且经过中央指示后已经大体上纠正了，但是还有引起各地同志加以注意之必要。当此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要求各根据地更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更加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另有关于执行土地政策的具体办法，作为附件，随此决定一并发下，以供各地采用。务望各地同志加以研究，认真执行。

（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

（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

（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

质的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四）上述三条基本原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四年以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而使日寇完全陷于孤立。一切过左过右的偏向，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五）在农村统一战线中，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例如地主反对或妨碍农民关于民主民生的要求等，必须按照上述原则作适当的处理。双方的合理要求必须满足，但双方都应服从于整个民族抗战的利益。在处理农村纠纷中，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站在农民或地主的某一方面，而是根据上述基本原则，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

（六）三三制政权，就是调节各抗日阶级内部关系的合理的政治形式。这一制度，必须在参议会系统中与政府系统中坚决的认真的普遍的实行。认为这一制度不过是一种敷衍党外人士的办的那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七）政府法令应有两方面的规定，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一方面，要规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对自己土地出卖、出典、抵押、及作其他处置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当地主作这些处置之时，必须顾及农民的生活。一切有关土地及债务的契约的缔结，须依双方自愿，契约



期满，任何一方有解约之自由。

（八）抗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须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

（九）减租减息实行之后，给予了提高农业生产的必要的前提，而农业生产是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的生产，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发展之。政府应举行大量的农业贷款，以解决农民借贷的困难。

（十）农救会的任务，在减租减息之前，主要的是协助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法令。在减租减息之后，主要的是协助政府调解农村纠纷与发展农业生产，而不是以自己的决定代替政府的法令，不是以农救代替政府。在调解农村纠纷的任务上，应取仲裁的方式，而不是专断的方式。在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上，应动员所有农救会员起模范的领导的作用。

（十一）既然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我党土地政策的第一个方面，既然各根据地内尚有许多地方并未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减租减息，而其原因，不是地主抗不实行，就是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因此，各根据地内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自己工作加以严格的检查，派员下乡分途巡视各地实行的程度，加以周密的调查研究，全般的总结各地经验，发扬正确实行的例子，批评官僚主义的例子。须知发布口号发布法令与实行口号实行法令之间，是常常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的，如不严惩官僚主义，反对右倾观点，就无法使口号法令见之实行。

（十二）既然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我党土地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既然各根据地内曾经发生过忽视这一方面的“左”倾错误，而其原因，不是农民不了解我党的土地政策，就是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或不完善。

全了解我党的政策。为着防止今后重复这种错误，就必须在党内农民群众中明确的解释党的政策，使他们明白现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是与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有根本区别的，使他们不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应把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联系起来，把局部利益与全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必须劝告农民，在实行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正如在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的问题上，必须劝告地主不应该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要顾及将来与全民族的利益，是一样的。

## 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附件

由于各根据地情况不同及在一根据地内情况亦有不同者，故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不能统一施行整齐划一的制度。中央在关于土地政策决定内规定了统一施行的原则，而在本附件内则根据此种原则提出具体办法，以供各地采用。本附件内所列各项，凡与各地实际情况相合者，均应坚决执行之。其有不合情况而须变通办理者，各地得加以变通，惟须将变通之点报告中央，并取得中央之批准。

### 附件一 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

(一) 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区，其租额以减低原租额百

分之二十五（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不论公地、私地、佃租地、伙种地，也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适用之。各种不同形式的伙种地，不宜一律规定为依地主所得不超过十分之四，或十分之六，应依业佃双方所出劳动力、牛力、农具、肥料、种子及食粮之多寡，按原来租额比例，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可比二五减租还少一点，只减二成、一成五或一成，以能相当发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战为目标。

（二）地租一律于产物收获后交纳，出租人不得向承租人预收地租，并不得索取额外报酬。

（三）定租（铁租），因天灾人祸，其收成之全部或大部被毁时，得停付或减付地租。

（四）多年欠租，应予以免交。

（五）公粮公款，按累进原则，由业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由土地所有者负担之。

（六）地租原约定以货币支付者，因纸币跌价而发生争议时，政府应召集业佃双方协议调解，并得将货币地租之一部或全部，改为实物地租。

（七）如设有评租委员会等调解机关的地方，须有农民、地主、政府三方代表参加，但政府有最后决定权。

（八）在租佃契约上及习惯上有永佃权者，应保留之。无永佃权者，不应强迫规定。但可奖励双方订立较长期的契约，例如五年以上，俾农民得安心发展生产。

（九）无永佃权之地及契约期满之地，出租人有依约处置之自由，包括转让、出典、出卖、自耕，及雇人耕种等项在内。但在抗战期间，地主收地，应顾及农民生活，并须于收获前三个月通知承佃人。原承佃人太穷苦者，应由政府召集双方

加以调剂，或延长佃期，或只退佃一部。

(十) 出租人于契约期满，招人承佃或出典出卖时，原承租人依同等条件有承佃承典承买之优先权。

(十一) 出租人出卖有永佃权或契约期限未滿之地，原承租人有继续佃耕之权，非原约期滿，新主不得另佃他人。

(十二) 承租人在二年内无故不耕，或力能付租而故意不付者，出租人有收回土地之权。

## 附件二 关于债务问题

(一) 减息是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为适应债务人的要求，并为团结债权人一致抗日起见，而实行的一个必要政策，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至于抗战后的息额，应以当地社会经济关系，听任民间自行处理，政府不应规定过低息额，致使借贷停滞，不利民生。

(二) 债权人不得因减息而解除借贷契约，债务人亦不得在减息后拒不交息，债权人有依法诉追债务之权。

(三) 凡抗战后新成立的借贷关系，债务人到期不能付息还本，债权人有依约处理抵押品之权。如有争议，由政府判处。同一抵押品而担保数债权人者，其卖得之价格，按各债权契约先后，依次按比例清偿之。抵押品如为土地（押地），照此办理。

(四) 凡典地尚未转成买卖关系者，出典人随时可用原典价依约赎回土地，不得用抽地换约的办法。如已转成买卖关系者，不得赎回。因纸币跌价而在赎回典地时所生之争议，由政府调处之。

（五）凡抗战后成立的借贷关系，因天灾人祸及其他不可抗之原因，债务人无力履行债约时，得请求政府调处，酌量减息，或免息还本。

（六）因纸币跌价，债务人用纸币还债而生之争议，由政府适当调处之。

### 附件三 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

（一）凡罪大恶极之汉奸的土地，应予没收，归政府管理，租给农民耕种，以示惩罚。其家属如未参加此种汉奸活动，或其情节较轻者，不在此例。

（二）被迫汉奸的土地不应没收，以示宽大，争取其悔过自新。无人管理者，由政府代管，租给农民耕种，俟其回家抗日，即发还之。

（三）凡逃亡地主，不论其逃至何处，其土地不得没收。无人管理者，由政府代管，招人耕种，并保存其应得地租，代交田赋公粮。原主回家时，将其土地及应得地租一并发还之。

（四）凡没有税过契或没有纳过税的黑地，不许没收，而限期责令业主税契纳粮。如逾期仍不税契不纳粮时，由政府给予相当的处罚。

（五）族地、社地，由本族本社人员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以其收入作为本族本社或本地公益事业之用。

（六）学地留作教育经费，由政府或本地人员组织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之。

（七）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

（八）公荒，由政府分配给抗属、难民、贫农开垦，并归

其所有。在一定期限内，免除或减少其税收。

（九）私荒，不论生荒熟荒，应先尽业主开垦。如业主无力开垦任其荒芜时，政府得招人开垦，并在一定期限内，免除或减少其租税。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原主，但开垦者有永佃权。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

(一九四二年一月)

周恩来

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沉机观变，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以实现中央给我们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的条件是：

一、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

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

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

---

\*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议最后发言，这是发言中关于西南党组织的任务部分。

的教育等)中体现出来。

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

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

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

这七点都做到了，我们西南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 整顿党的作风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毛泽东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现在我来讲一讲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

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念。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

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做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

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其次讲一讲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践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

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做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

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



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

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我来讲一讲宗派主义的问题。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不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

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

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

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的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



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

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



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 春耕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

春节已到，开展春耕运动，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当前最中心最重大最关系全局的任务。各地对于今年春耕业已有所布置，兹为引起同志们注意起见，特指出如下各项：

（一）根据地经济建设，其基本重心应放在发展农业，私人生产上面，才能解决政府的巨额预算，保证全体军民的充分粮食及各种生活必需品，如衣服、纸张、油等的原料，才能改善群众生活与粉碎敌人对我经济上的封锁破坏，坚持根据地。而今年农业生产能否胜利完成，全看春耕运动是否做得好，全看各地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能否在目前抓紧这一中心工作，造成广大群众的生产热情，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动员所有的党政军民力量，除作战外都集中去为完成这一任务而斗争。

（二）除麦子外，必须在各地下种以前，就将一切春耕动员的一切准备工作完全做好，包括政治动员及实际帮助群众，解决一切春耕中的具体困难问题（如对种子、肥料、农具、耕牛、粮食缺乏者，必须设法调剂和补充，对抗属缺乏劳动力者，实行代耕或劳动互助）。必须正确解决主佃间、劳资间的争议，使双方都乐于提高生产，必须对兴修水利，消灭熟荒开

生荒，预防害虫，奖励生产，植树，改良种子，改良耕种技术，增加产量，发展副业，种植一定数量足供全区军民需要的棉花等，都有具体的计划。必须把妇孺老弱及难民、游民均组织到生产战线上去，必须使广大群众在春耕中的生产积极性提得非常高，必须于春耕前将各种准备工作做好，才能保证春耕任务之完成。要使这一工作做好，党与政府决不是定出计划发布命令就完事，必须动员所有得力干部，都到下面去切实检查与具体帮助才有保证。

（三）在春耕农忙时期，必须尽量减少群众支差、动员及开会，尽可能发动一切人力、物力、畜力到春耕战线上去。

（四）政府今年的建设经费，必须以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以上用作农贷（包括合作社贷款在内）。只有靠农民生产之扩大，才能改善农民生活，也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陕甘宁边区一千万元建设经费中，决心以七百万元投入私人农业，就为这一目的。

（五）各机关各部队在不妨害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内，亦须积极参加生产，各单位应订出自己全年生产计划，主要是放在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上，而不是放在商业上，尽可能做到生产本单位几个月或全年足够的菜蔬、油、肉及部分的粮食（没有耕地者可向人民租种或伙种）。并尽可能动员一部分人力、牲口帮助群众春耕，以增进军民关系。陕甘宁边区目前实行的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就是除政府发给粮食、衣服及一部分伙食费、办公费外，各单位须自己解决约一半的伙食费办公费。为此目的，政府须对各单位贷给必要的资本，敌后根据地中，许多地方不可能实行这一制度，但若干地方还是可能的。

（六）号召全体党员在春耕运动中起模范作用，各机关、

各部队中的干部和士兵，也应努力在生产中起模范作用，帮助群众耕种，并采用竞赛奖励等方法，造成广大群众在春耕运动中的生产热潮，完成今年各根据地扩大农业生产计划。

（七）必须估计到敌人可能来扰乱破坏我们的春耕工作，因此应当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敌情，有计划的准备武装保卫春耕，并克服敌人所加于我们的各种困难。

中央书记处

二月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一)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是综合五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使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可以争取回来。

(二) 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

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争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些过左行动，而这些过左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种时候，畏首畏尾，束缚群众手足，就是右倾错误，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应被联合抗日的战略方针所限制，不能拖得过长，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以致迫使地主阶级跑到敌顽方面坚决反对我们，或跑去了也不愿回来，妨害抗日战争与妨害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党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限制这些过左行动不发生，以致妨害群众之充分发动与充分起来，而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充分起来之后，能够及时的说服群众，纠正过左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戴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一切打倒，而是争取一部分倾向我们的地主（打中有拉），中立（麻痹）一部分动摇不定的地主，集中火力打击一部分最顽固的地主（但与内战时期打击地主的内容与形式都不相同）。在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中，我们必须极力表示宽大，认真实行三三制与交租交息，认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在这种时候，如不着重说服党员，说服农民，争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与敌顽的联合，就有使我党与农民陷于孤立以至失败的危险。但在纠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评

中，必须同时注意到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热烈情绪或热气，须知我们正确地批评过火行动与宗派主义，决不是向这种热气泼冷水，以致造成干部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争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酝酿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还是优势，农民还正在准备斗争。如果把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则实行斗争（打）为第二阶段，团结抗日（拉）为第三阶段。在晋察冀区域，除了雁北及平西两区尚未普遍与彻底按照党的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其他基本区域是都经过了酝酿、斗争、团结这样三个阶段的，这是最正常的策略模范。在其他若干根据地中，也有这种模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执行联合抗日这个战略方针的总过程中，应该极力注意的策略阶段。

（三）各地过去在执行土地政策中所发生的过左错误，大体已经纠正。在今天，一切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而地主又已不生严重争议的事件，应作为已经解决，不再变动，维持良好的抗日秩序。但对三三制之没有彻底实行及地主农民间尚有重大争议的事件，仍须着重纠正错误。

（四）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因此，目前应当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须检查这一问题，对此问题如有某些人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须向他指明加以纠正。

(五) 在农民已经充分发动彻底执行了减租减息，经过了打的阶段，因而进入了拉的阶段的地区，由于我们开展自我批评，纠正过火行动，彻底实行三三制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地主阶级必然要抓住新政策之有利于己的方面，加以扩大，和农民作斗争。由于今天根据地内部在此阶段（拉的阶段）内，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而文化落后的农民群众甚至区村干部，遂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或被地主收买操纵区村政权，或被地主打击而不敢回击。因此必须教育县区村三级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习政府的法令，熟习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六) 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在减息问题上：第一，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算公账与算私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才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允。第二，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同时政府每年的建设费中，应以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投于农村，作为对农民的低利贷款（包括合作社贷款在内），以发展各根据地的基本的农业经济。而只以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投于公营工商业及私人商业。须知发展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利益，而且就是扩大政府税收的最大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解决财政问题基本政策。

(七) 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其三个附件，



都已公开发表，各地应即公布，广为宣传，认真实行。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实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的。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每一根据地内，应利用会议、党校及文电使党的基本干部懂得中央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然后经过他们，使下级干部懂得，使这种具体的策略教育确实收到成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 关于法币贬值各根据地应采取 的对策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与香港均成死港。据闻国民党早有准备放弃维持上海香港法币之说，就目前趋势观之，似已迫成事实。查上海法币流通量约有八九十万万元，其中除一小部分小工商业者手中外，大部分是操之于大官僚大资本家手中，向以投机外汇为主要出路。今外汇市场内移，沪港黑市渐告消灭，此项法币向后方逃避是很有可能，如此，则法币在大后方的流通量势将倍增，其购买力亦将因之而愈益下降。

重庆国民政府今年预算总额为二七〇万万元，收入计：税收五五万万元（其中包括田赋二〇万万元，盐税一〇万万元，专卖税二〇万万元，直接税二点五万万元，关税二点五万万元），公债二四万万元，粮食库券二〇万万元，美国借款四〇万万元，共约一三九万万元，财政赤字在一三〇万万元以上，赤字的弥补，主要是依靠增发通货，法币发行量原已达二〇〇余万万元，如再继续大量发行，其购买力必严重下降，反过来会使财政赤字更加扩大，故传闻国民党有发行新货币之说。在

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困难日益严重，太平洋战争初期将继续对日有利，沦陷区法币内流的情况下，发行新货币也是有可能的，但不管如何，印刷机将开足马力，加速运转，法币的购买力将继续下降，则毫无可疑。

法币购买力严重下降，对于各根据地的金融与物价或轻或重可能遭受到以下的损失及影响：（一）在流通与储蓄法币的地区将遭受法币跌价的损失及影响物价高涨。（二）已经停止法币流通的地区，而边币信用尚欠巩固或与法币联系较密切者，边币的购买力可能受法币跌价之影响而随之下降，物价亦必上涨。（三）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边币信用将随法币的跌落而受到影响。（四）敌人可能以大批法币用各种手段向我根据地抛出，吸收我资源，捣乱我金融，同时敌人为了应付战争，在敌占区可能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今后伪币的购买力也必然日趋下降，这对于我们边币也会发生同样的影响。

为此，各根据地不能不预为防范，以避免或减轻上述可能遭受的损失及影响。今后各根据地在金融上总的方针应当是：（一）建立独立的与统一的金融制度，以维护根据地的资源，财政上应努力发展私人经济特别是农业，以其税收收入来解决财政问题，不要依靠发行钞票为主要来源；（二）对外贸易应实行相当管理，要尽量做到以货易货，有计划的管理主要贸易，以剩余生产品，换进缺少或不足的必需品；（三）要向着自给自足的路上发展。然各根据地的具体条件与环境是不相同的，目前可能遭受的损失及影响，当然也不会一样。因之，我们的对策不能不依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分别如下：

一、华北各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处，在政治

上经济上都具有比较巩固的基础，边币的信用相当高，法币的信用反而逐渐下降，法币不但在境内不能流通，并且也极少储蓄。在对外支付上，由于完全处于敌后方，贸易的对象是敌占区，可使边币与伪币暗中联系，采取以货易货办法进行之，完全不用法币是没有问题的（晋东南与晋察冀边区已这样做了，并无问题发生）。不过在这些地区内，可能发生的问题是敌人可能用政治上的宣传，经济上的利诱，特别是配合军事“扫荡”以大量法币（战前华北保有法币约六万万到八万万元）向我根据地特别是不大巩固的区域驱入，吸收我资源，扰乱我金融。我们的对策，除了与法币断绝联系外，并应：（一）在经济上实行必要的反封锁，发展生产，利用代替品（如晋东南以核桃油代替煤油，以火镰代替火柴），减少输入；（二）在政治上宣传法币跌价的必然性，并在各主要地区附近压低其价格，以边币换吸一部分，乘机使边币流通范围向外扩展；（三）如法币已经挤入我区时，应相机贬值收回，以免侵犯我边币之流通，吸收进来的法币，一部分设法于最短期内迅速送中央，一部分通过私商抛出境外，换回货物。

二、华中各根据地——如鄂豫、苏北等地，军事变动性很大，政权基础不甚稳固，因而，我们在经济上对敌很难做到严密而有效的反封锁，在金融制度上又都未建立起来，对内对外法币还是主要的流通工具，我们所发行的流通券，还是一种临时性的货币，为数很小，信用又在法币之下，因此，在这些地区内，想停用法币或与法币断绝联系以及阻止敌占区法币的流入，目前是办不到的，只能从减轻法币跌价所给予的损失方面想办法：（一）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并可允许成立钱庄发行地方辅币；（二）以边币或地方辅币吸收境内法币以扩大边币或地方辅币流通范围；（三）在相当巩固的一定区域，有

可能时动员党政军民、公营商店、合作社，将所得之法币随时随地交给贸易局向境外换回货物，不得再用于境内，更不应囤积，以减少法币在境内停留所遭受的损失。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关于根据地各级青委组织 与工作暂行条例

(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

为着使青委的组织关系、工作任务划一分明，根据中央屡次决定，做出如下各项规定，作为目前暂行条例实施之。

### (甲) 为什么要设立青委？

为了使中国青运更适合于非党的，广大群众的，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在组织上实行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改造，并以各式各样的青年组织形式，去代替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单一组织形式，使党对青运组织上的领导方式由直接的变为间接的，由单一的变为多样的。为适应这种变换了的环境，保障和加强党对青运有系统有计划的领导，以争取广大青年群众及其组织团结于我党周围，故在党内设立青委，作为实现党领导青运的专门部门，既然青委只是为着适应特殊复杂的环境而设，故它带有临时的过渡性质。

### (乙) 青委的组织

1. 目前只在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各级内设立青委。

2. 区党委以下，一般不设青委，区党委以下各党部为着便利领导青运起见，在青年群众团体内，成立党团，直接受各该级党委领导，但个别地区的地委，如有特殊情形（如友党友军杂处之区，或情形特别复杂之区，或临近敌伪大城市之区，或青年工作刚在开辟，尚无统一青年群众团体，或是孤立敌后而与区党委联系困难）得区党委同意，可暂时设立青委。

3. 各级青委委员，视工作之需要，由同级党委规定指定三或五人组成之。此等青委委员均须实际参加该级青委工作，不得徒挂空名。

4. 在各级青委中，由同级党指定一人或二人担任青委书记或副书记，其他委员则按工作性质或地区具体情形，由各级青委自行酌量分工负责。

5. 无论何级青委，凡在自己所辖范围内，同级的统一青年团体已建立时，便需将青委全部工作人员转入到同级的青年团体领导机关内，使青委与党团合一，加强青年群众团体的领导（若有特殊必要时可留一人于党委机关内，以便保持与党委经常联系）。

6. 区党委以下同级青年团体（如青救、青抗先、学生会等）组织统一的党团。

### （丙）青委的领导关系

1. 青委为同级党委下所属部门，须绝对服从同级党委之领导，青委的一切较重要决定指示，须经过同级党委的审核与批准，可用青委名义发出。

2. 如青委负责人非党委委员时，各级党委应经常派常委出席青委重要会议，指导和检查青年工作，党委常委会如讨论

重要问题亦应尽可能吸收青委或党团负责人参加。

3. 各级青委经过同级党委的同意，可派巡视员指导检查下级青年工作，遇必要时，并可召集青年工作者会议。

4. 各级青委可协助同级党的组织部配备和调动青年工作干部，上级青委对下级青委干部调动有意见时，可向同级党委或组织部提出。

### (丁) 青委的任务与工作

1. 各级青委总的任务为：

- (一) 研究和了解青年运动的情况；
- (二) 掌握青年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 (三) 调剂青年运动的干部；
- (四) 不断学习提高自己。

2. 青委工作范围，在于组织与教育青年一代，积极参加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凡属青年团体及与青年有关的部门，青委均应设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配合，并尽力协助与指导之。

3. 在自己所管辖范围内，细密的调查研究有关青运的材料，总结经验，探讨方式方法，计划与指导当地的青运，向同级党委提出青运的报告，并有责任向上级青委报告。

4. 检查下级青委及青年工作。

5. 帮助同级党委有计划的培养、审查和调剂青运的干部。

6. 有计划的利用当地的报刊，并在可能条件下创办青年的报刊，反映青运情形，指导青运工作及教育青年。

7. 有计划的搜集青运材料，向外宣传。

8. 有计划的及时的推动与帮助自己所领导的青年团体进



行当地的及周围附近区域的青年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关于根据地各级妇委组织工作条例

(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

### (一) 妇委的组织

(甲) 目前只在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各级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地委以下的党委不设妇委，但当地尚无妇女群众团体（如妇救、妇联）或工作带独立性的地委或县委可暂设党的妇委，以便领导妇女工作。

(乙) 各级妇委之人数，由同级党委指定三人或五人组成之，但妇委委员必须参加实际工作，不得徒挂空名，各级妇委由同级党委指定一人为妇委书记，或再指定一人为副书记，其他委员则按工作性质与需要分工负责（由妇委自己决定，但不必分部、科）。

(丙) 各级妇委如无适当的女干部负责时，可暂时由适当的男同志兼任，但必须是真有时间与能力领导妇女工作者，且须在工作中积极培养女干部。

(丁) 地委以下妇委原有的工作人员全部转入当地妇女群众团体，使妇委与党团合并，在妇女群众团体内组织统一的党团，各级党委经过党团去领导各该地的妇运，上下级党团不发生领导关系。

## （二）妇委的工作任务

（甲）各级妇委的任务为调查研究当地妇女生活与妇运情况，掌握妇运的方针政策，调剂与教育妇运干部。

（乙）各级妇委的工作范围：

（1）根据地妇女运动的任务，在于领导妇女群众团体去进行组织与教育各阶层妇女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和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在争取抗战胜利的前提下，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凡属当地妇女团体及有关妇女工作的组织，妇委应与之密切联系，并尽力协助或指导它。

（2）各级妇委应切实调查研究当地有关妇女运动的一切材料，总结经验，计划与指导当地的妇运，向同级党委及上级妇委作定期的妇运报告，向下级妇委进行工作的检查与指导。

（3）有计划的利用当地报纸刊物，生动活泼的反映当地妇运情形，指导妇运工作，教育妇女群众并对外宣传。

（4）帮助同级党委培养审查配备妇女工作的干部。

## （三）妇委的领导关系

（甲）妇委为同级党委直接所属部门，须绝对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关于妇运的一切较重要的决定与指示，须经过同级党委的审查和批准。

（乙）各级党委对妇委工作的领导与对妇委干部的教育，应切实负责和特别关心并指定专人经常的耐心的领导，如妇委负责人条件适合应吸收她参加党委，否则党委应派常委出席妇委会议指导和督促其工作，党委开会时应尽可能吸收妇委与群

众团体党团负责人参加。

(丙) 各级妇委可派巡视员或工作团指导检查或调查了解下级妇女工作，遇必要时并可召集妇女工作会议。

(丁) 各级妇委可帮助同级党的组织部干部部配备调动妇女工作干部，上级妇委或同级妇委对干部调动有意见时，可向同级党委或干部部提出。

(戊) 上级妇委对下级妇委指示工作时，必须经过下级党委。下级妇委向上级妇委作工作报告时，也须经过同级党委。

(己) 各级妇委对妇女群众团体的领导必须经过党团，不得直接干涉或代办其工作。

#### (四) 各级妇委的同志必须：

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提倡学会调查研究、掌握政策与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反对满足现状、铺张浮夸的习气，纠正把妇女工作突出一切或者忽视妇女工作而不安心工作的倾向。

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妇委会通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反对党八股<sup>\*</sup>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毛泽东

刚才凯丰<sup>[1]</sup>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

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

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



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

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问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互”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彡”字。这位同

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奇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許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

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

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三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 ABCD，小 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

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



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

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痼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



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 and 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

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

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 注 释

〔1〕即何克全。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 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 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在去年中央政治局多次的讨论到遵义会议前，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后，同时指出这种错误的残余，到今天还存在于党的许多部门、干部、党员中，未能肃清。中央在这一时期内接着发表了关于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决定，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十一月六日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宗派主义的演说，今年二月一日又在中央党校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学风（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反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党八股）的演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党八股的演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这些决定演说及指示的主要内容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这些决定演说指示发出后，曾引起了党内的注意和讨论，但是中央的这一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并没有贯彻到整个党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在宣传教育部门中没有把贯彻党的这

一思想作为自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因此，提醒各级宣传部，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中央的这一思想，务必把目前一切宣传活动和工作的中心，以宣传解释党中央这一思想为中心，务必在这一思想之下改造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干部学校教育，检查在职干部教育，检查报纸刊物，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流毒于党，就造成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离开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搬用教条公式，死记书本上的理论，在抽象空洞的理论内打圈子，不注意研究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不能解答在实践生活中所提出的实际问题，轻视对于周围客观环境客观事物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夸大局部，否认经验，自以为是，于是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损害党损害革命。

宗派主义流毒于党，就是造成党内的排内性和排外性，打击干部夸大干部的错误以提高自己，责人严责己宽，在党内闹独立性，个人突出，风头主义。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在新老干部等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团结；在这部门与那部门工作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在党员与非党员，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关系上，不注意关心和了解非党干部，不能好好的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党员包办，党气凌人，甚至轻视排挤非党人士，结果就会造成党内不团结党外脱离群众两种危险现象。

党八股流毒于党，就是使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最后藏身之所，夸夸其谈，长篇大论，引证抄袭，毫无创见，模仿一套，到处运用，这样就束缚党员思想，失去生动活泼的气象，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感觉。

各级宣传部必须根据上述中央的决议及毛泽东同志的演说

彻底改造宣传教育工作，广为宣传解释，贯彻党的路线和思想，今后各级宣传部的活动和工作，务必与整个党委的活动和工作密切联系和配合，高级宣传部（包括区党委以上的）要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策划如何把党的每个政策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贯彻于全部党的工作中、指导党的思想、要能及时的反映党内各种倾向，找到纠正的正确办法。如果把宣传部的工作看作单纯的编报编书写文章传单等工作是非常不正确的观点，如果把宣传教育工作看作是搬运和贩卖抽象的空洞理论更是非常有害的观点，必须把宣传部的工作接近党的实际活动。各级宣传部对中央及各地高级党委各项政策和决议，务必贯彻始终，宣传解释，检查反映，不要离开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去空空洞洞的宣传，也不要只空空洞洞的宣传一顿，而不去切切实实的检查反映，这样的宣传工作是离开实际的也就得不到效果。各级宣传部务必改变本身工作的作风，要在宣传教育部门工作中造成一种新的作风，这就是活的、生动的、与实际相联系的工作作风。各级宣传部必须将上述中央决议演讲指示所进行的情形，反应结果，随时报告中央宣传部，并将进行中所发生的疑难及问题随时向中央宣传部提出，我们并准备随时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问题。

中央宣传部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一号）

——总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一）抗战以来，特别是从中央号召加强干部教育，提倡学习运动以来，部队中已普遍的掀起学习热潮，各级干部都进行了一定的教育，并获得了初步的成绩。一二九师的轮训制度，对在职干部学习，是一种有效的办法。此外，并经过抗大分校、教导队、训练班等，培养了成千成万的新干部。

但是，在我们的教育与学习上，还存在着许多原则上的缺点。主要的是在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倾向，其表现为：

1. 忽视甚至否认对于本身业务以内的教育（如指挥员研究军事，参谋人员研究参谋工作，政治人员研究政治工作等），没有执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各部门工作计划的讨论与战斗的总结等，是业务学习的主要内容与方式。但过去除了一些琐屑事项外，很少或没有联系到研究与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其结果使教育与工作（作战）脱离，使工作质量难以提高，使工作难以进步。

2. 不重视文化教育（国文、数学、史地、理化等），其结果由于干部文化水平低，知识少，致军事政治教育也难深入，并障碍了干部的进步。

3. 一般的不重视军事教育，即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军事教育领导机关不健全，军事教育的正规制度未建立，其结果使我军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影响到我军战斗力之提高。

4. 在一般干部比较重视的政治教育中，也只抽象的去学习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以为学习马列主义，只要阅读马列著述就够了，可以不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当前环境的具体情况，党的政策之具体运用，结果使理论与实际脱节，所学与所用脱节。同时教育计划太高，平均的要求所有干部都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结果除了背诵一些政治术语、经济术语以外，很难有所收获。

此外，在解决学习的具体问题上，如教材之编辑供给，教员之设置等等，也还没有集中力量来注意。

今后在实行精兵简政，部队缩编时，应抽调干部入校受训，不要降级使用。未实行轮训制度的部队，立即计划实行，在职干部的教育的内容，必须改造。总之，今后干部教育，必须纠正过去缺点。确定如下之方针：

（甲）教育的基本内容，分为军事、政治（二者都包括业务方面与理论方面的学习）、文化三大部门。

（乙）学习的基本原则是：

1. 军事干部以学习军事为主，政治干部以学习政治为主，技术专家，以发展其专长为主。

2. 文化水平在相当于初中程度以下之老干部，首先以学习文化为主，文化水平在相当于高中程度以上者，则以学习政



治或军事为主，文化为副，但学习文化仍然是必要的。

（丙）业务学习是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业务学习是学习本行的理论与实际。大而言之，军事干部学习军事，政治干部学习政治，但更具体的说，军事干部中，有指挥员、有参谋人员、有侦察工作干部、有军事教育工作者。政治干部中，有宣传工作干部、组织工作干部、锄奸干部等等。上述各种干部除一般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外，必须特别学习本身专门业务。学习的计划与内容见第五号指示。

（丁）学习时间之分配，在职干部依照两小时学习制，学校以每周六天计，大体如下：

1. 在职干部中，相当于高中以上水平者：

军事干部——军事约占六分之四，政治、文化约占六分之二。

政治干部——政治约占六分之四，军事、文化约占六分之二。

2. 在职干部中，相当于初中以下水平者：

军事干部——文化约占六分之三，军事约占六分之二，政治约占六分之一。

政治干部——文化约占六分之三，政治约占六分之二，军事约占六分之一。

3. 专家干部——专门知识学习约占六分之五，政治约占六分之一，其文化程度太低者，从专门知识学习时间中抽出必要的时间学习文化。

4. 在校学习之干部，其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以下者，应编入预科，其军事队与政治队的时间分配，可依照第二条规定。

5. 在校学习之干部，其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程度者，军事班与政治班的时间分配，可依照第一条。

（戊）学习的指导机关：

1. 军事教育，由各级参谋部负责。

2. 政治教育，由各级政治部之宣传部门负责。

3. 专家干部的教育，由旅以上之专门部门负责，但其政治文化教育，仍归政治机关负责。

4. 各级军政首长，应把干部教育，看成自己领导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己）轮训制度为教育在职干部之有效办法，团轮训班排级干部，旅（分区）轮训连排干部，师（军区）轮训营以上干部。务期于一定时间全体干部均能受到轮训，第一次轮训完毕后，可进行第二次轮训。

（庚）师（军区）办抗大分校，除培养连排干部外，应竭力抽调营团干部加以深造，教学时间应较长一些。总部军部更宜集中注意力深造团以上军政干部。

（辛）确立干部教育中的定期考试制度。如学生入校及毕业时，轮训班开始及结束时，均须举行考试。在职干部则须举行定期的考试，以测验我们干部教育的成果，以改进往后的教育内容与方法。

（壬）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具体计划，另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号指示规定之，其中关于课程方面，系按一般标准规定者，各地得依情况，酌量减少，总以少而精、能消化及不损害干部健康为原则。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 教育的指示（第二号）

## ——军事教育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 一、军事教育包括：

- （1）军事理论教育与技术训练。
- （2）军事业务（战斗、战役、指挥、战斗勤务、军队管理、参谋业务等，另见第五号指示）。
- （3）军事生活锻炼（我军传统作风教育与锻炼，锻炼的纪律养成，革命军人习惯姿态道德品质等之养成，革命军事干部性格风度之养成等）应注意如下：

A. 军事理论与技术教练，要求贯彻理论与实战联系，作战与教练联系（部队作战经验，必须反映到军事学校中，作为教练之主要内容，并使各军校之教练，能适应作战之要求）。务使学的能用来打敌人。

B. 军事生活的锻炼，除在日常管理中，会议的批评中进行外，并得于一定时间（如一月一次）或纪念节日，由部队首长专门举行关于我军传统教育的报告。

### 二、军事教育的正规制度与课程：

分为在校的、轮训的、在职的三种。

（一）在校的：

分为教导队与抗大诸分校二项：

第一项：教导队（一般由旅或分区办，培养班长与副班长，时间四个至六个月）其军事课程规定如下：

甲、战术与教练，由单个教练到排教练，及连战术之一部，重心在班教练与战士动作。

乙、兵器与射击：

1. 各兵器之性能、拆卸保管、使用法与故障排除。
2. 基本射击预行演习及射击实施，战斗射击预行演习。
3. 班排射击指挥。
4. 防空、防毒、防坦克、防骑兵常识。

丙、工事与伪装：

1. 单个战壕，轻机枪掩体，敌火下的土工作业，步班机班的战壕及障碍物。

2. 单人伪装、作战壕之伪装。

丁、内务条令摘要。

戊、纪律条令摘要。

第二项：抗大诸分校（一般由师或军区办）。

甲、抗大步兵科（培养连排军政干部，时间一年），凡曾受与上列教导队同等教育、经测验及格者，得入抗大诸分校之步兵科（或政治科），其未受上述教育或经测验不及格之初级干部和未曾入伍过之知识青年，则应先入教导队或在抗大分校内附设预科或入伍生队，以行补助教育，其时间与课目与教导队同。步兵科之军事课程如下：

1. 战术与教练：战术课由班到营及战术概则，重心在连。
2. 兵器与射击：

- (1) 重机枪之性能、拆卸、故障排除、保管及使用。
- (2) 基本射击教育及战斗射击之预习。
- (3) 排连之射击指挥。
- (4) 现代兵器常识（着重防卫法）。

### 3. 工事与伪装：

- (1) 各种战壕及诸步兵火器掩体之构筑，与作业指导。
- (2) 连野战阵地之构成（包括伪装、障碍）。
- (3) 单人伪装与部队伪装。

### 4. 简易测绘。

### 5. 内务条令。

除复习上列教导队所有内容外，并加连长职责，营舍秩序，各种制度，军队卫生等项。

### 6. 纪律条令。

### 7. 卫兵勤务摘要。

乙、抗大上干队（培养营团干部，时间一年半）——入学条件，要求有连营战斗指挥经验，并受过与步兵科大略同等之教育，经测验认为合格者，至于有战斗指挥经验之连营长，文化太低，不能自由笔记与阅读课本者，则应先入预科。

关于上干队之军事课程如下：

1. 战术与教练，步兵战术全部，由排起至概则及特种战斗，着重在营，兵团战斗之一部（概则）与团的战术。

### 2. 兵器与射击：

- (1) 步兵兵器全部。
- (2) 山炮之性能与步炮之协同法。
- (3) 现代兵器概说。
- (4) 射击学理简说。
- (5) 射击教育。

(6) 连营之射击指挥。

3. 工事及伪装，除同步科外加：

(1) 营的野战阵地之构成与指挥。

(2) 各种障碍物与障碍地带之构成。

4. 地形测绘。

5. 内务条令。

6. 纪律条令。

7. 营的参谋工作。

8. 管理与教育。

(二) 轮训的：

分团办、旅办、师办三种轮训班。

一、团部办的轮训班，轮流训练正副班长及一部副排长，每期一月至两月，轮训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正班长与副班长轮流受训，其目的在经过已轮训的班长（或副班长），去进行对部队的某一时期某一课目的训练，所以轮训班的军事课程，应适应以本部队中行将进行的课目，并应力求少而精。第二种，是在正副班长中各抽一部轮训，目的在提高班长之军事水平。其课程亦应与准备在部队中进行的军事教练课目相联系。上述两种方式，可依各团自己底状况与需求，由团司令部有计划的组织之。使所属诸班长，在受过数次轮训后，其所受军事教育能大略与教导队所受者相等。

二、旅（或分区）部办的轮训班，轮流训练连排干部，每期三个月，目的在训练一时不能离职到校受训而只能在短期带薪受训之在职连排长。其军事课程，可参照抗大步兵科军事教育课程，根据具体情况，从中摘要分期教育，旅司令部应有计划的组织此种轮训，使所属连排长在受训两次后，加上其在职时期中的学习（时间共一年半）能与抗大步兵科所受之军事教

育（理论方面）大略相同。

三、师（或军区）部办的轮训班，轮流训练在职营团干部，每期四个月至半年，其军事课程，参照抗大上干队的军事教育课程，摘要分期教育，并应有：

甲、经验的总结（如各该部新近战斗或战役之检讨等）。

乙、业务的学习（如营以上干部的职责，对干部的领导方式，对部队的管理方式等）。

（三）在职的：

在不妨碍战斗与业务的原则下，依照各级不同干部情形，分为：连排干部、团营干部，师旅干部三种进行教育与学习。

1. 连排干部（或相等于连排者）应参照抗大步兵科的军事课程摘要学习，要求在两年内，能大体学完前列抗大步兵科的军事课程。

2. 团营干部大体上应依据前列抗大上干队军事课程为标准，有计划的摘要学习。

3. 师旅干部，以自学为主，讨论为辅。师旅各建立一军事研究组，举行讨论。必须阅读之军事书目列下：

- （1）论持久战。
- （2）战略问题。
- （3）野战条令。
- （4）战斗条令。
- （5）战术教程。
- （6）战略原理。
- （7）敌寇作战要务令。
- （8）兵器学教程。
- （9）射击教范。
- （10）阵中要务令。

- (11) 野外勤务。
- (12) 参谋工作条例。
- (13) 内务条令。
- (14) 纪律条令。（以上三种军委即将颁布）
- (15) 筑城学教程。
- (16) 地形学教程。
- (17) 步兵侦察。
- (18) 空军与防空。
- (19) 现代战术特性。
- (20) 马克思主义与战争和军队。
- (21) 福龙芝选集。

具体的学习计划可由各师自定，但集总军部与军委得随时经电台通讯出测验题与讨论题。

三、教材：除战术教程与操典外，其他外面出版的各种教程（如兵器、地形、交通等教程，体操、爆破、坑道、架桥、马术各教范……）以及阵中要务令等，均可作为参考书。各战略区应设法翻印，以供各级干部阅读与参考。关于战术则应以苏联红军的《野外条令》、《战斗条令》、《战术教程》与《论持久战》及《战略问题》中有关战术部分以及《游击战争中的一般问题与战术问题》等为主要读本。军政杂志与《前线》内的军事论文，亦应选择编印以为参考。

四、实施注意：为了使理论与实践联系，作战与教育联系，应注意：

1. 在战术课内，对营以下的干部，应注意以游击战术为主，正规战术为辅，并不可把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完全分开（例如：连的战斗勤务内，除了一般的进攻、遭遇、防御、连担任侦察、警戒等课目外，连对驻止之敌的袭击，连被袭时之



动作等课目亦应列入，在目前阶段上，后者并应是主要的课目)。团以上，则应以正规战术之基本原理为主。

2. 各级司令部直接掌管军事教育的人员，如缺乏实战经验时，该司令部首长，应设法使之有获得战斗经验的机会。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三号）

## ——政治教育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一）政治教育包括下列内容：

党的策略路线的教育，时事教育与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与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教育。

（二）各门教育之主要课程是（以两年为大概标准）：

1. 理论教育，包括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上为营团干部用），左派幼稚病，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党的历史（以上全部为旅以上干部用）。

2. 党的策略路线，包括抗战以来党的决定与宣言，中央负责同志及分局以上师（纵队）以上负责同志的重要文章及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以上一般干部用，参加高级学习组者，照中央规定）。

3. 时事包括国内国际形势，后方为《解放日报》，前方为当地出版之报纸。

4. 政治工作，包括政治工作条例，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

作（以上为连级政治干部用），政治工作文献，政治工作论丛，“军政杂志”及“前线”文章之选读（以上全部为营以上政治干部用）。

（三）对于各种不同的干部，其政治教育的要求如下：

1. 营以上军事干部为策略、时事理论。连以下军事干部为策略时事。

2. 营以上政治干部为策略、时事理论、政治工作；连以下政治干部为策略、时事、政治工作。

3. 技术专家只要求学习时事、策略及一般政治知识。

（四）政治教育之实施：

1. 在职干部：在不妨碍战斗与业务下进行学习。

甲、连排干部或相当于连排级干部、除参加文化课外，每周作一次时事或党的政策的报告与讨论。以营为单位，军政干部一起，由团政治处或营教导员负责。直属队则另行组织之。

乙、营团干部，除参加文化课外，以团为单位组织一个政治学习组，军政干部一起，每周开会一次，由团政委负责，研究与理论问题，党的政策。

丙、旅及师级干部，以自己阅读为主，师旅各设一上级政治学习组，每周举行一次讨论。

丁、各级政治干部对于政治工作之学习，除自动阅读指定的书籍外，按工作部门经常举行部（科）务会议，研究与讨论本部门之工作。

戊、技术专家之政治学习，除自动看报外，可由旅以上之政治机关每月召集一次会议，报告时事或党的政策问题。

己、知识分子新干部，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实际经验较少，因此应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情况，党的政策，和当前的实际问题。

2. 轮训班中之政治教育：

甲、班级干部以报告时事为主。

乙、连排军事干部以时事及策略为主，政治干部加政治工作条例。

丙、营团军事干部除时事策略外，加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干部再加政治工作。

丁、第二次轮训时，连排干部须加中国革命问题，营团干部须加中国革命史。

戊、由各部队根据上述原则具体规定教育计划。

3. 学校及教导队之政治教育：

甲、抗大分校之上干队，军事干部须学时事，政策，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干部另加政治工作。其文化程度太低者，须特别加强文化教育，政治课为时事与策略。

乙、抗大分校之步兵科及特科之军事干部，须学时事、政策及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干部加政治工作。

丙、教导队上文化课，政治教育为时事与策略。

丁、各抗大分校及教导队，应根据上述原则改进自己的教育计划。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 教育的指示（第四号）

## ——文化教育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兹规定关于军队干部文化教育的实施计划如下：

（一）为着有效的进行文化教育，应按干部之文化水平分成等级（而不是按军职），一般的可分成三级，初小程度的定为初级，高小程度的定为中级，相当于初中程度的定为上级。以上均应实行强迫的文化教育。高中以上程度者，可自动学习文化，但必须学习文化，以资补习。

（二）各级教育时间均定为三至五年，以学至上级班毕业为完成文化教育阶段。各级的目标是：把初级文化教育提到相当于高小毕业的程度，把中级文化教育提到相当于初中毕业的程度，把上级文化教育提到相当于高中毕业的程度。

（三）各级之课程是：

甲、初级：国文（识字、作文等），算术（由四则到小数、分数、百分比），自然常识。

乙、中级：国文（文法、写作等），算术（学完全算术基

本知识），初中程度的物理化学及地理历史。

丙、上级：国文（选读、写作并自动阅读国内外著名小说，如鲁迅小说选集、三国、水浒等），代数、平面几何，中国通史（解放版），高中程度的物理化学及地理。

丁、文化课中均以国文为主，算术次之，此外如有余力，政治干部应注意历、地，军事干部应注意理、化之学习。

（四）教材：除初级班全部教材及中、高两级之国文、历史须自编外（延安正在编印），其余教材可采用初中、高中的现成本。各地须自行翻印，解决教材之缺乏。

（五）实施：

甲、大团直属队应设初级班与中级班，小团及营应设初级班，旅、师直属队应设初、中、高三班，每班都应有专门的教员。教员困难时可由团设教员，轮流到各营上课。连队文化教员可取消，把部队中文化教育的重心放在干部文化教育上。

乙、同时进行的课程，以两门为主，上级班的地理历史，可采用阅读方式，不必上课。

丙、各班每周应上一次或两次课，上课后须进行自习。

丁、因环境关系，营团旅师级干部无法加入文化班上课，则可组织文化学习小组，如团长政委参谋长主任均须学文化时，则可成立一组，聘请专门教员讲授之。

（六）教员：应该重视教员在培养干部中的作用。提高其政治地位，注意其物质需要，并说服不愿当教员的倾向。

（七）在轮训班、教导队、抗大分校学习的干部，其文化教育可照上述原则定出具体计划，其时间比例则依照第一号指

示上之规定。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华中各根据地今后的任务<sup>\*</sup>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十六日)

刘 少 奇

根据以上国际形势的分析，及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总结，那末我们在华中各根据地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

因为在我这个报告之后，还有关于军事的、政府的及党与群众工作的专门报告，我不能过分在这里侵犯以上各个报告的范围，同时又因为我在前一部分的报告中，已经简单的提出了各个根据地今后的特殊任务，故我在这里只简单的提出各根据地今后一般的任务；即是各根据地今后均须切实执行与完成的共同的任务。

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今后一般的总的任务，就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这就是我党我军今后一切工作的总方针，奋斗的总目标。

而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根据地，与加强聚集力量以准备反攻敌人，这几个任务，是互相联系的，三位一体的，而不能互相孤立起来看。其中任何一个任务的完成，都能

---

\* 这是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帮助其他两个任务的完成；其中任何一个任务如不能完成，则使其他两个任务亦不能或难以完成。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条件之下，应该着重其中之某一个任务，然而一般的来说，则完全巩固各根据地，为今后应该特别着重的一个任务。因为只有各根据地的完全巩固，才能在敌伪严重“扫荡”与反共派阴谋进攻之下胜利的长期的坚持敌后抗战，才能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反攻敌人；而粉碎敌伪“扫荡”与反共派的阴谋进攻，则为巩固各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这就是以上三个任务的相互关系。

为了彻底完成上述任务，我党我军在各根据地就必须切实进行各项工作，完成下列各项具体任务：

有哪些具体任务呢？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坚决粉碎敌伪的一切“扫荡”，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加强对敌伪的工作，团结一切抗日阶层的人民，为保卫根据地，保卫家乡而战斗到底。

只有这个任务的完成，才能使我各根据地顺利进行巩固工作与建设工作；否则，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很困难的。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各根据地各部队必须经常有反“扫荡”的准备，并且动员与训练人民，改造地形，以便共同粉碎敌伪的大小“扫荡”。加强警戒侦察，以防敌伪偷袭，严格反对太平观念及一切不适合于反“扫荡”与敌后游击的组织形式。同时必须用一切方法派遣适当的部队与干部到敌伪区及敌伪据点附近去开辟工作，进行游击。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必须进入敌伪区及逼近敌伪据点附近去活动，反对大家驻在中心区远离敌伪据点的现象。

敌伪如果向我进行大小“扫荡”，必须以灵活的顽强的游击战彻底粉碎之。敌伪如集中一二地区“清乡”，则应进行比

较大的机动，同时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群众与必需的干部和武装，使敌伪的“清乡”归于无效。敌伪如集中一二地区“扫荡”与“清乡”，其他地区我军必须在军部统一指挥下进行有力的战略配合。

我们必须告诉华中敌后各阶层的人民，并以各种实际行动给人民看，我军我党是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各根据地的，无论如何与人民一起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到最后胜利为止的，无论如何要保卫各根据地而流最后的一滴血的，并要求各阶层人民和我军我党团结一起坚持敌后抗战到底。我们要严格反对在敌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不经上级允许，即随便撤退，随便离开本地，离开职守，及抛弃地区与根据地的现象。要为坚持每一个地区而斗争，要在敌情严重情况下锻炼我们一切组织用各种办法坚持斗争的能力。

对于敌伪破坏我根据地各种建设及物质生产的进攻，掠夺我根据地人力、物力的强盗行为，伪化敌后地区的“强化治安运动”与“清乡”运动，以及敌之特务活动、经济封锁、经济统制等，必须坚决的打击之，必须详细的调查，研究对策，以打破之，必须为保护根据地的每一种建设与人力、物力而战斗，必须针对敌之“强化治安运动”与“清乡”，而加强我之政治上的以至经济上的攻势。

关于瓦解敌伪军工作，各根据地各部队应根据总政治部屡次的指示及各地经验与具体情况，切实的去进行。首先应该使干部及党员彻底了解敌伪工作的重要性——对于我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巩固根据地，与争取最后胜利，均有极端重要的作用与关系。我们决不可忽略或放弃从这一方面向敌伪进行斗争。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寻求一切机会，务必在这方面获得大的成绩。目前各级干部中仍有忽视这项工作的，应切实加以

纠正。

应派出必要的干部来加强敌伪工作机关（采用适当的名称），成立各地敌伪工作委员会，以统一工作的领导与计划，在各个接近敌人的方向成立工作站，切实调查敌伪情况，并注意总结经验，训练干部，严格遵守一定的秘密工作的规则。

对敌军俘虏，应严格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不准杀害，多加释放。同时应纠正我们队伍中狭义民族主义的倾向，及侮辱日本民族的行为，提倡中日两大民族革命的平等的联合。

应切实执行中央关于敌占城市及敌伪区人民中工作的指示，切实去建立这些地区的工作。对于接近我根据地的某些伪化地区，可以创造同情区。在这种同情区中，是一律不用我党我军的公开名义进行活动的，只在十分必要时，才以这种同情区作为我们某些部队及组织之掩护。但在这种地区，党可用灰色的名义建立党所领导的武装或其他组织。现在江南及其他我军游击队公开活动的地区，则应建立我之游击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游击区比在我强敌弱的游击区，各种组织的形式应有不同。

只有在敌伪工作上获得大的成绩，只有扩大敌伪与伪伪之间的矛盾，以争取更多的同情，孤立敌人及最坏的汉奸，我们才能更顺利的粉碎敌伪的进攻与“扫荡”，打击最坏的汉奸，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与巩固根据地。也只有坚决的胜利的粉碎敌人的进攻与打击最坏的汉奸，才能使我们在敌伪工作方面获得更大的成绩。

关于敌伪工作另有报告，我这里不多说。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根据党的一贯的统一战线方针进行各种工作，以便联合一切抗日的友军友党与抗日的各阶层人民和团体及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在我根据地内之人民与团体共

同抗日，同时应警戒亲日反共派对我之进攻阴谋，并准备击退这种进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在我之各种具体政策上，切实执行上述方针，如保护友军友党人士在我根据地内的家属的生命财产，并帮助其解决困难和照顾各阶层人民各党派团体的利益等，同时还必须尽一切可能和我根据地附近之友军友党及各界领袖团体进行各种接洽，以便在组织上及具体行动上达到共同坚持敌后抗战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之目的。

在（一）抗日、（二）不反共（不破坏抗日根据地与我军）、（三）实行民主这三个条件之下，我军我党不拒绝与任何党派军队及个人团体合作，共同建设根据地。这种态度我们不只应在口头上文件上宣布，而且应在一切实际行动与政策法律上昭信于各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孤立敌人，否则，必陷自己于孤立，以致增加自己的困难，造成自己的危险与失败。

由于敌寇灭亡全中国的坚决的方针不变，由于敌伪对于敌占区人民残酷野蛮的掠夺与压迫，因此，敌人与中国一般地主及资产阶级之间，甚至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此，他们仍有抗日的要求，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并善于处理，我们是仍然能够和他们保持合作，或改善关系以共同抗日的。因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中小地主及中等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此，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并善于处理（缩小我们与中等阶级的一些矛盾），我们是能争取这些阶级站在我们方面或守善意中立的。一切阶级的政治动向，是由其特殊的阶级地位，及其与各方面的矛盾的情形来决定的。

对于那些至今仍坚持反共成见，并仍企图向我军及根据地

进攻之友军友党，应用一切方法解消其成见，并停止其向我进攻，解消某种僵持局面，共同抗日。然而其中如果还有坚持其成见，并仍在亲日派指使下无理向我进攻者，则我仍应实行坚决的自卫政策，坚决击退其进攻。因为只有坚决击退这种进攻，我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并巩固根据地，否则，是不可能的。现在亲日派仍在活动，进攻与消灭我军的阴谋，仍未放弃，因此我们仍应时时警戒，并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作必要的布置，以防其突然的阴谋袭击及皖南事变重演。

对于在我根据地附近之一切友军，应切实的依照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不能容许忽视。我们除开公开反对投降反共及磨擦之外，不应挑拨与破坏友军。我们某些报纸的宣传，以后在对友军问题上应特别注意。各地组织及各部队应抽调一切能做友军工作的干部与人员，去加强和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切实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为了真正实现正确的团结所有各抗日阶层的人民及友军友党共同抗日与建设根据地起见，必须加强我们的调查工作，研究各阶层人民各党派军队与各方面的矛盾及其政治动向。必须加强党内关于战略策略的教育，统一战线的教育，使我们的同志和干部真正懂得党的战略策略及其在各种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同时还必须加强党内关于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及民主政治的教育与训练。要使共产党员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及民主作风，同时又能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在民主政治之下，和其他的阶级进行合法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能够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达到上述目的。否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任务，就是要切实依照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指示，来继续提高主力军，加强与扩大地方军，广大的建立与训

练人民武装，建设与提高兵工生产及正确的指挥各种战斗。

只有建设强大而精干的军事力量，并培养很多很好的指挥人才，才是我们坚持抗战与争取胜利最可靠的力量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下列各项：

(一) 主力军除以一部地方化加强地方军之外，应力求精干。实行必要的缩编，减少机关，充实连队，裁撤老弱，并抽出大批干部来加以训练，提高与加强地方军。主力军各部应寻求机会继续加以整训，在整训时应预先规定切实的训练目标与计划，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应密切配合，进行深入的解释与动员（可能时应召集团或旅的党代表会等）。应切实发动指战员学习的自动性与积极性，避免或减少采用强制与惩罚的方法。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亲自去进行整训和检阅。

(二) 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应努力设法补充主力军的兵员。这种兵员除随时个别扩大及争取俘虏而外，在可能时可进行扩兵运动，并设法从地方部队及人民武装中动员一部分兵员。关于新兵的训练，各根据地可设立补充团或新兵训练处，专司训练新兵及新成立的地方部队之责，以便系统的总结关于训练新兵及新部队的经验。

(三) 在华中各根据地今后均须集中力量来扩大与加强地方军。务必使地方军达到与主力军同样多的人枪数目，有的地方还可超过主力军。这须各地订出切实的计划按期完成。但地方军同样须力求精干，以免浪费人力、物力，地方军应掌握在地方党及最可靠的地方干部手中，并加强军区与军分区的工作能力。凡由主力军派到地方军去工作的干部，应经过一定的训练，因地方军须采用比主力军相当不同的工作方式，不可将主力军的一套机械搬到地方军去使用。一切地方军均须提高其战斗力，提高其群众纪律，提高其中党的作用。



（四）在苏南、苏中及巢无地区，一般不应有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分，不是将地方军编入主力军，相反，应使主力更进一步地方化，将主力编入地方军。师部、旅部即成为军区、军分区司令部。为使地方党与军队有密切的结合，地方区党委及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可兼军区、军分区及地方兵团的政委。

（五）必须为建立广大的人民武装而斗争。部队及党与政府和群众团体，必须切实配合，用极大的努力来进行，真正组织最大多数的男女壮丁到自卫队中去，必须在民主的方式下，发动广大人民抗日保家防匪的积极性来进行。否则，建立广大人民武装的任务，必不能真正的完成。关于各种人民武装的编制、任务、职责及训练等，各根据地应有明确的规定与教育，并通令一切部队机关和团体遵守执行。

（六）建设与提高各地兵工生产，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各根据地及各部队对此重视仍极不够。以后应切实加以注意并普遍建立。不要怕经费不够，不要怕材料及工人困难，而应尽一切努力去进行。生产应集中在手榴弹、地雷及马刀的制造。

部队的供给工作，部队吃饭穿衣及休息等问题，是部队中最重要的问题，如弄不好，则一切无从做好，以后各级干部必须经常给以最大的注意，绝不可稍稍忽视。

（七）今后的战斗形式，主要的仍然是对敌的分散游击战争，以及在必要时进行大规模的反磨擦战斗。军事指挥原则，仍然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因此，各部队在战略行动上，必须服从与遵守上级统一的战略指挥与战略计划，而在战斗上，则须各地区各部队独立自主的去布置与进行，不要坚持与希望上级的指挥与命令。而上级指挥机关亦不要在游击的战斗动作上去过分干涉下级，而只应在一定时期去检查。由于过去无数战斗的经验，凡无充分准备与布置的战

斗，及仓促应战，是打不好的，或很难打好。因此，今后各种战斗之前，均应尽一切可能进行充分的侦察动员及各种准备，力避仓促应战。务求每战必胜，每战必求彻底消灭敌人，彻底完成任务，扩张战果。要正确把握我军积蓄和保持有生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基本的战术原则，一面反对轻率冒险，切戒浪战，免致得不偿失，造成对自己的过分消耗；一面反对迟疑犹豫虎头蛇尾，以致丧失战斗时机，贻患将来。

(八) 各种军事政治干部的训练，今后更增加其重要性。应扩大教育机关，提高教育的水准与质量，延长学习时间，并抽调最好的干部来加以训练。对各级干部（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应即举行一次公开的鉴定，并大体规定其资格。

(九) 部队政治工作，须切实加强并提高其作用。应切实研究与改进连队的政治工作（各师可召集专门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切实克服干部中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加强他们的党性锻炼，审查每一个干部的思想，加以批评鉴定与勉励。对于那些革命立场业已动摇的干部，则须调动其工作，加以较严格的训练。所有政治工作干部则须严整政治纪律，务必在政治上党性上作一切指战员的模范。同时须提高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与必要的军事知识，因为我们的政治工作干部，很多还不能从原则上理解与透彻解释部队中干部中的各种问题与各种现象，说服干部，并鼓动部队的积极性，又还有许多政治干部缺乏必要的军事知识，因而不能使政治工作配合军事上的要求与行动。

第四个任务，就是要普遍深入的发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基本群众，普遍切实的改善群众生活，建立真正广大的群众团体。

这个任务的完成，是巩固根据地最基本的条件，是坚持敌



后抗战与聚集力量的源泉。没有根据地内基本群众普遍深入的发动和强固的组织，巩固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一切任务的执行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的依靠群众，必须根据中央各种原则的指示，迅速完成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任务，打破目前根据地内群众运动落后的现象。

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切实普遍的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的待遇，为真正改善人民生活，解除人民疾苦而奋斗。在目前因为华中除个别地区外，减租减息及改善生活的办法，均未真正的彻底的实行，因此，在中央决定的一定限度（如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及交租交息等）之内，我们目前应强调改善群众生活及于群众有利的一方面，以便真正的（而不是假的形式的）改善群众生活，减轻封建剥削，而大大的发动与组织群众，提高群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一切共产党员，不论他站在任何工作岗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均必须经常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每一个实际利益（即使是最小的利益并关系人数不多的）而奋斗。不代表群众利益，不爱护群众的利益，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为解除群众疾苦而服务，用漠不关心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切身利益与疾苦的问题，那就不是共产党员。

当着群众业已发动起来，为了满足群众合理的要求，而向地主资本家进行适当的一定限度的斗争的时候，应该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地主资本家千百年来优势，即不能打破，群众即不能确定的发动。但必须正确执行这种斗争的策略，必须注意其适当与不超过一定的限度，我们的干部，必须留心，不要使群众行动走到过分的“左”倾，妨害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战。如在发动群众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些“左”倾，我们要能适当说服群众。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办法，来

调解这种斗争。而在调解的时候，党与政府的态度，一方面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并保障群众的利益，鼓动群众前进；另一方面又要能使地主资本家悦服、安心，不要过分的伤害地主资本家。所谓进行适当的一定限度的斗争，就是：第一，要能经过群众的行动与要求，切实打破地主对改善人民生活与实行民主的反对和阻碍，使其在经济上政治上作重大的让步；第二，不要提出时间空间所不能允许的过高的要求；第三，不要采用超出抗日民主政府法律所允许以外的手段；第四，注意争取社会的同情并多说道理；第五，在群众要求达到之后，应设法解消地主、资本家在斗争中所记下的某些仇恨。总之一句，即是要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在可能的一定限度之内，切实的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的要求，并大大发动群众；但是不要妨害团结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共同抗日的总的战略方针，要更少的引起地主、资本家与党和政府之间的裂痕。所谓在群众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发生一些过左的现象，这是客观的现象，是主观所不能控制的现象，这不是主观上故意要去左一些。如果农村中的基本群众真正的广大的发动与组织起来，如果我们执行了正确的策略，是绝不会妨害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的；相反，将大有助于团结一般的地主、资本家共同抗日，并可能促进一些地主、资本家走向开明，使他们发现救中国的可靠力量与新中国的曙光。

各根据地的党，必须在党内很好的研究与总结群众斗争的策略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

根据地中群众团体的本身任务，就是：（一）保护群众切身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文化上的利益；（二）组织与团结广大（全体）群众到群众团体中来；（三）教育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根据地内的群众团体，是抗日民主政权主要的社会支柱。它应在保护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并引导广大的群众去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部队的建设。应该派遣自己最好的干部与积极分子到民主政府及部队中去负责，积极参加政府与部队的工作，反对政府中的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积极提高根据地内的生产……。只有这样，它才是抗日民主政府所依靠的不可时刻离开的主要的社会支柱，并提高自己的地位与运用政府来保护群众的利益。

要建立根据地内强大的真正拥有数十百万会员——雄厚社会力量的群众团体。因此，必须更加提高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建立从上至下群众团体的组织系统，培养各根据地在群众中有威信很多的领袖，派遣一批专门的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到群众团体去工作，提高群众团体在社会上法律上政治上的地位，准备群众团体相当雄厚的基金，由群众团体举办多项对群众有利的社会事业，大规模的进行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的教育……。一切机关部队，必须注意培养这样有威望的强大的群众团体，然后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帮助。

群众团体有群众团体特殊的工作方式与作风，不可把党的政府的部队的工作方式与作风，搬到群众团体去使用。共产党员，特别是群众工作者，应该很好的来学习与研究这种特殊的群众工作方式与作风。

对于根据地内之工人、雇农，应切实注意建立其独立组织，并特别注意训练工人干部。对于青年、妇女、儿童的组织，今后不能再容许忽视，必须分配必要的干部建立各根据地青年、妇女、儿童团体，大规模争取与组织青年、妇女、儿童群众。

对于游击区的群众，亦根据各地特殊的情况，采取特殊的

方法与策略，去组织他们。

第五个任务，就是要彻底改造根据地内的政权机构，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成为包括所有各抗日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权。

在我们这样的农村中，这个任务的完成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本质，是意味着以下的事实：

（一）改变千百年来地主封建势力的专政，在经济上削弱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减租减息），在政治上打破地主阶级的垄断与优势；但又不是彻底推翻与消灭封建势力。

（二）提高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到统治地位，使政权具有广大的深厚的群众性（而不是与群众对抗或脱离群众）；但又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所有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阶级（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对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两点就是改造政权的真实意义。因此，根据地内政权的改造，不只是调换几个人，而且是政权机构各种制度的改造，而且是国体与政体的改造。即是要将千百年来便利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的政权机构，加以彻底的改造，使之便于广大人民群众来管理与掌握的政权机构。

因此，根据地内政权的彻底改造，是意味着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一个严重的斗争——经济的、政治的严重斗争（这种斗争在今天我们是要用改良的“和平”的方式）。因为地主阶级绝不会自愿的在政治上让出自己的优势，以及在经济上对工农作重大的让步（过去国民党几次宣布二五减租均不能实行，以及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法令至今还有许多未能实行的原因，即在地主阶级的坚强抵抗）。如果没有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系统的有计划的斗争，把自己上升为根据

地内的统治阶级，政权的彻底改造是决定的不可能的。

因此，彻底改造根据地内政权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发动与组织根据地内的广大群众来积极管理政权的问题，是如何团结根据地内所有各抗日阶层的人民来积极参加政权管理的问题。

一般的来说，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改造，是经过两个步骤来完成的。第一个步骤，是我军在敌后反“扫荡”、反磨擦的胜利，造成了抗日民主势力在各根据地内一定的优势，共产党在政权中站在领导地位，建立了根据地内现在这样的政权机构（没有完成的统一战线政权），因此就造成了执行第二个步骤的可能。这第二个步骤，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广大深入的发动和参加政权的管理，以彻底完成政权的改造，建立完成的统一战线政权。第一个步骤早已过去，第二个步骤则正待我们执行。完成这第二个步骤，即是巩固了第一个步骤的胜利。

现在各根据地内的政权，基本上已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但还是带临时性质的、在形式上没有完成、在内容上尚有缺陷的统一战线政权，即是一种尚未完成的过渡的统一战线政权。它的根本的缺陷，表现在上层是共产党员占绝对优势，而下层则是封建势力的操纵，基本群众尚未参加政权的管理，民主制度未完全建立。在基本群众尚未发动前，这种过渡政权是必要的。用命令（完全非民主的形式）委派许多共产党员到政权机关中去负责，这就造成了政权走向完全民主化的有力条件和保障。现在就是要利用这种条件，把没有完成的临时的统一战线政权，改造成为正式的完成形式的统一战线政权，合乎“三三制”的政权。即上层既不是我们包办，下层也不是封建势力的操纵，而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统一战线政权。

根据地内的政权，本身应该就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是最高的组织形式。民主政权的本身，也应该同时就是群众组织的一种形式，人民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因此，它必须带有广泛的群众性，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不是与人民对抗，与人民生活隔离。

那末，我们怎样来进行政权的彻底改造呢？

首先，我们同志所应了解的，就是这种改造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创造的伟大的组织工作，而且是一个包括数十百万人民的严重的斗争，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与伟大的组织工作。这个斗争开始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地主资本家要求减租减息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起，发动群众，一直提高发展到改造政权的斗争，与坚持敌后抗战的斗争，以达到在经济上改善群众生活，在政治上打破地主阶级的优势，来保障群众在经济上已取得的胜利。改造政权的斗争，要与广大群众切身的经济利益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这种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中，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教育群众、从群众中生长出新的干部，锻炼出新的人民，建立起新的组织与制度，然后才能达成政权的彻底改造。

我们要特别注意下层（区、乡）政权的改造，并使下层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手中，可靠的群众积极分子手中，然后才能打破封建势力对下层政权的操纵。至少在最初一个时期，应该这样。虽然在下层政权中，基本上也应实行“三三制”，但在最初一个时期，如果不将下层政权掌握在可靠的民主势力手中，真正的“三三制”即无法实行。也只有在下层政权中切实打破封建势力的操纵，然后才能吸引更多的党外人士参加上层政权中的工作。

其次，对基层政权的改造，我们要进行以下的一些必须的



工作：

第一，确定公民独立的政治权利，取消家长在政治上法律上的特权。保障任何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公民个人有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之自由，享有公民一切的权利，并对自己的活动在法律上负完全的责任，不连累其家长及任何亲属。同时也不允许任何人妨害其他任何公民的权利，连自己直系与非直系的亲属（父母叔伯等），亦无权利妨害其子侄在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各种政治活动之自由。这就是说，在政治上法律上取消家长的特权，打破家长在政治上统治其家人的特殊权利。中国社会中的家长制，家长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是封建专政与个人独裁的社会基础。目前我们一下子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固然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必须确定任何公民个人有独立活动的政治权利，不能承认任何家长限制其家人子侄的政治经济活动为合法。民主政治，必须确定以公民个人为政治活动的单位，也由公民个人对政府负责。而不以家族或户口为政治活动的单位，也不由家长或族长对其家人在政治上法律上负责。世界一切国家的民主政治，均是如此的。

因此，政府应即举行公民登记，发给公民证，进行必要的公民教育……。

第二，确定以乡（镇市）为人民自治单位，代替保甲制。保甲制，是个人独裁政治的基本形式。它是从家长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与家长制是同类的东西。在保甲制之下，没有人民的自治，而只有人民的被治。保甲制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东西，而不是为人民所支配的东西，只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这种保甲制，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障碍。民主政府在乡村人民自治筹备妥善之后，应即宣布保甲制的废除。

政府应即依照自然的条件（以及敌情条件），来重新划分

行政区，一般应该划小些，以便人民能更直接的管理政府（是为了人民能更便利的管理政府，而不是首先为了政府能更便利的去管理人民）。乡村自治的基本组织形式，应确定为乡政府。市镇人民自治的基本组织形式，为镇或市政府。每乡公民组织乡民会议，并由公民选举代表若干人，组织乡民代表会。由乡民代表会选举乡政委员会及乡长，组织乡政府（在乡村自治实行至一定的时间，公民有更多的民主训练之后，乡镇委员会及乡长即由全乡公民会议选举，而不由乡民代表会选举）。市镇亦为人民自治单位，有市民会议，市民代表会，市政委员会及市长。

选举，是一个直接的“和平的”政治斗争。党在选举之前，必须有很好的准备组织，在公民尚无实施民主政治的经验之时，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不实行复选制即间接选举，即只由公民直接选举乡民代表，其他乡政委员会及区县政府，暂时均由各级代表会选举。待人民有相当民主政治的经验之时，应即将复选制改为各级政府直接由公民选举的制度，即所谓直接的选举制。

公民的选举权，不应有任何的限制（除开汉奸及法庭剥夺公民权者外），各种机关、部队及外地来人，只要以后在本地活动、居住、营业或工作者，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在选举前，要公布选举法，组织选举委员会及其事务所，并严禁收买及受贿与操纵强迫公民投票等行为。

第三，改组各级政府为合于“三三制”的与民主集中制的政府。即就是说，在乡村自治政府组织好以后，即应召集区民代表会，县参议会，以及各根据地的参议会。这种代表会与参议会是有全权的，有选举各级政府（区政委员会，县政委员会及各根据地行政委员会）与撤换各级政府之权。各级政府均实



行委员制，少数服从多数，行政首长服从委员会的制度。

在各级政府的委员会中，各级党与农会的负责人，应尽可能被选进去，取消各级政府的指导员、督导员等。

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下，不是什么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而是三权合一或五权合一。立法、行政、司法均集中于各级代表会、参议会及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

为了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新的民主制度与作风，须要根据敌后抗战的实际情形及全国的大势制订各种法律、条例等等，并且要切实实行法治，建立法律的高度威信。首先应在各根据地颁布一个临时的基本法律——敌后抗战的基本宪章，在这个基本法律之上，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各级政府的组织大纲，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三权合一等），及土地劳资与男女的基本关系，和根据地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基本态度等。这个基本法律，为其他一切法律条例的根据。这个基本法律，则根据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敌后的实际情况来制订，适用于抗战建国的阶段。各种法律的制订，须要各根据地用极大的注意力来进行，并须吸收许多专家等工作。

关于“三三制”，是我党在一定的革命阶段中，与一定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政治的规定，而不是一种法律的规定。因此，在任何法律上，不应该有“三三制”的规定。“三三制”在敌后根据地政权中实行，是民主的，然而，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在任何政府机关中，规定共产党员要占三分之一。在民主制度之下，这种特权，任何人及任何党派都是不能有的。在法律上，对于一切的公民，一切的党派、团体，都不能有任何特权，都是完全平等的，都只能给以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自然在各级民意机关中，依照会员人数的比例，规定各种职业团体、民众团体及部队一定数量的代表，是可以的。但共产党及

其他党派不能有这个规定。同样，在法律上，也不能规定任何人在政府中的优势，及其领导地位。共产党及工农在政府中的优势与领导地位，不能依靠任何法律或强力去实现，而只能依靠真理，依靠政策的正确性，党员模范的工作，及人民对于它的拥护等来实现。否则，共产党即不能在民主制度的政府之下有领导地位，封建势力仍将在政治上占着优势。

“三三制”在根据地内实行，当然是我们对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个重大的让步。这个让步，为了团结一切阶级共同抗战，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少的。然而，这个让步从全局上来看，却又是进攻的。

第四，共产党员特别政府工作的党员，要学习法律，养成法治的精神，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的合作的作风，反对关门主义及包办垄断的作风。没有这一点，政权的民主化，“三三制”的实行，是不可能的。在敌后根据地中政权的民主化，我们负有极大的责任。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这方面严格检查自己。我们同志在这方面是有极大的缺点。同时，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用心的来研究与学习合法斗争的策略。在“三三制”实行后，政权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只是改变了形式，共产党员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只有经过合法斗争来保持与巩固，否则，即没有我们的领导地位。而我们同志对于合法斗争的知识是十分缺乏的。至于党外人士在政府中的薪水、公粮、津贴制度，亦容许有特别的规定。

第六个任务，就是要在财政经济及食粮方面作极大努力，来保障人民的需要、部队的给养，以与敌伪在经济上作斗争。

各根据地的财政与粮食，均须努力做到自给，不要依靠外面的帮助；但在经济情况较好的地区，则除自给之外，应努力帮助全国及其他各根据地。各根据地之财政，均应统筹统支，

严格实行金库制及预决算。并须向人民公布，向上级报告。

各根据地对敌伪的经济统制与封锁，绝不可忽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完全封锁中国各敌后根据地是可能的。因此，应迅速准备对策。否则，将受极大的窘迫。

今后各根据地在财政经济粮食方面，应执行以下各项：

A. 努力动员与帮助人民进行春耕夏耕，真正做到提高农业生产，多种自己需要的东西，少种资敌物品。各机关部队须切实进行生产，以补助自己的粮食菜蔬，可成立专门的生产部门来负责进行。提高农业生产，是解决根据地内财政经济问题基本的主要的办法。

B. 动员与帮助人民纺纱、织布、熬盐、熬硝、造纸。

C. 将税收政策由进出口税转移到依靠土地税——田赋——及其他营业税统税等为主要来源。因此应即切实登记田亩，整理田赋。并努力开辟盐税及向敌伪争得税源。

D. 尽可能发行纸币，以抵制伪币及敌伪对法币的操纵。必要时可发行一定数量的公债。

E. 严格征收保管公粮的制度。动员人民收藏粮食、调节民粮，严禁粮食资敌（粮食运输一律要护照）。各根据地并可征收一定数量的公草与油粮，以供给部队之消费。

F. 在较巩固的根据地中，实行对外贸易的一定的统制，以抵制敌之统制，进出口货一律应在政府贸易局领取护照。相当限制输入输出。

G. 发展合作社，调节物价。

H. 最后，实行精兵简政，节省人力、物力。严格反对浪费贪污，禁止任意向人民募捐慰劳等。

第七个任务，就是要发展根据地内的文化教育，办理各种学校，训练人民成为新的公民。

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反对汉奸的奴化教育，反对封建的愚昧教育，提倡科学等，奖励一切私人办学。各乡学校及民众学校应即办起来，各县中学亦须从速办理。各根据地之高中及专门班应加扩大。应使这些一般的学校与我们的训练班区别开来，不要采用一样的办法去办理。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应给予保障，所有学产收入，一律拨交学校。教员的训练，应加紧进行，教员的待遇，应加以确定，给予相当的保障。课本的编审与印刷，须迅速进行，对于民众教育，则须在群众运动发动的基础上，去广泛的大规模的进行。根据地的青年儿童运动，应与文教工作密切配合的进行。

第八个任务，就是要健全各根据地保安处与除奸部门的工作和组织，加紧对敌探奸细及破坏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特务进行秘密斗争。

在根据地保障一切人民政治活动的自由，因此，不能允许任何秘密组织的存在。对于暗藏在根据地内的敌探汉奸及破坏分子、土匪，应加以肃清、驱逐。但不能因此株连任何好人。保安处对于案件的破获，应交法院处理，执行一定的司法手续，并须向人民公布。各根据地之除奸机关应切实加强，方能建立与保障人民抗日的秩序。

第九个任务，就是要建设根据地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党。

根据目前根据地内党的组织状况，对于地方党及部队党的建设，应即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A. 在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发展，有相当数量党员的地方（乡、区、县），党的组织任务，主要是巩固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审查党员，整理支部，建立支部工作。发展党员，只是个别的审慎的介绍。

农村中党的支部工作的建立（以及部队中机关中亦一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各根据地必须有最负责的人去实地考察，并召集专门的支部工作会议，来加以研究和讨论。在获得一定的经验之后，应即对所有支部书记及委员，进行普遍的训练。

B. 在尚无党的组织或党员数量太少的地方（乡、区、县），则主要任务，是建立这些地方党的组织，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但必须是审慎的个别的发展。

C. 在全党应根据中央的指示与经验，进行普遍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对一切干部及党员作一负责的鉴定，指出他的优点缺点，特别在思想上的缺点，以勉励党员和干部继续前进。这应首先作充分的准备与解释，以免引起党内的不安。这种审查鉴定的目的，是要清查混入党内的敌探奸细，发现投机分子，落后分子，克服干部党员中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教育干部党员，以巩固党。应使每一个党员了解：被党审查是光荣，只有以党所审查与考验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而这种审查与鉴定，每一年两年必须进行一次。

D. 扩大训练党的干部，根据中央关于党校的决定，各根据地与华中局党校，必须进行改组，并扩大学生数量，期限亦可稍加延长。除开学习必须的马列主义理论之外，要加强党性的学习，及根据各种政策与中央指示和时事问题的研究与学习。教材应根据现有的各种文件及经验来编辑，教员除开一定的专门教员之外，各负责人必须亲自上课。

E. 培养更多更高级的地方干部。特别注意坚定地方干部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因为地方干部在本地，易受封建势力的包围，能在本地与封建势力进行不动摇的斗争，是很困难的，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各级党校应多注意吸收地方干部，并

须采用许多其他的方法来教育地方干部。

F. 正确建立党与其他各种组织的关系，使干部及党员区别清楚党、政、军、民各种组织的特殊任务，特殊作用，特殊的工作方式，斗争方式等，是一件很重大很复杂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干部就是一切组织不分，——党政不分、党民不分，……党、政、军、民、学混淆一起，互相代替，互相干涉，互相对抗，因此，妨碍工作甚大。必须使各个组织在任务、职权、工作方式……上区别开来，而又结合在党的指导之下，使党成为最高的组织形式。这是结合各种斗争形式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对于干部和党员，除开使其具有一般的党的知识（党的方针政策等）之外，还应有特殊的专门的知识，应精通本行，具备自己职业范围内的知识。在这里，应适当提倡党员的事业精神。

G. 加紧调查研究，以反对主观主义。这须各根据地根据中央的决定，有系统有计划的由党、政、军、民各方面分工去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只是一种工作，而应该成为我们共产党员一种作风，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即是说一切要根据事实，拿事实出来，并从各种事实的互相关系中来得出结论；而不是根据空想，根据死的书本及决议的条文。应该考察实情，不应该随便相信人家的报告与谣言，随便怀疑猜测，随便感情用事，随便根据片面的个别事实……。一切错误，是由于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一致，主观不合事实。把事实弄清了，再根据我们一定的立场——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利益来处理问题，就不会有错了。在事实未弄清楚以前，去弄清事实，如一下弄不清楚事实，就不要妄下结论，不要固执，注意考虑事实的发展，一直到有事实的根据之后再下结论。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不是这样。应该从加紧调查研究中来加以改正。



H. 反对宗派主义，团结全党，为党的光荣任务而战斗到底。一切党员，应该站在党的整个利益上来考虑问题，处理问题。而不应该站在个人的派别的利益上来考虑与处理问题。应该反对那些闹个人成见，记个人仇恨，在处理问题时分出地方界线、部队界线、新老界线等等的宗派观点。要全党团结起来，上下团结，全军各部队团结，新老干部团结，本地与外地干部团结，党、政、军、民、学一致团结，严防破坏分子的挑拨离间……，全党团结在党的中央、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一定能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

以上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各项具体任务。

如果我们能够完成上述各项任务，能够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与“清乡”，能够团结抗日的友党友军及抗日各阶层的人民共同抗战，并阻止反共派的进攻，能够建设强有力的抗日军队与抗日人民武装，能够普遍深入发动与组织数十、百万群众，能够彻底改造政权机构成为完全的民主政权，能够在财政经济粮食上保障部队与人民的需要，能够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能够肃清敌探奸细及反动分子，又能够建设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那我们就能胜利的坚持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并聚集我之反攻力量，以反攻敌人，迎接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反法西斯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所谓争取时间，是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用一切方法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两年的时间迅速完成上述各项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它无疑的又要多少改变敌后的形势，以及在全局上加强我党我军的影响。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咬紧牙关，为百分之百的完成上述各

项任务而奋斗！胜利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报告。

是否有当，请扩大会议的同志们批评、讨论和公决。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毛泽东关于目前应以 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

恩来同志：

（一）对时局估计电悉，与我们估计略同。柏林协定似以苏联为第一对象，春季后德、日各以陆空主力向北，而各以海军主力、陆空一部及意国海陆空主力向南。即使是这一局面，仍是有利的，因为德、日各有三条战线，意有两条战线，兵力大分散了。如日攻印，则更分散。整个轴心将失败在分散与消耗中。如日侵苏，蒋<sup>(1)</sup>将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他的压力。但滇缅路断，英、美接济须走苏联，对内必不敢与我决裂的。（二）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三）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

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边区“三三制”大得周围各地好评，区内则团结了各阶级。精兵简政方针正在各地实行。（四）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五）今年二月统计党员数目为八十万，去年九月统计军队数目为五十七万（包括游击队），对外守秘。（六）林彪返延身体好了许多，惟尚须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诸人曾有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统战工作很可开展，要我告诉你注意。

毛 泽 东  
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讨论过去中央 路线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恩来同志：

（一）铣电悉。五中及遵义文件当电告。

（二）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sup>〔1〕</sup>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毛 王

马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即刘少奇、彭德怀。

## 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sup>\*</sup>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陈 毅

我们的战略总方针，是统一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目前我们的组织战役和部署战斗的指导原则，仍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之下的运动战。

我们的战斗方式则强调近战、夜间战、白刃战、袭击战、埋伏战等。这是我们主要的战斗手段。一切战斗动作，均围绕着此一中心。

对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战法，我军均应学习和研究。在主力部队应该能全盘掌握，在地方部队与民兵应该特别强调游击战。我军不拒绝采用任何战斗方式，而且应做到能使用和掌握所有战斗方式。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团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到持久的城寨战，均应列在我军研究训练和试用的范围内。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打击敌寇的胜利，均依靠广泛的游击

---

<sup>\*</sup> 这是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军事报告《论军事建设》的第三部分，原载一九四二年七月出版的《军事建设》创刊号。

战，辅以必要的运动战。对克服反共逆流的进攻，均依靠强有力的运动战，辅以广泛的游击战及必要的阵地战。对匪伪交通施行破坏战。对敌伪推进据点施行阻击争夺战。对潜伏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土匪和危害分子施行清剿战。对近代新式的高、重、热诸种兵器应努力研究，设法逐渐添加，以改良自己的装备。对旧式的短、轻、冷诸种近乎原始的兵器，则仍不拒绝采用。敌后的复杂的战局，使我们不能不采取又简单又复杂的战法。积蓄力量，强大自己，经常保持自己编制和装备，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积聚有生力量以待有利时机。以上就是我们应采取的整套的军事方针。

对于这一整套的军事方针，德国陆大学生、日本士官学生必鄙薄我们为简单固陋，不懂得世界战争原则。黄埔、保定军官必讥笑我们为乌合之众，不符合中国的正规战术。他们必共同预言我们不能战胜拥有近代高度技术的敌人。一个熟读苏联战术的教条主义者，必根据其满腹教条，斥我们为庸俗，为狭隘经验，不能登诸世界战争的大雅之堂。

这一片喧嚷声，在于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懂得在今天敌后的战争的特殊规律。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世界战争原则，但不能拿来同中国战争原则等量齐观。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世界革命战争原则，但不能拿来同中国革命战争原则等量齐观。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中国革命战争一般原则，但不能对敌后战争的环境毫无研究毫无出入去照抄硬套。一般战争与革命战争在原则上具有其同为战争的同一性，可也有其差别性。一般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战争在原则上具有同为革命战争的同一性，可也具有其本身特点的差别性。一般中国革命战争的原则，无疑义的是我们今天抗战军事原则的指导理论，可是运用到当前的敌后环境，又要因我、敌、地形、任务之不同，

要求灵活变动，不能划地以自限。教条主义者多半只抓住了战争的同—性方面，故于实践不仅无用且要打败仗，我们十多年来曾经吃过亏的。如果真有所谓狭隘经验的话，则这个狭隘经验应该严格限制在那一类仅固执自己局部经验坐井观天的人。凡主张认识同—性又认识差别性，主张理论与实践联系，主张以世界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又主张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洗练上升成为一般革命理论的人，那就不是狭隘经验，而正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创造和发展，则教条主义者无反对的权利。

世界战争原理是从解决两个势均力敌互有长短的国家间的战争问题出发的，故与我们革命战争任务中以弱敌强的斗争长期性根本不同。世界革命战争的原理，如马列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科学加上在苏联的伟大实践，无疑问可以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指导，可供中国革命的采取和参考。但“大匠能以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这就是说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极艰苦的创造过程，不是背书本，抄条文，画符退鬼那样轻便的事情呵。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以来又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向全殖民地的地位前进了一步。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以弱敌强、以被动对主动的不利状况中。一切战略、战术的课题，离不开解决此一基本问题。要从一切战争原理中学乖弄巧来解决此一不利形势，绝不是说一切原理中业已具体的替我们订有便宜办法，可以一索即得。拿今天敌后环境来说，敌比我强，我之强处仅依靠政治上的真理与人民的帮助。我处在敌之包围中，主动权长期掌握在敌人手上，我们长期处在被动地位。以弱敌强，以被动对主动，以分散对集中，不仅在书本上没有人替我们预备了锦囊妙计，即过去十年战争也没有样样相同可以完全重复的致胜的旧经验。毛

泽东同志天才的著作《论持久战》，替我们指示了以弱敌强、转被动为主动、以分散对集中的正确路线。这是得力于二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得力于对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战争理论的研究，更得力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与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战争原理的统一的统一的理解，业已把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中最本质的东西揭发了出来，我们应仔细研究的。

我们已驳斥了党外的意见，但在我们党的军队内部是不是都无异议呢？我们以为是存在不同的意见，至少说在执行上、了解上的偏见则异常之多。我们来研究一下，究竟有哪些偏向呢？

第一种偏向是不了解统一的战略意志的领导对今天敌后环境分散作战的重要性，常常拿地方的特殊情况与上级的战略指导对立，或者强调游击战争应该独立自主的一面，来削弱上级的集中领导。比如在整个发展方向上这是全军应该统一的问题，可是过去在某一时期某几个部队中确存在着全军向北而他偏要向南，全党东进而他偏要西进的现象，这就是破坏了全党全军的战略意志应有的统一。意志不统一必造成行动的不统一，行动不统一必遭受各个击破的命运。战略意志的统一是表示政治方针军事方针的领导上的集中性，这方面的集中是分散在敌后环境求生存的起码条件。游击战争的独立自主是表示在上级军政方针之下，应根据实际情况去灵活实现上级给予的任务。游击战争的独立自主是为了实施战略意志的统一的。离开了统一战略意志的独立自主必致失败无疑。战略意志要求统一，而游击行动要求独立自主，两者在事实上构成一个矛盾，但后者服从前者，绝不应把决定方向颠倒过来。自然在事实上也曾发生过个别单位有过分干涉下级工作，使下级感觉指示太多，要求过苛，太无伸缩余地，缚手缚足，大幅度削弱了指挥

上的机断性，这一过度集中现象亦应反对。因此，在上级负责保持战略意志的统一时，应多注意启发下级的创造性和机断性；下级工作同志在机动灵活执行工作任务时，随时不忘记上级统一的战略意图，两者互相顾全，才能正确掌握战略方针。关于战略方针、发展方向、制度制定、政策实施和决定用人、行政的大政方针，一般应该属于统一的范围。全军服从军部，军部服从中央军委。关于工作细则、办法、工作实施过程、战场指挥、部队整训、人马调动等，属于纯粹的组织问题、行政问题、战场问题，则应该在不脱离上级的总的意图下机动的去灵活执行，而且奖励有决断有魄力有新颖的创造。三年来的艰苦奋斗造成了全军铁的统一。今天在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上，明目张胆公开与上级意图对立的现象，是基本上消除了。但不切实具体执行上级指示，不仔细研究中央指示，借口客观环境困难延缓对上级企图的执行，或者于执行时不坚决，仅就自己部队的局部情况来了解任务、执行任务，不能从华中全局或全国战局来了解任务执行任务，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这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都会妨害党的战略方针的实施，是应该纠正的。

第二种偏向是主观主义的了解，只就部队的一时的顺利发展情况，空喊向运动战发展。只根据主观的愿望、想以主观的几个大的突击来改变敌后客观环境，不了解敌我条件对比，要转变强弱形势是长期斗争过程，还要配合着国际国内的诸条件。这一空喊运动战的错误认识，如不纠正，必然走到轻易放弃游击战争，走上过度消耗自己实力的盲动冒险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向运动战发展的英明指示是有条件的，是指示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是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三阶段论。在初期的游击战争逐渐加强，到第二期以至第三期反攻时期到来，适当时期才能把向运动战发展的口号变为实行的口号。在目前敌伪



“扫荡”频繁，且日益残酷，分散作战的要求更多，过早提出运动战方针是错误的。

第三种偏向是机械的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立起来。运动战与游击战均为一种战斗方式。在长大战线与宽广地区上进行对敌的外线速决进攻，便谓之为运动战。在敌之侧后进行机动袭击扰敌，便谓之为游击战。在固定战线上进行持久防御以待机反攻，谓之为阵地战。几种战斗方式完全因敌我兵种、地形条件、任务来决定，不能死板认为大部队打大仗即为运动战，小部队打小仗即为游击战。事实上部队编制大小只是决定战斗方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其全部。游击战的部署常常是运动战部署的一部分。同样，阵地战的持久防御常常是争取运动战的一个手段。同样，阵地战部署中亦应讲究配以外围的游击战，以阻止敌之围攻，而争取战局之能转到完全进攻的地位。同样，游击战仍不拒绝采取集中全力的突击与局部的阵地钳制。各种战斗方式均由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斗方式所演化而来。而且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斗方式又互相浸透不能完全分开毫无联系。比如遭遇战两方企图以进攻方式争取先机而压倒一方以结束战斗。事实上两军相接立即便转为固守的一方面或包抄的一方面，仍旧逃不出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斗方式的推演范围。明白这个道理，便不能机械把游击战、运动战分开，而取消其中的联系性。目前我们是以正规军担负游击任务，应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诸种方式联合运用。目前以游击战为主，将来反攻时期以运动战为主，这是可以断定的。

第四种偏向是把保持有生力量绝对化。由于认识到敌后的斗争的长期性，认识到敌我强弱的对比，认识到环境的艰苦和力量的培养和保持之不易，因而把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绝对化起来，应该打的仗不打，应该付的代价不付，造成惧怕牺牲的

消极保持的现象，以致丧失时机，错过能够解决以及应该解决问题的机会，结果是图一时苟安，贻将来之大患。不了解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的保持固是坚持长期斗争积聚力量的根源，但若不经过战斗，根据地是无法保持的。从战斗中去解决一切问题是十多年来的宝贵经验。不进行必要的战斗，有生力量之保持是不可能的。今日贪图眼前的小节省，会造成将来加倍的大牺牲的祸患。以一部有生力量去取得胜利，才有可能更大的发展和保持有生力量。所谓“舍得宝调宝，舍得珍珠换玛瑙”，便是这个意思。当然，把这一观念绝对化一变而为盲动硬拼的冒险主义亦是不正确的。但今天之患在前者不在后者。

第五种偏向对坚持阵地的战略战术意义了解不够，有轻易放弃阵地的现象。目前的某些阵地某些地区的坚持，在今天或许无重大意义，即或放弃也许不会影响全局。可是从远大战略眼光看来，其价值则异常之大，今天的失着会造成将来的极大不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某些地区和支点今天不坚持立即影响全局的事亦常常发生。所以从远大的战略眼光看到将来，必须有坚持阵地的决心。从目前全局着眼，对敌后阵地亦更要提高坚持的勇气，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不出让阵地。党政军民共同坚持现阵地这种教育应深刻进行。主力部队应成为坚持的模范。阵地即或丧失应设法去恢复，这样来表示坚持阵地的决心。内战时期常用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以吸引敌人，我们首先出让许多地区，把敌人引到适当地点再进行反攻，战胜敌人后，再重新恢复阵地。这种战略退却的方针，在我之广大的根据地内进行，其退却仅系一种准备进攻的手段，故是正确的有效的方针。但今天在敌后犬牙交错的环境中，临敌而举行战略退却是不可能的，或无利的；阵地一出让即有不能收复的危险。故坚持阵地应列为第一义，不能机械运用内战的战略退却

方针。但所谓坚持不是死守的意义，而是就地游击就地坚持，以争取最后战胜敌人的意义。华中几年来的斗争证明游击坚持无往不能，党政军民全体应深刻领会这一教训。

第六种偏向关于攻坚问题亦存在着不正确了解。我军技术条件落后，特别装备上无重兵器，如大炮；无高兵器，如飞机；又加我军弹药补充接济困难，故基本上不具备攻坚的条件。这本是一般革命军队对反革命统治阶级作战的共有的现象。因此在革命军队装备不全的时期，战术上不提倡攻坚，这是正确的。可是因而得出在原则上拒绝采取攻坚战术的结论亦是不正确的。今天敌后环境中，在我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之下，在我握着农村优势的条件下，对侵入我区的敌伪孤立据点应采取适当的可能的攻坚办法，我方对敌伪进攻亦可同样采取有效的顽强的围寨防御的手段。“地区是我们的，周围人民是我们的，邻近区域是我们的，某方面发生战斗坚持一定时期让各路援军赶到即可歼灭敌人，这是应采取持久防御以及采取坚守战术的理由”。

第七种偏向是某些部队中存在着的行动不积极。经常停留中心区，不愿到边区行动。对掩护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的战斗，视为地方的事情，不视为自己应尽的天职。进行对敌游击时常有游而不击的现象。进行对敌人交通破坏时，常常有破而不坏、毫不得力的现象。进行对敌人扰乱时，常有扰而不乱、敌人并不理会的现象。这些现象常常在边区发现，在某些地方武装中则更严重，对战斗任务之执行，采取敷衍不积极的态度。同时边区部队有时有受袭击的事件发生，由于侦察警戒疏忽，行动不积极，经常停留原地，致为敌人所乘等。

以上七种便是现存的一般不正确的倾向，这是与党的军事方针不能并存的。反对分散主义对全军的统一集中领导的削

弱，反对独立主义对总的战略方针的割裂和曲解，反对教条主义对实战经验的轻视和隔离，反对对具体经验的固定化和绝对化，反对组织战役指挥战斗中不脚踏实地、不正确分析情况的主观主义，这才能保持我党的战略战术方针的正确的实行。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陈毅军事文选》刊印。

## 周恩来关于对日寇南进后时局的 估计给毛泽东的复电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

一、号电敬悉，中央估计完全正确。

二、我意认为，在日本于缅甸、荷印得手后，攻苏可能增大，但攻印可能亦有。攻华则为顺手牵羊，非主攻。目前情形还看德苏战争的发展及缅甸、荷印抵抗时间的久暂，来定日寇下一阶段的动向。

三、英在南洋的保卫战，实在坏透，连美国甚至英人自己也极不满。香港根本未出击，二百余敌便在香港登陆。新加坡未抵抗而降，俘者六万多。仰光久已撤光，缅甸之失恐不出下月。緬、印陆上无防，海军亦难防卫。

四、日寇之困难，在攻印则分散，攻苏则深陷，攻华则难收。但大英帝国太腐旧，易于为敌所乘，而本年来则为苏打败德国之年，故苏对日仍取防御战略。

五、蒋<sup>(1)</sup>在此情况下既不会投降，也不会彻底抗战；既不会与我全面决裂，也不会放弃对我进攻。敌攻苏固要迫我北进，日攻印他也要关门压我。故本年内将为国内政治最困难的一年，但并非最黑暗的一年。

六、中央现行方针以及业务中心是完全对的。去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后，我们因估计是长期战而初期困难重重，故大后方工作方针除仍遵中央指示外，并对办事处规定业务中心为政治（提高警觉性同特务斗争，政治上加强支部生活、策略教育等工作），特重民主与文化宣传，特重集体研究与写作；组织，特重干部审查及组织工作的检讨；调研，特重军事、经济与人物；学习（高级班、乙班、丙班、选科）；健康、节约五项。对地方党则以巩固组织、审查干部、创造新的工作作为业务中心。而大后方一般党员与非党干部均以巩固社会地位、加紧个人学习、广泛交结朋友为中心业务。

七、关于此间学习情形，前已电告并望指示。我所做的报告均有记录，处处在检讨我们过去错误，处处与现时实际政策联系。你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指示尚未见全文（全文请令速发来），但已得启示甚多（党校计划已收到）。关于加强党性、调查研究、学习三决定及你的报告序言，在此不仅引起党内热烈拥护，并得到党外好评和赞助。现又收到土地政策、宣传工作两种文件，将大助我们研究改进。

周 恩 来

二十四日渝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五号）

——各种干部的业务教育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业务教育是军队中各种干部教育的中心内容。军队中干部必须各有“专行”，不懂得本行的知识，不整理本行的经验，而把干部的知识与教育局限在一般的政治教育上是不正确的，是容易使干部教育与干部工作脱节。但是各种干部仅仅有本行的专门经验与知识，而没有一般的政治、文化的学习，则会使干部眼光狭隘，失其前途（若无政治教育的话），或者知识文化太低，无法使本行工作进展（若无文化教育的话）。因此，业务教育与一般的政治文化教育，必须有适当的配合。不过我们干部教育中目前的弱点，并不是忽视一般的政治教育，而是忽视业务教育，而是太一般化，太教条化，好高骛远，以为学习业务并不是理论学习，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的书本才是理论学习，这就影响到各部门工作干部、不熟悉自己的职责，不熟悉“本行”的实际与理论。

（二）业务教育的中心内容，是调查该部门工作的有关情况，研究该部门工作对象，熟悉该部门工作中的政策，整理该

部门工作的经验，熟悉该部门的理论，使我们的干部教育直接影响其工作的改进。这种业务学习，必须针对着当前环境下的我们各部门工作，为此必须研究我方该部门工作的过去历史，研究敌友方该部门工作的经验与理论，参照外国革命历史中该部门工作的经验与理论，这样才能使我们各种干部的眼界扩大，使他们能够整理自己经验，同时也不使业务学习脱离本军客观环境，照抄友方敌方及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业务学习的范围不可过广，要抓紧在当时当地对本身工作有直接的与实际意义的东西，由浅入深，由近而远，由实际而理论，不然会把业务教育弄成无的放矢，这也就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业务教育。

（三）军队中各种干部的业务学习分述如下：

1. 我军军事干部应提高自己的一般的军事政治文化知识水平（见第二、三、四号指示），同时要努力当前的本身工作业务的学习：

A. 军事指挥员应特别调查研究：

甲、当前的敌情，当地的军事环境（经济、政治、地理、民情等有關於军事的方面）。

乙、敌人对付我们的战术（研究敌人文件）。

丙、抗日游击战术，总结各次战斗经验。

丁、本军的（本连、本营等）情况及本军各种条例的研究。

戊、友军的情况（国民党的）。

B. 参谋人员：

甲、一般参谋人员如参谋长，参谋处长及作战参谋，应与指挥员同样研究上述问题外，并须熟悉参谋业务与有关参谋工作的各种条例。

乙、情报干部则应研究：

（1）日军伪军情况。



- (2) 谍报学。
- (3) 当地社会有关情报工作的各种情况。
- (4) 总结我们谍报的经验。
- (5) 本部门的及有关的各种工作条例。

丙、通讯人员则应研究通讯技术，增进自然科学知识，改进我们通讯的方法。

C. 军事教育工作者：

- 甲、军事教育学。
- 乙、我军在职、在校之军人教育及干部教育之情况。
- 丙、总结军事教育之经验。
- 丁、经常注意研究国内外及敌、友新的教育方法与材料。

2. 政治工作干部，应提高一般的政治、文化水平，研究政治工作诸条例（见第三、四号指示），加强自己的业务学习：

A. 宣传教育干部：

- 甲、过去教育工作，宣传工作的经验。
- 乙、上级关于宣传、教育之指示及文件和各种有关宣传、教育的理论与材料（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毛泽东论宣传教育的文献）。

丙、了解当前教育工作、宣传工作的情况及总结经验。

丁、教育学说。

戊、敌人、国民党军队之宣传工作，政治教育之研究。

己、苏联共产党及红军之文化、政治教育及宣传工作。

B. 锄奸干部：

甲、了解敌人，日特国特是什么，及其对付我们的办法。

乙、了解当地社会、有关除奸工作的各种情况。

丙、历史上肃反的惨痛教训。

丁、上级对除奸工作的屡次指示与除奸政策。

戊、了解部队中除奸工作情况，总结当前经验。

己、研究奸细的面目，研究奸细的口供。

庚、苏联肃反的文件。

C. 组织干部：

甲、了解军队组织情况及党的情况

济学，及一般的财政学、战时政治经济学。

辛、从事专门的会计与统计工作者，应研究会计学与统计学。

B. 卫生干部：

甲、医学。

乙、有关于医药的自然科学。

丙、经常注意研究国内外及敌、友各种医药卫生方面的知识及发明。

丁、火线上救护及卫生防疫防毒工作。

戊、总结自己工作经验。

己、熟悉本部门的及有关的各种工作条例。

C. 军事工业干部：

甲、有关于本身工业的自然科学。

乙、工厂管理法及当地政府颁布的有关工业政策与法令。

丙、当地社会的物质条件与生产状况。

丁、总结自己经验。

戊、本部门的及有关的各种工作条例。

D. 机要干部：

甲、加强数学的自修。

乙、加强国文的学习。

丙、熟悉机要规则及条令。

丁、研究机要秘密。

戊、总结自己经验。

（四）为着更好的配合与充实上列各种干部的业务学习，各战略单位的高级工作部门，都必须有计划的编印各该部门的业务学习的教材或工作手册（如敌工手册、宣传手册，延安亦在着手编印中）。这种教材或手册，可包括下列内容：关于该部门

工作的有关情况，关于该部门工作的决议指示、条例、法令等。毛泽东同志关于该部门工作的文献，该部门工作的我们的历史文献，马、恩、列、斯关于该部门工作的文献及外国经验，友方、敌方关于该部门工作的文件条例及经验。这些教材或手册，可分期的继续的出版（如材料太多，则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如印刷困难，则可指定教材的目录），求得干部业务学习，能有计划性及不间断性。当然各部门干部业务学习，应当根据该部门各级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分量与速度。

（五）各种干部之业务学习的组织，应由各部门之高级机关，收集教学材料，定出教学进程。专门训练班（例如除奸人员训练班）的教育计划，除一般政治文化课外，必须依照上述原则，制定专门课目计划。各种干部亦须进行轮训教育，以补在职教育之不够。在职的各种干部业务学习的组织，以指定材料阅读、上课、报告、开研究会、开座谈会、开检讨会、开总结会等等方式进行之，但必须经常。

（六）各种干部除依照第一号指示，受一般政治、文化、军事的考试外，必须由各专门机关，定期组织各种干部的专门问题的考试，例如定期考试除奸干部，提出关于除奸工作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测验除奸干部是否了解敌人，是否懂得除奸政策。其他部门的考试以此类推。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 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的认真的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广大数量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须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我们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的。

(二) 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

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三）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

（甲）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不论从事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宣传、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医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与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每一部门的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指导所属干部有秩序的进行学习。而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及其宣传教育部门则负总领导的责任。其学习范围，包括如下五项：第一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例如军事部门精密调查敌友我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军事干部；其余类推。第二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例如财政工作人员应熟习财政政策与财政法令，锄奸工作人员应熟习锄奸政策与锄奸法令；其余类推。第三是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例如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的经验，加以分析和综合，抽出要点，写成文件，教育所属干部；其余类推。第四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

识。例如党的宣传部门将我党二十年宣传鼓动工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与总结，编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其余类推。第五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例如军事干部研究军事学，医务干部研究医学等，每一部门均须研究自己的理论。对于上列各项业务学习，各部门领导机关负有供给教材、指导学习及考查成绩的责任，务使所属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业之目的。轻视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观点是错误的。

（乙）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关于进行时事教育的办法，包括督促所属干部看报，对所属干部讲解时事问题，及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等项。关于进行一般政策教育的办法，或为一切干部所应普遍学习的，例如将中央对时局宣言，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边区施政纲领等，督促干部阅读，加以解释及讨论等；或为虽与本部门业务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有使所属干部加以研究之必要者，例如向军事指挥员解释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又须指出，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虽为一切干部所必习，但其分量轻重应依各部门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医生、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其分量应该减轻，而对于党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等，则其分量应该加重。关于政治教育缺乏经常性的毛病，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应有计划的克

服之。

(丙) 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范围，暂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宣传教育部门应负责解决课本问题。其教育与学习办法，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或一机关独办，或数机关合办，或采取轮训制，轮流抽调干部集中一地学习，都是好的。在这些补习班或补习学校中应有专任的教职员，辅之以兼任的教职员。在环境不许可的地方，则用小组学习制，以该机关某一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减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员，亦可专用教员。文化班或文化学校，可分为初级的及中级的两种，初级班为不识文字及粗识文字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高小程度为合格。中级班为已有相当于高小程度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中学程度为合格。干部分班应以文化程度为标准，不以职位为标准。此外，某些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虽属知识分子，但尚有补习国文及文法之必要者，则用小组学习制或其他办法补习之。为着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应在党政军机关内提高文化教员的地位，最好的文化教员应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优待。对办理文化教育有功的人员应受到奖励。

(丁) 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



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其具体进行，应采取高级学习组与中级学习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

（四）四种教育的时间分配及课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脱节，由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负责调理之。

（五）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须由领导机关加以审查，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须严格加以清除或批评。

（六）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则，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许可的地方或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七）实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定之。

（八）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人员（教员与职员），应加以严格的审查，并应首先调给之。各级领导人员有参加教课的责任。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经费，应最大量地供给之。

(九) 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人员，尤其是教员，应加以教育。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定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如何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团体 成为更广泛的群众组织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

蔡 畅

各界妇女联合会或各界妇女抗日救国会，是目前抗日根据地最普遍的妇女群众组织，应该是各党派、各阶级、各种职业、宗教、民族、年龄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团体。

过去各地妇联或妇救，基本上认识了这一点，实际上团结了相当广泛的妇女群众。根据一九四一年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等七个抗日根据地的不完全的统计，当地妇联或妇救的会员，平均占了妇女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这在素无组织的农村妇女来看，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成绩。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就会员成分来说，那么大部分地区，一般的都注意团结基本妇女群众，没有充分的争取（甚至忽视）富农、商人及地主阶级的妇女；就会员年龄来说，一般的注意吸收青年妇女，没有耐心的团结老年壮年妇女及所谓落后妇女。因此大部分地区的妇联或妇救，实际上近似先进妇女群众组织。

最近各地妇女工作者，已认识了这一点，正在改进过程中；为了使改进工作获得更大的成绩，使妇联妇救成为更广泛

的群众团体，特提出下列几点意见，以供各地妇女工作者参考。

首先从会员说起，关于会员的资格，入会手续以及对会员的要求，规定得是否适当，是妇联或妇救能否成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妇女群众组织的第一个关键。过去妇联或妇救对个人会员的要求，一般规定“凡十五岁以上的妇女，除敌探汉奸外，承认本会章程，执行决议，服从纪律，交纳会费，并经会员一人介绍，本会批准者，均得为本会会员”。入会以后，要过组织生活，尤其在巩固组织过程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大都规定每十天或一周开一次小组会，再加上其他活动，平均每周至少开两次会。

以这样的条件来要求根据地的妇女群众，那么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才能做到，绝大多数妇女虽然具有抗日救国的热忱，然而由于处在敌人反复扫荡的环境里，过着农村分散的生活，担负着繁重的家事劳动，对于妇救或妇联这样严格的要求，大有望而生畏之慨，她们不能也不愿走进妇联或妇救的门沿；就是已经加入的，也觉得难于完成会员的义务，而要求退出。

因此，我们建议，凡十五岁以上的妇女，只要赞同抗日，应不分阶级、党派、民族、职业、宗教，经报名批准者（该妇女所在地的妇救或妇联的组织批准），均得为妇联或妇救的会员。关于会员的组织生活，对于广泛的群众组织，在原则上不能也不应要求会员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如政党要求其党员一样；因此妇联或妇救的小组会议，应尽量少开（对普通会员甚至不开）。同时还要改变其下层组织机构，应以有工作内容的生产小组及识字小组为基础，统一为妇联或自救小组，取消其他名目繁多的空洞的小组。把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当为妇联或妇救小组生活内容，这样既可减少会议，又可推进工作。在

组织生活中，必须要有切实的工作内容，生动活泼的方法，说服教育的精神，以及估计到会员的困难。如果不从这方面着手，而一味强调会员服从纪律，执行决议，以至开除会籍等等，那么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总是违背群众组织原则，脱离群众的办法，希望各地妇女干部注意纠正。

其次，谈到组织形式的问题。过去各地一般地组织妇联或妇救，我们承认这是目前抗日根据地组织妇女群众的较好的普遍的组织形式，然而不是唯一的组织形式。为了更广泛地组织各种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职业、不同信仰（如会门妇女各种宗教妇女）、不同民族、不同兴趣的妇女，各地妇女工作者，可以根据当时当地妇女的具体条件，在妇联或妇救之外（或在其领导之下），采用各种不同形式，如女学生读书会，女教师联合会，姊妹会，母亲会等等，去组织和团结她们（详细办法，当另文发表）。

最后说到领导机关的问题，妇联或妇救领导机关的成分，配备得是否适当，是它能否成为更广泛的群众组织的决定关键。过去由于各地妇联或妇救的组织，是从上到下建立起来的；由于战争动员的频繁，常常忽视了妇救或妇联组织中应有的民主作风，再加上宗派主义残余的作祟，习惯于“包办一切”；因此，各地妇联或妇救的领导机关、村乡组织中，虽然吸收了很多非党妇女干部，然而县级以上的领导机关，共产党员却占了百分之十以上。这样，就使妇女群众组织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容易“党化”，因而不能与广大群众有更密切的联系。

因此要改善妇联或妇救的组织，成为更广泛的妇女群众组织，成为更能获得妇女群众确实热烈拥护与竭诚爱戴的组织，成为真正有充实群众基础的组织，其领导机关则必须坚决执行

下列两个方针：

第一，政治上的方针：妇联或妇救应是团结各阶层妇女照顾各阶层妇女利益的群众组织，妇联或妇救一切工作要以“公平合理”出发，既可确实保障最苦的劳动妇女的利益，又要照顾其他阶层妇女的利益；既要着重注意最受社会压迫与宗法束缚的贫苦妇女的生活改善、文化提高，又要照顾其他阶层妇女地位的改善。

第二，组织上必须有大胆的真正实行“三三制”的精神。各级妇联或妇救领导的巩固，必须引进大批非党的妇女领袖或积极分子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共产党员最多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反对党员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才能彻底肃清宗派主义的排外性”，开展民主作风，使妇救或妇联真正成为团结各阶层妇女的广泛组织。

有些妇女干部，不善与党外人士合作，不敢放手实行“三三制”，对于这些干部，我们诚恳地希望她们能够深切认识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没有权利排斥党外人士的真谛。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及与之共事的态度与作风，彻底肃清“包办一切”、“自以为是”的陋习。

另一些妇女干部，认为在根据地积极活动的妇女大部分加入了共产党，但是非党妇女都蛰伏家庭，深居简出，无从争取；实际情形，并不完全如此。只要我们改善工作方针工作内容，使广大妇女认识妇联或妇救不是少数人的组织；只要我们不固执宗派主义的成见，不用党员的条件去测量群众；那么在党外，我们定可以发现许多颇有声望、积极活动的非党妇女干部。

再加上敌后根据地的广大妇女群众，在敌人烧杀奸淫之下，在几年民主政权的教育之中，民族觉醒与社会觉醒提高

了，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伟大力量；而且各阶层妇女占人口之半，这些都是妇联或妇救实行“三三制”的最便利的条件。

在妇女工作中，贯彻执行这种新的方针，那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必然大进一步。

根据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解放日报》  
刊印。

## 刘少奇给薛暮桥的信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薛暮桥同志：

三月八日来信，我读过一遍。你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我完全同意！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策略问题，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不能和你讨论这些问题，但望你们能继续研究与讨论，必须把这些问题彻底弄清楚，而且要一般的弄清楚，才能算得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否则都不是布尔什维克。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战略问题，就有许多是值得讨论的。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如战略有错，策略也必有许多错误。退一步说，假定在内战时党的战略不错，而策略也有许多是错误的。甚至许多策略是与战略脱节的，党的策略在当时有许多是违反战略任务的可能性，许多策略执行的结果，取消了战略执行的可能性，或造成战略执行更大的困难。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乡村中的基本工作方针（这里不说城市），应该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在主观客观条件业已具备的地区——实行革命的进攻，建立革命的武装与政权（如果不违背战略方针及全国性的革命发展的话），苏维埃红军游击区即是如此。第二个是在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还没有或不可能准备进攻的地区——就应坚决的巧妙的实行退却，利用一切改良的



可能，合法的可能，以便保存后备军与党的组织，准备与聚集革命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等待新的革命的来潮。

当时的错误，就在于只有第一个方针，而没有第二个方针。即在一切主观客观条件均不具备的地区，一律采取实行革命进攻的方针，因此，使许多后备军与党的组织可以保存的没有保存（如江苏、浙江暴动最明显），可以准备好的没有准备得好。

当时的错误，在于否认一切改良的必要，不懂得利用改良的口号，来发动群众运动及建立公开与秘密的联系。这就完全是非马列主义的观点。

关于二五减租的口号，在以下几种条件之下，有其不同的意义与作用：

（一）战略任务是要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而广大的农民又已起来进行没收地主的土地的坚决斗争之时，这时二五减租的口号是反革命的，足以使群众迷失斗争的方向，违反战略指导的原则。这时应坚决反对二五减租口号，领导群众一往直前的实行土地革命。在大革命时，国民党中的反革命者提出二五减租，目的在反对群众的土地革命，而不在改良。当时我们反对这个口号，完全是对的。

（二）广大群众还没有起来坚决斗争没收土地之时，但有可能起来坚决为土地而斗争，并保护斗争的胜利，这时二五减租的口号，足以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走上土地革命的过渡口号。即首先经过二五减租的口号发动与组织群众，然后提高群众到为土地而斗争。这时二五减租的口号是完全革命的进攻的口号。这时我们在二五减租运动中宣传与准备土地革命，但反革命及改良主义者，则可能在二五减租中宣传与取消土地革

命。这是我们与改良主义者的区别。

(三) 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还完全无组织，而且在相当的长时期内群众不能举行革命的进攻，或这种进攻完全无胜利可能的时候，这时我们应利用二五减租的改良的合法的口号，来团结与教育群众，建立公开与秘密的联系，以便等待适当时机举行进攻。这是把二五减租当作一般改良口号来利用的。拒绝利用这种口号是完全不对的。把二五减租当作我们的一切，当作我们奋斗的目标，也是不对的。而应该一方面要二五减租，同时又向群众指出目标在什么地方。但也不是经过二五减租立即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举行革命的进攻。在这一点上，我们即与改良主义者取得一致。

(四) 即在我们现在的时候，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不能不放弃土地革命的战略要求之时，二五减租即成为我们目前的战略口号之一，而不是以前的策略口号的性质了。在根据地内实行二五减租，即是战略指导的实行之，我们不是经过二五减租到土地革命，而是在目前一般的即以二五减租为止，在战略上不再前进（前进的阵地是还有的，将来怎样前进这里不说）。这是二五减租口号在目前的性质。这就是说，在民族矛盾严重到如我之敌后根据地这样，对于土地问题，我们也要采取改良的道路，以便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加强与巩固封建势力）。因为这种改良，是在根据地实行，是在军队政权群众团体由我们领导的条件之下实行的。而不是在地主资本家领导的政权之下，由地主资本家来实行的改良——以加强与巩固地主资本家统治的。同是一个二五减租的口号，在这种不同条件之下，对我们就有各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与作用，这就表现，策略问题是一个何等复杂的问题，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是何等的有害！

你的来信上所谈的二五减租，其条件是在第二或第三项的

条件之下。如把这第三项条件与第二项条件不分，亦将弄出错误。

关于你们在农研会的工作，我有以下几点感觉：

（一）你们应更进一步与乡村改良运动的团体合作，甚至在组织上与他们合并，成为他们中之一个派别——较有远见的派别（在组织上甚至无派别）。这样，你们不独在外面去影响改良主义团体，而且在他们内部去影响，起推动作用，以至影响与推动其上层，而你们又经过可改良团体到民间去组织农民，在反动时期，应加入改良团体，而不应与群众性的改良团体对抗。

（二）农研会不能也不应发展成为农民群众斗争的团体。农民群众团体由农民自己组织，自己斗争。农研会的个别分子（干部），以个人资格加入这种农民团体去领导农民（为了保存农研会的合法地位，它的个别分子去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和组织还应秘密，即在组织上，农民斗争团体与农研会无公开的关系）。如将农研会发展（或称转变）成为农民群众斗争的团体，那在反动时期的策略上即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农研会即离开了它原来研究的任务，实质上既不能是农研会，而且要丧失农研会的合法地位。这与当时转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转变群众的文化娱乐组织为赤色工会，是一样的策略上的错误。

在你的来信上，对于以上几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弄清楚，故草此复你，望你们继续研究。你召集当时一些人来加以讨论，是完全有益的事。至于当时你们是否有党的领导，这不是重要的问题。也不一定要有党的秘密组织的领导，才能有公开与秘密的结合，才能在群众中进行鼓动与进行群众的组织活动。这完全不一定要就行的。农研会的中坚可靠干部，如能有周密的分工（有些人完全进行农研会的合法工作，有些人以个

人面目到群众中去公开组织群众，有些人不出头的联系各方面的工作，月刊进行合法的宣传，另出一个小刊物进行对群众的鼓动及指导群众行动），即可能完全结合公开与秘密工作。在白区文化界的工作，主要的只做了合法工作与宣传工作，而没有或很少把公开与秘密结合，把宣传与鼓动及群众实际运动结合。这是一个极大的缺点。你们可参看我在《共产党人》上的《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你们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全党对这个问题弄清楚的人也不很多。所以这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你的夫人，我有可能，当尽力照顾。

祝好！

刘 少 奇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

(甲) 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乙) 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

(丙) 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

(丁) 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

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

（戊）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中 宣 部

三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 敌占区工作指示<sup>\*</sup>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

刘 伯 承

一、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应着重于简单的政治宣传，或兼侦察，任务不可过重，距离不可过远（至多只一昼两夜，至次晚要回游击区），必要时并密令就近游击队接应。务求初次出动的胜利，以提高信心。

二、出动前，应使全队将敌情研究清楚，并由军分区首长亲身教育以切实的急需的政治工作与战术，并定出计划而演习之。

三、该队的指挥、政治干部都要挑选政治坚强、大胆机敏而有威信者。这点关系武工队成效很大。

四、政治工作，应以政策和革命的两面策略，运用宣传与组织的方法，察明敌人欺骗与压制人民、实施配给制度的情形，尤其秘密爪牙的分布，并乘机进行集会，做好团结群众（首先知识分子）的工作，而本身尤应严格遵守纪律。敌占区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必要的配合，但两者必须严格分

---

\* 这是刘伯承对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时的讲话，后来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命令下发部队。

开，以免被破坏，这点要特别注意。

五、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任务的需要与否而决定之，不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如突遇小敌，可捕捉或歼灭之，大敌则避开之。受敌合击时，则以麻雀战分遣撤退，但须预定第一、第二集合场，而以便衣联络之。一般说来，武工队是用避实击虚的奔袭战术，使得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捕捉。不老走一路，不久停一地（暂时停止也应在工作四通八达之处），一切使敌不意。应严守秘密，不露动向，依靠居民做我们潜伏地探，而通信极应秘密，行动应利用隐蔽地形和昏暗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散布“谣言”，曲折运动，以迷惑敌人。放警戒不要过远，以免过早暴露。同时要捕击敌人的侦察与通信机关，以使敌人耳目手足麻痹不知，摸不着规律，以利进行各方的袭击和合击。武工队是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应在每次运用实际经验中做出新的成绩，教育其他部队。

六、为要能在行动中百倍紧张起来，必须在行动前休养体力及预先做有组织的准备。

初次宜着便衣，尤宜轻装。带宣传品，带干粮。个人文件检交他人保存。带梯桥、镐、铲、索子，以便通过封锁线。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刘伯承军事文选》刊印。



## 到什么地方学习\*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陈 云

延安有一个时期的教育方法，在新干部中造成一种风气：不愿参加工作，要求“长期学习”。这种风气现在已有改变，但未完全扫除。近来又有一部分党龄较长（十年或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很少的（在秘密党内与党的生活长期隔离的，或长期未做过党的工作的，或只做过一个时期很少一部分工作的）老干部，要求进中央党校学习，不愿意组织部分配他们到工作中去。虽然组织部一再表明，他们是党保存下来很宝贵的老干部，但缺少工作经验，党为了爱护和培养他们，要求他们到工作中去锻炼，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可是这些解释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说明下面几点。

不愿立即参加工作，要求进学校，或者要求长期学习的同志常常说：“让我进学校学习，我要在政治上开展一下。”党当然希望干部在政治上开展起来，但应该研究，干部在政治上如何才能开展？事实证明：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从学校里训练。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不论是苏联的或者是中国的，决不是毫无经验、夸夸其谈的人，而是既有丰富革命经验又有真正革命理论的人。干部也是一样，

---

\* 这是陈云为《解放日报》写的署名社论。

真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决不是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因此，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使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

当然，这不是说，每个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上都很开展了。我们党内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水平一般说来还很低，而且还有一些经验主义者，这是事实。但是，许多同志政治水平所以不高，有的同志有经验主义的毛病，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某些工作经验，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观察去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克服经验主义，既要在思想方法上，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在党的路线上和政策上加强教育，又要扩充他们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如果两者不是相辅而行，则提高政治水平和克服经验主义是不可能的。本来这个道理很简单：政治高明不表现在人身的别的一部分，表现在人的思想上。而思想上的高明和发展，只是因为这个人丰富地接触了并且理性地认识了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客观事物。

如果上面的说法是合乎事实的，那末，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为了建立政治上开展的基础，为了自己在政治上进步，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

先进学校读书，还是先去参加工作？这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时常犹豫的问题。经验证明，除了学习专门的知识以外，一般没有或者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延安训练新干部有过好坏不同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抗战初期的抗大、陕公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习几个月，之后就去

参加工作。他们在学校中不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是培养生气勃勃的革命作风。现在许多抗大、陕公毕业之后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已经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都有了进步，这是正确的训练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后来延安又有另外一种训练新干部的方法，就是把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教的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学的是教条，许多学生既没有学到理论，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这是不正确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本来这两种学生的政治文化水平是一样的，但因为训练方法的不同，学习方法的不同（工作中学习和学校内学习），而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已经超过了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这两种训练方法所得的经验是宝贵的，现在对于错误的方法不应该重复而应该纠正。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这正像我们读书一样，某一本书自己确实已经读过几遍，但是，隔了几年，因为工作需要，再去读它一次，就好像是没有读过的新书，就觉得过去实在没有读懂。这个道理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必须由实践中得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所以，要使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不是先进学校（抗大、陕公那种几个月训练的学校不在此例），应该先去工作。

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干部进学校学习。对于那些必须进学校学习的干部，我赞成他们进学校。但是对于缺少工作经验的干

部，我赞成他们到工作中学习，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去学习。

有些同志也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经验很少，需要到工作中学习，但又以为这次中央党校彻底改组，许多中央委员当教员，不进党校恐怕错过学习机会。因此，虽想参加工作，更想先进党校。我以为事实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同志不仅是党校的教员，而且是全体在职干部的教员。每一个中央的决议、指示，就是学习的最好的讲义。而且在职干部的教员，不止中央委员会的某几个人，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党校规定学员最多只学三年（预料），而在工作中，则中央委员会是长期的教员。

缺少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党龄长，应该看到自己工作经验的不足。革命队伍里不能卖老资格。革命工作能否做好，不决定于党龄长短，决定于是否有工作经验、组织能力、政治水平和高度的积极性。如果在“老资格”上心满意足，就会阻碍努力，阻碍进步。这非但对于革命没有丝毫益处，对于自己也是一种倒退。

“我是老干部，难道我的工作经验还不如新干部？”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我们承认所有奋斗了多年的老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工作经验，但是，必须懂得今天工作的复杂程度，如果只靠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去应付，也是应付不了的。例如，我们在秘密党内从未动员过老百姓驮盐，没有征收过救国公粮，没有搞过春耕运动，没有干过政权工作、军队工作，没有干过管理吃饭穿衣的经济工作，没有做过现在这样繁重复杂的技术工作，等等。这些工作在秘密党内一概没有做过，件件没有经验，难道我们不要学习学习吗？不要赶上去补课吗？新干部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自然的，我们既称老干部又没有这些工作经验，就必须补课。过去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由于工作关系

或其他原因，但现在不能安于现状，或者责备过去，抱怨别人，而应该踏踏实实去补课。这是革命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革命的责任。

我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干部，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而且我自己也是缺乏工作经验的一个。但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同志，需要经过哪条道路才能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问题，是需要弄清楚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 第十八集团军关于揭发和打击 敌寇毒化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各师长、各军区司令、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日本帝国主义为灭亡中国而不惜采取最野蛮最无人性的“三光”政策、奴化政策，并在广大地区内普施毒化政策。在日寇占领区不少肥沃土地在压迫下种植鸦片，无数良民已为敌毒化所腐蚀，其狠毒阴谋不仅要亡我国家，而更要灭亡我种族。目前正值春耕时节，敌寇又在各地宣传与强迫种植鸦片，并企图侵入我各个抗日根据地区域，企图腐蚀我根据地抗日军民。我八路军全体将士应即在自己所属区域内彻底揭发敌寇毒化政策之狠毒阴谋，打击敌寇之毒化政策，并协同当地抗日民主政权号召与组织民众一致与日寇毒化政策斗争。在我各抗日根据地内一概不许种植鸦片，违者严究。

总 司 令 朱 德  
副 总 司 令 彭德怀  
野战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  
军·文献》刊印。

##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

---

\*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

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



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

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

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

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

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

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

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 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

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



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致 读 者<sup>\*</sup>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秦 邦 宪

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形态呈献在读者面前，我们愿乘此机会来总结一下过去十个月来的工作及提出今后本报的方向。

什么是党报？一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必然会想起“报纸不仅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组织者”（列宁）、“报纸是我们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斯大林）这一类名言。但是试问报纸到底如何才能成为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集体组织者呢？究竟怎样才能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呢？那么，必须：第一，贯彻着坚强的党性。这里不仅要“在估计任何事变的时候必须公开地和直接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观点上”（列宁），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使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第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

---

\* 这是秦邦宪为《解放日报》改版写的社论。

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第三，洋溢着战斗性。党报必须是为着党的革命方针和路线而奋斗的战士；报纸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事变而进行热忱的鼓动，而鼓动的成功，则极有赖于明朗锐利的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团结的阴谋和企图。尤其在思想战线上，报纸应该进行经常的坚持的思想斗争，宣传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思潮，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同时，报纸亦应该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摘，帮助其克服和改正。第四，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地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底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

如果从这样的观点去检查我们十个月的工作，实在是惶恐得很，应该说《解放日报》是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的，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对于敌对思想缺乏应有的批评，对于我们工作的缺点，没有严格的揭露和帮助其改正，对于边区中所进行的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总之，我们还没有具备党报所必需的品

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该的责任。一方面，党报在这个时期中没有能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的鼓手和先锋；另一方面，在党报本身还未能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余毒。我们在党报上未能对于整顿“三风”加以应有重视与地位，蔚成风气，形成潮流，重要的党的新闻消息放在极不显著的地位，有些解释的论文评述，或则浮泛空洞，辞严意宽；或则挂一漏万，损害原意；或则夸夸其谈，以八股反八股。同时，要成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先锋，本身首先应该成为模范者，唯有模范者方能成为先锋。而在我们篇幅上，主观主义（如对苏德战争前夜苏土协定的估计等）、宗派主义（如对某些稿件的取舍，未能免除狭隘的观点等）及党八股（如某些社论、专论和副刊）都是俯拾即是。因此，亦就不能在思想革命改造全党工作中起其应有的功能。

在检讨我们过去的工作之后，我们认为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是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的喉舌。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我们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别的利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报纸变成全国抗日人民和抗日党派的共同的论坛，我们欢迎一切抗日人

士和党派利用我们的篇幅来倡导一切有利抗日团结的主张办法，消灭一切阻害抗建大业的障碍。

十个月来，我们在工作中，曾受到读者的许多鼓励和批评。鼓励增加我们的勇气，批评促使我们反省，我们统致无限的感谢！当此改革之始，我们愿引一句联共第八次大会关于党报的决议，以为自励：

“没有办得很好的报纸，则健全的坚强的党和国家的建设是不能设想的。”

并且愿意，模仿地添一句：

“没有广大的读者的赞助和鞭策，则报纸要办得好，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诚恳地期望着读者们给我们一切援助和批评，使我们的报纸能够成为真正的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和集体组织者。

根据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 再论我们怎样学习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徐 特 立

第一次我写的怎样学习，曾提出八个小题目。在第一次只发挥虚心向人们学习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学习的第一等问题，是向学习开门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那么，一切学习的方法都成为无用了。或者多学一些方法更是有害。因为知道的方法越多，精神越不集中，反把主要的方法和次要的方法平等看待，甚至把主要的方法忽视了。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尚未肃清的时候，即许多人还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情况下，反对骄傲高慢的作风，是学习的第一等任务。

孔子是二千多年以来封建社会最有权威的学者，他自己的学派是儒家，他却向道家的老子学礼。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学者，他却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存着高视阔步的态度，鄙视一切，尤其是不愿意向下级学习，向群众学习，即向一切不如自己的人们学习。无论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他们的先生朋友以及当时的一切书籍，当时的社会思想，都要比他们所要求的要落后，比他们所认识的要粗浅。但是他们虽然严格的加以批评，加以革命，然而从来不存鄙视和唾弃的态度，而是加以细心分析，尊重他们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尊重过去和同时的一切

著述。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论者，是马、恩所推尊的前辈，因为他重视上流人理论的实践，忽视下贱的犹太人式的实践，马克思曾在《论纲》中加以批评。应该知道，无论是医药卜筮之书，宗教经典和劝世文，虽然没有科学意义，却有历史意义，何况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及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虽然他们的学说还不免有唯心主义、机械论及其他反动的成分，但还有许多可宝贵的东西，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我们需要特别尊重他们。技术人员政治落后的成见，实表现是自己的狭隘和自骄。我们需要虚心学习和深刻的研究。真能这样学习，就无论读何种书籍，都会发现自己从来所未见的东西。苏轼是宋朝一个极有名的诗人，他经常读已经读过的旧书，曾有两句写读书经验的诗，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过去我们在江西当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时，除油印外没有其他的印刷物。如果要看报纸的话，就要派一个部队打开一个县城，夺取新旧的报纸，马克思主义的书，除半部《列宁主义概论》外，只可找到三五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经常藏在床上禾草中，也竟被人们窃去，这是我最痛心的一回事，因为这是我学习理论的唯一工具。但是因为无书可读，只读一本小册子，一读二读三读以至无限制的读，每次都发现自己未了解的新东西。日本在明治维新初，书籍缺乏是惊人的。那时有著名的教育家名福泽喻吉，自学荷兰文，不独不易找师，也不易找书，他探听附近百里某人有荷兰文字典，竟带伙食行李去借抄。生活书店出版的《联共党史》，开始只出上册。我在湖南时探听书报流通社有苏联的版本，上下册均有，我借了来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不能不详细分析，做一番文字整理工夫，结果我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再回转来把上册节抄一次。我从此得了个结论：“买书

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同志们，我们自以为知，自以为能，就会阻碍我们进一步学习，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就会拒绝他人的批评，就会忽视他人的一切可学的优点。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为什么特别高明，不是中央负责人有三头六臂比我们聪明。但在自作聪明者看来却是特别笨拙，因为我们中央对每一个政治问题、干部问题、策略问题，都是经常的分析，经常的找材料，经常的检查过去的领导，不只是个别的检查而是有系统的历史的检查。例如检查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许多次都提到过去与十九路军的合作，以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下级不及上级的高明，其原因之一而且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实事求是与非实事求是；粗枝大叶与细针密缕；自以为是，拒绝他人意见与虚心研究，吸收下级意见。

虚心不是一般所谓谦虚，只是表面上接受人们的意见，也不是与人们无争论无批评，把是非和真理的界线模糊起来，而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当自己还未了解他人意见时不盲从。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但自尊不是轻人，自信不是自满，独立不是孤立。如果自尊而轻人，自信而自满，即是对自己关门，不向外面吸取可宝贵的精神食粮，也即是对朋友们关门，拒绝朋友们批评和贡献意见。上级来一批评，就以为是对于自己不信任而不满意，不加以反省，彻底检查自己。下级来一批评，就以为破坏了自己的威信而不接受，当面拒绝之。朋友们来一批评，或者是虚伪的接受，或者硬以朋友为恶意，准备乘人之短而报复之。人们以同志的态度待我，而我把它看做敌意，这种态度在我们某些同志中存在着。门户之见胜过同志关系，胜过真理，在普通党员就要阻止自己的进步和脱离非党的群众；而在干部尤其是握



有实权的干部将会造成或大或小的宗派主义；在一个学校一个机关中，造成各部门对立；与另外一个机关学校也造成相互对立。由于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的恶果，又种下宗派主义的恶因，因果循环，不止是断送了自己学习的前途而已。一分钟一秒钟自满，在这一分一秒间就停止了自己吸收的生命和排泄的生命。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排泄精神上的一切渣滓。只有吸收他人的意见才能添加精神上新的滋养品。

陶行知是中国的教育家，谁都知道的。但大部分人只知道他发明了教、学、做合一，发明小先生制，而不知道他是极端反主观主义的模范。因为他不自满，才能发现儿童的天才，发现儿童是成人的先生，即韩愈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可以高于先生），师不必贤于弟子”。陶行知原名知行，一日发现了自己的根本错误，即发现了把知放在第一，把行放在第二的错误，立刻把自己名字倒转起来，也即把自己一生行为倒转起来，否定自己，反对自己。这种精神，请我们同志自己各自检查一下何时有过？陶行知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布尔塞维克，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同志们！我们自己各人检查一下，是否我们值得向救国会的先生们学习呢？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我们的先生是马、恩、列、斯。杜威以下产生了陶行知，杜威给陶以小本钱，陶竟成了一个富商大贾。马、恩、列、斯给了我们许多财富，我们还不能很好的使用，还产生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尤其是把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变成了《新旧约》、《可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同志们！试检查自己一下，还值得自骄吗？

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我们有些同志把自己做神圣看，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江苏俞子夷先生，他是日本鸿文训练班学生。他学习的时

间，不过半年。他在中国教育界有极大的贡献。陶行知创造了教、学、做合一，尤其是反对了普及教育的教条主义，发明小先生制。而俞子夷先生在算术上反对了唯心论和机械论（见《算术教学的研究》，中华出版）。他说：“检算是一种检验，有的叫检答或者叫检算，其实就是一种原理的说明。做过了许多题目以后再加讨论，学生自然会得明白。做在前，想在后。做过了想，在做的时候想。”算术上各种法则他都有新的方法。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

我们边区有许多值得佩服的同志，在工作上，在一切行动上，都是辩证法唯物论，可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口头禅，他们只拿马克思主义作自己的指针，而不是贩卖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工具，制造成品出卖。因此人们就只看见他们的讽刺画有价值而称颂之，并不知道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只看见他们的军事地图详明，而不知道他们是无制图仪器所创造的；只看见窑业出品中有桌椅有磁琴而不知创作者不是工业家和艺术家，而是师范生及中小学教员；《铁甲列车》的导演者并不是工农出身，却了解工农心理，而过去曾被人们视之为执拗难进言者；某师范学校并没有什么地位，曾有很好的国文、算术教师，他们都忠于自己的职业，对于他们的职业有不少的马列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著述，我们负责机关又没有很好的检查，以致埋头苦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被人们所知道。还有些可怪的事，估计医院的医生而忽略病人的评论，估计学校的好坏，而不是根据学生的成绩和物质条件。离开职业事业专凭一己的意见议论人们的政治水平，必然要把马列主义空洞化、庸俗化、书本化。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员对我们说，斯大林同志曾召集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谈话，

指出他们没有站在经济建设前面指导，只是事情经过后追加叙述和分析，失掉了理论指导实践的意义，只做了实践的尾巴。这种现象在我们边区也是一样。苏联是改变过来了，德波林一派束之高阁了。目前我们在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正是我们学风、党风、文风转变的开始。一方面希望我们负责理论上研究的同志目光射向下去，与实际工作者结合，从他们那里吸收宝贵的实际经验和材料。应该知道埋头苦干的马列主义信徒，在边区也有不少的数量，因为他们不长于写文章，又无时间写文章，就不能使人们知道，为人们所忽视。尤其是检查制度没有很好的建立及没有经常性，这些下级干部和群众中的斯塔哈诺夫是不容易产生和发现的。因此我们的理论家就得不到理论上新的滋养品，只能搜索枯肠背诵过去的一切。

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理论的重要。理论本身并不是教条，只有阉割理论中的生命才成为教条，如果反教条而忽视理论，也必然会陷入教条的深坑中。例如我们有许多的乡村调查不下数百万字，听说青委的调查不独数量惊人的多，而质量也相对的好，可惜没有人整理，即没有经过马列主义的分析。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有极丰富的工厂调查，尤其是英国，经过马克思的分析而成为《资本论》中的一些篇章。列宁所著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调查材料也是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很好的材料。他人得之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作工具。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要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实践而学理论，即业务学习，即有的放矢。从实践中纠正理论发扬理论，则理论不是教条，其文章不是党八股而是行动的指针。

根据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徐特立文集》刊印。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 研究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整顿 三风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去年七月以来，中央关于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及其他决定，最近毛泽东同志关于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报告，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为了使干部充分掌握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的精神和实质，并在工作中运用这一武器，必须认识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的问题，如果以为讨论一次就解决了问题，是没有那样容易的事情的。

鉴于前次讨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和调查研究决定的经验，其缺点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行政领导机关很少有准备的有计划的组织这一讨论，而让一般支部自行讨论。其结果，多数支部只做到就文件讨论文件，没有了解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更没有进一步发挥这些文件，即是根据文件的精神实质来检讨本部门的工作及每个同志的工作与思想，发扬其成绩，纠正其错误，巩固党内团结，创造正确作风。但要这样做，单靠一般

---

\* 这个决定经毛泽东修改审定。

支部进行讨论是不可能的，单责备支部也是不可以的，首先必须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又鉴于个别机关虽是由行政方面领导讨论并检查工作，但没有在干部中预先研究清楚，酝酿成熟及周密考虑各方面情况，以致发生某些不适当现象，今后亦应避免此种情形。因此，本部对于研究及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的方法，特有如下的决定：

一、各机关各学校对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在考查别人时亦是如此，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查，避免有害的片面性。明哲保身，有话不说的态度是不对的，避开自己专攻别人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二、各部门的（包括党的和行政的）负责人，在研究及讨论中央文件时，应有准备有计划的来领导这一研究讨论过程。然后好好的想一想本部门及本人的工作，并与他人交换意见，拟定检查工作的计划。然后着手检查本部门及每个干部的工作。然后做出改进工作的结论。这是由研究到检查到结论的不可缺少的程序。在检查工作时，不要泛泛的检查，而要切实的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与各个侧面的。不只是揭发与纠正缺点及错误方面，而且要发扬与巩固成绩和正确方面，并要估计到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哪一方面是次要的。如此，方能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与思想作风。

三、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只有上面领导，而不启发下面的积极性，是不能彻底讨论文件与检查工作的。只有下面的积极性，而没有上面的领导，会使讨论与检查脱离正确方向。发扬民主的程度又要依据各机关不同性质的情况有所伸缩。在某些机关内应组织检查委员会，此委员会内包括该机关领导同志及从工作人员中吸收的人员。在某些学校中，除领导人当然参加并负领导责任外，可以用选举方式，从学生中选出若干人参加委员会。在讨论中要发展争论，在规定检查期间内，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但领导方面应善于注意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不得将错误意见变成结论。

四、研究讨论与检查的目标是为着彻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内容，认真的切实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一切与此目的相违反的言论及行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警语，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求进步，即使是在进步中尚不免有错误，也应鼓励他，帮助他。要欢迎每一同志的微小进步，从此去争取他的完全进步。要使同志们懂得，我们是为此目的而去使用批评武器的。

五、研究中央指定文件的时间，各机关规定为三个月，学校规定为两个月，然后开始检查工作。其检查工作时间，由各机关学校自行规定，取得上级同意。个别机关学校已经

实行检查并得中央同意者，不在此例。

六、在讨论与检查期间内可以出墙报，并设墙报委员会领导之。

七、有非党人员共同工作的机关，应与非党人员一道进行讨论与检查。

八、各机关学校讨论及检查工作的最后结论，须由上级机关批准，其重要者须得中央批准。各机关学校自己做结论后，在上级及中央尚未批准之前，对结论有不同意见者，允许向上级或中央申述其意见。但一经批准，便须服从。

九、政府中军队中的党组织研究及讨论中央文件的办法，完全适用本决定。但检查工作的民主范围，须依情况有所增减，其办法由西北局及总政治部规定之。

十、参加讨论文件与检查工作者以干部及能阅读中央文件者为限，学校中包括学生在内。

十一、为了考查干部及学生是否确实了解中央文件及本决定的内容与意义，本部决定举行普遍考试一次，其办法另定。

十二、规定以下列十八个文件为干部（学生在内）考试的范围：（一）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二）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六）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七）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决定；（八）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

---

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延安几种 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

(中央批准了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现将这一决定告诉你们，但不要在报纸上发表，只作你们在干部工作方面的参考。)

(一) 有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在职的老干部，尤其是属于这类的中级和高级干部，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进行学习。对于文化学习决不能轻视，必须认真学习以提高文化水平。

(二) 文化水平虽高但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除一部分学习专门知识者外，必须首先参加工作或学习一个很短时间后即去工作，以便获得工作经验，不应该长期在学校中学习。

(三) 党龄虽长但很少或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例如与党失去联系很久的干部)，必须参加工作，尤其下层工作，以增补其工作经验之不足。

(四) 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但没有或很少下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在不妨害该机关工作的条件下，应将一部分调去参

---

\* 这个决定是陈云主持起草的。

加下层工作，同时吸收有下层工作经验的适当干部去代替之。

（五）机要部门及有专门技能或正在学习专门技能的干部，不应调动，并应使他们长期安心工作。

（六）必须纠正以为党务工作才是党的工作，其他工作不是党的工作，或轻视党务以外其他工作的错误观点。一切党务、行政、军事、机要、经济、民运、文化及其他工作，都是不可缺少的革命工作。必须克服只愿做党务工作，不愿做经济技术或其他工作的倾向。

中央组织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我们对于孩子和母亲的态度<sup>\*</sup>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

邓颖超

我先来谈一谈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儿童和母亲的态度，其次，要听一听各位父母对于养儿育女的经验和种种尚未克服的困难，以便互相参考，互相帮助。

我们对于孩子和母亲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养育儿女是男女两性共同的任务。所以对于孩子的培养问题，父亲和母亲都应当有一般正确的认识。

我们认为人类是要让它绵延下去，社会才会不断进步。我们正处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要建设一个自由的新中国，要使人类都能得到解放，都能过幸福的生活，那么这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就需要我们民族有一代强似一代，一代胜过一代的儿女来继续担负这种责任，才能使之实现完成。所以对孩子们应善尽父母的责任，而对于母亲更应特别关切和爱护。我党历次提到保婴保母的重要，边区已经做了许多保护母亲和孩子的事情，如边区的妇女生产前后都有两个月的休息，工资照发，设立托儿所，特别提倡对母亲的爱护、尊重等等。

再由共产主义的含义和共产党人的立场说，我们应该无条

---

\* 这是邓颖超在重庆红岩村同一些年轻父母座谈关于养育孩子问题时的谈话。

件地爱护任何一个孩子。不问孩子的父母出身、社会政治地位、思想信仰怎样，亦不论识与不识，更不分男孩或女孩、自己的或别人的、或是私生子、甚至敌人之子女，我们都应该大公无私地“一视同仁”，把他们都看成是将来国家社会的一个成员，一个新的主人翁。现代社会上往往蔑视私生子，以至溺女弃婴的事至今不绝。但在边区的法律上私生子和非私生子是受着同等待遇，受着一样保护的。很多人往往轻视女孩，以至发生溺女的残忍行为，我们是反对的。又譬如继母虐待前房儿女，后父对前父儿女的鄙视，不关切、不公平的待遇，亦是不应该而为我们所反对的。对别人的孩子和对自己的孩子应该一样，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现代的父母对孩子不应存占有的自私的观念，应将子女培养成为国家社会的人才，献给社会国家，不应把栽培孩子看成是为了自己享受和养儿防老的狭窄目的。

在抗日战争中，那班失掉父母的可怜无告的孩子们，以及一部分被剥削的劳动儿童们，我们更要加紧教养，加强教育，予以卫护。抗战以来，成千成万的儿童被劫掠而落入敌手，敌人除了杀死过无数的无辜小生命外，还抢去了许多儿童，向他们灌输奴化教育，准备将来作他们杀人的工具，或是拿去用作战争中的牺牲品——为兽军输血。中国儿童就这样在残暴的敌人铁蹄下不知死了多少！所以，我们为了对于后一代的生存培养，要把教养难童看作是最光荣的伟大工作。

同时，我们认为对已经生存着的孩子的健康保护和减少疾病死亡等的努力，要比盲目的狭隘的只在口头上奖励生育重要得多。如果不能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或因营养不良，疾病无医，以致体弱夭亡，甚至让敌人抢去，这不仅违背奖励生育的

目的，而且是可痛心的严重事情。

希望孩子们变成未来的国家栋梁，首先应有贤良的父母，进而要有良好的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以前的社会只要求母贤而好像父亲是可以不贤的，但如果真的这样，则孩子是否能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颇成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求的是父母都能贤良，我们还要求社会特别保护母亲，注意母亲们的困难、辛苦和幸福，同时，还能使母亲们真正地获得做人的权利，取得社会上与男子的同等地位。因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环境中，从丰富的生活体验中才能培养出伟大的贤良母性来。因此，也才能够使我们的后一代强似前一代。我们的母性观是和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联系起来的，是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的。我们主张应把母亲由狭隘的家庭牢笼中引出到社会抗战建国的大道上，参加救国的工作，参加各种生产事业，真正实行政府和职业机关的开放，解决她们的痛苦与困难，使她们进到广大的社会和集体生活中，以陶冶她们，使之养成伟大的性格。所以我们的贤母观，和社会上那种封建片面的、后退的、想把妇女拖回去锁在家里的贤母观，迥然不同。

其次就说到，怎样尽父母的责任呢？

我们赞成发挥伟大的、丰富的父母的慈爱，但反对无原则的、无教育意义的溺爱。对子女要好好教育而不是娇宠。我们要让他们养成有秩序的生活和良好的习惯。注意他们身体和心理的发育，给予适当的营养和教育。孩子有了健强的身体，健全的心理，有秩序的生活和良好的习惯，则做父母的不但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和教养的困难，而且才能使孩子成为健全的国民。对子女应有贤明的态度，应严格的时候严格，该慈和的时候慈和，反对打骂等有碍儿童心身发育的处分。

做父母的人一面尽了做父母的责任，另一面还需要尽做国

民的责任。要争取自己做独立的人，要在民族解放的革命工作中应尽的义务。双重的责任，双重的奋斗，其中的艰难困苦没有做过父母的人是体验不到的。因此，凡能够担负起如此艰巨任务的父母，特别是母亲，最值得社会钦佩。我们反对有些同志因为孩子妨碍了他或她的工作而讨厌孩子，甚至仇视孩子，也反对有些同志因为有了孩子就把一切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让自己退步，以育儿为借口，不参加任何工作和学习。其实只要父母间能互助，同志间能互助，是不会困难到没有办法参加任何其他工作的。

育儿本是父母共同的责任，所以父母应该分工负担。以前有些人以为这单是妇女的责任，那是不对的，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母亲的适宜性和重要性。同志们应当把帮助其他同志抚育儿童看作是自己的工作的一部分，也应当把他们的孩子看作和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可以使做父母的不致因育儿而使革命工作完全受到影响。

孩子们的模仿性是很大的，父母应当做孩子们的模范——分工合作，亲爱融洽，生活有秩序，态度要慈祥，以便给孩子们一些好的印象。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不仅要作孩子们的模范，而且要做党外人士为父母者的模范。我们共产党人的子女全要有很好的品格，将来进到社会里都能在集体生活中顾全集体的利益，热心公共的事业，以最大的同情心帮助别人，不仅孝父母，而且还懂得自己是社会的人，要为社会服务，要为民族尽忠。要使孩子们的品格美好，父母应有一致的方针，切不可随便拿孩子出气，给以丑恶的印象，去伤害他们的纯洁的幼嫩的心！

最后，希望大家能建立起小型的托儿所、托儿室来。首先，可以让孩子们受到集体的教养；次之，做父母的也可以共

同讨论出一些教养的方法；再有，在物质上更可以得到一些互助和调剂；特别是采取轮流值班管理，做母亲的可以抽出时间来担任别的工作。更希望这些小型的托儿组织，能在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中推行起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邓颖超文集》刊印。

## 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

（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阴风，在我们党内作怪了多年，它给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以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现在在我们党内虽然已经只是一种残余，一种偏风，但是它仍然障碍着我们某些部门的工作的应用开展和改进。毛泽东同志指斥了它，号召全党为整顿三风而斗争。在这个号召之下，整顿三风的斗争已经开展起来了，这是我全党和全国人民应当庆幸的大事情。

一切斗争，要勇敢地进行才能成功，一切斗争，尤其需要正确地进行才能成功。勇敢而不正确，不但不会成功，相反地，会遭到严重的失败！勇敢与正确，哪个更重要些？正确是更重要些！

整顿三风可以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正确的方法，一种是不正确的方法，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方法。用正确的方法来整顿三风，三风必正。用不正确的方法，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方法来整顿三风，不仅不能整顿三风，相反的，会做三股阴风的俘虏。

我们党过去有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也进行过正确的斗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方法是怎样一回事，它与正确的斗争方法有何区别？为了达到三风必正的目的，需要将两



种斗争的方法作一个说明。

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其第一个分别，就在对事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因此，就必须清楚了解，应射的是什么的，必须了解什么叫做三风，这就要细心研究一下毛泽东同志和康生同志的报告，和了解一些党史。再则，必须了解某件事情是否属于三风不正之列，是否为应射之的。为此，必须对于那件事情，加以全面的和历史的研究，研究它的前因后果，研究它的内情和环境。经过这种研究之后，应射的则勇敢地射它，不应射的则不乱放一箭。这就是对于事情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资格说话，没有资格放箭。不正确的斗争方法，与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知三风不正是什么一回事，或者并不去了解某件事情是否真正属于三风不正之列，以主观的好恶来决定行动，凡是自己认为对的，都当作正风看待，自己认为不对的，都乱加以三风不正的帽子，或则有的不射，或则无的放矢。说得好一点，这是盲目从事，说得坏一点，这是假公济私，结果必然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俘虏。

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其第二个分别，就在对人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对人也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因之，对于人，也必须作全面的历史的研究。经过这种研究之后，然后才能断定他是否三股阴风的根深蒂固，才能断定他现在正在向哪里走，是在真正改正错误呢，还是在假貌为善坚持错误？对于三股阴风根深蒂固与坚持错误的人要向他坚决斗争，促其反省和改正。对于只有个别错误（应该说，人人都不免个别错误）而真正改正错误的人，应该鼓励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不是对他吹毛求疵，弄得他左右为难，不好做人。不正确的斗争方法，与此相反，它只凭感情，不凭理智，只凭成

见，不去仔细研究是非；它或者有的不射，或者“狗咬吕洞宾”，或者把正在改进的人当作坚持错误的人，或者把假貌为善的当作已经改正错误的人。结果一定为成见所囿，为感情所激，甚至被坏人利用。

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其第三个分别，就在对自己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不但要与别人的错误作斗争，而且还要深刻地检讨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三风不正的地方，怎样来求得纠正自己而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错误是人人有的，人人应有自己反省的勇气。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则完全相反，他只见别人之坏，只见自己之好，替三股阴风准备了藏身的“死角”，这个“死角”就在他自己身上。

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其第四个分别，就在于前者的目的是“治病救人”，后者的目的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治病救人，是以同志的态度对待同志，是尽力挽救犯错误的同志，只有在他怙恶不悛，无法挽救的时候，才不得不打击这个害群之马，只要稍有一线希望的人，即使犯的错误很大，也希望他回心向善。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就与此相反，他只是乱喊一阵口号，只是乱打一阵别人，甚至采用放暗箭、进行无原则的攻击、诽谤等等。不是与人为善，而是打击损害同志。

正确的斗争方法，在我党历史中辉煌的前例，就是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反对张国焘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巩固了我们的党和军队，老机会主义者张国焘，露了原形，独自一人叛党而去，挽救了许许多多曾被张国焘蒙蔽过的好同志。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方法，在我党历史中，有过不少例子，其结果是削弱了党，损害了革命。

在今天整顿三风的时候，我们的老党员必须回忆这些经验，我们的新党员必须学习这些经验！只有以正确的方法来整

顿三风，才能达到三风必正的目的！要知道，整顿三风的斗争，比起反对张国焘机会主义的斗争来，要艰难十倍百倍，因为这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腻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所指出，在这个斗争中，已经发现了绝对平均观念与冷嘲暗箭等不正确的办法，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这种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我们强调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其道理就在这里。

根据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解放日报》  
刊印。

#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  
一九四二年四月边区政府公布)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例系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民主选举原则，及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形制定之。

建国大纲系中山先生写的。孙先生革命，为的是要建立民主国家，要有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和政府，可是建国大纲上写的选举办法，国民政府并没实行。现在陕甘宁边区没有阻止实行的障碍了。可以依照孙先生的民主原则，制定选举条例。

第二条 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选举边区、县（或等于县的市）及乡市三级参议会的参议员，组织边区、县（或等于县的市）及乡市参议会。

普遍，是指选举人的资格，没有任何限制，任何哪个普通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是选民直接选出被选人，而不要经过转弯。平等，是任何选民投的票，其效力都是一样。无记名亦叫“秘密”，是选民在票上只写被选出的人的姓名，不写自己的姓名。

因为现在各国的选举，有的规定：要有财产若干以上的，读过书的，或者宣过誓，经过考试合格的，才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这样，参加选举的人只有少数，就不“普遍”。又有的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去选出议员或政府长官，这就是不“直接”。不直接，选举就易被有势力者操纵。又有的富人投一票，抵得穷人投的几票，这就是不“平等”。还有，要投票人在票上写了自己的姓名，使得心里不想选某人，面子上又不好不选举某人的，为难起来，这就是不“秘密”。

所以，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是最公平最进步的选举办法。

“等于县的市”，如延安市和延安县的地位相等。

## 第二章 选举资格

第三条 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阶级——指地主、农民、资本家、工人等；党派——如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等；职业——如工、农、商、学、兵等；宗教——如回教、喇嘛教、天主教等；民族——如汉人、回人、蒙人、朝鲜人、安南人等；财产——指穷的或富的；文化程度——指读过书或没读过书。这些我们都不管，只要他在选举的时候，他住在边区，年龄有了十八岁（年龄小的，不明白国事，所以要满十八岁），不论男女，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照这规定，我们边区，工农有选举权了，但并不歧视地主、资本家；共产党是合法了，但并不限制别的党派的自由；同样，弱小民族，信宗教的，都一样有权利，谁也不能限制谁，有势力的不能恃势力去限制其他没有势力的人，这就叫做

真正的民主。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选举与被选举。

- (一) 有卖国行为经政府缉办有案的；
- (二) 经法院判决剥夺公权，尚未恢复的；
- (三) 有神经病的。

我们的选举权，虽然人人都有，但汉奸卖国贼不能有，因为他们卖国害民，应该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有神经病的人，不明白世事，当然也不能有。

在把选举资格审查清楚以后，就要出榜公布。榜分红白，照例“红榜”在前，先抄选民名单，再抄年龄不及格的名单于其上；“白榜”在后，只写第四条所限制的三种人。去年有些地方对这点也有不清楚了解的。

出榜对鼓励人民参加竞选，有大作用。当榜出以后，居民喜眉笑眼围绕着看。今年仍要这样做，“红榜”无红纸，即用红笔画圈圈就行。

### 第三章 选举区域

第五条 乡市（或等于区的市）参议员选举单位为居民小组。

选举区域即是选举单位。乡市选举单位，今年为居民小组，每个居民小组的选民集在一处，选出他们自己的一位参议员。

什么叫居民小组呢？比如某乡当选举前，由选举委员会把东村八家人（五十六口）划做一个小组，南坡上九家人（五十七口）划做一个小组，西沟畔零散住的四个小庄子七家人（四十八口）划一个小组，蒋家山二十家人（一百一十八口）划两

个小组等（怎样划法，详见第八条解释）。

乡市选举为什么要以居民小组为单位呢？因为“乡市参议员要固定管理居民”，去年以行政村为单位选举，有的村庄参议员多，有的村庄参议员少，甚或一个没有，要他划分来管理居民，不便利；就划分了，而该参议员又不一定是该级的每个居民所选，不都信仰该参议员。所以条例上虽然规定乡参议员应有管理的固定居民，实际上并没做到。现把选举单位改为居民小组，就好得多。开会便当，选民都可以到；参议员又自然而然地同自己所管理的居民，形成固定的联系。

第六条 县（或等于县的市）参议员的选举单位为乡。

第七条 边区参议员的选举区域以县为单位。

县议员以前以区为单位选，现在以乡为单位选，使每个乡都有产生议员机会，人民与议会的联系更广泛更密切了。投票时，在一处也行，在几处也行。至边区参议员选举单位更大，投票就绝不能在一处了。

这里顺便再说说投票吧，根据去年经验，投票法有三种：

1. “背箱子”——各级选举委员会于选举前，推定若干司票员（要忠诚可靠，免得发生舞弊情事），把选票事先照名册散给各选民（按：边区选要把候选人名字印在票上；现在的县选和乡市选用白票就可以，只在票头上盖章记，以别真伪），选举委员会准备若干箱子，再把箱子上锁，贴封帖，交司票员分途收票。待票集完，定日召集居民大会（边区选不可能召开全县居民大会，就召集附近居民即可）开票。

2. “投豆子”——当选民大会未召开前，选举委员会查查本选举单位有几个候选人，有几个就准备几个碗。在每个碗上贴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待选民大会召开了，各候选人的票碗摆在桌上，监票员监场，司票员照名册顺序边叫每个选民到票桌

前，边按应投几票即交给选民几粒豆子（如居民小组只选一参议员，每选民就只有一票），并同时教给他某碗是某候选人的，愿选某人，投豆到某人碗。豆投完，宣布开票，哪人豆多，哪人当选。

3. “乍胳膊”——这个方法大家比较是熟惯些，不需详加解释。就是唱一个候选人乍一次胳膊，每选民有几票，只乍几次为止，最后哪人票多，哪人当选。

总之，这三种方法都要得，应按各地不同情况采用。例如地区小，人住的靠近，就不妨用“投豆子”或“乍胳膊”，地广人稀，那就得“背箱子”；又如乡选县选用“投豆子”或“乍胳膊”可以，边区选就比较用“背箱子”便利得多。但如果要检讨究竟哪种流弊大，哪种最好呢？根据去年经验可以这样说：

1. “背箱子”的好处是：第一，能使多数选民投到票（如延川去年百分之九十——个别地方百分之百的选民都投票了）；第二，票先发，使选民有考虑余地；第三，尤其如边区选、县选，选举单位大更方便。但它也有流弊，据有些办选举回来的同志说：有些地方，发现在选票发下以后，坏人活动当选；还有的司票员自己干“偷梁换栋”的事（抽去选民票投入自己伪造票）。因此，办选举时，要严防这个流弊。乡市选举单位，已修正为居民小组，“背箱子”就用不着了（如仍觉得票选好，那就不用当场开票，不用背箱子）；县选与边区选还是可以采用的。

2. “投豆子”最适合于文化低落地区，选民也容易“解得开”。在乡市选举很合适。县选边区选要保证选民多数能投票，那就不如“背箱子”。还有一点，“投豆子”，不能做到如票选之“秘密”，个别选民会因碍于“情面”，不想选某人，而又不得不给某人投豆子。



3. “乍胳膊”最不好，很容易使选民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但不得已时也可采用。

还有：无论何种投票方法，发票时，看本选举单位应选几个正式议员（除乡市外），就清楚地告诉给所有选民，每张票上写几个人名。去年有的地方了解错了，以为一张票只写一个人名（当然，如果只选一位议员，就写一个人名），或者不告诉选民，让他自由地多写，这结果是：多写成废票；写一人名呢，假如大家都集中在一个人的目标上，就会选不够数。

#### 第四章 选举参议员人数的比例

第八条 各级参议会选举区的居民与被选举人的比额如下：

（一）乡市参议会每二十人至六十人的居民小组得选举参议员一人，即不满五百居民的乡市，其居民小组不得少于二十人。五百人以上的乡市，其居民小组不得多于六十人。

在同一乡市的居民小组，其人数相差不得超过十分之三。

（二）等于区的市议会，每六十人至二百五十人的居民小组得选举议员一人，即一千五百人以下的市，其居民小组不得少于六十人，一千五百人以上的市，其居民小组不得多于二百五十人。

在同一市的居民小组，其人数相差不得超过十分之三。

（三）县参议会（或等于县的市），每达居民四百至八百人得选举议员一人，即人口在一万五千以下的县（市），其选举参议员的居民比例不得少于四百人，一万五千人口以上的县（市）其选举参议员的居民比例，不得多于八百人。

（四）边区参议会，每达居民八千人得选举议员一人，但

人口最多的县（市），其应选议员不得多于十人，人口最少的县（市），其应选议员不得少于三人。上列各项选举比例的实数，由该区选举委员会拟定，呈报上级选举委员会批准之。

首先把居民和选民闹清：居民是指所有在那里住的人，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幼的（连才出胎的婴儿也准），及没有选举权的（白榜）都在内；选民是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且不受第四条之限制者。居民指全体人口；选民是居民中有公民权的。去年有的地方，把居民和选民颠倒认识的；只把十八岁以下认做居民，选民不认做居民的；或者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做选民，这是错的，应纠正。

其次要说明的：

（一）乡市有大小，人数多少，相差常远。如把人数都固定了，那大乡嫌议员多，小乡又嫌议员少。又一家人不好分交两议员管，因之，规定由二十人至六十人划一居民小组，又规定同一乡市的居民小组，人数可以有点相差，但不得相差超过十分之三。有这个伸缩性，在划分的时候可以酌量该乡市的人口多少，村落疏密适当分配。比如：居民多、人口密，居民小组划大一点；居民少，地广，居民小组就要划小一点。又为了行政上的便利，不能把甲行政村的几家划到乙行政村去，把乙行政村几家又划到丙行政村去；那好几家的可以把那一小组划大些，或者划成较小点的两个组，只要人数相差不太远（不超过十分之三）就要得。比如：甲小组六十人，那末其他小组的居民人数就不能少于四十二人以下；甲小组是二十人，那末其他小组居民人数就不能超过二十六（人）以上等。

（二）等于区的市，如绥德市、庆阳市，比县小，比乡市又大。就以六十人至二百五十人划一居民小组。今后也许有些小市要成立议会的，若等于乡市照第一款办，等于区的照第二

款办。其他解释同前。

（三）县的大小，相差很远，如延安市七千人，甘泉一万二千人，绥、米各十四万人。这就得按县的大小，从四百人以上八百人以下，自由确定数目。例如：甘泉确定四百人选一县议员，再按照各个乡人数的多少，看某乡有几个四百，就要某乡选几个县议员。

（四）大县如绥、米各十四万人，可是应选议员不能多于十人，那就是平均一万四千人才选边区参议员一人；小县如延安市（县市）七千人，可是应选议员不得少于三人，那就平均二千三百人就可选一边区参议员。

除以上规定外，还有如机关、学校多的地区，机关、学校选出议员的额数也要改变，不然会因机关、学校议员数多而压倒老百姓议员。比如延市全机关、学校人数比老百姓多几倍。那么，老百姓四百人举一市议员，机关学校就须几千人举一市议员才为妥善。

当选举委员会成立后，应迅即拟定各项选举比例实数呈报上级选举委员会批准。因为不迅速，等到上级批准的往返时间，会使整个选举进程的迟延。不经上级选举委员会的批准，又怕比例数弄得不妥，而且不经过批准，不算合法。

第九条 边区县参议会选举区域单位的居民，不满前条比额法定人数，而已达二分之一的，得选举参议员一人，其超过比额的余数，达二分之一的亦可。

比如：县以乡为选举单位，已由县选举委员会决定该县每乡以五百人选一县议员，如果某乡不足五百个居民，只要有半数以上即二百五十个人以上，即可选出一个议员，若是超过五百个居民，其余额已达半数，即七百五十个以上就可选出两个议员。边区的选举单位，也照此推算，唯乡市是以划定的每个

居民小组只选一个市参议员。

第十条 边区、县参议会的选举，得按照各选举单位的当选人数，选出五分之一的候补议员，如该单位没有五个议员的，亦得选出候补议员一人，均以票次多数的充当。

候补议员如出席会议时，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以居民小组为单位选出的乡市参议员不设候补议员。

比如：某乡选举单位，应选出县议员五人，选举结果：张某得一千三百票，王某得一千二百一十票，李某得一千零三票，赵某得九百九十二票，刘某得八百一十四票，马某得七百八十九票，黄某得七百七十八票，那就是张、王、李、赵、刘五个人当选为正式议员，马某为候补议员，黄某以下落选。又如：该乡只能选出一个或两个县议员，不足五个的，亦得选出一候补议员。

当选的正式议员如有人出缺，就以候补议员补上，候补议员未补上时，不必出席议会，但亦可以出席，不过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这是正式议员和候补议员的区别。

以居民小组为单位，选出的乡市参议员，不设候补议员。如因事去职，即由该小组召集大会选举，小组开会是最易得的。

第十一条 警察、学校、工厂、机关、县保安队，均参加其所在区域的选举，和居民一样，但边区保安队，抗日驻防部队，专门以上学校，百人以上产业工厂，得以其生产为单位进行单独选举，选举出席于所属参议会的参议员，如不是第八条比额人数时，得联合数单位进行选举。联合仍不足额时，亦得选出议员一人。专门以上学校，百人以上产业工厂的职员，除参加某生产单位选举外，并得参加其所在地乡市选举。

这条很重要，兵士、学生、工人，是人民中进步的部分，应该参加选举，兵士、学生、工人，有他的特殊利益，又应该

单独进行选举。所以我们规定边区保安队、抗日驻防部队、专门以上学校、百人以上产业工厂，得进行单独选举。比如：驻防边区的留守兵团、边区保安部队、抗大、鲁艺、延大、行政学院等学校，他们有和一般居民不同的利益，所以应单独选出他们的代表。至于警察、县保安队人数不多，中等以下的学校、手工业工人或人数很少的工厂，那就只好参加区域选举，和居民一样。

学校、工厂的职员，他们和老百姓有关系，所以即是进行单独选举的学校、工厂，其职员也应参加所在地的乡市选举。

第十二条 在边区境内的少数民族选举如下：

（一）已达各级参议会选举居民法定人数的，照第八条之规定比额，单独进行民族选举；

（二）不足法定人数而已达乡市选举人数五分之一，县市的七分之一，边区的八分之一的居民，亦得单独进行民族选举，选出各该级参议会参议员一人。

（三）不足前二款所述各级选举居民人数的，参加区域选举，与一般居民同；

（四）少数民族选举，得以各级参议会的地区为选举单位，不受第三章选举单位的限制。

少数民族如回民、蒙民，有他的特殊利益，应该进行单独的民族选举，但因为人数少，如果照一般民族选举，很难选出其代表来。所以有本条例的规定。比如：关中、陇东、三边有回民；照条例应有二十至六十个回民居民，才能选出一个乡议员；但现在只要有五分之一，就可选出一个回民乡议员；县照条例要有四百至八百人才能选一个回民议员，现只要有七分之一，就可选出一个回民县议员；边区要八千人才能选一个回民议员，现只要有八分之一，就可选出一个回民边区参议员。而

且回民民族选举得以各级参议会的地区为单位，比如：全边区有一千数百回民，可是不住在一处，他们可以联合起来选出一个边区参议员，上次边区回民救国代表大会，就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议员。其他少数民族照此一样。

## 第五章 改 选

第十三条 乡市（等于区的市）参议会参议员每一年改选一次。

乡市（等于区的市）过去规定每半年改选一次，事实上做不到，现在修正为一年改选一次。但村长、行政村主任，在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上第十六条仍规定为每半年改选一次，事实上恐也困难，各地应依据具体情况，或也把它延长为一年改选一次。

为了乡市议行合一收得更大成效，把它一直贯彻到每个村去，有同志提议：“各小组选出的参议员同时可担任村长，小组以下之一家人或两家人的小自然村之村长，应直接受参议员领导。如若一个村有两个参议员或三个参议员，亦可在这二三议员内推定一正村长一二副村长，取得全村行政上的密切联系。至行政村主任，可同时领导行政，同时领导议员开会，起议员主任之作用。这样，所有行政村主任、村长，开议会时是议员，平日又是行政人员，使议员真正是议，同时又是行，老百姓选议员也就不能如过往之马虎；而议员因职责的加重，也就不至有开议会时，缺席不到的情景。”这个说法也有些道理，在条例未再修正前，各地不妨先试验进行。

第十四条 县市（等于县的市）参议会参议员每两年改选一次。

第十五条 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每三年改选一次。

上两条不要解释。

**第十六条** 各级参议员在任期内如有不称职的，得由各级参议员选举之法定居民人数十分之一以上的选民提议，经由该选举单位投票罢免之。

比如：县议员选举以乡为单位，如有县议员不好，有该乡原选居民比例的选民十分之一提出要撤换，就可开选举会投票决定罢免与否，如多数赞成罢免，就以候补议员继任，没有候补议员时，就在这会上选出继任的人。

**第十七条** 边区各级参议会，如遇特殊情形，不能按期改选时，乡市的或县市的，应由乡市参议会、县市参议会（或县市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呈报边区参议会（或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议决延长之，边区参议会由自身（或边参常驻会）议决延长之。

这条是为特殊情形定的。

## 第六章 选举委员会

**第十八条** 为便利进行各级参议会的选举，设立各级选举委员会，其组织规程另定之。

选举委员会是办理选举的专门机关，边区政府设一个，办理各级的选举事宜；县设一个，办理该县及乡的选举事宜；乡市设一个，办理该乡的选举事宜。乡、县的不常设，边区政府则须常设，边区、县的选委，多属于指挥与解释事项，县市选委则是直接实行选举的。

\*

\*

\*

除规程上有的不说外，现谈谈乡市选举委员会怎样工作？



假定一个例子：延安中区某乡，为着进行改选，召集了一个会（干部会或积极分子会或参议会都可以），乡长根据选举委员会由政府及群众团体代表组织的原则，要大家推选人，当场推选出张金生（一行政村主任）、高田福（工会主任）、赵兰英（妇女主任）、强伯成（青救主任）、张盛荣（县派来帮助选举的）五人为选委会委员，乡政府报告县府得其批准，并指定强伯成为主任（指定县派去的人也可以），于是选举委员会就成立了，开始它的工作。选委的工作：

第一件事，是划定居民小组。居民小组划定后，要居民们事先准备好他们要哪个人做他们的议员，不要哪个人做他们的议员。

第二件事，是宣传。各委员到各村宣传，动员各机关各学校组织宣传队，贴标语、画报、传单，挨户演说，说明选举的重要，及以居民小组为单位选举的意义。

第三件事，是登记各个居民小组的选民与居民。居民是人的总数，选民是有选举资格的，由他们来选举。各个居民小组的居民与选民都登记完了，选举委员会把选民名单及应选议员数目，用纸写了，贴在公共地方。选民登记时，要照上级发下的表填上，如果因文化低的缘故，填不来的也不要紧，只要把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的数目弄清楚了，就要得。

第四件事，是在选举进行中，各居民小组内发生了一些争执，要选举委员会解决。

1. 第一居民小组高同志提出：张大成是地主，陈正金是富农，他们不应有选举权，可是他们还在企图当选，应该禁止。又本乡共产党支部提出的候选人，有些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弄错了？应该纠正。

选举委员会答复：选举条例上规定，只要不是汉奸卖国



贼，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且都有竞选自由，政府不能禁止他。又现在的政权，各阶级各党派都有参加权利，共产党不应该都占，在共产党占优势的边区，应该帮助非共产党员进行竞选。共产党中央决定共产党员只应在政权机关中、民意机关中占三分之一，那么，共产党支部提出非党的候选人，并不是弄错了，而是应该这样。

2. 第二居民小组李同志报告：本村有几个国民党员运动当选，我看是不好的，请给查禁。

选举委员会答复：选举条例规定各党派竞选自由。国民党是国内大政党，应该有人竞选，并且应有人当选，就是其他小党派，都应该出来自由竞选，政府不能限制他。

3. 第三居民小组刘同志提议：我乡不识字的很多，现在要投票，那不能写的怎样办？

选举委员会答复：我们早已估计到这点。不能写票可以用“投豆子”或举手的办法。不过豆数和手数要数得清楚，在记录本上载明。比如你们居民小组，选民四十二人，假定在村长房子的禾场上开会，会场口摆张桌子，桌子上放着选民册，一个人在管着，来一人在他的名字上打一圈，一共到了三十八人，候选人假定是三人。如说用举手办法的话，主席应宣布：现在要选举了。大家分左、右、中三行坐着，请高同志数左行的票，杨同志数右行的票，张同志数中行的票，票没数清大家的手不要放下。又宣布：大家记着，每人都只能举一次手，不可多举，举完了，记录的把票数一算，当场宣布赞成某人的多少人，某些人当选为议员，某些人落选。

4. 第四居民小组艾同志提议：我们这个居民小组住得很散，中间还隔一个岭，要小脚妇女都到一处开会，很难做到，怎么办？

选举委员会答复：或者可以分作两处开，不过票要记清楚，要两处的票合起来计算，才能定出是谁当选。或者用“背箱子”办法，把票收在一起计算票数，定出谁当选。

第五件事，是实行选举。这时各委员忙得很，每个选委会要分配得力委员去主持各个居民小组会议；丝毫不能塞责，要准备会议日程，准备应付某些可能发生事件，同时党支部、各团体，都要全体动员，鼓动选民全体到会，使会开得很好。

第六件事，是选举结束。选举委员会，把这次办理的经过，居民与选民的册子，当选人名，用费多少，呈报县政府核准。于是选举事就结束了。

乡市参议会一年改选一次，县参议会二年改选一次，两次中有一次乡与县同时改选。可以在一个选举会，选了乡的，又选县的。县的选举以乡为单位。要合起全乡的票，才能定出谁当选。

## 第七章 候补与竞选

第十九条 候补议员递补完尽仍不足法定议员数目时，各选举单位得另行补选。

比如：某县某乡原选县议员五人，候补议员一人，现正式议员有二人出缺，不够补，那该乡就可召集临时选举会，补选出议员一人。

第二十条 各抗日政党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政纲进行竞选运动，在不妨碍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

第二十一条 凡以威胁利诱等舞弊妨害选举自由者，不问当选与否，除制止其行动外，并将当事人及参加人提交法院依

法惩处。

凡公民对于选举人认为有前项之行为者，仍得向司法机关告发之。

抗日政党如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等，抗日群众团体，如工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商会、妇联及其他抗日团体等，都可以提出候选名单进行竞选，只要他不妨碍竞选秩序，即是说不来捣乱、破坏、贿选、威胁等，政府就不得干涉他。但如若捣乱破坏，威胁利诱，那就是犯了法，即已当选了，除宣布无效外，还应受刑事处分。

有威胁利诱行为，不仅选举委员会能干涉，就是任何公民也有向司法机关控诉的权利。

顺便谈谈竞选问题，竞是争的意思，各党派各团体想自己提的候选人当选，都向选民宣传，要求选举他的人。竞选的好处：摆出许多货色（候选人）叫人民选择，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治的认识及兴味，可以促起政治的改进，可以使得民主更加发扬。

怎么竞法？拿什么东西来竞？不是靠枪靠势力，而是靠自己的主张。比如某乡选举乡议员，那里有国民党有共产党，共产党要想自己的人当选，于是共产党的该乡支部，就提出竞选政纲，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在本乡：

1. 要在没有小学的行政村都设立小学，使小孩子能读书。
2. 要聘请一位保婴员来本乡，教育妇女怎样养娃娃，使不生病。
3. 要在东山与西沟设立哨站，加强自卫军工作。
4. 要兴修东川水利，估计可能荫洼地二千亩。
5. ……

只要我党的人当选了，一定能做到，同时向人民介绍我党提的候选人的能力与品质。

当然国民党或其他党派、团体，也都提出人和政纲来，都摆人民面前，叫人民选择。人民是不会受骗的，看得准确的，选出的总不会坏。竞选的人如果失败了，那只怪你的货色不中客意。准备你的货色，下次又来吧！

## 第八章 经 费

第二十二条 各级参议会选举经费，由各级选举委员会造具预算，呈请边区政府支付之。

##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施行细则，另由边区政府制定之。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经边区参议会通过，由边区政府公布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解释与修改之权，属于边区参议会。  
上面四条都不要解释。

选举前和选举后

选举条例只规定了选举人的事。但我们并不是为了选举而选举，而是在选举运动中改进政治，提高人民对政治的兴味与认识。因此选举前选举后应该做些什么？还得说一说。

选举前应做的：

### 1. 政府工作报告与讨论

乡市参议会改选之前，乡市政府应分村召集群众大会，报告他当选以来的工作。因为要群众来得多，故须分作几天在几个地点开会。报告内容要简单明了，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哪几件做得好，哪几件做得不好。做得好的原因在哪里，做得不好

的原因又在哪里。然后说到今后本乡工作应该怎样，或者已经计划怎样去做，报告的话要切实，不要东拉西扯，也不要说得太长，报告毕，要求群众有质问，批评。

报告完了以后，各村群众可以自由讨论，党支部各团体应发动群众讨论：会上也好，拉闲话也好，尽量各人把各人的话说出，只有大家都清楚现在政府工作的好坏，敢于评论现在政府工作的好坏，然后各人心中都有了“泾渭”，能举出适当的人，提出适当的议。

## 2. 提案

讨论本届政府工作，人民总有些意见，加上了各政党各团体提出了竞选政纲，人民的意见更有所综合，经过人民的讨论、修正、补充，把它变成人民的意见即提案，在选举会上提出，作为人民对当选议员的指令。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提案要具体，如某村有若干小孩要读书，须增设小学；某村的路坏了，坝坏了，要修理；某村有几家抗属或孤老要救济……等。空洞的原则的提案，在乡市是用不着的。

## 3. 提出候选人

必须提出候选人的名单，然后人民的注意能集中，票不至于散乱。但是在统一战线政权创始的边区，又是共产党占优势的边区，提候选人的应注意到非共产党的各阶级的积极分子，注意到党中央决定的三三制的实现。共产党支部可以提非党候选人，各团体更应多提出非党候选人，犹恐见闻不广，最好在乡市选举时，各居民小组开群众会由群众推出些候选人，一个人提议，上十人赞成，就可以列入候选名单，候选名单应有两个以上（县、边区候选名单则应比当选人数多两倍以上），那仅照应选人数准备候选名单，是不对的。

## 4. 讨论候选人

候选名单有了，群众并不都认识，提出的政党或团体应详为介绍，让群众去批评，谁好谁不好，什么话都可以说。要告诉选民在选举会之前，每人都“心里有数”，我是选中了哪一个或哪几个，到会上就举他们。

选举后要做到：

选举完了，乡市政府马上召集新乡市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程序可以是：1. 推定主席团（三人或五人）。2. 分工，即推选某某乡（市）长，某某等做乡（市）政府委员会。3. 旧乡（市）长交待工作。4. 讨论选举会上选民对参议会的指令即提案……等。

于是旧乡（市）长任务终了，新乡（市）政府正式理事。

这里要着重说明的：乡市政府和边区、县级政府不同。边区、县级政府和议会并列；乡市则行政与立法合一。乡市参议会是该乡市的最高政权机关，乡市参议会不开会时，乡市政府委员会为唯一政权机关。乡长乡行政人员，同时也是乡市参议会会议员。

\*                                 \*                                 \*

此外关于选举上一些技术问题，运动方式问题，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希望对选举工作有经验的同志，及在实施选举遇到一些新的事实的同志，随时告诉我们，使这次选举办得更好。

上面所说的多乡（市）选举的例子，少说到边区及县级选举。其实边区、县级选举，除选举单位大一些以外，其他手续，大抵相同，所以不多论及。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  
刊印。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增加整风 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

(一) 增加下列四个文件，作为在延安讨论整顿三风材料的第十九至第二十二件：

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

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

斯大林论平均主义；

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二) 延安研究及讨论中央指定材料的时间，规定学校自四月二十日起至六月二十日止，机关自四月二十日起至七月二十日止。

四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准备 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sup>\*</sup>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

各地党部及八路新四负责同志：

有各种材料指明，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的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高潮到来时必须表现沉着态度，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必须向干部指明要认识困难的严重性，方能有步骤的克服困难。同时应指明困难的性质乃是破晓前的黑暗，整个国际国内条件都和十年内战时不同，克服困难之后，就有我们与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央书记处

四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sup>\*</sup>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 关于整顿三风<sup>\*</sup>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

上次讲了时局的问题，今天讲讲延安现在所进行的教育工作的问题。现在教育工作的意义很大，为了对付目前的时局也好，为了迎接将来的时局也好，都必须加强教育。现在的时局是一个国民党反共高潮可能到来的时局。反共高潮来了，我们的困难更大；反共高潮不来，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国民党说我们在转变作风，整顿内部，巩固内部，这是说得完全正确的。为了现在，我们必须这样；为了将来，我们也必须这样。时局的黑暗只是暂时的，是要变化的。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有一个变化的，法西斯就要倒的。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报告时局，估计时局，这是思想准备的一种。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

---

\*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

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

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全面的、全党的、由中央领导进行的干部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现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和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中央学习组在座的同志们，整个延安的工作干部，进行学习，这个意义不是局部的。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机关是中央直属的，这里——陕甘宁边区是所有边区中政治意义最大的，这里的很多干部是做全国性的工作的。二来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干部到这里来了，这些干部本来是全国各地的，他们之所以到延安来，或者是因为在原来地方立不住脚了，或者是因为有事情要到延安来办，或者是到延安来学习的。延安这个地方集中了全国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有全国性的意义。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还有，延安这样一搞，搞得很好，消息传出去了，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各地的党组织都会跟着我们干。现在我们还只是在这里干，我们要经过《解放日报》，经过新华通讯社把一些东西传播出去。现在新华社应该主要是广播教育材料，广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广播斯大林的十二条、斯大林论检查、列宁论纪律、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这些文件。当然，现在世界处于战争形势下，战争消息不能没有，但可以少播一些，比如印度打仗的消息可以少播一点，苏联打仗的消息也可以少播一点，而教育材料要多播一点，延安整顿三风的报道也可以多播一些。华北送来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可以由延安转播出去。

可以多做一些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

现在，国民党也利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来骂我们，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但我们还要继续反下去，当然我们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骂的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还要经过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中央各个部委除了一些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外，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是做这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是否能做好，当然现在还不能断定。现在各机关各学校也还有一些同志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把这个工作当成一项中心工作。我们说在最近三个月内要把它当作一项主要的工作，其他工作是不是停止呢？日常的、必要的工作那是不停止的，要在日常的必要的工作不停止的条件下把它当做一项主要的工作。不紧要的工作怎么办？不紧要的工作就把它暂时停止。学校里面有许多课程，那些不紧要的也可以停止。比如在中央党校，就是把全部精力来搞这个事情，十八个文件，加上四个，共二十二个文件，要学两个半月。中央研究院也要停止其他课程学这些文件。其他学校，按照不同情况，或多或少都可以停止一些课程。各个机关也可以或多或少按照情况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就是说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外，要把二十二个文件的讨论、研究，以及工作检查、思想检查，放在第一位。学校规定用两个月，机关规定用三个月。学校两个月如果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机关三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

一个月。总而言之，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必须下这样一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有人反对就要说服，说了不服，还要再说，一定要使其心悦诚服。总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现在再来一个三个月的突击，在突击以后，就要转为经常的工作了。在突击之中，除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外，统统停止。必须使高级领导干部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得很。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干部教育中是有很大大毛病的，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把方针完全搞到另外一边去了，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这个毒害相当深。现在的主观主义的毒害有历史的，也有最近这个时期产生的，都相当深。历史的毒害是遗留下来的。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但是现在有没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呢？没有人指破这一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种干部，新干部，老干部，男干部，女

干部，文化人，各个地方来的干部，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的人在一起，就有了毛病。这毛病，如果不经过这几个月的工夫，将指定的这二十二个文件研究好，并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间去，是很难克服的。要把理论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什么是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对它们可以先来一个研究，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就是说，现在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要在这次教育中、检查中去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做，否则，这个目的也就达不到，那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要能对付以后的困难就得赶快搞，我们现在就要读这些文件。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

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斯大林的十二条，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看文件一定要动手写笔记，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志动手写了笔记，有许多在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写了笔记。我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的，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不要把功劳变成一个包袱背在背上，一切都不在乎，这样，只会把功劳变成一种很重的负担。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也许又有人说，我天文地理都懂得，三角几何都晓得，看这么几个文件还用得了三个月，我三天就看完了。还有的人说，这算什么，我不用看也可以考。能够这样当然是很有成绩的，但我说不然。为什么说不然？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斯大林的十二条是十七年前写的，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斯大林能不能够写出十二条呢？不能的，不然为什么马克思的时候就没有写出十二条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是积近百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实行这个报告所讲的，必须实行干部政策的四条。世界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算起，中国革命是从共产党产生的那一年算起，五四运动就没有算进来，只讲二十年。中国共产党这

一点经验也是经过艰难困苦得来的，不要看得那样容易，没有二十年的曲折，没有二十年的斗争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中央今天的这些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的那个决定。有同志说，这些决定好得很，早五年出来就好了。我说，你的话不错，早二十年出来就更好。如果中国共产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宗派主义，没有党八股，那岂不是更好，那岂不是上策。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上策？没有的！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刚刚读了几年书的青年，就神气成那样，说什么三天可以读完，不看也可以考，不需要学两个月三个月。又有人说什么自己走过了二万五千里三万五千里，还学什么，我说走得再多也不行。水手是世界上游历最广的人，天天都在走，周游全球，但单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中央制定一个文件有时要搞六七个月，至少也得几个星期，好像我们这些人总是蠢些，人家总是聪明一些，我们写起决议来总是不能很快搞出来。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许多同志轻视斯大林的十二条，轻视中央的决议，轻视马列主义，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不要轻视它，要写笔记，要讨论，要反省。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扩大，不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清除、取消。要使我们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在整顿三风时重心在自己。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自己进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



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一定要这样做。无论什么人都要这样做，都要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我们对这些东西要表示态度，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以为这些文件不合马列主义原则，那就应该提出意见。如果以为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没有违反党的政策、党的原则而是合乎党的政策、党的原则的，便应表示拥护，表示赞成。要把中央的决心、高级干部的决心、中央学习组同志的决心带到下面去。一定要这样做，并且要进一步实行好。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不要像在江西时反对“机会主义”那样，说什么吃辣椒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而要反得正确，反得彻底。我们中央的同志商量，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帮助整个延安整顿三风，许多干部去帮助各机关各学校。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不停止外，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整顿三风。中央机关如此，各机关学校更应该如此。三个月研究文件，一个月检查工作，开他几次会议，如组织会议、宣传会议、其他会议等。这次整顿三风，由中央的同志分头领导，边区一级由任弼时同志负责指导，军委系统由王稼祥、陈云同志负责，中央直属各机关由康生、李富春同志负责，学校（党校除外）由凯丰<sup>〔1〕</sup>同志负责，党校由我负责。在这次学习检查中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改变作风，团结内部，就是决定上写的改变观点，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

在研究、讨论文件和检查工作中，会有许多干部表现积极、热忱，会有那么一些人也热心，也搞，但和平常差不多，也会有少数人比较更差，叫做落后的。大多数地方大体上都有这三种人，积极热心而又正确的，平常的，落后的。这些人我们不能平均看待。在干部中间实行平均主义是不好的，平均主



义是使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后分子看齐。我们要使落后分子、平常分子向积极前进分子看齐，要使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比较差的、不正确的同志向正确的积极的同志看齐，使平常状态的同志向积极的同志看齐。没有这样的引导，使积极的和落后的混同在一起，对积极的没有鼓励，和落后分子一样看待，这是错误的。那谁愿意积极呢？那便没有斯达汉诺夫了。苏联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斯达汉诺夫？因为他积极，要使别人向他看齐。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号召所有的人向积极分子看齐。当然在做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夸奖得太厉害、不适当，使人以为某些人领导特别喜欢，某些人领导特别不喜欢，那就搞不好。要使全体都向前，向积极的看齐，要有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精神。

还有搜集问题、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和检查工作的问题。各机关学校自己开会讨论，解答问题，同时把这些问题反映到中央来。我们希望有两种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坏的。把这两种意见两种情况报告中央。学习中发生的问题各单位自己解答，解答不了的开会讨论，再解决不了交与中央答复。关于搜集问题回答问题便是这样。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采取和他们个别谈话的方法。这个方法西北局实行过，还有许多机关实行过，产生很好的效果。再一种方法是开干部会。进行个别谈话，开干部会，用这两种方法来做工作。干部会怎样开呢？我昨天和王首道同志谈了，他所在的机关中，小组长、科长等有二十多人，其他干部有六十多人，一共八十多人。我以为可以两星期开一次二十多人的会，一个月开一次八十多人的会。在二十多人的会上，把中央学习组的精神、要讨论的内容系统地告诉他们，可以展开讨论，大家发表

意见，按机关的情形也可以十多人或八九人来开这样的会，一星期一次最好，不能的话便两星期一次，这些人是其他人的直接领袖。其他的人一月一次会，这样的会人太多，讨论恐怕很难，可以报告一下，把二十多人的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们说明，须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开会。同干部发生联系，一种是和干部谈话，一种是开会。用这两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各个同志想的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什么事他们不满意，什么事他们满意。现在还没有到检查工作的时候，有些事到那时才能讨论，比如讲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样的方式方法问题。上次邓发同志报告职工会的经验，先批评领导者的缺点，大家肯讲话，如先批评被领导者，便把大家吓倒了，不敢说话了。检查工作要鼓励大家发言，如同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讲的，大胆说话，有的放矢，只要不违犯法律，又是在规定的范围以内的，说话是许可的。正确不正确是指说话的内容，有的对，有的不对。说得不对，是在说的过程中发生的，应该允许，说错了的，以后可以纠正。在讨论中发生了问题，要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个方式比较好，像职工会的办法。总的责任，这次搞得好不好，整个归中央负责，搞好了算一功，搞不好有过。各部门搞得好不好，行政首长负主要责任，不是按照过去办法由党支部负责，这次规定行政上负责。个别谈话解决了问题没有，干部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写了笔记没有，检查工作没有，作风改变没有，讨论的目的达到了没有，成绩少或者没有成绩，这责任归行政首长负。今天在座的同志都要负责任，希望好好考虑一下，研究一下，同自己领导的部门的干部好好商量一下，交换意见，达到整顿三风的目的。别人整三风，我一风也不整，如果党员是这样，那是不好的。你是共产党员，便应服从党的决定，你一风不整，行吗？整两风也不

成，我们讲是一定要整顿三风。要整顿三风，一些偏风也不让有的，整了两风半，还剩半风，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整三风，这叫搞到底。我们要担负这个责任。这里方法是重要的，首先要宣传，宣传部的决定提供了方法，即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讨论二十二个文件，检查工作，这样才能搞好。这不是容易的事。

听说有个别机关学校安排得很紧，一个文件研究两天就过去了，这是走马看花。许多文件须要一条一条加以分析研究，一个搞完再搞第二个，这时候别的先不要看，专讨论这一个。有些可以两三个合起来研究，但也要先一个一个地研究。斯大林的十二条搞通了很不容易，许多人想一把抓，结果没有抓到。要一条一条地搞，要用分析的方法，搞了一条，再搞第二条，这样搞下去，先剩下十条，再剩下八条，最后全部“消灭”。先逐条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全部才能明白。这次我们要搞出些名堂，使全党面目为之一新，这就须要在座的同志负起责来。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这样的事做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 释

〔1〕即何克全。

## 中共中央关于 纪念五一节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今年“五一”正当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及中国人民抗战均已进入严重阶段，因此今年纪念“五一”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及我国人民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应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改造各根据地工会工作，深入肃清职工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残余。在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于不估计今天根据地职工运动的环境：经济落后工业缺乏的农村，敌人反复“扫荡”的战争环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的特点，硬将产业城市职工运动的一套办法搬到根据地来，不管有无工人及有多少工人，在乡村中普遍建立工会，有些地方甚至建立各种产业和职业总工会，并进行尖锐对立的斗争，这就是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的实质。职工运动中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于：某些工会中党员包办工会。当工人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时，派员发动工人组织工会是正确的，但工人群众已经起来，就应当实行民主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吸收非党职工参加工会领导机关中工作，然而，不少工会工作的党员仍继续包办的作风，以致造成某些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职工运动中的党八股表现于工

作计划宣传教育的不切实际，特别在教育方面，在某些公营工厂工人教育中，不问对象，夸夸其谈，大讲经济学，马列主义，哲学，而轻视与业务有关的技术教育，忽视反对行会主义思想及工人中某些狭隘思想的教育工作。

为克服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残余，第一必须进行客观环境的调查研究，研究具体的工作环境，研究劳资关系在抗战中的变化，分别研究每个资本家和雇主，研究公营工厂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研究工人成分在抗战中的变化；第二必须注意吸收工人中积极分子，特别是熟练工人参加工会工作，发扬工会民主作风，吸收他们检查工会工作，只有经过他们才能团结全体职工。为着吸收熟练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工作，在工会领导机关中，应实行共产党员最多只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第三必须克服空洞的工作作风及夸夸其谈的教育内容、方式、方法，去教育一般工人群众。

整顿三风是改变思想作风的长期斗争，并不是经过一个“五一”动员就能解决问题的，而只是经过“五一”动员作为我们工作的开始。因此进行这一工作必须有充分的领导和组织，各级职委和工会党团必须根据中宣部决定与实际规定自己学习检查工作的计划。

我们着重指出，整顿三风，必须与目前抗战动员配合起来，在目前抗战形势日益困难，敌人反复“扫荡”的战斗日益残酷，需要我们具有百倍坚定的信心和斗争意志，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武装组织，和各种生产建设，克服这一困难局面，只有这样去纪念“五一”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将会变成应景式的纪念。

“五一”纪念仪式，应以节省人力、物力为原则，各根据

地可按照当地情况召集“五一”群众纪念大会或晚会。上述工作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 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精兵简政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求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着想，注意节省与积蓄民力。二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中央为总结并继续研究精兵简政问题，望各根据地执行的经验教训电告，并望收集下面材料一次或分次电告中央。

### (甲) 关于节省与积蓄民力方面

(一) 根据地现时在我统治下的有多少人口(必须是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出负担的，对于游击区只能纳部分负担者须注明)?

(二) 现时脱离生产的人数，是否符合中央百分之三(军二与党政民一)的规定。如果超过了须说明原因，并说明在人民负担上是否有困难。

(三) 计算一个脱离生产者，一年要多少费用(要用实物与钱同时估计)，要多少人口才能养活一个脱离生产者。

(四) 当地人民每年每人平均收入多少，个人消费多少

(一切用费均折合粮食计算)。

(五) 现时人民负担占其全部收入百分之几? 并指出富有者负担最高达到的百分数, 及贫农负担最低的百分数。同时还要计算出整个边区各种负担(包括财力, 物力等)占该区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百分之几?

(六) 根据地每年出产粮食若干石(按普通年成计算), 除民食外, 尚有多少余粮? 现收公粮若干石? 若再增加兵员是否有吃的?

(七) 根据地十八岁到四十五岁壮丁现有多少? 除壮丁外, 能参加生产和半参加生产者有多少? 农业用的牲口有多少? 是否够用?

(八) 根据地各种人力牲口的动员是否有一定制度, 平均每一个能服役的人民及每一匹牲口一年要支差几天?

(九) 敌占区友军区与我根据地的人民负担孰轻孰重(应举出一般估计与具体数字)? 人民对此有何反映?

(十) 估计敌人以后“扫荡”封锁更残酷, 地区还可能缩小情况下, 在财政经济上有些什么办法可以长期坚持。

## (乙) 关于组织精干与增强效率方面

(一) 党政民各级原有脱离生产人数及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后新编制人数(应将干部与什务人员及战士分开写)。

(二) 现在党政民各种组织是否还有机关庞大, 头重脚轻, 上下隔阂, 政令不能贯彻现象。

(三) 现在党政民各种组织是否还有组织太多, 会议太多, 干部疲劳, 群众厌烦现象。

(四) 现在党政民各种组织是否还有重叠可以合并的机关,



还有无事可做的工作人员，还有分工不合理，遇事多绕圈子，效率迟慢现象。

（五）是否有后方庞大，行动笨滞，敌人“扫荡”易受损失现象。

（六）正规军与地方军是否已经划分？两者间的比例如何？民兵与自卫队占全人口的百分比，及其已起作用？

书记处办公厅

四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职工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北方局转晋东南党委：

党委工委报告，已收到，内容很好。希望以后根据中央调查研究决定，深入调查各种具体情况，经常报告，以便向你们提供意见。在报告中证明职工会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并向深入工作方面发展；但另一方面，尚有许多弱点，主要表现在对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特点（战争，农村，新民主主义政权）认识不足，因而对劳动政策了解不深刻，工作缺乏中心和经常性，党政军民关系有些不正常，所以职工会工作还不够深入巩固。望工委考虑下列意见，改进职工会工作：

## 一、关于工资问题

敌占区高于我区的工资额，是因为敌占点线平原交通便利，工业品来源较易，而某些农产品价格则较我区高，因此一般生活水准亦较我区高。我区经济落后，且不断受敌破坏掠夺封锁。因而，相对的名义工资必然高于我区，此种现象，敌我

---

\* 这个指示原载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解放日报》。

形势未根本改变前是很难彻底转变的，就在平常状态农村工资也低于城市工资的，因此，我们不能采取提高工资与敌竞争劳动力的政策。在我工作不深入，党政军民关系不正常，敌人高价吸收工人下，部分劳动力的外流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只有深入群众工作，团结职工，提高政治教育，适当改善工人生活与社会地位，改善党政军民关系，从政治上来对抗敌人的奴役政策与引诱政策。

由于战时的破坏，根据地生产缩小，而需要则增加，因此在根据地内把战前生活与现在比较作为改善工人生活标准是不妥当的。目前改善工人生活，只能依据战争环境及各地生产及生活水准之不同，来规定工资。农村成年工人，一般以维持本人生活外，还能养活一个人为原则。因此规定各地同等的工资是不可能的。

国营工厂工人工资如果把各种优待价值算入工资之内，则实际工资并不比农村工人低得多少。至于某些国营工厂工资稍低于农村工人工资的原因，是由于国营工厂的生产主要不是为了营业获利，而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加上抗战经费的困难，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此种现象是很难免的。因此，职工在军事工业及国营工厂中工作，是一种抗战义务性的光荣劳动，党的支部和工会应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解释工作，加强政治教育，提高职工政治认识与技能，改善其社会地位，协同党政军改进工厂管理方法，发扬民主，调剂职工关系，在可能范围内改善物质生活，来团结职工安定工人生活。减少工资问题的纠纷，最好采用物品本位的工资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仍以计件制为宜。

## 二、农村劳资关系问题

农村雇主不愿雇用工会积极分子，多找小山沟出来的落后农民，或少年工人的现象，除某些雇主抱有恐惧工人斗争心理之外，同时由于工会会员中积极分子，各种会议活动时间过多，耽误生产，甚至恃势凌人，要求过高，此种现象若不改正，不仅雇主不雇工会会员及积极分子，而且将降低农村生产，妨害工人团结，养成工人惰性，造成工人失业，工会脱离群众等危险。雇工积极分子所提出的“多种，早锄，多收好抗日”的口号及生产互助小组，应广泛宣传与实行，才能发展生产，改善工人生活，协调劳资关系。对于企图利用我们政策的改正，而向工人进攻的雇主（如多分配雇工负担等），应根据具体事实，进行调解，必要时请求政府仲裁。总之，我们必须从劳资双方均能获益为原则，去适当改善工人生活，照顾各阶层利益的观点出发，坚决克服狭隘的行会利益的思想。

## 三、关于工时问题

一切公私工厂作坊必须依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至于雇工手艺人亦只能按原来的生产习惯，酌量减少一二小时，工会开会及开短期训练班，应于例假休息时间举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还须遵守劳动纪律及劳动合同，以便发展生产，维持劳资双方友好关系，保障团结抗战。

#### 四、职工负担与支差问题

应执行政府各阶级公平负担的政策，但因职工没有副产，其免征点可以在保证维持职工生活条件下，可提交当地参议会讨论，以减轻某些生活特别困难之职工的负担。因雇工劳动既已出卖给雇主，其支差应属于雇主方面，但战争动员，则一切职工，应一律执行。

#### 五、职工会的组织形式

主观的把产业城市的组织形式机械地搬到农村来，如你们在地方总工会下成立各业总工会（产业的、矿工的），一县之内成立矿工会，产业工会，直属各业总工会的领导，显然是不适当的（至于某些县份矿工集中较多者则仍可成立矿工产业工会）。因为地区辽阔多山的农村中，工人稀少已不易领导，再加组织上的分离，不管在组织上深入工作上，都是不利的。农村中的零散矿工与雇工羊工，应统一于县工会之内，直属于总工会领导，否则不仅浪费人力金钱，而且会使工会成为形式主义，脱离实际，障碍深入工作。工委应提交各业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向群众解释清楚，改变上述组织形式，把工作交由总工会执行，各业干部则参加总工会的领导。

至于按行政系统组织的产业联合组织（如后勤军工行署等），为适合党政工的配合，仍可以保存，直属总工会。此种组织的改变，不是削弱产业工人工作，而是加强总工会对产业工会矿工工会的领导。

## 六、职工会的主要工作任务

职工会应以提高劳动热忱，严守劳动纪律，提高职工技术，保证生产，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党政工会必须协同进行政治、文化、技术教育，根据工人具体特点，决定这三种教育的分量，使生产与学习适当的配合起来，以安定和提高工人的生产情绪。

工会教育工作，及日常活动应注意时间的节制与工人兴趣，除工厂煤矿，必须单独进行工作外，一般应集中于村镇：民革室民众学校及各救共同活动，调剂各救关系，纠正借口在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口号之下，工会工作突出和骄傲现象，工会会议至多一月举行一次，内容着重抗战工作，劳动政策的检讨，鼓励学习发展生产，教育的中心则以学习技术识字为主。

工人武装组织，均应集中于武委会领导。工会应积极参加武委会工作，工会内不应单独成立武装部及单独之部队。

工会工作应尽量发挥民主，在组织与领导上，必须反对共产党员包办的现象。在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应实行共产党员与一般工人之比例只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尽量吸收不脱离生产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各级领导机关，使群众与领导机关的联系更加密切。

为实行精兵简政方针，节省人力物力，工会应尽量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干部，向减少职业干部方向发展，职业干部应以少而精为原则。

严格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学习内容政治方面以党的政策，政府法令，职运历史策略及实际调查的研究为中心。日常教育应以提高生产技术及文化水平与科学知识为主。一般干部训练，工会不必单独办训练班，必要时可在党校及其他学校设

立职干班，其教育内容，亦应以上列科目为原则。

某些工会组织与军政民关系不甚融洽的现象，工会应自主的力求改善，克服狭隘的偏见，凡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可会商召集适当的联席会议解决之，这是今天晋东南职工会急待解决的问题。

四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克服困难向前迈进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

朱 德

当我们纪念今年的五一节时，我们大家都应该十分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正处在大的战争前面，我们的工业生产将要碰到更大的困难。

经过两三年努力，我们已经开办了一些工厂，在重重封锁包围中间，在边区非常贫困的经济条件下，强壮了我们自力更生的力量。想着冻死、饿死、困死我们的阴谋是失败了。这是很有意义的成绩。今天为了迎接更加艰难的局面，我们工厂的各种工作，还须大大向前迈进一步。我觉得在以下的四个问题上，必须大家来一致努力，才能把我们的工厂推向前进。

第一，我们须要教育工人们认清自己的事业和责任，用新的态度来参加劳动。我们边区工厂的工人须要懂得，他们不是简单的因为生活驱迫而做工谋生的普通工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先锋队，应当最积极的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理想——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他们今天的工作便是这种建设的一部分，这种劳动是最光荣的。

边区的工厂不是属于任何别人的剥削工具，这是拿在边区工人手中的建设新社会的武器。因此，我们的工人不应当以对立的立场来对待工厂。因为二者之间是血肉相关利害一致的。



一切对提高生产有利的事应当积极去做，一切与生产不利的事都要反对。今天便要在工人队伍中间反对偷懒怠惰，破坏劳动纪律，浪费物资，技术上的保守观念，鄙视劳动，在困难面前消极失望，这一切旧的传统习惯。要在工人中灌输以新的劳动精神：严守纪律，高度的劳动热忱，和向上的进取心。

第二，我们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时代，边区整个经济都困难，我们的工厂也是在艰难缔造的创业时期，假如我们的工人和工作人员没有省吃省穿的自我牺牲精神，工厂便无法维持与发展下去。

一切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工资的要求，我以为一定要首先以不妨碍工厂的维持与发展为前提。工资的标准，一般以能维持生活，保证温饱为限度。在这个原则下面，按照技术高低，生产多少，和出品的好坏来规定工资的等级，这里不分高低，一律平等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它会使生产低落以致使工厂失败。一切工厂之开办，都是为了赚钱或赚东西，我们革命者的工厂更不例外，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资本津贴它们。不过它赚钱赚东西是为了供给抗战需要，而不是为私人获得利润。如果工资提得太高，不照顾工厂的发展，使工厂无法维持，结果只有把工厂弄得关门。所以一定要反对不顾革命利益和实际可能，一味追求高额工资的落后意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工厂必须尽一切可能关心工人的物质生活，特别因为今天物价飞涨纸币跌价，须要时常注意调整工人的工资，保证其一定的生活水平。同时要关心提高工人的文化和技术水平，给工人以广泛发展和提高其工作的机会。

节衣缩食，勤苦劳作，这是一切经济事业创造的必由之路。二十年前的苏联，还是一个没有飞机，没有坦克，和用了木犁瘦马来进行耕种的国家，然而今天它已成了强大的工业

国，这是苏联工人阶级长时期中节衣缩食，勤苦劳作的结果。特别是我们是处在战争时期，处在贫困的边区，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创造我们事业的基础，我们应当特别提倡和实行“节衣缩食，勤苦劳作”的口号。

第三，我们必须发挥工人的生产热忱，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质量。在技术水平很低，机器又旧又少，动力根本缺乏的条件下，高度的生产热忱是进行生产中特别重要的因素。热忱和熟练，这几乎是我们提高生产上唯一的和最有效的办法。

怎样提高生产热忱呢？我们过去的经验证明了革命的生产竞赛的确是提高生产的有力武器。在竞赛中不但能够大大的发挥大家的生产热忱，而且改变了工人对于劳动的态度。只要善于组织这种竞赛，使它能够吸收全厂人员进来，并且成为经常进行的运动，我们将能够克服竞赛仅能临时提高一下生产的缺点，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质量。

第四，为了减轻生产成本，改善工厂的管理与领导，须要大家来爱惜工具，节省资材，严厉反对浪费现象。我们管理和领导工厂的经验还很差，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来管理工厂，只有熟悉和研究工厂中的全盘情况，不断的检查研究我们现行的管理制度，才能创造出好的制度和方法来。我希望全体人员，特别是厂长、技师、指导员、这些负责人切实注意这个工作。你们所处的负责地位，原则上是因为你们在掌握和领导整个工作上能够走在别人前面，领大家前进。因此你们必须在这一切问题作精深的研究，使自己不做工作的尾巴，反对那种不肯作精密的研究而满足于粗制滥造地应付工作的态度。

我想顺便谈一谈兵工制的问题。在我们一部分军队经营的工厂中，今天实行着兵工制度，有成几千的从我们八路军中挑

选出来的天才战士在工作。他们做的是同一般工人一样的工作，但是他们却过着和战士相同的生活，拿很少的工资，做着很有价值的生产。他们真正是边区工人的模范，是节衣缩食勤劳劳作的先锋。他们是我们八路军最好的最优秀的子弟。这个制度，这些同志，值得我们大大的嘉奖！一切先进的工人应当学习他们这种自我牺牲的劳动精神。

同志们，工友们！兵工同志们！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吓倒我们的！克服困难！向前迈进！让我们大家一致努力啊！

根据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 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 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

（一）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这是在敌人困难日益增加，兵力更感不足，摧残我根据地的一切方法遭受失败的条件下，由“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发展而来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自敌人的蚕食政策实施以来，由于我各方面给敌以有效的打击不够，就造成了目前全华北敌寇蚕食我根据地的严重局面与某些根据地敌进我退异常严重的形势。这一严重形势在平原地区（如冀南）表现的更为显明，如不立刻展开坚决的有系统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则不仅不能停止这一严重形势的发展，且将造成更严重的困难局面，这是首先必须引起我华北全党全军万分注意的！

（二）敌人蚕食政策的进攻，在表面上似乎不像敌军事大扫荡的猛烈与显著，它是缓慢的，隐蔽的，零星的，给我的震荡较小，因此许多地区对敌人这一恶毒的阴谋，过去以及现在，都表现了不容许的忽视与麻痹，表现了消极退缩与单纯应付，至今除少数地区外，还没有一套有效的具体办法，来停止与粉碎敌人的蚕食进攻，有的地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蚕食到心腹地带来了。几年来敌占区的扩大，根据地的缩小，由于敌人的蚕食所造成者十之七八，敌人蚕食政策给我们的危害，较

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无不及，这是必须有足够的认识的。

（三）敌人蚕食政策的实施是十分具体与灵活的，但根据各地经验，一般的可以分作以下三个阶段：

（甲）第一个阶段：主要的是进行各种准备，进行秘密活动。进行这些准备与活动的方法是：向蚕食的地区进行深入严密的调查与研究，寻求、扩大、制造并利用我们的弱点，寻求可供利用之对象（主要是流氓、会道门、国特以及不满分子），建立秘密的特务工作及情报组织，发展暗维持，制造种种谣言，动摇人心，挑拨离间，为了配合这些活动，敌人还不断的举行军事“扫荡”与“清剿”，以无可形容的残酷与镇压向这些区域进攻，目的在于造成人人自危的严重恐怖，镇慑人心，破坏我们的一切抗日工作，打击抗日干部的地位，迫使我们武装力量难以公开存在，给内奸制造有利的活动条件。

（乙）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在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秘密工作完全公开起来。其方法是首先以军事力量，依托原来的据点，向正面跃进或侧面迂回三十里或四十里，建立新的据点，将被蚕食的地区围成方格，然后施行种种活动，驱逐我之武装力量，破坏我民兵，捕捉我抗日干部，制造群众与我对立，建立公开维持会，在严厉镇压下，施以小惠，达到其统治目的，在迫使维持会公开时，条件很低，只要上钩就行，待面目已经表明，要求便一步一步的加紧起来，有个别小的地区，也有不依靠军事力量，经过政治压力就达到蚕食目的的，这要看敌人准备工作作的如何，要看我之反蚕食斗争作的如何来决定，一般说来，这一阶段中的斗争是异常剧烈的。

（丙）第三个阶段，这要看第二个阶段的结果如何来决定，或者被我完全粉碎，敌人未能达到蚕食的目的，退而进行新的

准备与活动，或者敌人蚕食目的已达，进一步进行深入与巩固工作。使这些地区完全成为被敌人统治的敌占区，我之一切抗日活动与组织，受到彻底摧残，一时不易恢复。

（四）敌人蚕食政策的步骤与方法，是相当毒辣的，但只要我们正确的掌握党的政策，各方面工作配合得好，坚决的进行反蚕食斗争，经验已经证明，粉碎敌人这一阴谋是完全可能的。敌人蚕食政策的实施固然是所谓全面的总力战，固然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空隙还是很多，尤其是因为敌人兵力不足，前进则后方空虚，且不能不更多利用伪军伪组织，予我以更多机会，采取广泛的游击活动与政治进攻的办法，确实掌握民族矛盾，使敌人顾此失彼。在目前敌我斗争中，军事上的敌强我弱仍未改变，但政治上的我优敌劣是确定了的，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政治上的优势，配合武装斗争（主要的是游击战争），争取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是有保证的。但这种胜利要成为事实是要经过艰苦斗争与各方面工作密切配合才能求得。

（五）反蚕食斗争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停止敌占区的继续扩大，组织我们全面的力量彻底粉碎敌人对我们的蚕食政策。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针对着敌人每一步骤，给以及时的有效的打击。

（甲）如敌人在准备阶段（敌人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则应运用我们的抗日政权（我们是合法的），给敌人一切秘密活动以坚决的打击，给敌一切内线与特务以彻底破坏，并使之不能再建立，使暗维持不能存在，而两面派的政策亦应有严格的限制（两面政策一般的用在敌占区），不应任意运用，助长退缩。应当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充分的发动基本群众的积极性，从反对奸细的斗争中，争取国民党，争取与瓦解会道门，争取知识

分子，杜绝一切可供敌人利用的空隙。对国特、流氓、及会道门中之坏分子，应给以必要的注意，防止他们为敌利用，正确的执行锄奸政策（见五月二日北局野政指示）。灵活的坚持武装斗争，给敌人的扫荡以必要的打击，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经验一再证明，凡属游击斗争坚强的区域，敌之蚕食政策就遇到更大困难；凡属忽视游击斗争的区域，敌就最易成功。提高斗争情绪，深刻的研究政策，迅速的解决问题，亦是在争取反蚕食斗争胜利中，领导上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乙）如在第二阶段，敌人的蚕食阴谋已经实现，则应以武装斗争为主，扫除敌人武装便衣队，乘其立足未稳，给以不断袭扰，在可能条件下，集中适当的主力给以有效打击，并取得其他一切工作上的密切配合，使敌人不能轻易建立据点。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公开的与秘密的伪组织必须彻底肃清，对死心汉奸则应给以严厉的镇压。必须争取一切斗争的胜利，表示我们的力量，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安定人心，保卫群众利益，充分的发动群众反维持反汉奸的斗争，应将没收之死心汉奸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及抗属。

（丙）如在第三阶段，敌人已达到蚕食目的，估计一时不易击退时，我应灵活的转变斗争方式，深入我各方面的秘密工作，确实掌握一切伪组织，撤退公开不能立足的干部，准备合法斗争，积蓄力量待机恢复。另一方面对深入根据地之敌人的点线，则应给以坚决袭扰，并打击敌之出扰部队，停止敌继续向两侧扩张。

（六）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正确掌握武装斗争，轻易放弃武装斗争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坚强武装斗争作核心，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将是不可能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只有在敌占区才是主要的，在敌人向我根据地及接敌区（即游击区）进行蚕食



时，若仍以合法斗争为主，而放弃武装斗争是非常错误的。但这不是说在游击区及一时不能击退敌之蚕食的新占领区完全放弃合法斗争，而是说，合法斗争是次要的，在这些区域有合法斗争的存在，也更便于武装斗争的存在与发展（有耳目与群众），有武装斗争亦便于合法斗争，这就必须使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联系起来，才能争取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坚持阵地，不轻易放弃阵地，但机械的了解坚持阵地为单纯军事的正面对抗是会失败的。单纯的以军事对军事、以政治对政治、以及合法与非法斗争互不配合不连结等观点，都是不对的。因为斗争的配合把秘密的合法斗争任意公开了也是不对的。应当以灵活的游击战争及可能与必要的部分的运动战，给敌人的蚕食进攻以打击是必要的。否则要想积蓄力量，坚持敌后艰苦斗争是不可能的。为此，特决定：

（甲）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部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当集中整训，轮番调换，这种办法，在地方武装不够坚强的根据地尤为重要。

（乙）分散活动之连营，应特别加强党的领导，其任务为：（子）与地方党委取得工作上的密切联络，以灵活的游击战争，破坏和扰乱敌人所谓治安区（敌占区），配合打退敌人的蚕食进攻；（丑）帮助与培养地方武装；（寅）捕捉汉奸交地方政府处办；（卯）为着完成上述任务，须特别严格部队中的群众纪律，执行党的政策，在扩大政治影响下可以吸收精壮群众参加连队，以补充自己的消耗。

（丙）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更进一步的改善武装工作队的工作，必须使其在反蚕食斗争中起更大的作用，必须给武装



工作队以政策的及必要的技术训练，如锄奸反奸细破路爆炸等。

（丁）加紧培养地方武装，加紧发展民兵，加强游击小组的活动与建设，这是打击敌人，粉碎蚕食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只有坚强的地方武装与广泛的民兵活动，才能使敌人不易放手向我作蚕食的进攻，才能使敌人不易扩张与保持其面的占领。

（七）在反蚕食的斗争中，也必须正确的掌握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联系问题，机械的了解以政治斗争为主或以军事斗争为主，都是不对的，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斗争的重点应放在哪一面，应当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有机的联系起来，绝不是以这个为主就要放弃那一个，比如当敌人向我进行“扫荡”时，则应以军事为主，向敌人展开坚决的反“扫荡”武装斗争。当“扫荡”已过，向我进行政治阴谋活动时（特务谣言等），则应以政治为主，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政治攻势。当敌人向我根据地根据地进行蚕食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应以政治为主去根绝敌人一切可能利用的因素。当蚕食进到第二阶段时，我军事斗争的比重也就要随之加强。

（八）坚决的展开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全党全军的一个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才能使我们渡过这一段黎明前黑暗的艰苦路程。任何相互埋怨，任何步调的不一致，都是最有害的，我党我军必须亲密团结，为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而斗争！

这一指示在地方发到县委，军队发到营为止。此外望根据实际情况去分别讨论，并将执行的结果及新的意见，随时电告我们及中央。

## 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国营工厂的 劳动性质与职工会任务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

邓 发

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国营工厂的劳动性质，是一个新的问题，不仅有许多职工们没有弄明白，即知识分子也还有不少人弄不清。目前争论不决的问题，就是国营工厂劳动性质是雇佣性的呢？还是义务性的？对于国营工厂劳动性质的问题，如果没有彻底弄明白，不仅仅要影响对于今天提出的工厂合同的态度，而且还要影响今后对于工会的领导。现我试来解释这一个问题：

一、是雇佣的而又不是完全雇佣的。所谓雇佣性就表现在工资制度上，现在边区国营工厂大部分的工人，他们劳动的结果都获得一定额的工资。但在全体职工中并不是完全是雇佣的，例如厂长、职员、技师、事务工作人员，他们大部分是由政府委派的，都按八路军一样的待遇，仅领普通的津贴；在工人中，有一部分是由前方部队中抽调回来的技术工人，或年老与受伤的战士以及由政府动员来的，他们都以革命战士的资格来参加生产的。除此之外，还有兵工制的工厂，全厂职工的待遇完全与八路军一样。从以上几点看来，边区国营工厂的劳动既带有雇佣性，但又不完全是雇佣性的。

二、是义务劳动而又不是完全义务性的。首先我们应当认识：边区公营工厂并非完全为获得利润而设立的，而主要是为抗战与人民的需要而设的。例如机器工厂修理枪炮，制造子弹、手榴弹，是为了打日本；被服厂的生产是为了解决军政民学等的衣着问题；肥皂厂、纸厂、纺织厂、皮革厂、农具厂等，所有生产都是为了供给军民的需要。因此，我们边区公营工厂工人的工资，比起大后方、敌后工人的工资都要低些，就是与边区普通的泥水木石工人的工资也不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就是边区公营工厂与私营工厂有本质上的不同。边区公营工厂的劳动是带有义务性的，劳动的对象是为了抗战与人民，劳动的结果也是为了抗战与人民的需要。公营工厂的盈利，不像私营工厂落在私人的腰包，而是消耗于战场上，消耗于党政军民学的需要上，基本上是没有钱挣的。边区公营工厂既然不是专门图利的，而是为供给抗战与人民需要的，它的劳动是带有义务性的，所以公营工厂的工资一定要比外面低些。但公营工厂的工资虽低，但仍发给一定额的工资，所以又并非完全是义务性的。

我们在生产意义与工资对比上看来，说明了边区公营工厂的劳动是带有光荣的义务性的，这就是表现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劳动，为巩固边区而劳动，为建设边区工业而劳动。

但此种带有义务性的劳动制度并非长期的，而是过渡性的。抗战胜利后，全国工厂正规化，就不可能实现此种制度，必须完全实行工资制。将来需用很多专门家，需用大批建设干部，如不采用工资制，则他们难于生活；目前的专门家与建设干部在全国中还是占少数，将来扩大到全中国，像今天的津贴制就不能采用了。今天的边区公营工厂工人为抗战、为八路军而生产，故带有义务性，将来，每一个职工，能拿出多少本

领，就能得多少工资。所以在抗战期间，在落后的边区，在工人觉悟高的情形下，才采取不是完全的工资制。

三、何以不实行完全的义务制？理由很简单，因为边区国营工厂工人的觉悟程度并不齐，像机关工作人员那样可以完全实行义务制是很难的。边区经济落后，缺乏技术工人，为了吸收争取边区以外的技术工人来边区建设，他们政治觉悟程度不如延安的工人，所以也不能实行义务制。此外，还要照顾到某些工人的家庭生活的困难，也不能完全实行义务制。

四、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劳动是不是自由劳动？在一定的意义上讲，边区的劳动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边区工人可以自由获得职业，也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用不着贿赂，用不着特别介绍，更不需要什么靠山。在权利与义务上讲也是自由的，边区工人得与厂方订立劳动合同，规定工资、工时、学习以及其他待遇等，这个合同有政府法律的保障，而且政府以法律禁止一切欺压虐待工人的行为。边区工人在政治上又有完全的民主自由，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苏联，只有我们边区的工人才享受了此种权利。在大后方工人就没有资格当选为参议员，在边区参议会，就有二十多名工人参议员。在“五一”，我们工人可以开大会纪念，可以去看晚会，报纸上可以出特刊，如果在后方、在敌后的工人，则根本无此权利。

五、劳动既然是自由的为什么又不允许自由离厂与跳厂？上面已说了，我们边区国营工厂的生产是为了支持抗战，供给军民需要，巩固边区的经济建设。如果允许工人可以自由离厂、自由跳厂，一定要影响生产，使生产停顿或减少，这对于支持抗战、对于巩固边区都是不利的。现在边区周围被敌人和顽固派严密封锁着，他们企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我们边区工人如果自由离厂、跳厂，使得没有子弹、手榴弹、枪炮，打

不死敌人，使得我们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用，这只有使敌人与顽固派高兴。目前在敌占区做工，好像过牢狱的生活，在大后方也只有不自由。我们边区工人要保持目前的自由，只有使边区更加巩固。我们进步的边区工人，应当有远大的眼光，切勿贪图眼前小利。个人自由离厂去做买卖，他个人固然得了自由，但影响了边区的生产停顿，影响了边区的巩固，结果他个人的自由一定也要丧失掉。我们工人阶级要知道，中国如果没有八路军，一定要亡国灭种，一定不能支持抗战到今天，老早就投降了。汪精卫和顽固派的痛恨八路军，就是他们害怕八路军要反对他们投降，害怕八路军要宣布他们不是中国人。所以，大家如果都来闹离厂，强调劳动自由，个人固极痛快，但使得边区不能巩固，甚至失掉了国家，个人最后的一点自由也失去了，到了那时谁都可以来欺负我们工人了！我们要巩固边区，只有努力发展生产，使边区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我们如果不努力织布、造纸、制造子弹、手榴弹、枪炮……就要活不成！比方我们没有纸用，办公、学习、整顿三风也就不行。所以边区不能缺一工厂，更不能使生产一刻停顿。总之，不允许工人自由离厂、跳厂是应该的，这就是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个人自由应与集体自由统一起来。我们要认识：要获得劳动自由，必须先有政治的自由！觉悟的工人如果此点也不了解，就不能算是觉悟的工人。

六、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劳动，是具有新的意义的。这表现在：

（一）不是简单的创造剩余价值。在边区不论公营工厂与私营工厂皆为抗战需要而生产的。但这一问题要分两面来解释：私营工厂有资本有原料，目的是在创造剩余价值，但他的生产品主要是供我们的需要，他挣了钱，但他要担负营业税，

纳给抗战的政府作为抗战的费用。因此，在私营工厂也要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国营工厂的生产大部为抗战所消耗，它的剩余价值，则非为个人所有，而是为公所有，完全作为抗战的经费。

（二）国营工厂是革命的公有财产，工厂本身工人阶级自己也有一份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我们边区工人的劳动是有新的意义的，这就是为革命而生产，为革命创造财产。就是边区农民的生产也有新的意义，生产越多，出公粮越多，这对于支持抗战，巩固边区也是有很大意义的。

（三）边区工人所生产的东西是为支持抗日民族战争的，也就是为革命所需而劳动的，这种为革命的劳动是带有义务性的。凡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义务，就是参加生产，这也是光荣的劳动。

（四）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自我牺牲的劳动上。国营工厂的劳动不是单纯的雇佣劳动，而是带有义务性的，在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物品不计工资，这就是工人阶级自我牺牲的部分，这也是工人阶级在抗战中领导作用的表现。有许多工人为什么不要数百元的工资，只领取数十元的津贴？这就是因为他们认识了自己的劳动是为了抗战，为了革命，工人阶级应当为革命尽义务。所以，我们边区工人用更大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为整个抗战造成必要的物质基础，这就是新的劳动态度。

七、国营工厂职工会的任务也是新的，从以上所述的边区劳动性质看来，边区国营工厂职工会的任务也与一般职工会的有所不同。现简单举出几条于下：

（一）提高全体职工的政治觉悟，领导职工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有意义的劳动，努力增加生产。

（二）维持劳动纪律，提高生产效率，爱护工厂，节省原料。

（三）进行职工教育，提高职工的技术，提高职工文化政治水平。

（四）向每一职工解释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劳动意义。

（五）团结全厂职工，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

（六）与工厂共同合作，协商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应当兼顾工厂与工人两方的困难，只顾工人的困难，而不顾工厂的困难，一定要引起工厂与工人的对立，或陷于狭隘的行会主义，这是要严重注意的。

根据工人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四集刊印。

## 整顿三风要联系实际\*

(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

张 闻 天

### 一 整顿三风要同实际工作的 检查与改进联系起来

马列主义要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种报数式的、条文式的讨论既无结果，也无意义。要认识旧三风是患一种病，它在我们党内根深蒂固，要时常与之斗争，而且要经过痛苦。就如拔牙，拔的时候很痛，很不舒服，但必须要下决心来拔。

### 二 检查工作、决议、指示、计划 执行程度时应注意的要点

要检查工作、决议、指示、计划的实际效果，而不只是检查它的数目字，检查传达的次数，会议的次数，检查派了多少人，多少工作团下去。而这方面最主要的，就是从被领导者、实际执行者方面来检查。首先是从群众方面来检查，从这方面来考查领导机关之优缺点，领导人员之优缺点，决议本身之优

---

\* 这是张闻天在中共晋西区委整顿三风座谈会的讲话。



缺点。

要打破老一套的检查工作方式——天天在会议上，在干部中，在机关里，在文件上。这是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党八股式的检查。应该是生动的，在实际工作中，在斗争中，在群众中的检查。

须知根据实际来的数目字才科学，形式上的数目字不可靠。要着重看干部和群众是如何执行的，我们的政策是否合适？就如打枪，应检查打中与否，而不应只是在姿势上打圈子。如此才能反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 三 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

反对三风之目的在于使干部能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中央的指示（马列主义的原则亦然）是从实际中产生出来的，是行动的指南、方向，不是解决每个实际问题的方案，医治百病的万应药方。因此中央指示本身的执行，要求领导机关既要研究文件与把握方向，又要对当地情况进行具体研究而使之具体化，一直到一个个问题的实际解决。光背诵中央决议，而不去研究实际，不在实际中贯彻中央方向，实际上是违反中央决议的精神的。同时下级同志也不光是执行上级指示，解决问题，而且要提出新的问题，反映上去，并作为上级确定政策的条件，又成为原则的东西。上下级的指导关系，均应本此精神。

所以执行中央指示可以有两种办法：或者对中央指示精神不求甚解，照例传达下去，不去研究当前情况，不解决实际问题，以议论感想为满足；或者切实掌握方向，切实研究问题与当前情况，而给问题以切实解决。目前我们许多会议、报告、

指示都存在不能解决问题的现象，我们要使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成为一种作风，一种工作习惯。

#### 四 材料之分析与综合——方法论

分析就是解剖。例如晋西北可以解剖为几个分区、县区，区则可解剖为行政村，自然村，直到每一个个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就解剖到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的细胞，找出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分析必须“追根到底”，分析后一定要综合，不光是看到个体，还要看到联系。这样，从统一到一个个事物的研究，从一个个事物到统一体的规律之把握。从分析到综合，从综合到分析。这里材料愈多愈好，分析愈细愈好。要从材料中抽出原则。

我们的毛病是缺乏分析，综合太多，事实上是没有内容的综合。因此形成的原则是空洞的、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也有拥有了一大堆材料，而看不出任何方向的。但是在今天这还不是重要的问题。今天首先要的是大批的材料，而我们这方面则是太少了。

#### 五 整风学习与工作

要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要认清文件书本的学习是为了工作的进步，认识的进步。中宣部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我们首先要了解其精神，然后根据精神去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就是矢与的的关系。此外我们还要进行理论、政治、业务、文化的学习。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脱离工作搞学习，效果不大。

## 六 下决心来改变作风

要认识到自己毛病很重——三风不正。知识分子知道的实际东西太少（特别是群众的生活与活动），反而以为知道的很多，夸夸其谈。其实天下便宜的事情是没有的。用力多，则得的多。用力少，则得的少。要不怕出力出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决心克服自己的弱点，做马、恩、列、斯、毛的好学生，做群众的好学生。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三卷刊印。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撤回在新疆的部分人员问题 给陈潭秋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

潭秋：

一、在目前国际国内情况下，仁兄<sup>〔1〕</sup>可能发生某种动摇，蒋介石也企图拉拢他以对苏对共，不过估计他目前还不可能脱离苏联完全投到蒋的方面去。你们所提巩固六大政策政权争取他改善对我们关系的方针及三项办法是对的，并要暗示他提防蒋略取新疆的阴谋（如派三师中央军入新），注意内部的团结。仁兄对我们工作同志既不信任又表示恐惧，我们想在此时撤回一部分同志，以示我们对新疆只是帮助毫无其他野心。此事已电远方<sup>〔2〕</sup>商量，并将你四月一日电也转去。如彼方同意，再电你执行，请考虑如撤退一部分同志，则以何种方式撤退和撤回那些同志为适宜。

二、在迪同志一时既无法回延，我们决定在迪组一调查研究分局，以你为主任，负责研究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材料由恩来<sup>〔3〕</sup>从重庆供给你们。因为那边许多材料无法运送延安，但可利用友人飞机经常送你处，你们研究结论则电告我们。分局可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组，各组可

设组长及组员若干人，请考虑哪些人任组长并告。

书 记 处

五月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 〔1〕指盛世才。
- 〔2〕指共产国际。
- 〔3〕即周恩来。

##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

（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解放日报》社论）

两条战线斗争，这口号我们是听得很熟了。共产党是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和错误的偏向作斗争，正确的路线就不能执行，党也就不能发展。侵犯党的正确路线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一个，而表现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左”的，一种是右的。要保证正确路线的执行，就要反对两方面的偏向。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办法，是从全面的思想方法来的。所谓全面，就是要照顾到两面，不能只看见一面。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主观主义的精神。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

我们党二十一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两条战线斗争的历史。反对陈独秀主义，反对李立三路线，遵义会议，开除张国焘，就是最重要最特出的例子。经过了这些斗争，我们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才得提高，党的战斗力，才得加强。但在某些党员中，对于两条战线斗争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够普遍，因此，党整顿三风进行之时，对此问题，还有加以说明和提倡的必要。

整顿三风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掌握二十二个文件中的正确

方针，来检查全党思想的、工作的实践，发扬其正确的，纠正其错误的。这里首先是照顾到这样的两方面，又要掌握理论，又要改造实践。整顿三风，就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活生生的统一。只顾理论，不顾实践（像过去有些地方离开工作讨论文件那样）是不对的。只顾实践，不顾理论（像最近延安个别机关未将方针研究清楚就开始检查工作那样）也是不对的。四月三日中宣部决定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将掌握理论与检查工作，正确结合起来。既反对不顾理论，又反对不顾实践，这就是中宣部决定的主要思想脉络，而这是充满着两条战线斗争精神的。

现在是延安各机关学校集中力量研究文件的时候。研究文件的目的，是掌握文件的精神和实质，不仅懂得，而且会用。中宣部决定告诉我们，对于文件，必须精读。有些同志只有粗枝大叶的习惯，却没有精读的习惯。所以要精读就要反对走马观花，“一目十行”的办法。但有些人在精读时，又走过了头。他们把注意力放到字句的钻研和争辩上去了。结果，变成了咬文嚼字，在词句上钻牛角的偏向，这也是不对的。精读不是粗枝大叶，但也不是咬文嚼字。这两种办法都不能掌握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所以都是应当反对的。中宣部决定又告诉我们，研究文件要和反省自己联系起来，才能将文件领会贯通。而这里也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就文件研究文件，研究来研究去，还是文件是文件，自己是自己，不发生关系。另一种偏向，则是对自己作了不恰当的估价，弄到失去了信心，这也是不对的。

整顿三风的第一步是研究文件，第二步是检查工作。在检查时，也要反对两种偏向。不能把眼睛只望着上面，以为整顿三风仅仅是检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没有什么关系。但也不能只检查下面同志，而不检查领导者。检查的范围，是整个机关

和学校的工作，同时还有每个同志。检查中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仅纠正缺点，而且要发扬优点。有些同志以为检查就是揭露缺点，优点可以不说。不知专门讲缺点，使人感觉一无是处，只能破坏工作信心，所以必须发扬优点。

要保证研究文件和检查工作进行得好，还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是有正确的批评。民主集中制就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只有下面的民主，没有上面的领导，就要造成无政府状态，什么事情也办不好。反之，只有上面的领导，没有下面的民主，则缺点无从揭发，工作就不能改进。至于民主程度的伸缩，则要看斗争的具体条件，一切以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为标准。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在许可讨论的过程中，在问题未决定以前，任何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都可在一定的时机与地点发表，一经决定，则任何人必须无条件服从。这里也是需要两方面注意的。

关于批评的方法，中宣部决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严正，彻底，尖锐，同时又要诚恳坦白，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如果没有前者，则错误不能彻底揭露，会变为无原则的和平共居，结果不能帮助同志，也不能团结同志。如果没有后者，则批评必至过火，必至有损于党，也是不能帮助与团结同志的。在对人和对己问题上，也是一样。专攻别人，避开自己，不对；明哲保身，有话不说，也不对。这里也是要从两面来进行斗争的。

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不是折衷主义的方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对在时间中运动着的事物规定一个适如其分的相对的安定性，它反对过右的与过左的两种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与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质相违的，都是主观主义的。折衷主义则是庸俗的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调和主义的方法，它调和



矛盾的两个侧面，求得和平共居而不解决矛盾，它不能规定事物的性质，而只举出事物互相矛盾的标志。

所以我们党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反对不正确思想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侵犯，使党能够得到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统一。而折衷主义则决不能得到这种统一。

因此，两条战线斗争，是不能给人乱戴帽子的。这个斗争的进行，要有最大限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提倡同志们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勇于怀疑和勇于批评的精神。但决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弄得到处都是偏向，到处都要斗争。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任何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可打击党员群众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对党都是不利的。

正确的两条战线斗争，是党的生活中一天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整顿三风进行中，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实行，以保证我党伟大改造运动的成功。

根据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解放日报》  
刊印。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敌后实行 义务兵役制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

各局、各分局、区党委，各战略单位：

甲、今天在敌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必须慎重考虑到以下问题：

(一) 农民现在的政治觉悟，是否能够接受。

(二) 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着想，是否会发生困难。

(三) 是否会发生大批壮丁向敌区逃亡的危险。

乙、目前冀察晋所实行的志愿义务兵役制，其主要精神还是着重在志愿原则，而不是着重在义务制度，其他地区暂不宜仿行。俟冀察晋这次试行得出经验后，再决定可否照做。各地今天着重要做的还是认真实行精兵简政，及努力发展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这是准备长期坚持根据地应当切实执行的方针。

中央书记处

五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央军委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 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前总、新四军、各师、各旅、各纵队、联防司令部：

(一) 为了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决定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统一两个地区的作战行动与建军工作。

(二) 决定以贺龙为联防军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关在休养，高岗为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

(三) 联防司令部直辖下列各兵团：1. 一二〇师。2. 留守兵团。3. 晋西北新军。4. 三五九旅。5. 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6. 炮兵团。

(四) 凡直属联防司令部指挥的各兵团，从五月二十一日起，即与联防司令部直接发生关系并接受其命令。

(五) 华中华北各战略区，望与联防司令部相互通报，确保联络（通讯法另由三局通知）。

军 委  
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

彭 真

中央决定必须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是整顿三风的锐利武器，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讨论，真正领会贯通它们的精神与实质。

什么是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就是指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指导思想。我们领会了它，便可能依据它、运用它来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来预言事变的发展进程。就是说，有了它，不仅可以知道事变在目前如何发展和向哪里发展，而且可以知道事变在将来如何发展和向哪里发展，从而使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确定正确的方针。换句话说，我们所以要领会它，就是为了要实际应用它，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武器，自己的箭，射起来得心应手的箭，好用来百发百中地射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用来改正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工作。总之，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究竟怎样才算领会贯通了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呢？有什么标准呢？显然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实际应用。

如果我们研究了文件之后，能够运用它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并且在实践中来

---

\* 这是彭真为《解放日报》写的署名代论。

检查、改正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又能够运用它来检查同自己有关的部门和地区的工作，并且改正了其中的错误，揭发并纠正了其中的歪风，那我们就是真正领会贯通了。反之，纵然能把它的字句背得烂熟，甚至像和尚念经一样背得顺口流出，仍然是一窍不通，因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你却不会实际运用，不能实践啊！

具体讲起来，究竟什么是这些文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呢？

我们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人类历史中最革命的阶级的立场，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因而也是解放全人类的立场。

我们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观点，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因为只有辩证的历史的唯物论，才是彻底的唯物论，才是完全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是不完全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唯物论，它往往有一定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机械唯物论者即成为唯心论的俘虏，成为唯心论者，费尔巴哈就是一个典型。

我们的方法是彻底的辩证法的方法，即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方法，因为只有唯物论的辩证法，才是彻底的辩证法，才是完全的辩证法。辩证法在唯心论者的手里是受着严格的拘禁的，受着不可避免的限制的。唯心论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不仅是唯心论者，在某种范围内仍然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如他的“绝对观念”、“最高理性”，是不受辩证法的法则支配的，它是黑格尔的“上帝”，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创世主，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没有辩证法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的。

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那末，问题不是再简单没有吗？为何还要在每个文件中，每本书籍、每篇论文

中费尽脑力地领会它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即它们的精神与实质呢？

因为我们的立场虽然只有一个，虽然是确定不移的，但是随着革命阶段的不同，随着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的不同，在处理问题时，却有其不同的表现。同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和在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它的表现形式是很不相同的；在这一个国度和那一国度里的表现形式又不相同，在劳资斗争中反资产阶级和反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也不相同。以中国来说，我们的阶级立场，在实质上来说是确定未变的，但是它在大革命时期和在内战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在抗战时期和在内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又不同。从立场的表现形式来看，正确的立场固然有极其多样的表现形式，错误的机会主义的立场也同样甚至有更多的随遇而变的表现形式，但是就其实质来说，都是百变而不离其宗的，始终都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我们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不仅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其他革命阶级、阶层的利益，而一切机会主义则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我们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观点，这是不变的，但是随着问题的不同，或者同一问题，又随着其所属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不同，都有极不相同的具体表现。因此，就其所表现的形式来讲，也是千变万化的。举例说，当我们考察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时，我们认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但是当我们考察中日战争时，我们却又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相对照地加以考察，认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

这里”；而当我们考察抗战中的中国国内关系，并且决定党的具体政策时，则又认为现在不但和内战时期而且和大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根本不同，认为目前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矛盾是最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是从属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就是说，它是决定党的具体政策的根据。所有这些例证，都可以说明：（一）我们在分析处理一切问题时，总是从客观的具体情况出发，总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或其他主观的什么东西出发，这种观点是始终如一的，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的观点。单就这一点来说，也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但是，（二）这种观点的具体运用，却又随着问题的不同和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变化无穷，要想真正领会并且熟练地运用它，却又并不是一件易事。

讲到我们的方法，从它的实质来说，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辩证法，但是具体运用起来，却又千变万化，极其洋洋大观的。就是说，我们若就辩证法的本质来说，那末“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因为辩证法本来就是研究矛盾的东西，列宁说过：“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如此看起来，似乎是再简单没有了，但是真正具体地充分地应用起来，却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

举例来说，如把中日战争的双方，即中国与日本的各个方面所具有的矛盾、双方强弱优劣形势加以分析，并综合地考察，把中国抗日统一战线营垒中的亲日派、顽固派、中间力量和进步力量加以区别，并分别加以缜密的考察，对于顽固派的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性，及其在抗日与反共两方面中又各自具有其两面性等加以分析，并且全面统一地正确掌握这些矛盾等

等，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了，但在全党达到如此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不但经历了无数的斗争和艰苦工作，而且是支付了不小的代价的。

又如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的决定中，对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关系，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与正确的、主要的与次要的，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关系的正确处理，在中央已经指出之后，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也是比较简单的的事情，甚至也许有人以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全党达到这样的认识并且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全面地看问题及处理问题，却是无数血的经验的结晶，全党支付了无数的代价，方才获得的一点辛勤的果实。但是即使是这样，要想真正领会它的精神与实质，而圆满灵活地应用于实际，贯彻到全党，仍然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之，文件中的立场、观点也好，方法也好，就其本质的共同一致之点来说，似乎是很简单的，但是就其实际的应用，就其所表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形来讲，却又是变化无穷，是有无限丰富的内容的。真理常常是具体的，如果不满足于一般的公式，而是要真正领会它们，那末便不是咬文嚼字背死书的教条主义的读书方法、学习方法所能解决的，必须以企求实际应用的精神，逐件逐件地精读，深入地研究，热烈地讨论，反复地、深思熟虑地、细心地体会，才能真正领会贯通和实际应用，同时也一定能够真正领会贯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彭真文选》刊印。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 泽 东

##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

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

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

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

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应该很

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 结 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

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差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 —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



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谁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東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

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予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

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

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

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sup>(1)</sup>，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sup>(2)</sup>，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

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文艺，又有反过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

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艺术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艺术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艺术家在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

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艺术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艺术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艺术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

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



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

命艺术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艺术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



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

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艺术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

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

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

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 注 释

〔1〕“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2〕“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 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一、运动的情况

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后，全延安在四月二十日开始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运动以来，一个月间，已经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学习热潮。这是我们党在思想战线上一件空前的大事。学习运动分成五个分区进行，即（一）中央直属，（二）中央军委直属，（三）中央党校，（四）中宣部与文委所属四个学校，（五）边区系统。总共参加人数，据已有的统计约九千余人，包括党员和非党人士。

学习热潮甚高，收获也大。有的同志，在一个月的学习中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面貌；有不少的同志，则正在开始改变自己的面貌中。这个热潮已普及到全党，并将普及到全国人民中。

根据延安一个月总结的检查，除已达到的成绩外，在学习中还有某些偏向，应针对这些偏向，分别加以适当纠正，使今后学习更能达到成功。

（一）咬文嚼字，专在字句内打圈子。犯这个偏向的，要纠正，叫他注意整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而不是字句。但真心是不懂文字的意义者，又当别论。

（二）不反省自己，专搞文件。犯这个偏向的，要叫他不

要停留在文件上，要实行按照文件逐件逐条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三）丢开文件，专门反省自己。犯这个偏向的，要叫他注重文件，按照文件去反省自己，因为离了文件，就无从正确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四）轻视整风，以为“老子不整风还不是革命？”犯这种偏向的人是少数的。应当好好的对他们解释整风的必要。应知整风是人人有份，人人应当参加的。

（五）怕整风，“躲风”。或则要“下乡”，或则托病，或则上午就往门诊部门前打扑克，却怪门诊部为何上午不开门。犯这种偏向的人更是少数。应对这极少数的人说明：躲是无用和不必要的，而且整风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并无可怕之处。

（六）有过分积极，日夜不停的在看文件想文件，因而生病的，对这些人，要劝他们勿太过分，要他们休息一下，要安慰他们。

（七）笔记太长，有的一篇笔记五六千字的。对这种同志，要劝他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或是笔记太短，有的全本笔记只写上二十八个大字。对这种同志，要劝他写得长些，要按件作笔记。

（八）不肯暂时丢掉可丢的工作，因而没有时间学习，对这种同志，要劝他丢掉些可丢的工作。当然，十分必要的工作是不应当丢的。

（九）计划性差，自己的工作时间没有支配得恰当，因而没有时间学习，对这种同志，要加强其工作的计划性，使他能兼顾学习、领导和工作三方面。

（十）一部分行政领导人员抓得不紧。这些领导同志对于

整风决心不够，畏首畏尾，生怕出乱子。对这些同志，要他有决心，大大发动这个学习运动。

## 二、今后的办法

一般的说，学习运动的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这一阶段是有成绩的。今后的方针，是要把已发动的热潮巩固起来，和注意运动的深入。为此目的，中央已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来更细密的及时的领导整个延安的学习运动。同时决定延长学习时间，学校由二个月加到四个月，机关由三个月加到五个月，即学校到八月二十日，机关到九月二十日。因为高级干部自己的学习和领导作用，是决定运动有无成绩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央也决定了抓紧这些干部的学习。

总结一个月学习运动，在学习方法上得出下列经验教训，足为今后学习方法的指导：

（一）学习运动的成败，最主要的关键，是在行政领导干部的身上。行政领导干部如果自己不学，就不能领导学习。所以各大小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中心学习小组，必须特别抓紧。过去有抓得紧的，亦有抓得不紧的，后者应向前者看齐。

（二）高级学习组（即中心小组）同志一定要分头参加中级学习组，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

（三）对于错误的意见，要尽量容许发表，适时组织反驳。过去有些地方，做到了“容许发表”这一点，没有做到“组织反驳”这一点。有些地方，则“容许发表”也未做到。不容许发表，是不好的，但眼望着错误的言论，不去作有力的反驳，是不负责的态度，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共产党员不应只是独善其身，而应当利用一切机会，积极的宣传马列主义，



发展马列主义的影响，才是正确的态度。

（四）开会，漫谈会、讨论会，各种方式都要。漫谈会可以是三五个人的小漫谈，及十多个人的大漫谈，不拘地点时间形式，随便谈论文件，但也要是有组织的。讨论会则是比较正式的会议。讨论会要有领导，准备、启发、结论，三者缺一不可。

（五）笔记，人人都一定要做，这是“伏案”的功夫，有了这步功夫，才不会夸夸其谈。笔记要（1）指定负责人轮流修改。（2）上级人员要看改下级同志的笔记，不能全看时，也要轮流抽看，并且帮他批改。这是上下级联系的很好方法之一。（3）互相借看笔记。（4）传观最好的笔记。（5）上级人员看了下级同志的笔记后，必要时找他来个别谈话。要发给充分的做笔记的纸张笔墨。

（六）要开小组长联席会。各小单位的要经常开。五大系统的看情形而定，也要开。

（七）有大问题发生时，动员时，总结时，可以召开大座谈会，人数可以多到二百左右，由重要的负责同志作报告，或主持该会议，大家报名发言，开展热烈的讨论。

（八）总学委及各系统的学委会，要派出巡视员，巡视和帮助下面的学习。

（九）要收集问题，收集之后要加以解答。解答时，看问题的大小，重要性，采取各种解答的方式。小组会、中心组、大座谈会、各级学委会、学习刊物，都应解答已经提出的问题。

（十）墙报是学习的重要工具之一。要抓紧对于墙报的领导。

（十一）由负责人传达文件的中心内容，可以帮助同志们

深刻了解文件，应在同志们对某一文件看过之后，讨论之前，进行传达。

(十二) 组织各机关学校的相互参观，作为推动学习的办法之一。

(十三) 通讯与复信。在研究文件的过程中，同志们如有意见，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写信给自己的领导者，或者给各分区学委会，一直到中央。接到信的领导同志，要妥当的答复他。

(十四) 要奖励那些学习得努力的、有成绩的，批评那些学习得不努力、无成绩的，安慰那些因为学习得太积极而影响健康的。

\*                         \*                         \*

整顿三风运动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运动，是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但要克服旧有的三风不正的残余，而且还要克服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正的思想。不但要从老干部老党员身上去掉这种非共产主义的思想，而且还要从新干部新党员身上同样去掉这种思想。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尾巴，在许多同志身上，是表现得甚为顽强的，他们并不自以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是以无产阶级之名来表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企图按自己的面貌，来建设党，来改造世界。惟有战胜这种错误思想，才能按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的面貌，来建设党，来改造世界。

此次整顿三风，已成为党内一个大论战，论战的形式，是非常复杂的，从口战到笔战，从谈话到开大会，从小广播到大

广播，从墙报到《解放日报》，已经处处开展起来了。

我们党已经有了八十万党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没有此次思想上的大改造，是不行的。

一定要把这个思想改造工作进行到底。不惜精力、时间、费用，达到无产阶级思想在全党内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

根据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解放日报》  
刊印。

##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党中央曾向华北各根据地指出：“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洋等二十余国为敌”，无论“从经济的（战争资源），政治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军事的（潜在力），各方面看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反侵略国家”，这是对于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基本有利的方面。同时又指出达到这个胜利，还要经过一个极艰苦残酷的斗争过程。由于日寇今天在太平洋上还占着有利的军事优势，日寇为了准备进行反苏战争，必更加紧巩固其反苏前线的华北阵地，加紧榨取华北的人力资源以供应战争；因此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毁灭“扫荡”也必更加紧，今后两年将是华北最艰苦最困难的两年。但这是达到胜利必经的困难，正如天将破晓前的黑暗，我们一方面要有在敌后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对日益增加的困难，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在精神上，在各方面工作上有很好的准备，去迎接困难与克服困难，而不致临事张惶失措，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及避免党内党外可能发生的悲观失望心理。

今年五个月来，敌人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扫荡”，与积极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之

艰苦与残酷，实空前未有，完全证明中央指示之正确。今天各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动，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仔细的去研究了解今天情况的特点，和正确布置各方面的工作，否则就会不能前进，甚至可能受到损失。目前情况的特点，存在着增加我们困难的方面，也同时存在着有利于我们能够坚持争取胜利的方面。属于增加我们困难方面主要是：

一、敌人的据点与公路网更加稠密。以晋察冀为例，去春还只有八百多据点，现已增至一千四百六十，平均每县有十五个以上据点。在据点周围与公路铁路两旁，有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主要的道沟，宽深各二丈，有一部分且引河水灌入，阻我不易通过），使我地区受到很大的分割，交通联系与工作指导上均增加很大困难。

二、由于敌点线增加，使敌在军事上增加了新的便利，无须用比较过去更大的兵力，即可经常进行“分区清剿”与“分割蚕食”。今后“扫荡”将更频繁与残酷，两个战役间的空隙将更缩短（五个月来各地区连续的“扫荡”与反“扫荡”战争已充分证明）。并增加了随时遭敌突然袭击的可能。

三、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经济实行严格的封锁，并在“扫荡”中采取“彻底毁灭我军民生存条件”的“三光政策”，把一些地区完全毁灭成“无人区”。这样残酷的破坏，与五年来长期战争的负担，不能不使根据地民力凋敝，财政经济日趋困难。特别是军用器材更感缺乏。

四、由于斗争的残酷，不仅部队伤亡甚大，党政军民各级干部的伤亡也极大，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已成为敌人经常追踪袭击的主要目标，稍一疏忽，就有受敌人合击歼灭的危险。

五、由于某些地区党政民及地方武装的工作，还不深入，

不巩固，群众游击战争的发动还非常不够；因而在今天新的情况下，表现无法应付。特别在根据地突然转为游击区或敌占区时，不善于去具体分析情况，正确掌握政策，及时转变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以致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六、由于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及敌人各种挑拨离间的欺骗活动，一部分上层分子可能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分化。再由于我们个别地区的领导者，对于群众困难的关心与帮助不够，也可以使一部分落后群众在过度疲劳后，产生悲观失望与对我不满情绪。

我们对于上面所指出的困难，应有足够的估计和深刻的认识。畏惧困难，夸大困难，在困难面前退缩不前，这不是革命者的态度；但掩饰困难，与轻视困难，也必然会麻痹自己，放松了当前应努力完成的任务。某些地区由于对新的变动情况的研究与了解不够，因而在精神上与工作上缺少准备，当困难突然到来时，发生慌乱与不能应付的教训，必须加以研究与接受，使之不再重复。在目前新的残酷的斗争情况下，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工作：

首先是要在军事上对敌人日愈频繁的、突然的“扫荡”，提高空前的警惕性，更机动发挥游击战术，随时注意跳出敌人的包围合击，去消灭敌人与粉碎敌人的“扫荡”。特别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加强民兵和地方武装的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开展破袭运动与爆炸运动，才能打击敌人的蚕食与封锁，才能使敌人行动不安，更多的疲惫敌人与减少我的损失，并造成主力打击敌人的有利机会。

其次，要改变一切组织机构，更加适合于今天残酷战争的环境，党政军的关系要做到一元化，庞大不便行动的后方机关必须缩小，同时由于长期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必须在各地适

当配备能正确掌握政策独立工作的领导干部。

其三，要切实爱护节省与培养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一切工作应注重质量，坚决肃清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认真整理村财政（这是若干地区财政上浪费最大的地方），减少人民负担，并积极采用各种方法去帮助群众增加生产，改善群众生活。

其四，由于敌占区游击区有相当数量的增加，必须加强注意对这些区域工作的开展。当着某些地区估计可能转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时，应在事前即有准备，更要能够保存斗争力量，并以新的方法与敌人进行斗争。

其五，要加强对敌寇的政治攻势，敌寇五年的侵华战争，并未能灭亡中国，敌军士气已不如从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军伪组织内部更形动摇，敌占区人民遭受敌人日愈严重的掠夺（大量搜捕壮丁，实行配给制度，各种负担占整个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抗日情绪日愈增长，敌人今天在华北点线的增多，一方面虽增加其“分割扫荡”之便利，另一方面更感到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处处孤立，在抗日人民大海中的危险。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向敌军伪军伪政权宣传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及伪政权转向抗日。并向游击区敌占区居民扩大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

其六，要百倍加强内部团结，包括党内的团结，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这是克服一切困难，能够坚持的中心关键。党内的团结，要从这次整顿三风中，使全党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造成一致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切实了解情况，正确掌握政策，坚固团结在党中央正确路线周围，便能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有办法克服，不发生脱离群众，互相埋怨，悲观失望现象。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

系，必须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及其困难与要求，不仅要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去提高群众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以发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并且要在负担上认真爱护与节省民力，不使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要在敌人“扫荡”中与“扫荡”后，认真帮助群众转移掩藏，及对损害者实行各种救济工作。在敌占区应采取灵活的办法，以减少群众的损害。党政军各部分只有这样认真关心群众利益，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由于敌人对华北各阶层人民日愈加重的压迫与掠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会基础是更加扩大了，我们的政策要时时照顾到一切抗日阶层的利益，使日寇完全在中国人面前孤立起来。今天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虽然比过去严重，但只要我们内部团结，政策不犯错误，我们能更进一步的依靠群众，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受敌人挑拨破坏，则一切困难都是能克服的。目前整个世界动向，又是于反侵略国家有利的，在华北敌后艰苦困难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应遵照中央的号召“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训练干部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根据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 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

整顿三风学习运动，从四月二十日在延安进行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成绩（参看《解放日报》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已广播），根据延安的经验，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全党干部党员思想的改造和工作的改进都是有极重大意义的。因此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的领导这一学习运动。

关于整风学习运动的进行和计划，除参考四月三日中宣部的决定外，根据延安的经验，应采取下列的办法：

（一）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

（二）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吸收参加，分成小组。

（三）一切干部学校凡能阅读文件者，暂行停止一切其他课目（军事学校则暂行减少军事课目），专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四）机关部队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应尽可能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学习时间，延安规定每日上午为学习时间，各地应依具

体情况而定。但必须注意，不要忘记战争环境，不要忘记敌人的可能袭击。

(五) 依情况之可能，出版学习报刊（油印或铅印）讨论问题解答问题。并依情况之可能，各机关学校出版墙报。

(六) 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时期中，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

(七) 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从何时起由各地自定，各地因情况不同，学习时期可以依具体情况伸缩之。

(八) 有些已经开始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地方，其领导办法如果是与本指示及“四三”决定相符合的则照原计划进行，如果是不符合的则须加以改变。

(九) 附件一中央直属系统学习计划，附件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作为各地领导学习的参考。

六月八日

## 附一：中央直属系统四个月研究 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

四月二十日起，浏览全部文件，作为粗读阶段，其中讨论过“四三”决定和毛主席二月一日的报告。五月二十日起为精读阶段，计划如下：

——从五月二十日起到九月二十日止——

甲、整顿学风问题（反主观主义）：一、毛主席二月一号整顿三风报告（参考二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康生同志的传达），二、毛主席关于改造学习报告，三、联共党史结

束语第二条，论布尔塞维克化第二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三星期）；四、中央调查研究决定，五、农村调查序言二，六、古田会议决议中论唯心观念，七、论布尔塞维克化第三、四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一个星期）；八、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部分，九、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十、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一个星期）。

乙、整顿党风问题（反宗派主义）：一、毛主席二月一号报告中反宗派主义部分，二、中央增强党性决定（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一个星期）；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五、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六、论布尔塞维克化第九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三星期）；七、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八、反自由主义，九、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十、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民主，十一、联共党史第三、四、五条，论布尔塞维克化第八、十、十一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二星期）；十二、毛主席在参议会演说，十三、联共党史结束语第六条，论布尔塞维克化第六、七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一个星期）。

丙、整顿文风问题（反党八股）：一、毛主席二月八日反党八股报告（参考三月八日《解放日报》康生同志的传达），（研究时间为一个星期）；二、宣传指南（研究时间为一个星期）。

丁、综合研究：一、毛主席改造学习报告，二、毛主席二月一号与二月八号报告，三、联共党史结束语全部，四、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全部，五、中宣部“四三”决定，六、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三星期）。

以上甲乙丙丁四项从五月二十日起到九月二十日止，共研究时间十七星期。九月二十一日到九月三十日为考试与总结学

习经验，准备检查工作时期。

### 附记

一、以上计划，关于文件之编列与时间多少系大体规定，具体实施，各单位按具体情形之不同，可予伸缩增减。二、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已讨论之文件可再加以复习。三、此计划适合于所有阅读文件之干部，至于需上文化课者，仍按以前所规定之八个文件，各分委酌情增加自行规定进行之。

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

## 附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

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由中央总学委会每周或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会中讨论学习问题，并通知时事政治及工作等问题。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一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同志负责，各机关成立学习分会。军委直属系统成立一分区学习委员会，由王<sup>(1)</sup>主任、陈云负责，下成立几个中心学习组，如参谋部中心学习组、政治部中心学习组、后勤部中心学习组、专家中心学习组等，各机关部队成立学习分会。边区系统成立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均成立中心学习组（甲组），自己把文件学好来领导其他干部学习。此外有中级学习组（乙组）与普通学习组（丙组）。甲组人数较少，但是领导的中心。乙组人数最多，都是中级干部，是学习运动中最应注意的部分，甲组同志应分别参加之。丙组人数不很多，是文化较低组，又应该学习文件的

若干干部，则采取上课的办法为主。延安共有一万零九十八人参加这次的整风学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注 释

〔1〕指王稼祥。

## 毛泽东关于联防司令部成立及整风学习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

周：

各电均悉。

(一) 自联防司令部成立(半公开, 未登报, 陈宏谟知之, 但未明说)、自卫军公开组训、部分队伍由绥德南调(王震旅部及一个团), 使联络参谋及西安均起了恐慌, 吓他们一吓是必要的。

(二) 为何彬开追悼会, 广播抗议杀何彬的社论, 也是必要的。对刘英、小廖<sup>(1)</sup>、郭潜及其他被捕被杀者亦拟公开抗议或开追悼会。一以答复反共狂潮, 一以对内部作教育, 你意如何?

(三)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 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 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

(四) 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 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 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 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 便是胜利。

(五) 少奇<sup>(2)</sup>已至山东, 过来不得, 令其即驻山东, 统一山东及华中的领导, 山东领导甚弱, 纠纷甚多, 少奇驻鲁是

好的。

（六）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便可大量保存，否则是无法保存的。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可以开辟很多新支部，其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除有据点者外（如方方），请下决心办理。

（七）郭亚生走后陈宏谟又走，听说陈走是升任师长，未知确否。周励武带其老婆留此。

毛 泽 东

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指廖承志。

〔2〕即刘少奇。

## 悼左权同志\*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

朱 德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晋东南周围敌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等主力三万余人，向我太行区大举“扫荡”。我八路军左副参谋长，于率军出击麻田敌寇之际，不幸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十余年来，左权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在枪林弹雨间，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从事武装斗争，成为我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然而今天，他与我们永别了！这自然是我们民族很大的损失，是中国人民很大的损失，是我们很大的悲痛。回忆起十余年战友的生涯，不禁黯然。

左权同志是湖南醴陵人，现年三十六岁。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排、连长职。黄埔军校开创，左权同志为该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参加统一广东的东江战役，后由黄埔军校保送赴莫斯科入军事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归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历任红军学校教官、野战司令部作战科长、红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旋任该军军长。一九三三年调任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一九三六年调任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职。七七抗战，红军改

---

\* 本文原载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左权同志即任第八路军副参谋长职，转战华北，与敌人搏斗，直到他牺牲沙场之日。

左权同志一生辛勤劳苦，为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他的毕生精力，直到他的生命，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人民是有很高的功绩的。他曾长期担任高级兵团参谋长的工作，参与了我军许多重要战役和建军工作的规划与领导。特别是抗战以来，他在极残酷艰难的敌后环境下，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劳瘁地工作着。在他参与策划下，八路军发展成为数十万劲旅，全华北成为日寇所不能摧毁的堡垒，成为大后方安全的屏障。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他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同志的这些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军事界，千秋万代，将要永远崇仰这个模范军人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民族对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他生活艰苦，从来不为私人作任何打算。他同士兵一样吃穿，到三十四岁才结婚。抗战以来，每月领五块钱的津贴，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但是对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于工作，则夜以继日，孜孜不倦。不管如何困难复杂的任务和如何艰苦险恶的环境，他从不推辞，从不畏缩。在与民族和人民的敌人斗争的时候，他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积极性和耐烦细心。他是一个沉静寡言的人，十余年如一日集中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于工作。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和暴躁。他不断地在解决问题，叮咛部属，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

作。左权同志这样工作，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从未要求过一天休息。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的诚实朴素、勤学苦干。左权同志在黄埔军校和苏联军事大学学习时，都曾名列前茅，得到优秀的成绩。他对自己谨严刻苦，埋头实际，不务虚名；对同志则虚心和蔼，对部属则以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精神，去帮助和带领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体贴他们的困难。

现在，左权同志牺牲了，他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的牺牲是光荣的，他的名字将要永存，他的功业将永垂青史，他的人格操守将永为我们未死者的模范。

我们以无限的哀痛悼念左权同志。我们要学习左权同志，要继承左权同志的遗志，要为左权同志报仇。我们一定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一定要达到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目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 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

自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提出整顿三风以来，在延安已造成热烈的运动，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现均卷入了这一伟大有历史意义的思想革命的洪流。这对于团结和巩固全党，改正干部及党员的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有莫大的作用；而事实上现在虽还处在学习文件的初步阶段，但已经在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效果。

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完成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是由朱毛红军发展起来的，长期的在毛泽东同志直接的领导下，但过去一个时期的主观主义曾经给部队一些影响，在我们部队里三风不正的现象是存在的，特别是“老子天下第一”，宗派主义的思想更为明显。抗战后部队的扩大，新的成分加入了我们的部队，加之统一战线的环境中，我们的部队是又被带来了一些非无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影响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的思想意识，所以在部队中必须热烈的来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更好的来团结巩固及改造我们的部队。

革命军队的干部必须能充分掌握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建立与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理论，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与经

验主义、肃清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对于我们的恶劣影响（这不是指吸收这些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克服军事理论与军事学习的落后，不让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存在于我们的部队中，使我们军队干部的思想能够正确的蓬勃发展起来。这对于克服目前困难，迎接将来光明，这对于进行目前游击战争与准备将来正规战争，都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八路军、新四军是我党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力量——武装力量。党把这些武装力量的率领委托于军队干部，因此军队干部在党面前是负有重大的责任，军队干部应该是最没有毛病的。若不如此，其给党的危害就必重大。所以在军队中整顿三风、锻炼党性，是更有重大的意义。

但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我们整顿三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力量；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必须立即纠正，学习文件与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的准备与进行。根据上述的要求与部队的特点及延安整风经验，对前方部队的学习文件与检查工作，除依照中宣部“四三”决定及六月八日指示执行外，特作下列建议：

（一）估计部队的特殊情况，在讨论文件与检查工作时，必须遵守下列的原则：

甲、不妨碍战斗及与战斗直接有关的工作，利用战斗空隙，特别注意利用青纱帐起后可能的战斗空隙。

乙、集中力量于主要干部（团营以上首长及相等的机关领导干部），务求在主要干部中弄通。连以上科员以上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均可参加，但以文化程度政治经验的不同而有所伸缩，不应平均看待。

丙、时间可酌量延长，务求深入，草率从事是不对的。

丁、在战士中、在班排干部中，因为政治水平关系，暂不学习整风文件，其教育照原来计划进行之。

戊、在整风文件学习期间，干部的理论及业务学习暂停，以便集中力量于整风学习。

（二）学习文件可采取以下办法：

甲、将文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干部，利用战斗空隙阅读，以同一机关单位或若干单位的干部组织小组，利用空隙讨论。

乙、利用轮训制度，调集干部专门研究三风文件，是最妥当最便利的办法，特别是平原地区，其他方式更困难，因此更应着重轮训制度。

丙、在适当时机，召集军区分区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三风文件与检讨工作。

丁、必要时可实行分级学习制，先在师一级弄好，然后到旅到团。

戊、对距离领导较远的部队，可组织工作团，工作团本身先行将文件研究好，然后派往各处帮助整风。对近距离的单位实施指导时，亦可组织工作团，办法是每研究好一个文件之后，即分赴各单位传达与主持讨论。

己、对每个文件的讨论，应在讨论之前，先在会议上作报告，传达文件内容，使文化较低、理解力较弱的干部能充分理解文义，懂得该文件的中心。

庚、在讨论文件时期，军区、师，可出版党内军内专门报纸刊物，讨论与解答三风文件中的各种问题，指定主要干部及能写文章的干部写文章，以补口头讨论之不足。

（三）反省与自我批评的运用：

军队干部在整顿三风中，反省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是需要

的，借口军队是集中的组织而取消反省与自我批评是不对的。然而军队是战斗的集中的组织，加之目前环境日益困难，反省是为了团结，为了提高战斗力，而不是涣散战斗力。因此，反省与自我批评必须注意遵守以下原则：

甲、干部反省与自我批评，可写在阅读文件的笔记中，上级首长应检查与批阅这些笔记。

乙、每个干部在讨论文件后，应写全面的自我批评语录，或自我鉴定书，呈上级首长批阅，上级首长不得借词推诿。

丙、在适当的会议上，例如在同级干部会议（如团长团政委会议、军政委员会）上，各同级干部应作反省与自我批评，及相互批评。

丁、干部反省与自我批评，在考虑成熟、经上级指示之后，应适当的正确的在一定的会议上向下级干部公开，这种正确的公开的自我批评，不会降低自己的威信，相反的会提高自己的威信。当然，过分的失去自信心，失去应有立场的批评，也是不对的，应当纠正。

戊、师、军区、纵队以上主要负责干部的反省笔记及自我批评语录，应摘要电告军委。

#### （四）民主与集中：

军队是集中的组织，然而这次整风没有适当的民主，仍是不行的。当然，军队中这次整风中的民主与地方党是不同的，关于在这次整风中，民主与集中的联系及批评方法的运用，可采取下列原则与办法：

甲、学习委员会与检查委员会一律不民选，由首长指定之。

乙、下级对上级有批评时，应允许之，不能禁止，但应采取下列方式：

1. 向上级首长写信批评某负责人，某领导机关，该上级首长应作解答。为发现错误与缺点，上级首长可发动干部写信。

2. 在适当会议上应允许批评，但当其批评是错误时，应立即加以解说，以免涣散军心。

3. 一切不负责的小广播，会外批评，信口开河，组织集体上诉等，均应禁止，以免削弱战斗力。

#### （五）检查工作：

在文件学习后，应举行工作检查，但前方战斗频繁，部队分散，要检查所有工作及一切工作的细目，是困难的；因此，把检查工作集中于领导政务（不是事务）和原则的方面。但马虎是不行的，务求得出新的经验教训和结论，而不是照例的经验教训与结论。例如：

甲、从整顿三风眼光来看本师本旅本团领导工作优点缺点错误等。但是这需要师旅团领导机关先作研究，做出一般结论，再开会征求意见，发动下级讨论。不由领导机关的先准备，让大家乱说一通，是不会有结果的；但不征求下级意见，不进行讨论，则检查工作也不会深入。

乙、检查各部门工作，如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干部工作等，使整顿三风具体化，军委与总政准备发出如何检查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中三风不正的提纲。

丙、在检查工作时，除上下配合之外，还需有内外配合，这就是需要征求地方党地方政府的批评与意见，由军队负责人自动的访问地方党政负责人，并重视他们的批评与意见。

#### （六）认识干部与鉴定干部：

这次整顿三风是改造干部的思想与工作，除干部自我鉴定与自我批评语录外，还须由上级作鉴定。在思想革命中，在工

作改造中，对于真正进步的干部应提拔之；落后顽固不灵者，应改变其工作；有希望进步并愿意进步的应帮助其进步，不能打击。

（七）在整风时期，各部应供给我们一些整风的消息，以便汇集编整刊登《解放日报》，每月至少须供给一次。遇有偏向发生，应随时报告，结束时向我们作电报的总结报告。

（八）本文件应与二十二个文件一并加以讨论。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周恩来关于国民政府军委汇报会 等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

毛主席：

长电最后复得情况如下：

(一) 最近军委汇报会，讨论浙赣问题时，何应钦、刘为章<sup>[1]</sup>公开说，这次浙赣路所以失败，是没有积极布置作战，并且是蒋<sup>[2]</sup>的命令，节节撤退，不进行战斗，原因是没有外援，避免损失。此令报军委，有各厅处长及顾问<sup>[3]</sup>均到会，似乎故意说给顾问听的。在另外一个汇报会上宣布，据延安联络参谋报告，延安有二十个团向南开，估计八路军有利用日本进攻乘虚挑衅，可能因有顾问在场，没有讨论。

(二) 根据上述情况，估计蒋的中心是在挑拨日本攻苏。其办法：

1. 故意不打日本。一方面向盟国表示自己不行，要外援；另一方面向日本表示不牵制攻苏。

2. 进行局部内战（如由宁马<sup>[4]</sup>挑衅）。一方面向日本表示忙于内战，不妨它北进；另一方面威胁盟国表示有投降危险。

3. 重庆市上又在宣传有与敌谈判的危险，袁良到渝，在报上公开发表，故意放出投降空气，使外交界又发生恐惧投降的心理。

我估计蒋目前不敢投降，也不敢放手内战，还是在此二者之间拖延，但对我局部挑衅、政治全面压迫，是不会放松的。

所以，目前大后方的情况，拖的可能是存在的。我们也应向此努力，力争抗战下去。但要彻底改善两党关系，巩固统战，和蒋直接谈判，现在尚无此条件和办法。

周 恩 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 注 释

〔1〕即刘斐。

〔2〕指蒋介石。

〔3〕指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崔可夫。

〔4〕指马鸿逵。

## 胜利在望，团结向前

——为纪念抗战第五周年而作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

朱 德

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已届第五周年，我们为这五年来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愈益接近最后胜利而感到无限兴奋。同时，我们尤感高兴的，当此我国抗战五周年纪念之日，我们已经看到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与一切反侵略人士，都在消灭法西斯蒂野兽与缔造世界和平的旗帜下亲密地团结起来了。我们也已经看到苏联红军与苏联人民，在英勇的担负着消灭法西斯蒂强盗这个光荣的先锋任务而获得的许多胜利。趁着这个机会，我代表八路军新四军五十七万战士，谨向我全国军民向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蒂的战士，致以民族解放的敬礼！谨向抗战五年来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正义而牺牲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向为消灭法西斯蒂野兽、拯救世界人类和平而牺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儿女，向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家为反抗法西斯蒂凶魔而牺牲的英勇战士，致以悲痛的悼念！同时，谨向一切先烈的家属及其遗孤致以亲切的慰问！

### 二

回顾一年来华北敌后的抗战，我们衷心感到欣慰，我们无

负全国同胞对于我们的关怀与厚望，我们无负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的同情与赞助。我们可以告慰全国同胞与全世界人士者，一年来，我们虽处在日寇愈益频繁而毒辣的“扫荡”下，我们虽处于铁路、公路、运河的包围分割及护路沟、护路墙与绵密的堡垒网的封锁下，我八路军新四军虽在长期得不到任何经费弹药接济的情况下，我们始终坚持着华北华中敌后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残酷“扫荡”，打破了敌人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阴谋。敌后抗战的大旗，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后胜利的标志，同时又是日本法西斯蒂死亡的象征。

抗战第五个年头，敌后抗战的环境是艰苦的，战斗是频繁而惨酷的，其经过情形，约可概述如下：

从去年七月间起，敌首先向苏北、山东、晋察冀、晋西北及大青山等地举行“扫荡”，中心首在苏北。我新四军所部与敌伪军各万余苦战一月，战斗达百三十余次，毙敌伪达五千余人。八月中旬，敌“扫荡”中心移至晋察冀，集八万余重兵，分十三路围攻，号称“百万大战”，以报复前年我之“百团大战”。边区军民奋起迎敌，冀中、冀南、晋西北等地我军亦遥相呼应，历二月有余，达八百余战，直至十月下旬始将敌击退，毙伤敌伪八千余人。与晋察冀的“扫荡”同时，九月中旬敌万余人“扫荡”冀中，下旬敌二万余人“扫荡”太岳区（晋东南）与泰山区（山东），虽经苦战将敌击退，而我损失亦非轻。十月底，敌“扫荡”中心又移至晋东南，兵力二万余人，战斗达四百余次，至十一月下旬战斗始告结束，毙敌三千以上。此役之黄烟洞战斗，我军千余对抗五千余之敌，激战竟日，伤毙敌军一千八百五十余人，而我仅伤亡三百五十人，造成敌我伤亡五点三比一之光荣战例。十一月敌“扫荡”中心在山东沂蒙区，先后兵力续增至

五万余人，敌酋畑俊六亲临指导，至十二月中战斗始告结束，毙敌六千余人，战斗四百余次。此后十二月至本年一月（一字不清），敌因忙于南洋作战，对我扫荡不得不暂时放松；然我为配合太平洋上的盟军作战，牵制敌人兵力，遂举行全面的主动出击。计晋察冀方面前后袭占敌据点百余座，破铁路公路六百余里，毙敌四千五百余人；冀东方面，消灭伪军三团、缴获长短枪二千余支；冀中、冀南平原区，先后克安平、文安、大城、成安、馆陶等五县；胶东（山东）我军一度攻入烟台；尤以晋东南之破击战，动员民众达六万余人，战斗百余次，毁封锁沟七百余里，铁路公路五百余里，歼敌伪二千余人。本年二三月间，敌复普遍发动全华北之“春季扫荡”，从山东到晋西北，从冀东到晋东南，纵横六七百公里之圈内，十万以上之敌军到处向我各个根据地进攻，并实行最残酷毒辣之毁灭政策。尤以在晋察冀之五台、阜平中间地区实行所谓“无人区”，见人杀尽，见屋烧光。兽蹄所至，寸草不留；以及在冀中、晋察冀、晋西北等地散布鼠疫，更属惨无人性。我军浴血苦战，备极艰辛，至三月末始将敌分头击退。四月初，敌四万余大举“扫荡”冀东；五月初，敌三万余大举“扫荡”冀中，五月下旬开始敌三万余大举“扫荡”我太平区（晋东区），战斗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六月二日，太行山区之清漳河畔的战斗，我总部左副参谋长亲临前线，不幸英勇殉国<sup>(1)</sup>，战斗之烈，即此可见。

计一年来，我八路军各部，与敌进行战斗一二，二一二二次，伤毙敌军五〇，三〇六人，伪军三三，五二六人（另俘虏伪军一七，九一四人），缴获步马枪一五，七一五支，轻重机枪三六二挺。我新四军各部，与敌进行战斗二，四二七次，伤毙敌伪二四，五一二人，俘敌伪五，四五八人，缴获步马枪一

三，七二一支，轻重机枪三〇一挺。而牵制于我八路军周围，经常与我作战之敌，达十个半师团以上（计二十七师团、三十六师团、百十师团之全部，二十六师团、三十二师团、三十五师团、四十一师团之大部，独立混成一旅团、二旅团、三旅团、四旅团、七旅团、八旅团、十五旅团、十六旅团之全部，五旅团、六旅团、十旅团之大部）；牵制于我新四军周围之敌，另有三个半师团以上（伪军均不算在内），约占敌寇侵华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而一年来我军英勇殉国将士，八路军为二三，〇三四人，新四军为六，七四五人；另负伤将士，八路军为四〇，八一三人，新四军为一〇，八五六人。在殉国的将士中，有我们赤胆忠心、机谋果断、为我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参谋长左权同志，有我们青年英俊的旅长范子侠同志，有我们忠勇坚决的纵队副司令员刘德明同志，有我们锋镝余生的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同志、赖国清同志，有我们少年杰出的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同志、杨宏明同志，有我们忠诚朴素的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同志、刘寿松同志、陈元龙同志，有我们尽瘁革命，十年如一日的新一军旅长罗忠毅同志，旅政治委员廖海涛同志，副旅长朱立文同志，代旅长林英俭同志，有我们五年来驰骋平郊、英勇善战的骑兵团长刘云彪同志，也有我们文化界先进、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何云同志等等。其余旅级以下干部，则不胜枚举。

当此抗战五周年纪念日，我们除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继续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参谋长、周建屏旅长、罗忠毅旅长、魏大光旅长、范子侠旅长、朱立文旅长、林英俭旅长、廖海涛旅政治委员、刘德明纵队副司令员、郭国言、赖国清、杨宏明、包森、李荣分区司令员，洪

涛、韩明柱、刘海涛、张襄国、鲁雨亭支队长，马耀南支队司令员，郭征、胡发坚、朱秋溪旅参谋长，邓永耀、胡一新、郭天顺、王育民支队政治委员，董天知纵队政治委员，杨忠、苏精诚、刘寿松、陈元龙旅政治部主任，罗化成、彭得大、鲍辉、王翼之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邦秀、钟蛟盘、刘子超、张德槐、邱积成，师及军区政治部部长，陈锦秀、叶成焕、刘云彪、丁思林、朱义兴、谢家庆、李和辉、尹国赤、白乙化、肖刚、王贤光、罗少卿、陈美、郭慕汾、余林、杨威、熊桐柏、王一民、周海彬、李子英、陈龙飞、李林等团长，林龙发、吕官印、刘礼年、陈文彬、曾庆洪、朱吉昆、刘振东、邹林、桂承志、陈德仁、刘文明、安有龙、郭猛、吴奎文、吴楚邱等团政治委员及所有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

### 三

这一年来，我们的奋斗牺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坚持着华北敌后的斗争，我们配合着全国友军的抗战，我们粉碎了敌寇残酷的“扫荡”，我们打击着敌寇掠夺的阴谋，我们每一分钟都在消耗敌人的兵力与资材，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让敌人得到片刻的安息。尤以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军发动主动的攻势，卒使华北敌军不敢任意抽调，使其益感泥足深陷之苦痛。这不仅在我国抗战中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在太平洋盟国对敌作战中，也成为有力的一翼。

还不仅如此，华北敌后抗战的坚持，在全国全世界人士面前，贡献出我们抗敌的宝贵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发动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是发动广泛的游击战，就是武装斗争与各种

其他斗争（如此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及工农青年妇女及一切人民的斗争等等）相配合，就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总括一句，就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持久战”的战略政略方针，我们执行了这个方针，并创造出光辉的范例。这不仅说明着我们五年来在敌后生存发展和抗敌致胜的基本原因，而且，当此世界法西斯蒂凶魔正伸出其黑手抓向全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个经验之于一切反侵略国家，不是没有意义的。

#### 四

抗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我们回顾过去、瞻望将来，从艰苦的路程中已可望见胜利的曙光，辉耀在我们前面。一年内打败希特勒，二年内打败日寇，这并非过高的奢望。但横梗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段艰难困苦的路程，还待我们作极大的努力。胜利是不可以坐待的，胜利是要以血肉去换取的。

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北敌后的军民，敢向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宣告：我们愿本一贯团结抗敌之精神，在我最高统帅蒋<sup>(2)</sup>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历千辛、排万难，继续坚持敌后抗战，继续巩固国内团结，并与一切反侵略国家的盟军携手并进。不仅在没有最后把日寇驱出鸭绿江外之前，即在我国抗战已经胜利之后，我们也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共同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与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新世界。但我们要同时向全国及全世界伸出我们希望的手，希望给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战的军民予以经费弹药之援助，予以坚持敌后抗战的应有援助。

没有英勇的斗争，没有充分的援助和补充，便不会有抗战



的胜利；没有亲密的团结，同样也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此日胜利的曙光在望，我们紧密的团结向前！

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根据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 注 释

〔1〕左权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反“扫荡”突围中牺牲。

〔2〕指蒋介石。

##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 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一) 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 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

---

\* 这个指示是王稼祥起草的。

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经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该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是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作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

（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

隔阂。

(七) 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 共 中 央  
一 九 四 二 年 七 月 二 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全国同胞们！全体将士们！

在抗战五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至诚向全国同胞、全体将士致民族解放的敬礼，向死难的志士致深切的哀悼，向负伤的将士致热烈的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以同样的心怀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战友们致民主的胜利的敬礼。

抗战第六个年头开始的时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是处在胜利的前夜。在民主同盟国方面，我们看见：苏联前线的胜利，后方的巩固，红军的英勇，人民的积极，英美同盟国军火生产的扩大，人民抗战情绪的高涨，海陆空军的壮大，第二条战线的积极准备，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成立，反侵略国家更进一步的大团结。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英美同盟国今年战胜希特勒及其欧洲伙伴，是有充分把握的。

在法西斯轴心国方面，我们看见：德国东线春季夏季攻势的破产，空中优势的丧失，德意人民的不满，被占领国人民的反抗，军火生产的下降，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战线上死伤的浩大，人力的不足。而德意的东方伙伴——日本，则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经济枯竭，运输困难，而其致命伤则在树敌甚多，无一获得解决。所有这些都说明，法西斯轴心已日益接近失败

死亡的末路。

世界战争中胜败谁属，已很明显，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我们应有此信心，应为这个目标而共同奋斗。尤感兴奋的，不仅胜败谁属已定，而且战后世界的动向亦有了明确的方针。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苏英同盟条约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规定战后的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侵略主义再有抬头的可能。凡此一切，都被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所共同承认，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拥护这些宣言，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之下，摆在我国抗战面前有两大问题，即：（一）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以达抗日的最后胜利；（二）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对战后中国的建设取得各党派的一致意见，以便更好的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就是时间与团结的两大问题。

在时间问题上，如果说苏英美三国今年有打败希特勒的把握，那么中英美三国明年便有打败日寇的把握，如果日寇敢于背信弃义的侵犯苏联，则强大的苏联远东军必能给日寇以严重打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到胜利的路虽则很短，却尚有极大的困难。日寇还在“扫荡”敌后与进攻正面，日寇还在挑拨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营垒中等待心理与侥幸心理还是存在，国共关系还是很不正常，财政经济的困难还是很大。抗战第六年虽是接近胜利的一年，然而也是抗战以来存在着更大困难的一年，稍一不慎，稍一懈怠，我们已往的成绩就有丧

失的危险。我们一定要警戒这个危险，我们一定要熬过这个困难的年头，方能争取快要到来的胜利！为此，必须全国同心合力，争取时间。中国人民已经与日本帝国主义苦战了五年，还须以排除万难坚忍卓绝的精神熬过今明两年。这一难关渡过，胜利就在前面。

在团结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既不是只顾一部分人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也不是以暴力没收土地没收工厂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总之，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国共产党声明：自抗战开始我们就是为着共同抗战并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远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上，就宣布：“（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五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并且把这些诺言具体化。诸如八路军新

四军的英勇抗战，共产党坚持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的合作政策，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上发布切合情况的施政纲领，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政策，并实行政治上的三三制等等，莫不是根据这些诺言的精神与原则而实施的。我们现在再一次声明，这些诺言的精神与原则，这些纲领与政策，不仅适合于抗战时期，而且适合于战后的建设时期，中共誓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为私利所昏迷的人们，才不分皂白，乱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破坏抗战，在抗战后企图独霸中国或赤化中国。当此抗战接近胜利之时，全国人民不但要有争取最后胜利的共同方针，而且要有战后建设中国的共同方针，以便建立互信，泯除猜疑，一致为着争取最后胜利与一致为着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各党各派合作的战后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sup>[1]</sup>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认为：为着上述目的，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按照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改善内政，使人民更踊跃的为抗战而服务，才能战胜日寇，并为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树立前提。

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定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消除等待侥幸的心理，一切为着抗战的胜利，一切为着反攻的实施而奋斗，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言论与行动是



应该取缔的。

同胞们！将士们！抗战五年了！五年中我们中国人民表现了无限的英勇、坚忍、刻苦、耐劳、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我们坚决的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继续这种精神，一直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设起独立自由民主繁盛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根据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 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 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在抗战五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致亲切的慰问与崇高的敬礼！

同志们！五年来，你们是很辛苦了！在全国抗战的配合之下，你们创造了很多的抗日根据地，你们坚持了艰难的敌后游击战争，你们拖住了日寇在华的一半兵力，你们组织了千百万群众，你们保护了华北华中千百万民众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你们表现了英勇奋斗和艰苦牺牲的精神。没有敌后游击战争，全国抗战便不能支持五年；抗战能有今天的局面，你们是有功劳的。

在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敌后斗争是会比过去更加困难了。敌人的“扫荡”会更加频繁，敌人的堡垒与封锁线会更加多，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会更加残酷，我们的地区可能暂时缩小，我们的经济可能更困难，我们的牺牲与损失也可能更大。

同志们！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我们要认识这些困难。但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绝不悲观，绝不失望，绝不屈服。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从来是在困难中生长的，从来是不

怕困难的，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我们今天的困难是胜利前的困难，党中央曾经指出过，今年可以打败德国，明年可以打败日本，现在再让我们向同志们讲清楚这个道理。

苏联英美与反侵略同盟国在今年内打败希特勒法西斯是具备了充分的条件。请看：

苏联与同盟国共有人口十五万万，德国与其他侵略国只有二万万七千万。

苏联与同盟国共有土地一万万平方公里，德国与其他侵略国只有五百万平方公里。

美国英国苏联等同盟国月出飞机九千六百架，德国与其他侵略国月出飞机三千九百架。

美国英国苏联等同盟国月出坦克八千三百辆，德国与其他侵略国月出坦克三千辆。

加之苏联红军与英美军队是保卫自己的国土，士气日盛；德国是侵略别人，士气日衰。苏英美人民抗战积极性日益提高，德国人民则悲观失望。苏英美后方巩固，德国本国及其占领地日益不安。苏英美最近又订了同盟条约，第二条战线在今年内建立，德国会两面受敌，德国东线战争已陷于僵局，苏联红军则不断的取得胜利。斯大林同志在五一节的命令中，苏联人民在他的行动中，英美在建立第二条战线的准备中，都预计在今年——一九四二年战胜希特勒。

我们在明年打败日本，同样具备充分的条件。日本兵力更加分散了，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虽然占了些便宜，可是到处都要兵，都要运输联络，力量不集中了。你们在前线不是看见四十岁的日本老兵及十七岁的日本娃娃兵吗？日本经济也更加困难了，你们不是看见日本兵士穿的吃的都比过去坏了吗？日

本不仅与中国为敌，而且已经与英美及很多民主国为敌了，向日本宣战的有二十四个国家。在打垮德国及其欧洲伙伴以后，英美就可集中全力对付日本，那时配合中国的力量，日本的崩溃与失败就会到来。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严重的，但是暂时的，牺牲是重大的，但胜利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全体同志的责任，就在熬过困难的两年，迎接将来的胜利。

为克服困难，为迎接胜利，我们应当怎样呢？

我们应当：坚定我们的抗战意志，反对悲观失望，我们要有信心，要相互勉励，要共同奋斗。

我们应当：坚持游击战争，时时警惕，刻刻准备，不仅军队英勇作战，而且帮助老百姓，组织民兵，到处打敌人，疲劳敌人，消灭敌人。

我们应当：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与自由，遵守纪律，不脱离群众，不浪费民力，要向老百姓做宣传工作，要救护敌占区的人民。要牢牢记住：假如老百姓拥护我们，日寇就无法打垮我们，假如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会失败。

我们应当：不仅与敌伪军作战，还要对敌伪军做宣传。敌军士兵也是工人农民，伪军官兵都是中国人，我们要向他们发传单、写标语，争取他们同情我们，反对敌人。

我们应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敌后战斗要与正面战斗更好的配合起来。

我们应当：在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中起模范作用，我们是共产党员，是革命军人，应当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不怕危险，不叫困难，率领大家奋斗到底。

我们应当：加强根据地内部的团结，我们与老百姓的团

结，老百姓间各阶层的团结，我们与友党友军的团结，军队中官兵的团结，军队与地方的团结，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团结，新党员与老党员的团结，遇到困难，大家一同克服，不要推诿，不要埋怨。我们的团结是最巩固的堡垒。

同志们！五年来日本强盗占领了我们很多的土地，烧掉了我们很美丽的村庄，杀掉了我们很多的同胞，强奸了我们很多的姊妹，抓走了我们很多的壮丁，我们的田园荒芜了，我们的亲戚朋友死掉了，万恶的日寇打破了中国人民原来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不能不忍受长期战争的苦痛。同志们！报仇啊！斗争啊！再鼓一把劲吧，一直把日寇全部赶出中国，恢复和创造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和平的繁盛的新中国！

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

熬过最后难关的两年，就会有最后胜利！

反对悲观失望！反对麻木不仁！

我们始终要同老百姓在一起！

大家团结起来，团结是战胜日寇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根据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 毛泽东关于山东的重要性问题 给刘少奇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

胡服同志：

（一）六月九日电早已收到，书记处各同志都看了，因在考虑，故迟复。（二）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三）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四）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

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sup>〔1〕</sup>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sup>〔2〕</sup>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五）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六）日寇正积极准备攻苏，时间有在本月底说，你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七）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领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八）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毛 泽 东

七月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杨得志、苏振华。

## 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

任弼时

在党校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什么没有在遵义会议前提出来？在这个决定发出以前，我们党内是不是也有党性的锻炼？我们说：过去在党内党性锻炼是一般地提出过，而不是把它当作特殊问题提出的。过去各地党校或训练班都有一门功课——党的建设，这就是党的教育和党性的锻炼；过去反对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也是党性教育，是在实际斗争中间锻炼每个同志的党性。我们可以说过去的党性锻炼只是一般地提出来，没有把它当作特殊的问题提出来。

那么，为什么在去年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到底有什么必要和原因？我想，党中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是偶然的。

首先，我们的党今天是处在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环境，是处在同日本战争的环境，又是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这种新的环境使我们党发展壮大。今天，我们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

\* 这是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的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的第一部分。



我们党今天是有武装的，而这个武装从党的历史上说是最大的，它有着五十万的军队。我们党在包括几千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这种政权是在我们党领导下面的。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大的力量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很重要的决定作用。这就是说：现在国民党要决定是不是还继续抗战？它不能不顾及我们党的态度，不能不顾及我们党的力量。如果它投降日本，那么，我们党是不答应的，会出来反对的。我们的反对可以获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并且可以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正因为我们党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这样重要的决定因素，民族敌人——日本法西斯，国民党里面的反共顽固分子，汉奸和其他反动势力，他们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我们的党。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为了对付我们党采用了许多办法。很明显的，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合作，另一方面尽力想办法削弱我们，想利用我们某些党部和中央意见的不同，关系的不好，想拉拢我们那些党部，来分裂我们党。国民党曾想分裂八路军、新四军，想把新四军拉到他们那边，或者想造成我们的军队与党对立。它采取许多办法打进我们党部和八路军、新四军里面来收买我们的人，瓦解我们。日本也是一样。这说明，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复杂环境和艰巨任务的前面，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其次，我们党在抗战以来和几年的统一战线当中，有了迅速的扩大，新成分涌进，已经由比较小的只有四五万人的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大的有八十万党员的党。这八十万党员里面有七十五万是新加入的，而且是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环境中加

人到共产党里面来的，成分相当复杂。新党员里面很多已经成为好的干部。但是，大批新党员今天很需要党更多的教育。同时，我们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我们的同志就是在被分成许多小块的地方坚持斗争，坚持长期的战争，建立了根据地。而且，我们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使我们党内容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比如：个人主义，独立主义，像文件里所举出来的那些倾向，那些不好的东西。这些情形也告诉我们党，今天更加需要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我们内部。我们党的任务是这样的重大，只有使我们党内部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向胜利。

第三，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抗战过程当中的一些严重的事件和现象正向我们警告。

党的历史上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张国焘的叛党。同志们都知道，他一直走到公开的反党，公开的成立中央与我们中央对立起来，分裂党的组织。这是很严重的反党的行动，后来公开叛党。张国焘这种分裂党叛党的事件，我们已在党内进行了教育。党的六中全会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报告里所提出的党内团结的重要，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

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有些重大的问题，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也有个别党部，或

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比如皖南事变以后，有人公开地说：马日事变又来了，我们要自己建立中央政府，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样政治上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对党是没有益处的。这表现出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组织上闹独立性，还明显地表现在某些做妇女工作、青年工作与政权工作的同志中间。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工作部门特殊一些，做这工作的干部突出一些，不大愿意受党的政策的领导。这些都是抗战以后发生的事。这些现象就是告诉我们党应怎样保证自己的团结。

附带答复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党性强不强表现在哪个历史时期上，哪些地方上？”我想这个问题提法不大妥当。虽然我们说党在某个历史时期是犯了路线的错误，如立三路线的错误，苏维埃后期的错误，但是不是说在这个历史时期，所有的党员，所有的干部都是党性不好呢？我想恐怕不能这样说。在路线错误的历史时期，使党的工作、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那个时期的负责人，负责的机关，在那里领导，决定路线，决定政策，他们不是依据情况来决定的，是党性不好的。是不是在那个路线下工作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是党性不好呢？那些党员干部为党的路线坚决奋斗，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坚决奋斗、英勇牺牲的行动是好的，这样的同志我想不能说党性不好。我们应该估计到每个党员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只有这样看才能正确。所以说，那些同志的党性还是好的，只是某些机关具体负责的人党性不好，不能说那个历史时期党性完全没有。拿地区来分，说哪个根据地党性不好，也是不妥当的。任何地区都有党性不好的同志，某些具体的人党性特别差，但不能说那里所有的党员干部党性都不好。譬如张国焘自

然是党性不好的，在中央没有指出张国焘路线错误以前，在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工作同志，党性都不好吗？不是的。因为当时那些同志是把张国焘看成中央的代表，把自己看成是为中央的路线而斗争的，我们不能说那些同志各个都是党性不好的。但当中央已经指出张国焘的路线是错误的以后，如果还坚持，那就不好了。我们也不能依地区来说山东的党或冀中的党党性不好，这是不妥当的。

为什么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就是我们看到了上面的一些原因：我们党是全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因素；我们党是处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已由小党成为大党；我们党的历史教训；统一战线中某些严重的事件。这许多情形使得我们党不得不在全党面前，把党性问题单独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历史教训我们，党内要团结。为什么在遵义会议的时候不提出来呢？那时提出是比较困难的，过去血的教训没有总结起来，而且在那样的战争情况下也没有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提出来也不能像今天在全党起这样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并在战争的环境中又发生了许多的事实，所以有特殊提出来的必要。

这个决定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是组织问题，有的同志说是思想问题。我想就决定的本身来说，是组织问题又是思想问题。这决定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上面讲的一些客观的、主观的和历史的原因都告诉我们，今天党的统一集中，全党服从中央，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统一的集中的党，就不能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任务。今天特别要求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也就是为着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

们的党；今天强调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党成为坚固的整体，能够担负起当前的任务。这的确是偏重于组织上的问题，但又是思想上的问题。是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呢？我看是偏重于组织思想方面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这样的党，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更加需要组织上的团结，而且从思想上告诉我们的同志今天党内团结特别重要，因此这这也是一个思想问题。我们党过去对思想方面的领导是不大重视的，甚至有时是忽视的，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前的时期。自从去年五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以后，中央政治局对于思想领导问题特别引起了注意。中央政治局在自己的业务里规定：思想、政治、军事、党务、组织这几项，把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从去年五月以后，注意整个党的思想方面的总结，研究了一些问题，党性问题就是在这许多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所以把它形成决议，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重要文件。在这一决定以后，中央又陆续发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毛主席作了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这些决定和报告都是解决思想问题，强调的是理论与实际联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而增强党性的决定则强调组织思想的问题，也就是这一决定的中心思想和中心内容。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对于我们党的建设起了什么作用？

首先，这个决定是总结了我们党二十年来对于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二十年来，我党和资产阶级从合作到分裂，又从内战到合作抗战；二十年来，我党组织和领导了各种武装斗争，参加了北伐、内战和抗日战争。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生长起来的，这就是党在建设上表现特殊的地方。这

个决定总结了这个过程当中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来巩固党的团结。总结这样的经验教训，对今后我们党的建设有其特别重要意义。

其次，这个决定发出后，对于全党是起了教育的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一些像过去那种政治上随便发表意见同党的主张对立的现象，最近是没有看到了。这表现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统一了。在组织上也是一样，那些闹独立主义倾向的情形比较少了，能够把局部利益服从于党的整个利益，这表现了党的进步，表现了党比过去更加统一巩固一些。就拿延安来说，去年八九月以前，许多事情要统一似乎还很困难，八百诸侯，你肯了他不肯，他愿意你不愿意，这学校和那学校合并也觉得困难，统筹统支很不容易办。在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事情比较好办了，许多事情比较统一，解决问题也比过去容易，不像过去那样困难了。这些都说明了同志们在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思想上起了变化，有了进步。

第三，这个决定发出后，对这次的整风学习运动也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这个决定加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其他决定的发出，引起了全党对于思想问题的注意及思想方法的学习，展开了今天这样广大的全延安全党的学习运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一文件，特别在整顿党风的学习中是有其特别重要意义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 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 几个具体问题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

彭 德 怀

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种新的形势，现对几个具体问题说明如下：

### (一) 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形势

平原地区敌我斗争空前紧张尖锐，我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某些地区性质上已起了变化，成为游击根据地。其主要标志是我大块根据地被敌逐渐分割成为许多小块。敌依据其密布的公路、碉堡、封锁沟、墙，随时可以对某一地区进行“扫荡”；而我军在敌之点、线、沟、墙封锁之下，大兵团活动受到极大限制，甚至于根本成为不可能。因此，必须在平原地区结束运动战，进行分散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这种新的形势，在平原地区是长期的，甚至在某些平原地区，不到战略反攻形势下，不可能恢复像过去的大块根据地。过去，敌人是稀少点线的占领，尚未达到对我严密分割；这时，敌我都有了一套相当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可以有系统、有步骤及相互配合地同时作正规的各种战斗。今天，我们进行这种



统一与规模较大的战斗已增加极多困难。但如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时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仍能进行一定限度的各种斗争。武装斗争虽然是主要的，但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亦有其一定的作用与地位，且必须配合武装斗争，才能保卫和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如果不承认某些平原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性质上已经起了变化，那就是不承认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应该改变，无疑的也就不能及时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与发展，来采取新的方法方式进行斗争，结果必然使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不能坚持，而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抗日游击战争在新的形势下，仍能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仍能存在公开的武装斗争，并且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亦必会走到另一错误方面，即只保留极少数的党员，完全转入地下，处于非法的地位，实质上是放弃可能的武装斗争，放弃平原的坚持，而走向全部撤退。假若如此，则山岳根据地的坚持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造成严重的局面。这将使敌后斗争走上极其困难的道路。

## （二）坚持平原根据地与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条件

敌兵力不够分配，只能对我实行分区“扫荡”“清剿”，不能同时向我全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即对我某个战略区发动“扫荡”“清剿”，亦须分区进行。这是因为敌在华军队之实力，与我比较，并非绝对优势。敌人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技术与战术方面，其政治素质随着战争的持久而降低，战斗力不如以前，军队数量亦较前减少。但由于敌人掌握了交通要道，所以能够在一定地区内集中相当大的兵力，取得暂时优势。这种优势是有时间性与地域性的。以敌人兵力衡量，不可能在全



华北普遍地取得这种优势，即在平原地区，亦不能同时取得这种优势。这样，敌人虽然对我一定的地区可以进行极疯狂的“扫荡”，但在另一些地区，兵力又感不足，顾此失彼，予我军有可乘之机。这是敌人进行战争最苦恼的事，且是它不能克服的弱点。我应及时地掌握敌人这一弱点，相互密切配合，争取主动，有力地打击与消耗敌人。这是完全可能的，且是事实证明了。这是我能够坚持华北，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的主要根据与有利条件。

敌人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残酷的掠夺，军队纪律的败坏，更易激起我全民的反抗，造成深刻的民族矛盾。这一矛盾非但不会降弱，相反的，将随敌人各种压迫的加紧而加剧，屈服的只是极少数，这亦是我能坚持敌后斗争在政治上的主要根据与有利条件。

我在华北，军事实力上虽占相对劣势，但在政治上却占绝对优势。所谓敌强我弱，只限于军事方面。因敌我军事实力的不平衡，目前难以甚至不可能在军事上给敌人应有的或决定性的打击，只能采取积极的游击战争，对敌弱点给以必要的打击，从各方面去削弱敌人，达到熬时间的目的。这种分散作战的形势，在平原较山地更为困难；山区根据地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集中较大兵力，予敌人某些歼灭的打击（这种形势今天在山地亦较前大大的减少了）。敌我军事实力虽是如此，由于我们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所以不但在山区根据地可以坚持，即在平原被敌分割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在不违反政策、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亦肯定是可以坚持的。

平原根据地局面较为困难，斗争更为复杂，这就要求平原地区的领导同志更细心地研究具体对策，一定能够熬过时间，直到最后胜利。

### (三) 新形势下的游击战争

1. 由于敌之兵力不足，故敌人对我之“扫荡”与“清剿”，在地区上、时间上表现的局限性，其特点为此起彼落，此落彼起，具有极大的变化性。我们必须善于掌握具体的变化，及时灵活地改变某些过高的斗争策略，抛弃死硬公式，进行灵活的游击战争，配合各种斗争方式，才能顺利坚持，得到胜利。

2. 全华北领土我占三分之一强，绝大部分是落后的农村，一般地说来，我能自由回旋行动，无多大拘束，与敌作战可以采取无固定战线（有固定的地区）的游击行动。虽有的地区，敌军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亦不可能消灭我们。敌人点线的飞速发展，增加了对我“扫荡”的某些便利，但这也增加了敌人的困难和暴露了敌人的弱点。如兵力愈益分散，更难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对付我们。兵力不足是敌人先天的弱点，这一矛盾不仅现在存在，即是将来，敌人也无法解决的。

3. 游击战争必须要有根据地，否则游击战无力，且难持久。今天无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实质乃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作用仅等于军事别动队或武装侦察，这将使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脱节。游击队的斗争，必须与群众的政治、经济要求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群众的拥护与援助，才能有力坚持，才能持久与发展，才能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务。认为在平原应以合法斗争为主、隐蔽斗争为辅的意见，实质上是不承认游击根据地的存在，取消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其结果必然是退出平原，这绝不能称之为坚持平原，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意见。

#### （四）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问题

在日本的法西斯刺刀与殖民地政策下，不应幻想存在合法斗争为主，因为客观上不存在这种事实。过去有些地方自己解除民兵武装，组织黑团；取消抗日政府，代以维持会，这都是严重的错误。在某些地区，根据具体情况，估计敌兵久占，我实无法再坚持公开的斗争，一切公开的抗日组织亦不能继续公开存在，我们必须转入地下或撤退。在此情况下，我们应预作准备，设法打入伪组织，掩护抗敌工作的进行，侦察敌人，收集情报，协助公开的武装斗争。利用伪组织的两面政策，对敌是公开的、合法的，对我是秘密的、非法的，但两面政策是利用敌人所许可的合法的组织形式，进行欺骗敌人的非法斗争，因此，这并不是合法斗争。如果错认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在政治上是麻痹了自己，在工作上也会弄出乱子来。但合法斗争亦非绝无可能。如利用敌伪矛盾及敌人的怀柔阴谋：敌在某一时期、某一地点（敌占区）为麻痹我们，故意惩戒民愤极大的个别汉奸时，我即去领导人民请愿，反对最坏的奸伪，利用这种办法打击其他汉奸，使其觉得没有出路。敌寇如不允许，我则揭破敌人假面具，增加民族仇恨。这样做是可能的，是必要的。但一般说，足资我利用为合法斗争的机会是很少的。敌人是要灭亡我们，奴役我们，绝不会允许什么合法的反日斗争，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陷到机会主义的泥坑里。

关于打入一切伪军、伪组织中工作问题。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绝不应放松，要利用一切可能去进行，目的在于争取伪军，利用伪组织，对敌欺骗应付，对我诚恳帮助。这种打入敌人合法组织里的工作，不能叫做合法斗争。因为敌人绝不会允

许抗日分子进入其统治的武装力量与组织里进行抗日工作，所以对敌伪是非法的。至于将自己的抗日武装改编成伪军的意见与做法，那是把自己合法的抗日权利取消，换得不合法的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思想与做法发展下去，可能走到所谓“曲线救国论”的危险道路，必须加以反对。已在敌占区建立的小型秘密武装，直接依靠于群众中政治觉悟最高的分子和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是可以存在的。他们可以采取隐蔽的伪装方式，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镇压汉奸；可以减少群众的负担，打击敌伪的骚扰、苛索与威胁，使敌伪改变某些态度。所谓隐蔽斗争，即是不要大张旗鼓；所谓伪装斗争，即是减少用八路军或公开抗日政府的名义出现，缩小自己的目标，以便利我进行斗争。

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方式是复杂的，是各种斗争密切配合的，主要是公开的武装斗争与秘密的各种斗争的结合。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 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 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

刘 少 奇

今天来说，对我们最要紧的，是如何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没有现在，就没有将来。我们的将来，只有从现在就加以准备，只有从现在发展下去。要把我们现在的工作，今后两年的工作，与将来的反攻斗争，战后新中国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要在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的观点上，同时也在准备将来、准备反攻与战后新中国斗争的观点上，来进行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除开华中局扩大会所说到的一些以外，我现在特别就准备反攻与战后斗争的观点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反攻以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斗争，坚持原有的根据地（这必须与开展敌占区及接敌区的游击战争密切联系起来），无须主动进行对敌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我们的主力就无须大的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而以加紧整训教育为主，提高其质量，以便将来在发展扩大时有必要的良好基础。如果我们在反攻中需要大批的新兵补充主力，需要主力尽量扩大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组织与训练好大

---

\* 这是刘少奇给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的信的后半部分。

批的民兵自卫军及地方武装，并保存这些后备力量；在政治上作动员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将来能大批的动员（现在无须经常动员，以免引起人民的厌倦）。

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破敌人的严重“扫荡”，特别在华北、山东、上海、南京附近要准备在反攻时期出现比今天更加严重十倍的敌情。同时，要准备在反攻中较大的进攻的战斗，准备抵御可能发生的反共军进攻的战斗。

第二，如果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的政治动向，是决定战后新中国动向的基本力量的话，那末我们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就特别要注意吸引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在政治上倾向我们，并且能坚决地拥护我们，和我们一道共同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

第三，如果根据地内的人民负担过重，超过了人民所能负担的能力，足以破裂我们与根据地内人民的联系，足以引起根据地外的人民畏惧与拒绝我党我军的领导，足以引起人民对共产党领导战后新中国的怀疑的话，那末我们就要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把负担减轻到中央所指定的限度（全部负担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百分之三）以下，并须向人民作充分解释：这是战争期间的负担，在战后就要减少。如果人民负担的能力，不够养活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应实行严格的精兵简政，情愿少要些人员马匹，号召干部艰苦生活，实行严格的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各级财政机关对粮食的注意太不够，粮食浪费太大，其实关系人民生活最大的是公粮问题，而不是税收问题，我们收入最大的是粮食，浪费粮食是最大的损害民力与破坏我们的政治影响），颁布严格的法令，来惩罚那些贪污浪费公款公粮及乱征民间佚马者。同时要培养民力，注意组织与改善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要显示

我们区域与敌顽区域人民生活的本质上的区别。这件事不独要影响我们今天的斗争，而且要影响我们在战后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对这件事情的不注意，我们必将自食其恶果。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这在全党全军中必须进行深入解释和动员，为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光明前途与新中国的创造而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物质资财。对民力、对物质资财的不爱惜，无异于对党对革命不负责任，无异于犯罪。

有的部队做生意赚钱，流弊百出，应该停止、改正。但部队自己生产蔬菜、烟叶、麻、棉花及开厂做鞋子、织手巾等，是能够解决部队困难的。华中各部队机关要切实仿效。

第四，如果在根据地内很好地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等，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足以影响与推动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的话，那末我们就要下决心，务必在今后把民主政治、“三三制”等切实推行，非达到可能的高度不可。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缺少民主的训练，对于民主政治的精神、实质及方法，党内党外多数的人都是不大懂的，因此，我们的民主没有充分见之于实际。政府机关中，以及部队与民众团体中，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作风还极端严重。不少的干部是站在民众之上，而不是站在民众之中；他们是以人民的上司自居，而不是以人民的勤务员自任；他们是越权垄断包办一切，而没有尽到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他们自以为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是听命于人民、以民意为依据（不要与尾巴主义相混淆）。这些现象，是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民主政治生活之很大的障碍。不肃清这些现象，在根据地内组织很好的民主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在根据地内领导政权许多年，还不能建立一种像样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秩序，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在全国人民中、在战后再来谈民主政治，那就会引起人民对我们以至对民主政治的怀疑，以为只是在口头上叫的而不是在实际上实行的。而且这也绝不能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群众。

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我们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民主的教育和锻炼的缘故，是党风不正、宗派主义严重存在的缘故。只要我们有很好的民主的教育和训练，整顿党风，有这种毛病的党员，大多数是能迅速改正的。因为他们愿意学习与进步，但必须经过认真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才能改正过来。

因此，我们必须在党内外及人民中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应该指定同志去研究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法国的、美国的、孙中山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研究各国的宪法，写出必要的文章、小册子及教材。我在华中局讲的《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等，也可拿到党员干部中去讲解和研究。要号召我们同志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学习民主，在各阶层人民中去运用民主，并总结各地实行民主的经验来教育党员与群众。还须制订出一些关于民主的法律（如各级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代表会议的规则，处理各种案件的手续等），规定制裁那些违反民主、侵犯民权（人民民主权利）的官员的办法等。在党内，对于违反民主的党员，要进行批评、斗争或处罚。在人民中也应进行广泛的民主教育，解释各种法律等。各级宣传部教育科，应在关于民主的研究及宣传教育工作中进行必要的努力，多写文章、小册子，多到各种会议上去作报告。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工作同志，各级领导同志，更须加紧对民主的学习、修养和锻炼。总之，我们



要下一个决心，使党员懂得运用民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真正地推行民主及“三三制”，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

庞友兰说，共产党的下层同志能照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话办事，一定得天下。那末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这样呢？是能够做到的。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没有做不到的理由，我们一定要做到。做到了，我们就“一定得天下”；做不到，就不一定“得天下”。这件事对我们的关系是这样重要，是能否“得天下”的大事。就是地主阶级里面的人，也是这样来警告我们的，我们能不重视这件事吗？能让现在那些恶劣现象继续存在吗？能不努力研究与学习实行民主吗？为了要“得天下”，即为了革命的胜利、战后新中国的创造，全体党员应该在根据地内创立模范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新秩序。这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这能吸引全国人民来赞成我们、反对顽固派，巩固根据地内人民和我们的关系。

第五，如果根据地内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的提高，是我们坚持抗战与创造战后新中国所依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就要用一切努力来提高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这在华中似乎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工作，已经相当普遍地改善了工农生活，并组织了几百万群众到农会工会之中，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工人、青年、妇女、儿童，则还大部分没有进行组织，自卫队的组织与训练，还须作极大的努力。某些地方的群众如果还没有组织与发动的话，都必须全部地使他们组织起来。当着群众已经发动，并已初步组织起来和达到了基本的经济要求之后，就应把对群众的教育工作提到第一位，就应为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而进行一切的努力，就应注意经济主义的狭隘思想在群众和干部中的发展。估计今年秋季减租是无须费大

气力就能做到的。群众团体在秋季减租后，除经常注意保护群众的日常利益而外，要建立各种相当固定的组织与制度，以巩固群众的团结。在这时候，必须对群众进行广大而深入的教育工作，也有时间与可能来大规模地进行群众的教育工作。在许多地区，在今年秋季、冬季及明年，你们应指示各地方党及群众团体大规模地进行社会教育与国民教育，特别是对群众中积极分子的教育。目的是为了<sup>1</sup>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主要还不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但国民学校的教育及以后的社会教育，提高文化仍是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思想上巩固这些群众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不致因为某种变动与挫折而动摇群众对我们的信仰。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政府的教育部门、群众团体的干部及地方党，应有大的动员，应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应密切配合，并应加强青年团儿童团的工作。要注意青年、儿童的教育与学习。要准备好教材，拨出经费，由各群众团体直接领导，在乡村中创立许多民众夜校，并须多办国民小学与中学。群众团体的干部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应自动去当夜校的教员，并应派遣必要的专门教员，派遣干部去加强政府教育部门的工作，同时大量吸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加以训练去办教育和当教员。必须使根据地内数百万基本群众及数十万儿童、青年都受到深入的教育。这是一个异常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党与政府必须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来进行。

现在我们不能用土地革命来吸引群众跟我们走，但我们必须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及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去吸引群众紧随着我们。如果我们能在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吸引了数百万基本群众与青年儿童，使他们不论在什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跟随我们走，那我们就要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件工作，是有如此伟

大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进行。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

有教育意义的群众会议，应多召集。各级负责同志以及各地最高的军政负责同志，都必须密切注视群众的情绪，必须设法经常去参加群众的会议，亲自去解答群众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亲自去与群众建立亲密的联系，互相认识，而不可将群众中的事情完全委托下层同志去处理。

各地党政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去检查各种学校（小学、中学、夜校等）的教育内容，考查教员，掌握教育方针与政策，并经常亲自去向学生讲话。你们要知道，即使是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特务，如果他们对青年儿童进行了深入的“教育”，他们都能驱使成千上万的青年为其拼命，难道我们有真理并有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不能在深入的教育中团结数百万青年和我们一道为新中国奋斗吗？为了这个目的，大批的共产党员应到教育机关去服务，应学习如何去教育群众与青年，应经常总结经验，应首先训练大批的教员，我们党政群众工作的干部也去兼任教员。

报纸杂志亦应改善，亦应提高其作用，亦应成为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亦应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

中央在“七七”五周年纪念的宣言中提出了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与顽固派企图造成少数人专政的中国是直接对抗的。应拿这篇宣言到各阶层人民中以各种方式去展开完全民主的讨论，去深入地宣传教育群众，去团结群众在我们的口号（民主的新中国）之下，去详细解答群众所提出的关于新中国的各种问题。有时甚至可用完全民主的方式在群众中进行投票测验。务必在今后两年间，在根据地数百万群众中，对于战后新中国，在思想上、在实际生活上准备好完全

巩固的基础。

第六，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之中，如果中间势力、中间阶层的动向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的話，如果这些中间势力的动向成为决定战后新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話，那末，我们就应该以极大的注意和切实而广泛的工作去争取中间势力站到我们这一方面来，或在斗争中守善意的中立。而且我们的目的，不只要中间势力在今天能对我们守中立或倾向我们，主要的是要使他们在战后为新中国的斗争中能赞助我们或善意中立。我们今天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主要是为战后斗争做准备的。目标应该放远些。

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及对顽固势力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过去已经说得很多了，故在这里不多说。不过我们仍须经常提醒各级干部，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执行政策中注意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修明政治，生聚教训，整军经武，严修武备（各种武器资材弹药的聚集），为了坚持两年斗争须要这样，特别为了准备反攻及战后的斗争更须要这样。敌人的“扫荡”在华北是很严重的，故在华北的工作方针更须多照顾到如何坚持两年斗争的问题，一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如何渡过后两年两年的问题。在华中则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敌人的“扫荡”似乎没有华北严重（过去如此，以后不知怎样）。我估计，如果我们在华北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扫荡”与“清乡”，如果敌人在华北不能“剿灭”我们，那末，他们就不能照样来“清剿”华中我军了。在这一点上说，华北八路军英勇艰苦地坚持斗争，是极大地帮助了华中新四军，是与华中新四军的命运完全相联的。正如华中新四军在反磨擦中的胜利，极大地帮助了山东河北的八路军一样。很明白，如果

八路军在华北不能坚持，则华中新四军便将立即受到敌人最残酷的“清剿”。我估计敌人或许不能照在华北一样来“清剿”华中新四军，因此，在华中的工作方针，就有更多的可能照顾到准备反攻及准备战后的斗争。一切工作就有可能更多地放在准备将来斗争的目标上。这是我的一种想象，不知客观事实的发展是否能如我所想象的这样。

为了实现这一切，目前必须经过一个关键，就是经过我们的中下级干部。而中下级干部的状况，则不是令我们完全满意的。他们还很幼稚，没有成熟，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党的政策，作风也有很多不正的。这是我们目前一个很大的弱点。因此，用心来逐渐解决这个问题，有极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一下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不解决，一切工作任务又难于完成。因此，除开办党校、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整顿三风等外，还必须设法派遣一些较强的干部去任县区工作。还必须在某一个工作任务提出以后，在干部中作充分的动员与教育，使干部理解之后，再去进行工作，并由高级负责人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通过总结工作来教育他们。对于某些专门的问题（如战略策略，战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等），负责同志应多作讲演，来提高我们的干部。应特别注意对直接领导部队的干部（团营连）及地方党政民工作的干部（县级区级）的教育与讲演。因为他们是直接实现党的政策与执行任务的人，是直接联系人民与士兵的人，如果他们不懂得政策，不了解任务，工作是无法做好的。而过去对他们的教育又太少，故许多问题是由他们发生的。因此，轮流召集他们来比较系统地谈清一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提高他们，就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过去我们许多报告都是对直属机关干部作的（这固然也要），以后应多向

---

下层干部进行教育，才能解决问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 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 给刘少奇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胡服同志：

已有电午养收到，兹复如下：

(一) 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七七致蒋<sup>[1]</sup>贺电有抗日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解，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这些将来还会有的，我亦正在争取。

(二) 我们现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待国民党好转更确定时，我再要求他通令山东、华中部队，停止向我磨擦，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三) 国共关系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sup>[2]</sup>的表示，最近恩来<sup>[2]</sup>见蒋谈的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sup>[3]</sup>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

(四) 我党七七宣言及整顿三风运动在各方有很大好感。

(五) 七月六日复你一电收到否。

毛 泽 东

七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2〕即周恩来。

〔3〕即刘斐。



## 从现在去认识过去 从过去来了解现在\*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聂荣臻

恰恰一个月以前，在党的生日的纪念会上讲了些党的问题；今天又是我们党军的生日，应当讲一些党军的问题。但是讲什么呢？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好了，就是所谓“感想”；也就是说我讲的问题不是那么系统化和原则化的。关于历史上的分段，也是我为着叙述的方便而分的。这是我在正式讲话前应先说明的几句话。

今天是我们人民军队十五周岁生日，也就是南昌暴动十五周年的纪念日。

南昌暴动是我们党首次领导的武装起义，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与继续中国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过程中，北洋军阀已经被打倒，革命运动蓬蓬勃勃的发展，革命军队已经取得武汉和南京。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妥协，背叛革命，转而向工农劳苦大众进攻，违反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志愿，要想独吞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卑鄙的向着工农大众说道：“这里没有你们的份，赶快走开吧！如果你们不重

---

\* 这是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直属机关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的讲话。

新当奴隶，那末就请上断头台！”于是向着工农大众和革命领袖开枪了，白色恐怖笼罩了广州、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区域，使大革命遭受失败。为着继续革命运动，反对反革命的摧残，当时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和叶挺所领导的第十一军之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和第四军之第十师的一部（三十团）就爆发了有名的南昌暴动。这次暴动是正确的；用武装起义来回答反革命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进攻，是必要的。但在这一运动中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许多原则的错误，所以南昌暴动最后是失败了。革命军队从南昌打到东江，在潮州、揭阳、汤坑、流沙诸次战斗中遭到了最后的失败。那时军事上政治上发生许多错误，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的确是有些“蠢”；我自己也是当时“蠢人”中的一个。可是正因为有那时的“蠢”，今天才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同时南昌暴动失败以后，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却从新形式中成长起来，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朱毛红军。

在朱、毛大旗下的红军就是现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前身。朱毛红军是在革命低潮时产生的，是在极端困难、残酷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朱毛红军先后由三支力量会合而成：第一支力量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一部分武装，就是现在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同志所领导的第二十五师——当时该师在韩江上游三河坝牵制向我们侧后进攻的敌人，适值我军主力第二十四师与第二十军经潮汕与广东军接触，汤坑一战后，接着潮州被敌人占领，把二十五师在韩江上游与主力隔断。这时朱总司令就负责指挥二十五师。由于整个军事上处在失败的地位，南昌暴动的武装，一部分参加了东江有名的海陆丰农民暴动，一部分由朱德率领到赣南、粤北、湘南。在南昌暴动前，朱总司令是没有部队的，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才从苏联回来，做了许多统一

战线的工作，如开始说服四川军阀杨森来参加革命战争，后来到武汉朱培德处（因同学关系）办军官教育团训练干部，实际上没有兵权。南昌暴动时，他只带领叶挺部一个连打先锋，广东一战后，就指挥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作战。当时该师既不是朱总司令直属的部队，又是“残兵败将”，干部大部伤亡或离队，队伍七零八落，几至不能收拾，可是朱总司令与现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同志（那时在第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艰苦的把部队维持下去。朱总司令大公无私地对部下说：“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但一定要胜利的，一定是有希望的；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这支军队虽然是国民革命军，是进步的军队，有政治工作，有一些党员当干部，但基本上仍是旧的雇佣制度的军队，在那种艰险的环境下是不容易维持的。部队从赣南拖到北江，没有衣穿饭吃，没有子弹用，朱总司令曾经化名“王楷”，借旧朋友关系暂编成范石生的一个团，重新搞了些服装、军饷、子弹。广州暴动失败后，朱德发动湘南起义，随后又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合。

另一支力量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武装。当南昌暴动时，毛主席穿着草鞋，背着包袱，到湘赣边界组织农民秋收起义，号召以武装暴动，来回答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同时在湘赣边与预定参加南昌暴动的一部分力量——“警卫团”会合。该团是在国共分裂时才组织起来的，其中只有少数干部是党员。在南昌暴动后，无法与主力会合，乃经铜鼓、修水到湘赣边与毛泽东同志会合，配合了湖南的农民秋收暴动，形成南昌暴动失败后的另一支武装。后来朱、毛所率领的这两支力量会合，到了井冈山。

第二年，第三支力量起来了，就是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

暴动。彭德怀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入党，当时他是湖南军队的一个团长，以长于治军闻名。在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很厉害的时候，由于他对国民党统治阶级的不满，与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于是领导兵变，配合了平江的农民暴动。最后率领部队也到了井冈山。

这三支力量成为朱毛红军的基干，首先在湘东及湘赣边界挂起了红旗，支持艰苦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多次的进攻，发展并巩固了湘东及湘赣边——井冈山根据地。

这里，我们应当了解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几支红军力量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南昌暴动和湖南秋收暴动失败后的余部，正处在白色恐怖到了极高点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当时朱、毛、彭等同志，如果不是有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与宇宙观，认清了革命的发展方向与前途，是很难支持下去的。那时环境虽然很黑暗，力量虽然很微弱，但他们没有丝毫的动摇，却抓住这点力量来发展革命运动。在白色恐怖高涨时，有的人消沉不干工作，有的人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声明脱离党的关系，但彭德怀同志却举行革命的“兵暴”来反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些领袖创造红军是如何的艰辛，对革命是如何的坚决。这告诉我们：每个革命军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能够在革命力量占优势时冲锋陷阵，摧毁敌人，猛追敌人，而最可贵的与真正的勇敢还是要在极端困难与危险的时候，能够拿出主意来掌握部队，毫不动摇地去战胜敌人。我们的红军创造者朱、毛、彭诸领袖就有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各级干部，在危险临头时，不应该把自己“坚壁”起来，穿上便衣躲避斗争；不要在困难时说：“你不要找我，你自己去干吧！”须知红军的创造是没有多大“本钱”的，怎样把这点“本钱”保存与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警惕的。

这是红军艰苦缔造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中，朱、毛巩固与发展了红军，战胜了井冈山上的困难。井冈山给我们许多好处，但也给了许多坏处：那连绵险要的大山，的确是不容易攻取的阵地。可是山中人口太少，缺少粮食，而敌人又严密封锁，不断层层围攻。如何来打破围攻，克服困难，先决条件就是要把农民变成军队，把残余的旧军队变成新军，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强大的红军。当时在红军的领导上，是用最高度的民主方式，用最广泛的民主生活来根除旧军队的习气；使每个人都了解红军是自己的武装，了解革命是自己份内的事。因之在当时，有许多事情并不是命令行事，部队首长与党代表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权力，而士兵委员会在连队中却成了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问题经士兵委员会决议通过后，就须执行，没有通过就不能执行，甚至士兵委员会可以决定处罚干部。拿今天看来，这岂不是极端民主吗？的确是极端民主化。但当时没有这种宽广的民主生活，就不能彻底推翻旧制度旧习惯，就不能用群众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启发革命的积极性。当然今天我们部队中是不需要而且也没有这样大的民主范围的。其次，就是执行官兵平等的原则，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平等。朱总司令也一块和士兵一样从山下挑谷上山，所以总司令十多年来唯一的私产就是一条扁担，上面还注有“朱德扁担”字样。因为那时只有保存一条扁担，才能很方便的与战士下山去担粮。拿今天来看，这又岂不是平均主义吗？但在当时这种平等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最高干部以身作则来克服当时的一切困难。到冬天穿不上棉衣，下了雪很冷时还穿着单衣，也没有被盖。为了严格管理物资与大公无私的分配物资，所以一衣一被都要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哪个人须领一件衣服，哪个人须领一条被子，都得要经过毛主席亲

手批条子。如果拿今天看来，岂不是又要给他加上一个事务主义的帽子吗？但当时毛主席任红四军党代表，对于爱护部队、干部与调节物资，非常严格公平，这样才能渡过困难日子。又如，在南方点菜油灯用灯芯草，虽然很小，费不了多少油，但毛主席也规定哪里只点一根，哪里能点两根，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增加一根，打算得很周密。在今天来说，这些都是小问题，如果今天这样做，大家一定要认为是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事务主义了，但在当时对于巩固部队战胜困难是有很大作用的。

这里告诉我们，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是最有效果的。同样告诉我们：干部以身作则特别是在艰苦危险的时候，是有重要的作用的。这个真理不管在过去今天还是将来，都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说哪个干部都得挑一下担子，朱总司令在今天谁也不需要他这样做的。这里也告诉我们：具体的细致的管理部队，管理物资，对于克服困难，巩固部队有很重要的意义。今天有的同志一概以为这是事务主义，用不着来管，有的认为经过批准麻烦，太不自由，上级抓的太紧，甚至表示不满。有的仍然铺张浪费，对精兵简政没有贯彻执行，大机关大架子还放不下来，许多机关不必要的招待、应酬，还没有废除。如果拿来与朱、毛在井冈山上的奋斗精神一比，能无愧色吗？！要了解一切物资都是人民的血汗，用人民的血汗，作个人的挥霍，自以为是讲面子，其实是最不体面的事情。我们虽然再三要求节省，要求消除铺张浪费和虚伪的应酬，但还没有很好的做到。

第三阶段，是朱、毛从井冈山下来创造中央苏区与五次反“围剿”战役。这是非常艰苦的阶段，同时也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时期。红军到江西后即建立了很大一块根据地，但当初下山



时却非常艰苦。而敌人却乘着我们撤离井冈山，新的根据地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集中了巨大兵力来“围剿”，实行跟踪追击，环境非常艰险。那时敌人一直追到瑞金，形势危急，好在我们抓住敌人追击疲劳之际，回头一击，一个反攻把敌人打垮，这样才顺利到达了东固的游击根据地。此后在闽粤赣边及赣南，开展了大规模游击战争，经过二年多，创造了许多块游击根据地，才形成了一个大大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开始深入土地革命，建立了根据地。但这种根据地在当时并不巩固，里面还有许多白点子似的反动势力的土围子。政权也不巩固，还在开始创建。接着敌人来了三次进攻，每次动用很大兵力，也先后都被红军粉碎，才把苏区内的地主豪绅的武装拔掉。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成了广大的根据地，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地政权与红军的建设进入新阶段，颁布了许多社会政策，红军制度与政治工作都有新发展。同时部队扩大，成分改变——得到土地的人民，大批动员到部队中来了，红军质量大为提高。经过一个时期后，敌人用很大的部队进行第四次“围剿”，许多著名的“将军”领导着精锐部队，向苏区挺进。但结果一仗就把这些基干部队解决——击溃两个军，消灭了三个师，活捉了两个师长，把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又打垮下去。于是敌人重新办学校训练干部，扩大部队，改进战术，经过半年多的布置，又进行第五次“围剿”。战争就越打越大，这时红军越战越强，苏区越扩大，敌人也越加用全力来对付我们，调动了三百多个团的兵力，整整打了一年。在第五次“围剿”中，敌人有系统地采取堡垒主义：一面进攻，一面大修堡垒，实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占领一地就马上修筑堡垒固守起来，我们一打，它就缩进“乌龟壳”里去。从前打运动战的横冲直撞的战术改变

了。那时江西遍地都是堡垒林。随着红军长征，沿途都有堡垒，最后直到山西和河北阜平不是也筑有堡垒来对付我们吗？

从井冈山到五次反“围剿”时期，红军有了成熟的系统的军事思想：就是处在战略防御，敌人占优势的形势下，我们在战术战役上也是进攻的。往往我们已经撤走，敌人才敢前进；我们偶一停驻，敌便畏缩不前，而赶修工事固守，进攻精神很差——战术战役上缺乏进攻性。所以我们要打就打，要走就走，要休息就休息，进攻精神很旺盛，敌人常常抵挡不住我们的进攻。同时我们游击战与运动战是有机配合的，转移很灵活，有时把部队分得很散做群众工作，有时又集中向敌人突击。同时红军中党的工作，政治教育提高了，各种制度建立了，部队互相间的团结也密切了。如在几个军团之间，到哪条战线时，后来者即听从先到者指挥，协同作战。部队与地方党政民的关系也很好，不管到哪里，马上有行动，地方就帮助解决粮食输送等问题，一致为着胜利，各方面协同很好。同时部队与人民血肉相连，因为红军战士多是得着了土地与政权的农民，所以坚决保卫苏维埃，也即是苏区工农的子弟兵。他们高度爱护人民，而人民关心红军战士也无微不至。那时，江西许多县份在经济上文化上并不比现在冀西各县优裕，拿瑞金、兴国两县来说，人口不比边区县份多，但每县动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成立一个师，每师三个团，有好几千人，可见人力动员到了怎样的程度。如果红军不是与人民血肉相连，是做不到的。同时在一切为着前线胜利的工作上做的很好。后方机关及勤务部门对前线各种人力、物资的保证，用尽了力量，为着前线部队的吃穿。前线每人每天吃一斤多米，后方机关，中央机关，军委会，每天只吃十二两<sup>〔1〕</sup>“包子饭”，不管够不够，每人只有一包。饭量小的与饭量大的调剂，那是个人间的事情。



那时粮食还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一切为着前线就需要这样做，而党政机关比军事机关还要艰苦。正因为我们艰苦与英勇，正因为各种建设的进步与各方面关系的协调，才能支持长时期的战争。

可是最后我们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呢？即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妨碍了红军的发展与苏区的坚持。特别是最后时期由于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影响到人力物力更加困难，影响到革命阵地的变动，使红军不得不突围而长征。历史上空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整整经过一年的时间。可是所谓雪山草地究竟是怎样的艰苦与危险呢？许多同志还是模糊的。我们跋涉了许多难以通过的险山、恶水，翻过海拔三四千公尺以上的雪线——所谓“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的雪山。当时地主资产阶级得意地说：“前有堵兵，后有追兵，八卦阵图，加上万里长城，其不为石达开者几希矣！”但我们却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到达陕甘宁根据地。这是第四个阶段。

这次空前艰险的进军的胜利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首先，是我党领导的正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掌了这个胜利之舵。在苏维埃运动末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造成很大的损失。如今天我们执行精兵简政，在反“扫荡”时部队更要轻便的道理，每个同志都知道。但在当时却把长征当成了“搬家”，连石印机、铅字机都要几十个人抬着走。可是，我们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拖泥带水，那么多笨重东西，要搞二万五千里，就是主观主义的想法。红军冲过封锁线，前有敌人堵，后有敌人追，掩护这机关，掩护那机关，还要掩护资材与机器，费力不讨好，结果只得统统丢掉，连我们的几门大炮也不要了。当时有些人以为“搬家”就是从这个根据地搬到

另外一块根据地，是很简单而容易的事。可是我们想找块根据地“安家”，敌人却拼命不让我们找。敌人好不容易费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我们搞出根据地，怎能让我们另找根据地呢？所以在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各省层层堵击与围攻，使我们无法立足，不得不走。因此在几个地方，我们做群众工作，想建立根据地，但终没有成功。这使我们在长征中更觉得根据地的可贵。大部队如果没有根据地，就难以支持，行军作战也不方便，要充分休息、整理也不可能。

其次，团结友爱很重要。正因为有党与部队的团结，所以能胜利地完成长征。叛徒张国焘分裂党及红军，就给我们党以莫大损失。当时一、四方面军会合，虽然经过相当长的行程，但部队并不算很疲劳，人员还充实，尤其是四方面军更加充实。如果不老在草地上打圈子，而浩浩荡荡直到西北，那么今天的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会更好些，八路军的基干也不止这样多。这是两种不同现象的不同结果！这说明团结问题在困难环境中特别重要。同时也说明在困难、危险时也最容易发生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的现象。因此，必须具有布尔塞维克的高尚品质，认清革命利益，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才能战胜困难。一切分裂行动就是自走死路，自寻灭亡。

再次，坚决勇敢地完成任务，是胜利的重要关键。譬如横渡金沙江、大渡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是怎样的艰险。金沙江两面都是大山，难以攀登，渡口很少，架不起桥，船又很少。如果那时不出奇兵，抓住土司，弄到一只船，是难以渡过的。当时我们的渡河战役，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在云南，要过金沙江，敌人估计我们一定不会到缅甸，也不会到西藏，一定要渡江走石达开的路。这时刘<sup>(2)</sup>师长抓住一个土司，抢船渡河。但敌机发觉了我们左翼，集中兵力赶到江畔，布置

了一个大歼灭战，企图歼灭我们于金沙江畔。我们待主力过河后乃沿着江岸小路回头兼程随右纵队过河，一个急行军，把追击的敌人丢掉了，大摇大摆的渡过了金沙江。后来敌人赶到，也只好隔江对骂了。

渡过金沙江，又要过大渡河。这两江之间是彝族区，有黑彝白彝。我们虽然想建立根据地，但这个区域是不能作根据地的。我们渡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故事，像神话一样。过河地点就是石达开的坟墓所在地的安顺场。这时几十里河岸完全被敌人控制，而且两岸都有敌人，我们行军又很疲劳，赶到安顺场时只得到一只烂小船，只能载十几个人强渡。这十多名英雄，带着棉花抢渡急流，以随时堵塞敌弹射穿的漏孔。渡河后即冲垮敌人，夺下阵地，控制了渡河点，又抢了三只船，掩护渡过了一个师，沿左岸前进。主力从右岸沿江而上，夺取泸定桥，因为两面都是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全部过去。当时右岸的先头部队第四团，就是今天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同志，当时为团政委，所率领的一个团，一昼夜走了二百四十里，打垮了敌人一个团，消灭了一个营，晚上还冒雨通过泥泞地，爬过一些大高山，赶到泸定桥畔。敌人还以为我们至少在七天以后才能赶到，刚把桥上的木板拆去一半。见我们部队涌来，才慌忙放火烧桥，但被我军急速扑灭，有的同志把眉毛都烧掉了。这样才控制了泸定桥，部队得以安全通过。

再次，要有高度吃苦耐劳的精神，红军一昼夜急走二百四十里，抢夺泸定桥，就是高度吃苦耐劳的表现。在草地缺乏粮食时，朱总司令还当起神农氏，来尝百草，不是要发现药材，而是想找草来充军粮。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伟大的，是应当学习的。

最后，要绝对信仰党。当时红军服从命令，日夜行军。走

到哪里去呢？不知道。因为没有根据地，就要重新去创造。可是到哪里去创造根据地呢？只是天天走就是了，而且每天都走好几十里路，一年中有十个月以上的时间都走了路。但全军从干部到战士一致的呼声是“跟着中央路线前进”！党一定会带着我们走到胜利的。

到陕北后还有许多艰苦奋斗的事迹，这里不多讲了。这是红军发展的第五个阶段。

今天是处在第六个阶段。革命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是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制度。而今天却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与独立、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中国。这是中央在今年“七七”宣言中着重提出的问题。

拿今天与过去比较，可以看到：

第一，我们的社会基础比过去大多了。过去只是以工农群众与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做基础。由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所以苏维埃政权也只限于狭小的区域，社会基础也就比较小。加上那时不仅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向我们进攻，而且帝国主义以巨款、军火、顾问等帮助他们，向我们进攻，我们处在孤立的地位。可是今天我们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社会基础广泛得多。除少数汉奸外，整个中国人民都与我们站在一起。同时世界上分成了两大阵营，而我们是整个反法西斯阵线的一部分，所以同盟者也比过去多得多。

第二，我们的根据地比过去也大得多了。过去的根据地是相当孤立的，虽然全国有许多苏区，但是分在各省不连接，在战略上只能有一定程度的配合。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虽被敌人在华中、华北用点线和小块地区隔断，但战略上甚至战役上可以取得密切配合，整个区域可以协同一致，而且

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的。

第三，我们的军队比过去更强大了。过去红军虽然强大，但因军事上政治上某些错误，使红军遭受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八路军、新四军数量更大，在几年战斗中，锻炼得更坚强了。

第四，根据地的人力、物力也比过去丰富得多。在江西时，棉花布匹就很难买到。要像现在每年发单衣两套，还要发衬衣，棉衣还不冷就发下来，是做不到的。我知道过去只是在漳州时发过两套衣服，以后每年只发一套单衣。因为敌人封锁，奸商的剥削，棉衣非常单薄，往往天气很冷还穿不上，穿上不过一个冬也就烂了。南方又没有羊毛来代用，所以穿的问题在江西很困难。一块钱只能买两把甚至几钱盐，有时还要吃淡饭。电池、西药，因为苏区离大城市很远，只有靠战斗中缴获来解决，这是与现在不同的。至于零用钱，鞋袜费，红军是没有这个制度的，只可能分点伙食尾子。当时已经消灭了雇佣观念，政治觉悟很高，当红军干革命是为了自己的解放。有时苏维埃政府没有钱发伙食费，于是大家三角五角的凑合起来，有些还拿出自己的伤残抚恤金借给政府。直到现在，这笔账还没有还清。在抗日战场上，一九三七年冬还有人要我还老账。我说：“现在财政同样是困难，把老账还了，又会拉下新账，还是把收条收拾起来吧！”我是那时的政治委员，应该代表苏维埃政府向同志们致谢。同时我也可以告诉同志们，我在苏维埃运动时的积蓄，由分伙食尾子凑成买得两元苏维埃公债券，直到现在还在我自己的“金库”里保存着呢！

第五，当然今天的敌人与过去不同，今天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应该把它估计得过低。敌人还控制着大城镇与交通线，还仿效内战时的堡垒政策来分割与封锁我们，并且相当熟

悉我们的战术原则。敌我正展开空前复杂的斗争局面。我们固然比过去坚强，可是今天的敌人也比较过去要“高明”些。

第六，敌人现在的堡垒政策，基本上是学习我们内战时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没有重武器，不容易摧毁堡垒。但过去与现在的堡垒政策并不相同，不仅是修筑的技术不同，即在运用上亦各异。过去国民党的堡垒政策的优点，就是可用很大兵力凭借堡垒推进，纵深不要军队来守，而由豪绅地主来维持秩序，可将最大的兵力集中到第一线。今天敌人的堡垒政策，虽然也想这样推进，但遇到的困难是推进后纵深要分散兵力来防守，不然就要被我军控制或被我平毁。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所以纵深要用伪军防守，但伪军却不大可靠，不会完全愿意帮助日寇办事。如过去大清河北岸被日寇占领，但却是伪军、土匪联庄的天下，实际上被他们统治着。因为日寇是侵略国家，是异民族，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过去敌人有豪绅地主做基础不同，而仅仅依靠汉奸，这是日寇基本的困难。可是敌人虽然不大相信伪军，但还要这样干，以补救自己兵力的不足。

第七，在战术上今昔也不同。过去国民党以堡垒为前进与防御的阵地。我们撤走，敌便追击与进攻。我们反击，敌就缩进“乌龟壳”，怕与我们打运动战，攻击精神差。日寇恰恰相反，兵力虽较难大量集中，但不管有堡垒也好，无堡垒也好，都积极找我们打。虽然我们在战术上极有弹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使敌人到处扑空，但敌人总想抓住我们打，总是采取进攻姿势。敌人在战术上也有发展，采取奇袭等办法。所以，今天与过去的敌人在堡垒政策及战术运用上各有优缺点。

第八，在江西、福建、鄂豫皖、湘鄂赣等苏区我们主力转移后，还留下部分红军与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与统治阶级的军



队打得很厉害。这些武装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后来新四军的基础。今天敌人在“确保华北”的方针下，不断向我们根据地进攻，某些地区的主力，有时必须转移。根据过去的经验与现在我们的社会基础，和敌人堡垒政策的弱点，敌人的统治虽然厉害，但在我们主力转移后的地区，仍须留下一部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来坚持，这是必要而且可能做到的。当然今天的斗争是更加复杂了，需要有更多的新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不是像过去内战时那样单纯。

第九，我们今天虽然遇到极大的困难，但还没有像国内战争时那样严重，可能今后的困难会更多。战争将继续打下去，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时间是按正比例发展的。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什么困难，或者以为现在困难已经到头了，相反的要认清困难的严重性，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多方设法来克服，任何困难是可以战胜的。

第十，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这不是狭隘的经验论，要根据具体环境把它发扬起来。另一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坏传统，最基本的是农民的自私自利，本位主义，游击主义。这是有它的历史根源，一直发展到现在。自私自利的现象仍然很多很严重，本位主义表现是只顾自己，不顾其他部队与其他部门；游击主义表现很严重，有的不爱护公物。虽然再三的讲，但始终没有克服。这是因为过去的坏传统没有消除，如过去红军物质困难时，到新区得到新东西时就不加爱惜。今天公物好像来的很容易，也不加爱护了。我有一件皮大衣，还是红军时代的，曾经有人说我保存这个东西，是富农意识。可是为什么不爱惜着穿，多穿几年呢？有些同志得到较好的东西，也是不加爱惜，还不烂就丢掉，打算再搞新的。这就是坏传统作怪，应该清除干净。

我们党告诉我们要认清今后的困难，这些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应该有过去那样坚决顽强克服困难的精神，来战胜黑暗，迎接光明。几年来我们的干部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有些干部加强学习我们的军事思想，运用我们的军事科学，掌握战争的艺术，许多方面都比过去进步了。许多新干部也实践着与习惯着党军的战斗生活，正像田野里的青苗一样成长起来了。我们是朱毛红军的血统，要永远继承这一光荣传统，并要向朱毛彭诸领袖学习。中央号召我们再鼓一把劲，明年就能够打垮日寇强盗。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聂荣臻军事文选》刊印。

## 注 释

〔1〕旧制，当时一斤合十六两。

〔2〕指刘伯承。



## 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sup>\*</sup>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罗 荣 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如果以为这只是今后两年，甚至是一年半载的转瞬间事，而视为无关重要，毫不在意，那将会造成自己的麻痹，帮助了敌人的凶暴。

整个华北的形势，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山东自然也没有例外。敌人对我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由来已久，而目前犹在加紧进行中。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如鲁南、泰山区几乎已全部变为游击区；鲁中沂蒙区亦已被封锁割裂，在交通联系及工作指导上深感困难。

冀鲁边与鲁西，情况更加紧张，因为在那里工作基础还很薄弱，群众在长期战争中忍受着过重的负担和损失，而我们对群众生活的改善又是今天才开始注意，才开始深入发掘出并且还要继续发掘出不少严重复杂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非常细心谨慎的去解决，在解决中不是没有困难的。

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和游击区的斗争是更严重更复杂的。在我们工作不甚好的基础上，如不很好很警惕地注意和转

---

<sup>\*</sup> 本文原载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战斗生活》第十六期。

变工作，那就很可能继续沦为敌占区或退化成游击区。这一点，决不能因为我们主观上不愿意承认而可以马虎过去。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是有某些收获的，首先是从其自己占领区以内给我们以“肃清”的打击，并转向对我们游击区与边缘地带推进，加强其纵深封锁和面的占领，形成雄厚的包围与紧缩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而且这种包围和紧缩，正在加速发展着。鲁南狭窄的山区，已没有我们可以联系的平原地，也没有可成为我们可靠的结合纽带。随着敌人紧缩地推进，不是各种工作塌台，便是往后向比较基本地区的退却。地方武装的溃散及个别的叛变，仍是异常严重。致使我们久已存在的某种战略基点遭到全部暴露和挫折，这是值得严加警惕和注视的。

上述严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同国内外形势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也有我们的缺点与错误。

第一，不认识我们是在敌后建设抗日根据地，是在敌人点线之间建设抗日根据地，而且又有经济、政治、文化、地理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总之，没有大量的发展游击区，不会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没有很好的坚持的游击区的工作，亦不会有我们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不仅是军事的任务，特别在后一阶段上，更是政治的任务。如果说“战争愈不像战争愈像政治”的话，那么我们的游击战要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还要求我们如何达到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同时亦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研究用什么形式获得坚固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因此，在建设抗日根据地上，没有明确的观念与长期的打算，还表现在对抗日根据地边缘与游击区的坚持工作的忽视。

第二，满足于一般公开武装斗争与民主运动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体环境及其所有的条件。在有些游击区已变为或可能变为敌占区，在有些基本区已退化或可能退化成游击区，

是需要我们立即或准备着改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然而，有的地方仍在坚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几个仅仅安置我们的机关还感到狭小的村庄，他们对于精兵简政的执行仍然是采取忽视的态度。

第三，“大量开辟发展敌区工作与缩小敌占区”，已不是今天的口号。今天的口号，是普遍的巩固精干，并根据我们基本区同边缘游击区，或者敌占区各个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准备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以保存自己势力与机动上的可能。因此，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应付，而是有其积极的意义。为了粉碎敌人的任何“扫荡”与迎接总反攻的到来，这样一种转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那种张扬旗鼓、大吹大擂一套公式的机关作风，是特别有害的。这一点，过去并没有为领导所重视，以至在某些地区造成损失。

第四，对日伪军工作我们是有了最大的热情，并获得了一些显著成效。但决不能认为可以自满的。过分暴露的政治攻势，急躁的拉伪军反正，不是没有损害的。短促突击的方式，宣传鼓动的一般化，反给了敌人特务、宪兵以猎取破坏我们的间隙，削弱了日伪军同情我们的情绪。

第五，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地方武装，无论在素质上与灵活分散动作上都不够要求，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薄弱或根本没有。尤以对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我们只给予他们一般的保证，他们是可以不执行我们任何条件的，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往往会使他们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三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

第六，不睁着眼睛看着敌人来势和细察情况是不会有我们的政治攻势的。虽然我们最近也调查了一些材料和作了一些汇

报、通报，但一般的说，这些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够，距离真正的了解敌人还差得很远。这就必然形成我们对敌斗争的空泛无力。

这些缺点与错误的存在，是会使我们边缘游击区愈益陷于严重地位，对敌斗争上亦招来了破坏与打击，对我们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将要形成最大的危机。敌人的蚕食，我们自己的后退，不是不可想到的事情。因此，必须转变和加强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工作。

目前一般的应该是采取麻痹松懈敌人，精干地保存自己力量，并争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有我们机动的条件，不丧失坚持相持的信念，这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方针。敌人全部殖民地化的政策，即是发展很凶恶的奴役掠夺，广大的中国人民是已经饱受或愈益严重的受到无限的苦情，存在着民族基本仇视的。敌人宣传“解放东亚”，巧妙地修改日本同中国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历史关系，事实上是不可能掩饰的。宣传“剿共自卫”，强调出“互相救，救人自救”一套谜语，无非为了要中国老百姓牺牲良田沃土，大批劳力壮丁，去替皇军修筑护路，封锁道沟，服从其残酷的奴役制。宣传“勤俭增产”，调查土地产量，更不外乎为夺取广大农民最后一口救命粮食，以加强其饿死中国老百姓的经济配给制。日本人加强特务活动，加紧伪化治安，已使伪军、伪组织同样怀着不安。日本人经常利用“杀鸡吓猴”的办法，强迫调整伪军，编制伪组织，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更加扩大了对我们的同情。这都是对我们有利的，但决不会因此而造成我们的一切好转与反攻胜利的到来，这只是一些便利于我们的条件，使我们有渡过难关，克服黑暗，迎接好转与胜利的可能。中心环节要看我们能否正确地执行方针。因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作为一般研究的参考。

（一）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以配合着党和群众工作的深入隐蔽。首先求得立稳自己脚跟，打击敌人特务活动，使我有可能迟滞敌人的推进与面的控制。尤以破坏敌人等齐一线圈的向我们紧缩，展开对敌人作彼虚此实的斗争。要发展必要的革命两面派，多争取交伪军朋友，而不是要求轻易的反正工作，以达到破坏敌人的伪化组织体系，挖空敌人。总之，要把机动性与高度原则性结合起来。

（二）排除狭隘公式化的一套，大量将我们的机关人员散布到下层组织中去做坚强深入的隐蔽工作。但应注意将无法存留或不健全的动摇成分送到基本点地区分配工作，或可能给予不重要的任务，个别派遣以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某些重要基点上安放得力干部，使其可能掌握具体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是非常必要的。

（三）特别值得重视的要把某些不可靠的地方武装、坏成分切实清理。有的给以改造，有的欢迎他们在另一种方式下去生存和作一定程度内有利于抗战的活动，有的设法使其枪支转交给党所团结的群众手里去。并调去比较坚强的成分（最好由基干兵团中抽出并且是当地的人）去加强游击基干队小组，在群众中隐蔽生根，建立坚强的情报转递和联络站。各地主要干部，应成为这一游击战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经常以游击基干的突击行动，配合着游击小组的分布潜伏，只打击敌人的宣抚班、保甲巡查与公指导班，打击敌人少数出动抢粮及捕抓壮丁、牵走牲口的部队；要善于打击敌人尾背，不打击敌人来头；要善于埋伏打击敌人，不对抗打击敌人；要善于暗中打击敌人，不张扬旗鼓打击敌人；还必须相当的遵守没有情况不乱击，避免引起暴露和破坏，有了情况要善于袭击，积极配合主力的作战。这一切在今天要成为全党普遍熟习的课目。

（四）没有同群众的联系与适合于群众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是不会有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坚持的。因此，必须制止在临到困难便去加重群众负担而产生自流的发展殖民地观念。要广泛深入地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反对敌人统一封锁的配给制，帮助群众对准敌人这一殖民机构组织与管理方法实行舞弊、泄漏、走私、暗藏等办法，甚至成立群众性质之类的斗争小集团，并同小贩、商人与敌占区人民订立彼此交换利益的条件；而且应该使其在民主法令下有这种自由。今后对敌人强迫群众修筑道沟、围寨，在无法抗拒而且不能增加群众不能忍受的痛苦时，我们只有赞助群众去暂时应付，配合着我们对伪军的工作以造成日军的疏忽和松懈。这一切，会使我们获得切实的利益，获得最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提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与依靠。同时也就有了我们教育与组织群众的基本条件。

坚持着我们边缘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对我们克服最艰巨的一段过程，是有特殊意义的。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很好地体会、研究、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罗荣桓军事文选》刊印。

## 以团结力量建设战后新中国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历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多次宣言与文告中明确地声述了自己一贯的团结抗战建国的方针。但是对于这一方针国内尚有某些人士不甚了解，而反共分子的恶意诬蔑则更妨碍了他们的了解，并散播着猜疑的毒素。现在当抗战胜利日趋接近之际，为着加紧团结，熬过困难两年，并树立战后新中国建设的前提，我们对于团结建国的某些重要问题，予以说明，是非常必要的。

有一种话说：“共产党在抗战中，多方攻击友军，并且准备在战后实行大的内战。”我们应当明白告诉同胞们，这是一种荒唐的谣言。我们共产党不仅早在抗战前就已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在抗战中坚决主张反对磨擦，团结抗战，而且确切声明在抗战胜利后也要反对内战，团结建国。在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以武器腐败弹药俱缺之师，专力杀敌，抗击在华日军的一半。但却曾有某些不明大义的人，反以打击此种苦战之军为自己第一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在遭人进攻有被消灭危险的情况之下，才为着民族抗战利益，迫不得已实行自卫，这种自卫还是为了团结抗战。八路军、新四军是绝对不愿并且从来没有轻起衅端攻击友军的。此情此景，国人共鉴。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反对内部磨擦，而且更主张在战后反对内



战，和平建国。共产党中央在今年七七宣言中清楚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将在抗战胜利后，也本着团结建国的精神，与其他军队及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参加和平的统一的新中国的建设。如果那时谁想挑起内战破坏国内和平建设，那么他不仅必将为全国反对内战的广大人民与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所共弃，而且将为国际上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国家与人士所共弃，因之他发动内战企图之遭受失败，将是无疑的。

另有一种话说：“共产党要在抗战后独霸中国，实现工农小资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应当清楚告诉同胞们，这同样是种无稽的谣言。我们共产党不仅早在抗战前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决议中提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任务，而且更于抗战中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具体建设抗日民主的政治。在那里，一切抗日的人民，包括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在内，都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员），无党无派的人士参加了政府的领导工作（如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先生是牺盟会员，胡仁奎先生是国民党员，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先生是著名的老同盟会员，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是无党无派人士）。在那里执行着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府委员中只占三分之一，在那里所建设的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而是合于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的各抗日阶级各抗日党派合作的抗日民主政治。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实行这样的政治建设，而且更主张在抗战后也联合各党派（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各阶级（包括赞成合作建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建立



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即是共产党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并没有主张将现在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排挤于新中国国家建设之外，同时也不同意将共产党与其他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排斥于新中国国家建设之外。所以共产党中央在今年七七宣言中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诚恳愿意与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精诚团结，为这样的国家而奋斗的。

再有一种话说：“共产党在战后要赤化中国，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与资本家的财产。”我们应当严正的告诉全国同胞们：这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共产党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即宣布“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并且忠实地执行了自己的诺言。至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那么就是在过去土地革命时期，也是并没有过的。抗战中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上实行了团结各阶层的土地政策与劳动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共产党主张了并且实行了：一方面适当的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生活与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保证农民交租交息，保证地主地权财权，以维持地主的生活（详见中共中央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在劳动政策上共产党主张了并且实行了：一方面改善工人生活，保证他们在劳动过程上的正当需要；另一方面提倡工人积极工作，以保证生产的发展与资本家的正常的利得。共产党所实行的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超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政纲的范围，而且甚至还没有达到孙中山先生所规定的限度（如“耕者有其田”）。共产党认为在民主共和国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且是有利的，而实行社会

主义则是尚未具备必要条件的。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实行了这样的土地政策与劳动政策，而且更主张，在战后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与劳动政策，以团结各阶层来共同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所以中共中央今年七七宣言中清楚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既不是只顾一部分人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也不是以暴力没收土地没收工厂的中国。”这样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以及具备同样精神的其他社会政策，也就能够为战后消弭内战，团结建国，奠下必要的经济基础。

抗战的胜利将使我们的民族独立问题获得基本的解决。战后这样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中国，同样将是独立的坚强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与附庸国，它将与各友邦共生平等互惠的关系，并与他们联合共同建设战后和平的民主的世界。

自然，这样独立、统一、和平、民主、民生幸福、各党合作的新中国，是我们全国军民的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共产党的奋斗的目标。这样的中国，是不会自然而然地来到的，必须努力去争取。在争取这样新中国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种种障碍与许多困难，而且新中国建设的发展与三民主义政纲之实行，在一定时期中，在全国各地区内，一定会是不平衡的，可是我们全国军民既在多年抗战中锻炼了团结奋斗克服困难的大无畏的精神，那么我们相信在战后我们全国军民也能以同样的精神去克服建国路上的种种障碍与许多困难，去逐渐争取三民主义政纲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的实现。在战后建国大道上，斗争还将会是很复杂的，曲折的，甚至是艰苦的，但是我们有信心能够以团结的力量去进行这些斗争，以达中华民主共和国建设的完全胜利。

揭破谣言，泯除猜疑，精诚团结，共同奋斗，这不仅是争取日趋接近的抗战胜利的保证，而且是争取战后新中国建设成功的关键。

根据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解放日报》  
刊印。

## 毛泽东关于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 给陈毅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

陈毅同志：

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面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于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毛泽东

八月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 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

关于边区工作：

同意毛泽东同志所提的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第一是农业），明年投资要多；公营为辅，明年投资要少（今年投资偏重公营是必要的）。平衡出入口，只有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销为辅。在革命与战争环境下，部分的劳役制度，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党政军各方应着重批评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统一意志与行动，加强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政府党团应完全执行西北局的决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周恩来关于蒋介石欲约毛泽东在 西安晤谈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

毛主席：

(一) 今日蒋忽约周见面，先问延安最近有无电来，次云：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周答以延安来电对于政治、军事亦愿与张文白、刘为章<sup>[1]</sup>一商解决途径。蒋云张文白周内可返，军事可先与刘为章谈×。蒋谈入正题云：他一周后，将去西安，拟在西安约泽东同志一晤，如不便则不必。他连说两次，好像深恐误会似的，并要我电延。我当告以得复即报。最后我提及叶希夷<sup>[2]</sup>夫人抵此，求见叶，蒋云商量后复我。(据戴笠面告叶夫人，希夷生活甚好，惟已不在此地，似有解往贵州可能)。

(二) 我们认为蒋约毛见面，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又自己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目前办法有二：

1. 毛称病，以林彪代表至西安见蒋一谈。
2. 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并商，即偕一人(林或其他负责人)回至西安见蒋。

估计前一办法可行，后一办法不易得蒋同意，除非偕周出

者为朱总<sup>〔3〕</sup>。至□周回延再谈，则决不可提，因蒋通不过，而且关系会转坏的。

如何请立即电复。

周 恩 来  
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即张治中、刘斐。

〔2〕即叶挺。

〔3〕即朱德。

## 周恩来关于先由林彪或朱德出面 谈判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毛主席：

本晨来电收到。至今日蒋<sup>〔1〕</sup>尚无回电，我当往见刘为章<sup>〔2〕</sup>探究竟。对目前形势答：虽有以政治解决趋势，但具体问题尚未谈到，且实行压迫，一无减轻，而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蒋毛会面似嫌过早，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我意如此，中央意如何？请示复。

周 恩 来

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2〕即刘斐。



##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实际上是党政军民系统中党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的增强，上下级联系的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活动的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

---

\* 这个决定是王稼祥起草的。

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1.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

2. 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交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

意见，可报告上级党委。在遵照各组织上级的决议解决具体问题党委内部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责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见，亦必须执行同级党委的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有关机关。

3. 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之。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主力军是否参加县委，由各地按具体情况决定之。县委（无主力军参加之县委）及区委，只包含地方党，地方军及政府的党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应选择能掌握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担任之。因此，党委书记不仅须懂得党务，还必须懂得战争和政权工作。区党委书记人选，由中央局分局议定，经中央批准之。地委书记人选，由区党委议定，经分局中央局批准之。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如军区、分区政委被选为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则可设副政委，专管军队工作。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应照顾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体工作。如有个别特殊情况党委书记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党委书记时，须得上级党委或中央批准。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门，与其他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平等权利和义务，不隶属其他部门或委员会，但与其他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军事政策（如扩兵建军原则、政治工作等等）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如反“扫荡”的战略战役计划及总结等），须交党委会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治委员（即党委书

记) 决定之(司令员与政委对军事行动之最后决定权依照政治工作条例), 无限制的民主讨论只会引导军事行动的失败。军队主要人员的任免, 仍须经过军事机关依照已定规则进行之。

4. 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 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有全国性, 但同时具有地方性。过去有些根据地领导不统一, 主要的是由于该地主力军某些领导同志对于该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的统一的认识, 因而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如军事建设中之地方武装问题, 扩兵问题, 财政经济政策问题中之统筹统支等) 只注意了主力军, 而忽视了根据地整个工作的配合, 因而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发生争执。同时有些地区, 党政领导机关对于一切服从战争的认识不深刻, 对主力军之人员补充, 粮食及物质保证, 优抗及反逃亡斗争, 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 因而使军队与地方党政间的关系不协调。今后为了实现根据地领导一元化, 除实现以党委为各地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外, 还必须纠正某些地方主力军, 某些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人思想上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实行中央关于根据地的各种政策, 实行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几号指示。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如县、区、乡) 的决定, 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 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并应当经常的彼此联系, 彼此帮助。主力军的军事措施, 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 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实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机关的责任, 凡因军队之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党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 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 如有争执, 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 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 反对各个组织只是向上告状,

而不在本地当面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

5. 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党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及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应当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参议会及政府的威信，党的干部与党员违反参议会及政府法令时，党的组织应给以严厉的处分。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万一没有说服参议会及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假如党团同志因为自己的意见与同级党委有分歧因而不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是党团同志违反党纪的行为，应当受到指斥与处分。党必须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视政权工作，把干部堆在党的机关中的现象，必须纠正。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但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在这里，应特别提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系统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

是有严重意义的。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还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必须改善；军队中应进行拥护政府的教育；政府应保证军队的给养及运输；军队的首长应被选为政府委员及参议员。军队应成为尊重政权执行法令的模范，军人的违法行为，军事机关必须严格处分。军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员参议员资格对参议会及政府发表意见外，一切军人及军事机关无权干涉参议会及政府内部工作。但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尽可能的帮助政府工作。

6. 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如民众团体违犯政府法令时，政府可加以处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民众团体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和军队，协助抗战动员工作。但民众团体并非政权机关，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对人民执行逮捕、审讯判决等事宜。军队与民众团体应相互帮助，但不应相互干涉。

7. 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军事指挥员、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则仍执行其原来的党政民的职务（如党委书记、县长、工会主席）。



8. 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凡带地方性质的不违犯上级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

在这里，应当再一次的提醒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分局委员以上师以上负责人的文章，凡带有全国及全党意义的，应事先将主要内容报告或电告中央。各地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应当深刻认识，一个党的负责高级干部，不经过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犯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

9. 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在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全局，号召干部实行批评自我批评，使干部懂得全局，不陷于局部和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体与局部、上级与下级、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间的正确关

系。要加强党政军民各组织中的教育工作，使全体同志认识领导一元化及根据地革命秩序与革命法治的重要性。在这里，应特别警惕军队干部：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军队干部应负较大的责任，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独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因此，军队中军政干部必须特别约束部下，检点自己。必须号召自己的部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法令。同时，又应纠正某些党员和干部中的不合事实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党委及党的机关中工作才叫党的工作，其实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中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某些党员空喊或曲解服从党的领导，而对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则不认真研究，不认真执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10. 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在全党中说明，假若军队削弱，假若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军队的人员补充，粮食、服装、弹药的供给与运输，营舍的让予，伤病残废人员的输送、看护与保养，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等等，党委及政府、民众团体，都有随时加以解决的责任，一切漠不关心的现象，都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在军队本身，则应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



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军队的人员与物质补充、运输、优抗等等，必须依照政府的法令、规章去做；乱来一顿，只会损害抗战，于军队本身也是不利的。

11. 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等方式规定之，以解决统一领导的许多具体问题。制定后须报告中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关于反“扫荡”的准备问题\*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日)

刘 伯 承

## 第一部分 敌情估计

### 一、华北敌人三个兵团作战步调的趋势

日寇军队在山西方面者为第一军，军司令部在太原；在平汉线系华北方面军直属兵团，方面军司令部在北平；以济南为中心的津浦路为第十二军，军司令部在济南。它们各有各的防区，凡“治安强化”之类都各有各的机构。但它们在游击战争的情况下，为了确实掌握华北，又不能一口吃完，必须有一定的步调。

敌人规定战略的传统，是“圆规划法”。就是以某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掠取的办法。比如今年夏季“扫荡”，从五月起，山西以太原为中心，对晋东南实行四期作战；平汉线则以北平为中心，先“扫荡”冀中；山东则以济南为中心，“扫荡”冀鲁边。过去敌人“扫荡”是同时进行的（如二月“扫荡”），但从今年夏季“扫荡”起，有变为集中兵力辗转“扫荡”各区域的趋势。估计敌人在今后“扫荡”晋察冀时，

---

\* 这是刘伯承在太行军区各分区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

则华北敌人直属兵团可能由河北（冀西）向西，山西敌人可能由山西向东北，山东敌人可能由德州以西“扫荡”冀中相策应。

战略上有主作战与支作战，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主作战的胜败。由于整个国际战争形势，敌人目前主作战还不可能也不必要在华北消耗于游击战争，这除非敌人南进、北进、西进都遭受破产才有可能，但那时便到死亡阶段，即我们转到反攻时期。因此，敌人在此时只有集中现在华北的兵力辗转“扫荡”的可能，即使由各方调来三个、五个师团机动“扫荡”，也不是转移其整个战略的主作战。

## 二、山西、河北两敌秋季“扫荡”可能的协同

敌可能先攻晋察冀与晋西北，然后南下晋东南，这种可能多，但先攻晋东南的可能也是有的（敌人现在是在晋察冀周围集中兵力，近来四十一师团有调蔚县之说）。其“扫荡”时间可能在九月、十月间。

## 三、特务机关实行不间断的有力活动

敌酋冈村宁次有奴役东北和朝鲜的统治经验，他的特点是长于政治阴谋，尤长于招摇撞骗，散布恐日病菌，以期灭亡人心，来配合军事“扫荡”。这要有足够的认识与戒备。

## 四、蚕食与“扫荡”的密切配合

蚕食是使我们的回旋余地小，“扫荡”是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这些在反“扫荡”总结中说了，不重复。

## 五、今后敌“扫荡”法则演进的可能性

压缩合击、抉剔“扫荡”及分道撤退三个步骤，是敌人近年来的“佳作”，是逐渐演变来的。对我们“扫荡”一般兵力是腹地密，边地稀，敌占区空虚。但这不能看成是死的规律。假如我老在某一边地机动，则敌人也可能将大合击圈的中

心转移到边地。

另一种可能是敌人大兵团的反转大合击。以几万人忽然反转大合击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们游击作战变化太快捉摸不定的条件之下，仓促构成新的大合击阵势，必然是自相冲撞磨擦。这时以小部队的奔袭，来配合大兵团成为反转的合击是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游击战争中强化主动性、灵活性与出敌不意的艺术。

相传敌人作战役的大纵深配备，现在是没有的事。由于敌人兵力不敷分配，我们游击战争千变万化的短时的闪击性，敌在战役上的大纵深配备的进击，是用不上的，就如这次大合围的纵深配备，也不过留一些残置封锁部队（一个小队到一个中队），进行佯动、造谣、招摇撞骗而已。这需要我们彻底地认识，不要被敌人欺骗。

#### 六、秋收的掠夺与破坏

这种可能是很大的。因为敌国的歉收及其在敌占区饥馑的造成，必然造成敌人强迫、诱骗敌占区群众到我根据地来抢掠与破坏，同时借此造成我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对立，达到它“以华制华”的目的。

## 第二部分 军民结合进行反“扫荡”作战的要旨

### 一、游击作战与政治攻势

我们作战虽也有突击，但基本是游击战，消耗重于消灭。我们在阵势不利时，对敌是先拖后打，拖打兼施，这就是游与击的道理。游与击必须有机地巧为配合。对阵势严密之强敌要拖，游击战争就是拖垮敌人来打击的。但拖中有打，打中有拖，不可机械分开的。我们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

治；不但是军队，而且特别要有群众武装斗争。我们的政治攻势是巩固阵地的进攻，而且要不间断地进攻，自信心是军人的魂魄，我们在政治攻势中，要提防招摇撞骗的恐日病菌的袭击，这是巩固阵地的政治攻势。

二、每一地区的本身与友邻区域都要把反蚕食与反“扫荡”密切协同起来

这个问题在《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说了，不再重复。我们现在的配合不是百团大战的正规战的配合，而是游击战的配合。配合的要点：一是破袭，一是情报。破袭可斩断敌军的输送与补给，且在敌人的后方活动易于取得情报，以供给友邻，直接配合友邻作战。这样，不但帮助了友邻，而且强化了自己，必须坚决实现之。

三、主力在敌侧背作战与腹地游击的配合

见《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但必须抓紧新的具体情况进行之，不可演出公式主义。

四、保护秋收与反“扫荡”的结合

目前我们武装工作队，就应制宣传品，散发敌占区，号召敌占区同胞反对鬼子欺压他们到抗战区掠夺烧杀、“以华制华”的毒计，叫他们临战逃避，使其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一番准备，以便于将来瓦解和争取。另外，还要根据去年经验，定出快收快打快藏的具体办法。

### 第三部分 党政军民对反“扫荡”的准备

每次粉碎“扫荡”的经验，就是党政军民结合的问题。我们军分区党政军民的全力斗争，通常是统一于地委一元化领导之下进行的。而军分区在执行军区军事命令时，也是要求党政

军民一致斗争。我们提出“子弟兵”的口号已四年余，但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均不够。例如我们太行山发动基本群众，强化统一战线的工作，过去是不彻底的，近半年来这工作才有了大的开展，基本群众逐渐发动起来了。从前太岳的群众，也只认识到我们是一般的抗日军，现在发动了基本群众，强化了统一战线，广大群众才认识我们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兵，把我军爱护基本群众的特殊性，从实际中体验出来了。子弟兵不是空口号，需要我们军分区与野战旅帮助群众工作，发动基本群众，才能强化统一战线，才能建立强大武装。我们军队不但要帮助地方工作，而且要帮助地方党军事化。同样，地方党也要教军队做地方工作，发扬我军传统。

群众工作落后是要注意的问题，但我们要特别防止特务分子的挑拨，造成军民的互相埋怨。我们不但要发动群众，而且一定要反对特务分子挑拨军民团结。夏季反“扫荡”有些地方不但不帮助抗日军队，而且殴打抗战军人，甚至搜刮民众物资欢迎鬼子，这些背景必须追究严办。

### 一、配合晋察冀反“扫荡”的问题

配合他们反“扫荡”有近地的配合与远地的配合。如太行一、二军分区，太岳一军分区，冀南二军分区的配合，是近地的配合；其他各军分区对各当前之敌的活动，就是远地的配合。

配合主要是破袭与情报。

### 二、执行师的青纱帐、雨季破坏封锁沟墙的指示

我们要破坏封锁沟墙，在封锁沟墙之后繁殖秘密小型游击队，发动群众铲除死心汉奸，建立情报网，破坏伪组织，打掉敌人耳目（情报网），配合政治攻势，这样来争取反“扫荡”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有的分区未执行师以前乘雨破坏封锁沟

墙的指示，是根本不认识争取空间、时间的重要性，是不对的。

过去我们对敌占区的维持政权一般地是不打垮，但以后敌人由点线逐步向外推广蚕食，而民众对敌人的奴役摧残也更进一步地认识清楚了，这时我们必须打垮，特别拔除伪组织中的死心汉奸要紧。这些伪组织中的一般人员看见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才易于争取他们。这前后两个时期的办法，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做的，并不矛盾。

### 三、县、区、村指挥部对于民众游击战争的组织与指挥

我们必须说清楚，县、区、村指挥部在军事上是军分区的直接隶属系统。如果说我们今年工作的重点是在建设军区，那末，各军分区的工作重点便应该是指导县、区、村指挥部组织民众性游击战争。如果说武委会是半军事组织，则县、区、村指挥部既有基干游击队又有人民武装进行游击战争，那就不只是半军事组织，而是军事机关了。当然，这个军事机关同样是党政军民的联合办事处，同时是不妨害各该本身工作的。只有指挥部这样经常工作的机关，才能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县、区、村政府一定要把三分之一的精力来注意群众武装的建设工作。野战军同样也对此建设工作担任推动之责。

武委会是人民武装的组织，是独立的、半军事半群众性的组织。但在其半军事上说，一定要接受相等军事机关的领导，而各军事机关的指挥，要经过武委会系统。

现在提出县、区、村指挥部要解决的四个问题：

其一，武装组织问题。这个问题有二：一是武装组织的装备问题，二是武装干部问题。抗战区有些士绅埋藏的武器，要经过群众借出来使用，以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也要尽量使用旧式武器，如土枪、土炮、刀、矛等，使参加武装斗争的人都有

武器。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敌人汉奸瓦解游击队组织的鬼话。地雷、手榴弹要很好配备，步枪要拿在可靠的人的手中。至于武装干部问题，“干部决定一切”，武装组织的干部，更有其森严的意义。我们某些地区人民武装干部中，混进了一些不可靠的人。我们武装组织是没有“三三制”的，因为全国大多数军队不但没有实行“三三制”，而且有些败类还瓦解他人的抗战军队，今后武装干部一定要是党员或进步分子。要提拔坚决执行政府土地法令的和反“扫荡”战斗勇敢的英雄。要大胆培养提拔本地干部，不要压住他们的头。

其二，训练问题。夏季反“扫荡”有我与雪峰<sup>(1)</sup>同志及师政写的三个总结。这是总的东西，要各级干部深刻研究，不能原封原样地整套搬到下层去教一切人，而只能按其基本要旨与教育对象写成教材，用一个月时间把游击队、民兵轮训完毕。这次训练要想定情况实地演习，切不可空口说白话，教条主义地按本宣科。主要内容是侦察、警戒、麻雀战及技术的锻炼与实习。地雷、手榴弹由军分区规定数目实习。教材中要抓紧敌人的规律和我们作战中好的例子，以及地形的利用与改造问题。接敌区道路要改小，使其仅能步行，不能通过车马。我们在各地要改造机动小路，好打敌人，使敌人打不到我们。教员除武委会基干队的人以外，军分区及野战旅一定要抽一部分干部去帮助。民兵中要注意培养特等射手。特等射手在反“扫荡”中着重射杀敌人官长，有重大作用。预期打仗的地方要实地考察，并将射击距离测量标示出来。

其三，情报、戒严工作。情报等于侦察，戒严等于警戒。一定要建立这两项工作，使之相辅而行，才能了解敌情，才能给予特务爪牙以有力地打击。情报工作在侦察会议上已经说了，只是做的问题。关于戒严、查路条、清查户口，我们一方



面仍要节省民力，但必要的戒严组织要建立，才能保护民众安全，不能放任汉奸横行。军分区与地委商定，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规定办法实行。

情报、戒严与除奸、防谍是不可分离的。今年五月反“扫荡”前，师政治部与区党委曾发出联合指示，要军队除奸部门参加地方保卫组织和帮助其工作。这一指示仍要地方各级组织切实执行。敌人特务机关能否在根据地横行，要看我们的工作来决定。

其四，瓦解敌伪军解放民夫的工作。过去我们腹地在反“扫荡”中没有政治攻势。要知道敌人“扫荡”是“清剿”来的。敌人带民夫来，我们便应抓紧民夫的民族教育。敌人来“扫荡”一次，我们便应给予一次大的民族抗战教育。这是我们对敌伪军与敌占区群众进行政治工作的好机会。我们也可以给放回去的民夫一定的宣传任务，以后武工队到敌占区衔接联系，进行秘密的组织工作。

#### 四、基于军队的训练

首先，应由各军分区、各旅首长对于三个总结深刻研究，根据其基本要旨来制定训练计划。时间一个月。主要内容是现实的游击战术。主要方式是在预期作战地域进行演习，而且要联系地方人民武装进行演习。要教他们投手榴弹，安放地雷，以及配合作战的一切办法，如送情报、救护伤病员、采集粮草之类。

#### 五、供给与资材

棉衣要早发。子弹、地雷、手榴弹要好好由参谋长分配，多余的要储藏在使用者的附近。其他的，如群众空室清野的生活资材，及我们储备军需——粮秣、油盐、柴炭、饭水的准备，由军分区与武委会照李达同志所规定的储备军械、军需的

数量和方法，拟定具体办法施行。

#### 六、卫生问题

昨天钱<sup>(2)</sup>部长报告过了，我只讲一点。我们卫生工作有很好的传统，供给与卫生要在分区开专门会议来布置。要商定具体办法鼓励他们做。区指挥部要组织药店、医生进行战时救护与防毒、防疫工作。

#### 七、司令部工作

首先要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领导机关的任务：一是思想领导，一是组织领导。我们思想领导差，组织领导更差。现在统率机关的组织问题，立即要做的就是我在总结上所说的前后梯队的组织与分遣问题。

其次说到侦察工作，特别对敌“扫荡”基地的侦察，准备在敌占区机动地点的政治与军事的侦察，都要预有准备。各部队作战地点的地形，也要实地考察。

其三，后勤部门工作，由参谋长具体计划，监察实现，不可放松。

其四，对所属各部与地方联系的制度，要认真建立与检查。

其五，我们在游击战争中，要研究敌我材料，要整理材料，提高对付敌人的战术。要惩办坏的，特别要奖励好的，好的例子必须在训练中表扬，从组织上奖励。奖罚严明，是军队的命脉，不可丝毫忽视，忽视就会削弱军队。

#### 八、政治工作

师政治部正在准备政治工作的计划与材料。我只谈思想准备问题。我们思想准备都是具体的，真实的。要联系中央“七七”两大文献提出的国内国外形势问题和有利的条件。我们有几年斗争的丰富经验，有较深入的民众工作，并有武装建设工作，特别有党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朱、彭<sup>(3)</sup>总副司令的

英明指挥。

思想准备最主要的是提高信心，反对悲观失望。近来有人开口便是“这个年头……”，表现一切都完了，没有前途。还有互相埋怨，也是无前途、右倾的表现。必须通过教育与必要的斗争克服过来。

对于我们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要有不断的政治工作相配合。

政治工作要注意使全体军民从政治上严格分清敌我。敌人经常以敌我不分来麻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关于群众中流行的打敌人会“惹祸”的观点，须要给予正确的解答。我们并没有去打东京，是敌人来侵略我们，何谓“惹祸”？我们不能做绵羊，一定要自卫，自卫并不是“惹祸”。如在民众隐藏地点不打枪，免被敌人发现，那正是自卫掩护的具体办法，不能把这一点曲解成为不抵抗主义。

对敌伪军、民夫的政治工作，要在反“扫荡”中不断地进行。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政治工作，必须协同动作。政治部与区党委，在必要时应发出联合指示。

最后，关于反“扫荡”一切准备工作，统限于九月底完成，由各军分区、各旅自行检查设施与测验教育成绩，在“双十节”再由师部检查测验。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刘伯承军事文选》刊印。

## 注 释

〔1〕即李雪峰。

〔2〕指钱信忠。

〔3〕指朱德、彭德怀。

## 毛泽东关于同蒋介石会面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

周：

二日电悉。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毛 泽 东

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周恩来关于毛泽东同蒋介石会面问题 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九月五日)

毛主席：

关于毛见蒋事，我再一次提出下列意见，请你及中央考虑：

甲、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其理由，首在根本方面：

(1) 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蒋约毛见面毛以林<sup>(1)</sup>代事，侍从室、军委会均大肆宣传，王芸生反映侍从室意见谈：“中共廉价大出卖”）。

(2) 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3) 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这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sup>(2)</sup>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者：

(1) 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sup>(3)</sup>等却看到苏联

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

(2) 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3) 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次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七七宣言发表并见董<sup>〔4〕</sup>周后，尚将救国会全体勾出参政会，七、八两月重庆尚大批捕人）。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

A. 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B. 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当否，万请考虑示复。

恩 来

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指林彪。

〔2〕指朱德。

〔3〕指何应钦。

〔4〕指董必武。

##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毛 泽 东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不但和抗日的第一第二年不相同，也和抗日的第三第四年不相同。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种情况，整个反法西斯各国在目前阶段上都是有的，整个中国也是有的，不独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根据地为然，但是尤以我军的各个根据地表现得特别尖锐。我们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它同抗日的开头两年和中

---

\*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间两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就只会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虽然已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懂得了，但是还有若干同志不懂得，这就是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抗战要有一个团结，在团结中有各种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政治上的困难，过去有，今后还可能有。五年以来，我党用了极大的力量逐步地克服着这个困难，

我们的口号是增强团结，今后还要增强它。但是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目前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觉得，我们就有唤起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呢？很显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



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但是，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

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 毛泽东关于答复同蒋介石会面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

恩来同志：

十九日电昨日阅悉，又接五日电，兹复于下：

(一) 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如张文伯<sup>〔1〕</sup>愿来延则先欢迎他来延一叙，如此较妥。

(二) 我们与民主政团及地方军人的合作，应服从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质的，其他合作是第二位的，次要性质的，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应使第二位服从第一位，这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三) 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并注意。

(四) 我西安办事处已于三日接办公厅通知，四日接三十四集团军通知，邀林彪前往，现正交涉飞机，准备日内动身。

毛 泽 东

八日午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即张治中。

## 周恩来关于目前国共合作中我之 方针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

毛主席：

（一）八日午电十日收到。

（二）国共合作为主，地方与各党派为辅，是历来统战的方针。不过武汉时代太重视了国共合作，甚至幻想一些成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且为国民党所吓住，反令其易于操纵，这不能不是一个教训。重庆时期，在你的斗争三原则及革命的两面政策指示下，国内外统战工作都得到了新的开展，除主要由于我中央领导正确和党的力量发展，使压迫者不得不有所顾虑外，统战工作亦曾在这方面有若干成绩。因此，自去年反共退潮后，此间即一方面在国共关系不团结状态下采取不刺激办法，另方面却努力于国共以外他方面（外交、地方、各党派、文化界）统战工作的开展。现在国共关系有趋于政治解决可能，我自应主动的争取这种可能，你指示的两项原则完全正确，且应坚持。

我们做法是这样：

子、对国民党争取谈判机会，但有步骤。

丑、如国民党在实际上压迫过甚，我们仍与之说理，请求解除压迫太过的事，也要从正面批评，不能默然而息，使其误认

我为屈服，已不复有何要求。

寅、对其他方面，统战中心在要求其与中央比进步，非比落后，坚决反对其弄乱了再说的观念，即在三四月时，我们与地方谈话亦说明：即使中央进攻边区，我们一边抵抗，一边仍要求停止内战，拥蒋<sup>〔1〕</sup>抗战到底，并告诉他们不要以武力响应。只是表示考虑，在适当时也要求停止内战，现在当然更不同了。对他们怕蒋、反蒋而不自求进步、自强力量的办法，要诚恳的要求他们改正。

（三）以上三点，你看对否？请示。

恩 来  
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 毛泽东关于目前任务是促成国共谈判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周：

十四日电悉。

(一) 何应钦、朱家骅及西西都将在国共谈判时起破坏作用，你前电所传“中共廉价出卖”等语，必是他们有意放出，企图挑拨。地方势力及某些小党派亦不愿国共好转，他们在某种时机亦想起挑拨作用。故对上述两部分人须极力警戒，不听他们挑拨的话。

(二)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sup>(1)</sup>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

(三) 林彪昨晨偕周励武乘车起身，因路坏车坏今天才到郿县。因陕北大雨为数十年所未有（延安南门外被水冲走军民

二百余人），故林走时带了五个兵随车修路，不知何日才到西安。闻蒋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到西安后要求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四）各方消息敌在彰德集中兵力，准备攻郑、洛，西安军事会议很快结束，必因此事，如敌不攻苏，则必攻华攻澳攻印，如攻华则很可能攻豫攻陕企图打断西北通路。敌阁建立大东亚省，将外务省权力剥夺殆尽，东乡辞职，似是为此，而非为日苏关系。只要两三星期内斯大林格勒守住，日寇不攻苏，则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

毛 泽 东

十五日亥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 毛泽东关于设法同 国民党军改善关系给陈毅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陈毅同志：

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毛 泽 东

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毛泽东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 问题给何克全的信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凯丰同志：

今日与博古<sup>[1]</sup>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sup>[2]</sup>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sup>[3]</sup>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指导。

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sup>[4]</sup>、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敬礼！

毛 泽 东

九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 释

- 〔1〕即秦邦宪。
- 〔2〕即吴亮平。
- 〔3〕即李维汉。
- 〔4〕指艾思奇、范文澜。

## 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 干部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

(一) 抗战以来，特别是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决定以后，部队在吸收、培养和提拔知识分子干部，获得了很大成绩。成万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他们表现了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积蓄了许多实际斗争经验，他们帮助我们军队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的提高，他们已与老干部携手并进，他们已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 军队中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三个方面：“容”、“化”、“用”。所谓“容”者，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干部。所谓“化”者，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所谓“用”者，就是正确的分配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

(三) 根据“容”、“化”、“用”三个方面来检查部队中对待知识分子的工作，应当承认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在“容”的方面，不积极争取知识分子者有之，排挤者有之，漠视歧视者有之，打击者亦有之，这些缺点使我们不能更好的争取与容纳知识分子。

在“化”的方面，我们的教育工作还非常不够，或者操之过急，不积极的引导，只消极的打击，甚至动辄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等等头衔，使新知识分子不能接受我们的教育，甚至引起反感，与我们教育目的背道而驰。或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采取漠视态度，对他们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行动采取放任政策。或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只采取书本的教条的教育，以为他们能够背诵一些抽象原则和术语便算无产阶级化了。知识分子由原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是需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艰难的曲折的过程，假若对知识分子不能进行很好的“化”的工作，则我们“容”的目的便很难达到，因为知识分子如不改变原来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则无法成为我们军队的优秀干部。

在“用”的方面，我们的缺点是：有些地方把很多的知识分子堆积在上层领导机关中当干事科员，这样使新知识分子得不到更实际更下层的锻炼，而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对上层领导机关的工作帮助也不可能很大。有些地方只分配知识分子以宣传教育工作，而很少培养他们去当中下级指挥员及政指政委。其他如分配的工作不适合其学力与兴趣，所用非所学，未利用其所长，不估计其今天的才能与将来的发展等等现象，则在在皆是。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用”知识分子，则“容”、“化”政策也难于圆满达到。因为分配知识分子以适当的工作，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是培养知识分子成为优秀干部的重要关键。

（四）在目前形势下，对知识分子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掌握与教育现有的知识分子，但不放弃一切可能吸收新的知识分子加入军队，整理我们吸收与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经验，以备将来吸收更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军队。为此目的，应加强对知

识分子的教育，不仅在学校中，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会议中、谈话中，教育他们懂得：

1. 必须在思想上实行革命，清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确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

2. 必须重视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与工农打成一片，知识分子能否革命到底，取决于能否与工农劳动大众站在一起。

3. 重视实际工作与 actual 经验，决心抛弃满足于书本生活，不肯深入实际工作轻视经验的毛病。

4. 重视组织并培养自己的集体生活的习惯，扫除小资产阶级原有的无组织，无政府，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五）在分配知识分子的工作上应注意：

1. 已经考验（几年抗战工作已经是一种严重考验）有能力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应当分配以负责的工作，如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团长、团政委、参谋长、政治主任等等。只分配他们当科员干事和文化教员，而不敢分配以负责工作，那是不对的。

2. 不要把知识分子堆积在上层机关中，应当派他们下去做更实际更接近群众的工作，以便锻炼、培养他们。上层机关中需要知识分子时，应当调集那些参加过下层工作有些实际经验的同志。

3. 要决心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出一批有知识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这须要一方面我们领导机关注意，另一方面向知识分子说明军事之重要。

4. 要根据知识分子各人的长处与爱好，分配和培养军队中各种工作人员，如组织、宣传、锄奸、机要、经济等人员，把他们全部或大部都局限在宣传教育文化娱乐工作是不正

当的。

5. 在分配知识分子工作时，对知识分子本人，应当强调服从组织分配、个人服从组织。然而对领导机关尤其是分配干部的机关，则应当要求更精细的熟悉每个人的特点、长处与爱好，务求工作分配更合理，更妥当。一切粗枝大叶，对干部发展前途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是有害的。

6. 对于知识分子中个别有政治问题的分子，应当加以慎重的严密的考察，务求如实的彻底的弄清楚。对于政治嫌疑分子，不作详细调查，只凭主观推测，随便作出开除逮捕的处理，是极端有害的。另一方面，对政治嫌疑分子麻木，不警惕，同样只凭主观推测，认为毫无问题，也是一样有害。对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应当经过考察，凡合格者，吸收他们入党。对于过去被开除党籍或停止党籍的同志，要加以重新考察，如发现其开除及停止党籍是错误时，应当恢复其党籍。

7. 对于少数不愿入党，只赞成共产党民主纲领，不一定拥护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要求不应过高，不应当排斥他们，而应把他们看作我们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

(六) 为使新老干部更加互相融洽互相补助，提议：

1. 每个战略单位内，进行调剂各部队间的新老干部。

2. 尽可能作到同级的新老干部相互掺杂（如营长是老的，营教导员是新的），以便相互帮助。

3. 与地方党进行交换干部，以便使军队与地方更能密切合作。

(七) 军队中知识分子的“容”、“化”、“用”三政策之能否更有成绩，有赖于各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在这儿，老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有决定意义的。老干部必须忠实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严格肃清自己排斥新知识分子的态度，反

对夸大知识分子的弱点，对知识分子采取耐心的和蔼的说服教育。老干部对自己的弱点，则采取坦白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自己的进步。务求新老干部团结一致，共同前进。

总政治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党与党报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九月九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通过的“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载九月十四日本报），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趁着这个决定发表的机会，趁着各地党的组织讨论这个决定的机会，我们愿就党与党报的关系的问题，有所阐述，来贡献给边区以及各地的党，并贡献给各地党报工作者。

我们常说：报纸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这句名言我们已经背得烂熟。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我们各地党的组织和党报工作者，真正照这句话去做了没有？如果仔细的一检查，就会知道，我们多少还有些以背诵名言为满足，多少还有些言行不一致。

所谓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这个“集体”是个什么意思？报馆的同人，也算一个“集体”。如果说这个“集体”就是指报馆同人而言，指几个在报馆里工作的人员而言，那末，报纸就不成其为党报，而成为报馆几个工作人员的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报馆同人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好恶、兴趣，来选择稿件，依照自己的意见来写社论、专论；总而言之，一切依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及党的意志，一切依照自己的高兴不高兴办事，不必顾及党的影响。办报办到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



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所以，所谓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决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党经过报纸来宣传，经过报纸来组织广大人民进行各种活动。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报馆的同人应该知道，自己是掌握党的新闻政策的人，自己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标的题目，直到排字和校对，都对全党负了责任，如果自己的工作发生了疏忽或错误，那并不是仅仅有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有关于整个党的工作和影响的问题。

党报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时时警惕，看重自己的责任。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这是办好党报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报馆工作人员一方面的事情。

但是要办好党报，要使党报成为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光有上述的一方面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另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是，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党报也同样不会成为真正的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

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要看重报纸，给报纸以宣传方针，而且对于每一个新的重要的问题，都要随时指导党报如何进行宣传。党的领导机关与党报的关系，也应当是很密切的、呼吸相关的、息息相通的。我们各地党的领导者，对于自己的机关报，要非常关心，要如像毛泽东同志对于《解放日报》那样，

密切的注意领导和培养党的机关报。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大的政党，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党建立了各种机关来掌握各方面的政策，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各方面的工作。党的领导机关，依靠了这许多机构，来领导和施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社会各种政策。党的这些机关，既然对党负责研究和施行各种政策，就有完全的必要来利用党报，宣传解释各种政策，推动工作和检查工作的进行，因此，同时也就有严重的责任来向党报供给消息，供给文章，提供意见等等。党报的工作范围是很广泛的，党报的工作人员负责掌握党的新闻政策，但没有可能要求党报的工作人员像上述那些机关一样精通每一个具体政策，精通每一件事情。党报的工作人员，不仅应当尊重党的领导机关，而且应当尊重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的意见。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同时，党的一切工作部门，都有责任，使党报充分地反映党的该部门的工作情形，使用报纸给该项工作以正确的指导，并且尊重报馆的要求与意见。

不但党的上级机关，因为党报是自己的机关报，有责任与报纸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供给党报以各种指导、材料、文章和意见等，而且党的各级机关，各级组织，以至于每个党员，都对党报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就是：不要对党报漠不关心，而要阅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文章、消息与谈话，推销党报，向党报通讯等等。党报是经过许多积极的党员，来反映群众的生活和组织群众的行动的。

这样，党报才真正能成为党的喉舌，成为集体的宣传者与

集体的组织者。

反之，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不动员全党来办报，其结果，党报还是不能成为党的报纸，而会多多少少成为报馆同人的报纸。报纸办不好，乃是全党的损失，这种损失，不仅党报的工作人员要负责任，而且每个党员都要负责任的。所以西北中央局的决定中，把参加党报的工作作为党性问题提出来，是完全正确的。西北中央局决定中说：“对党报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党性不好的一种具体表现，而经常看党报，帮助党报的发行及组织党报的通讯工作，则是每个党员所应当努力的责任。”

依照上述各点，来检查我们的党报工作，我们可以看见，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不论在党报工作人员方面，或者在党的其他部分方面，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对于“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这个有名定义的了解，多少还不够深刻。

究竟什么东西障碍着我们把党报办得更好？除了上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言行不一致的余毒以外，还有手工业工作方式的落后习惯。

报纸是影响人们的思想的“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天天出版，数量最多，读者最广的一种刊物，没有任何其他出版物可以与之比拟。我们的同志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手工业工作方式的落后习惯，使我们有些同志醉心于油印机，醉心于“个人谈话方式”，醉心于“办个独立刊物”，宁愿选择影响比较小的工具来传播他所要传播的东西，却不愿去使用“最有力的工具”。要把任何工作做好，就总有些话要对大家说的，既要说话，就总要用些什么工具。当然，在没有报纸的时候，油印机也是好的。但我们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党报，这时候再去留恋落后的方式，就是不很聪明的事，客观上等于不想充分传

播党的影响，不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了。在有党报的地方，改正这种落后的习惯，积极使用报纸，是一个大问题，是改进工作的重要一环，这是我们全党都要注意的问题。

根据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刊印。

## 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

(一九四二年九月)

陈 云

最近，中组部需调一批人去敌占区工作，其先决条件是，他们要在敌后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或能找到立足过渡的关系。通过在各机关、学校寻找和与有关同志谈话，在条件比较合适的一百一十七人中，除少数人表示服从党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均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饰推诿，或当面拒绝。这些人都是抗战时期入党的知识青年。在国内外斗争日益艰难的时期，尤其在整风时期，竟有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现象。

不服从党的工作分配的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自称文化人的人。这些人表面上以无秘密工作经验或社会关系与身体不好等为理由，实际上是自命不凡，以文学家、戏剧家、歌唱家自居，怕危险或离不开爱人。

第二，在社会上混过事，有些世故经验，抗战时走顺风入党的人。这些人在谈话时，尽量减少某社会关系的可利用程度，实际上是因家在延安，现在工作相当稳定，不愿做危险的事。

第三，年轻幼稚、苟安现状及对秘密工作恐惧，或在参加革命时即多少带有光耀门庭思想的人。这些人在延安机关、学

校中是相当多的。他们除丢不开爱人、对秘密工作恐惧、怕危险外，还有不少是因为现在回去，没有一官半职，觉得对家庭乡里面子上不好看。

第四，一帆风顺的大学生。他们原是少爷出身，参加革命时有赶热闹的成分。他们的社会关系并不坏，却要描写得无法利用，实际上也是离不开爱人，怕危险。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几种人不接受工作的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因，就是没有为革命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明确观念。他们中也有人曾想到革命难免要牺牲，但最好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万一临到自己头上，也应尽量躲避。所以，遇到党分配有生命危险的工作时，他们总要用尽一切办法来推诿，而且为了推诿得很漂亮，使党不易察觉，他们总有一大堆理由为自己辩护，什么自己“特殊”呀，“不合个性”呀，党还“不够了解”他呀，他“还不到牺牲的时候”呀。在他们看来，不接受党要求的工作，是因为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不合乎干部政策。甚至少数人竟含有这样极端荒谬的思想，以为拒绝党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爱护党；如果接受工作，反而是一时的感情用事，党性不强，不替党爱护干部。

另外，从各种表示愿意接受工作的人来看，也还没有那种在延安牵挂多、身体弱、敌后关系不好，而能经过考虑，决心为了党的利益去牺牲个人一切的人。这说明，即使接受工作的新党员新干部，也还没有达到一个党员应有的党性水平。然而，尽管如此，毕竟去敌后工作的人，生命危险性是很大的，他们表示愿意去，说明他们的个人利益多少被克服着。这不能不说同他们过去受过的下层的相当锻炼或延安某些学校较严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新党员新干部中很少有能无条件接受工作的人，这是否意

味着抗战后入党的知识青年和大革命或内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的质量有根本的不同呢？

从各时期参加革命的不同阶级出身的人数比例上看，现在党员的质量虽较过去有很多差别，但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均系小资产阶级，普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们在每况愈下的生活中，日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至不断地加入到党内来。大革命和内战时如此，抗战后更如此。所不同的是，在三个时期中，随着环境的不同，斗争各有偏重，因而参加的人数比例不同，受革命的锻炼也不同。如果把大革命和内战时大批脱党的人算进来，那时的党员数目也是极大的。现在仍留在党内的大革命和内战时的党员，连牺牲的人算在内，同那时的党员数目相比，倒是少数。虽然在抗战后有不少人因抗日而加入党，但由于党的教育和战争环境的锻炼，照样能把他们中的很多人提高到真正党员的水平。所以说，抗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比大革命或内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虽有区别，但在质量上还是一样的。如果单就政治常识的水平看，由于大革命和内战以来政治斗争的增长，进步书报的增多，抗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倒比过去两个时期还要高些。

那末，为什么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会有这样严重的党性薄弱的现象呢？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学生，他们生长在抗日的环境，又处在和平的边区，入党后就未得到适当的锻炼，有的还是“老延安”，几年来只在几个机关、学校转来转去，碰不到任何较大的困难。因此，他们的缺点很少有机会得到暴露和纠正，甚至还在无形中增长。如果看同样党龄的新党员新干部，经过几年前方的和下层工作的锻炼，则显然与长期在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有所不同。这更说明，小资产阶级



出身的知识青年，只有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锻炼，才能逐步消除其小资产阶级意识，增强无产阶级意识。

第二，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缺点或多或少助长了他们的不良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学校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使他们对书本上的条文津津乐道，无形中助长了其自高自大的态度和不务实际的作风。（二）组织教育中的某些不适当的做法，助长了他们投机虚伪的心理、自由散漫的习气和看重个人利益的偏向。比如，组织生活多流于形式主义，忽视真正的纪律教育；又如，分配工作或学习时，迁就得多；再如，党的建设教育未能着重强调个人服从党的问题，模糊了干部与普通党员的界限，等等。（三）本位主义的影响。比如，一些机关对于经过学习后仍旧要调回本单位工作的干部，往往直接将其送入某校或要求中组部送入某校，实际某校对其并不合适；又如，某些机关、学校暗地拉人，甚至当中组部调动某系统的干部时，某干部本可接受调动，而原机关、学校却有意无意地示意其不接受调动；另外，还有一些机关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当发现某党员干部思想意识不太好时，不去耐心教育，而用调工作、送学校的办法推出门了事。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某些新党员新干部的个人主义思想及不良倾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在延安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薄弱的原因，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因其有内在原因，所以党性薄弱现象难免。因其有外在原因，所以党性薄弱的现象完全可以防止或在短时间内得到克服。办法就是改变外在不好的因素，使它成为好的因素。要使一个党性观念不强的人较快地达到坚强的境界，可以用加强对其教育和锻炼的方法。这在过去老党员老干部身上得到过证明，现在前方的新党员新干部身上也得到了证明，在这次接受去敌后工作的人身上又得到了证



明。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新党员新干部如何教育、如何锻炼。

根据目前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薄弱的情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增强其党性的工作：

第一，加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教育。利用这次整风的机会，以这些不接受工作的人为例，在各机关、学校展开讨论，以转移风气。要使人们了解，没有党就没有个人，只有在党性建立之后，个性才有可能建立与发展。每个党员必须具有随时准备为党牺牲的决心，这是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必须明确自己是革命的牺牲者，而不是革命胜利的享受者。要知道，牺牲的场合不仅在残酷的刑场上和战场上，而且还在极平凡的技术工作和事务工作上。在这些岗位上任劳任怨、千辛万苦、积劳成疾也是牺牲。牺牲的价值不取决于表面上代价的大小，而取决于党对它的需要。

第二，大批地分派新党员新干部到下层锻炼。在整风后将大批的延安新党员新干部派到地方上去，派到技术部门去，派到事务工作中去。对新党员新干部使用的基本原则是，要使其多走逆风，少走顺风。必要时，对某些新党员新干部要分配其不愿干的工作，以磨练其意志。但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必须审慎行事，不得草率，防止出现更坏的结果。

第三，加强纪律教育。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事先必须多加考虑，一经决定，绝不准讲价钱，严格纠正过去的迁就作风。在安排新党员新干部工作与学习时，必须拒绝任何人的任何非组织路线的建议，严格纠正本位主义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不合组织纪律的作风。在各学校中及党的建设上，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强调无条件地服从党，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对违犯纪律的人，要及时地给予适当的纪律教育与纪律制裁。各级

---

行政与党的负责人，应对过去纪律教育情况详加检讨和总结，并把纪律教育作为日常考察的一个内容。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集》第一卷刊印。

##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张 闻 天

据调查，兴县二区十四个村战前共八百七十二户，内富农四十一户，占百分之五。现在共八百九十七户，内富农五十户，占百分之六。战前雇农五十三户，占全户口百分之六，现在三十七户，占全户口百分之四。富农雇农合计，战前占全户口百分之十一，现在占百分之十。若按一户雇农出一个雇工计，战前每户富农平均雇佣不到一个半雇工，现在平均不到一个。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成分在农村是很微弱的，封建的成分，即地主与农民的成分，还占优势。

但农民已起分化。除富农、雇农外，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是中农、贫农小资产阶级成分，这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园地。

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不会运用新民主主义政治力量，推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甚至机械了解“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以为，晋西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晋西北今天的经济，也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了。

应当知道：什么是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发展它？

晋西北封建势力还强大，农村资本主义只是萌芽，工商业

资本家根本没有。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可使社会进化的。封建剥削制度下，地主出租土地，农民租进土地，土地使用很分散。地主以高额地租盘剥农民，而农民缺乏生产工具和资本，生产情绪不高。所以农业生产力是低下的，农民生活是痛苦的，社会也是贫穷的。

在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下，首先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土地集中使用，而又合理分工。富农饲养牲畜猪羊，经营工商业（油房、粉房、磨房、染房、商店等），自己有工具，有肥料，有资本，可以把土地耕种好，多打粮食和棉花。土地产量越高，对富农和资本家越有利（所以他们不像地主那样对生产漠不关心，当寄生虫），对全社会更有利。资本主义经营，可使商品经济园艺业等发展，因工业需要原料，商业需要货物，富农和资本家又需要货币支付工资和投资工商业。我们在晋西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定要靠农业积累资本。将来社会主义，又要靠新式资本主义发展做基础。

为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第一，不要怕晋西北资本家多。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山地，这有什么不得了呢？倒是应该限制地主，奖励农民，才合我们的政策。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

为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第二，不要怕农民受苦，就是说，不要怕雇农多，没法安插，失业、工资低，生活恶化。今天雇农、贫农的生活，都是很苦的。说贫农永远比雇农生活好，贫农不要丢失土地当雇农，这是落后的想法。欧美各国资

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的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一定会改善。因为革命政府颁布劳动法令，限制富农资本家随意剥削工人，政府将有计划从农村征调工人，不会造成农村无政府状态，造成农村破产。

所以，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

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三卷刊印。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许多人在这种时候还被德国的攻势所迷惑，以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军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军的战役统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军的最精锐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带决战性的。德军猛攻不克，整个德奥土保阵线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后的崩溃。然而当时英美法阵线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军仍极强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经快到面前。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

---

\*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视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间世界人民的注视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希特勒在西线胜利以前，他似乎是谨慎的。攻波兰，攻挪威，攻荷、比、法，攻巴尔干，都是注全力于一处，不敢旁骛。西线胜利后，他就冲昏了头脑，企图在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向这个庞大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就分散了他的兵力。去年十月向莫斯科进攻的失败，结束了苏德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特勒第一个战略计划破产了。红军制止了德军去年的进攻，并在冬季举行了全线的反攻，是为苏德战争的第二阶段；希特勒转到了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此期间，希特勒撤消了他的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自己充任总司令，决定放弃全面的进攻计划，搜索欧洲全力，准备向南线作局部的但被认为是打击苏联要害的最后进攻。因为这一进攻带着最后一次的性质，关系法西斯的存亡，希特勒就集中了极大的兵力，连在北非作战中的一部分飞机坦克都抽调过来了。从今年五月进攻刻赤和塞瓦斯托波尔起，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希特勒调动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

力，附以飞机坦克的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作空前剧烈的进攻。他企图迅速攻下两处，达到切断伏尔加和夺取巴库两个目的，然后北攻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并令日本法西斯集中兵力于满洲，准备在斯大林格勒攻下后进攻西伯利亚。希特勒妄想把苏联力量削弱到足以使德军主力从苏联战场上解脱出来，以便移到西线对付英美的进攻，并可掠取近东资源，打通德日联系，同时，日军主力也可从北面解脱出来，以便西进南进对付我国和英美，而无后顾之忧，这样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但是这个阶段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希特勒遇到了苏联制其死命的策略。苏联采取了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的方针。五个月的战争，使德军既没有打进高加索油田，也没有打下斯大林格勒，迫使希特勒顿兵于高山与坚城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损失甚大，陷于僵局。现在已是十月，冬季就要到来，战争的第三阶段快要结束，第四阶段快要开始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

拿希特勒在第一阶段上的情况和第三阶段作比较，就可知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目前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方面，实际上均已停止了德军的进攻，希特勒已到再衰三竭之时，他对斯大林格勒、高加索两处的进攻已经失败。他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整个冬季中所整备的一点兵力，已经



耗竭了。在苏德战线，距冬季不到一个月了，他须赶快转入防御。整个顿河的以西以南是他的最危险的地带，红军将在这一带转入反攻。今年冬季，希特勒因被死亡所驱迫，将再一次整备他的军队。他或者还可能搜索他的一点残余力量装备出几个新的师团，此外则乞援于意、罗、匈三国法西斯伙伴，向他们勒索一些炮灰，以应付东西两线的危局。但是，他在东线须应付冬季战争的极大消耗，他在西线须准备对付第二条战线，而意、罗、匈等国则将在希特勒大势已去的这种悲观情绪中，一天一天变成离心离德。总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四十八天中，红军的保卫斯大林城，和去年保卫莫斯科市有某种相同。这就是说，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计划也像他的去年计划一样，归于失败。其不同点，则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虽然接着举行了冬季反攻，可是还要遭到今年德军的一个夏季进攻，这是因为一则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尚有余勇可贾，二则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缘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则形势将和去年完全两样。一方面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欧洲人民也将准备着起义响应。另一方面，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

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的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的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对党员察看处分 执行办法的规定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对于党章第四十五条关于察看党员的处分问题，根据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与实际情况的需要，特规定具体执行办法如下：

(一) 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处分适用于犯有严重错误，但其错误程度尚不宜开除党籍而需留在党内加以考察教育者（相当于过去的留党察看）。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之后，其党内权利及义务与候补党员同。

(二) 停止党籍。此种处分，适用于此类党员，即党组织对他有重大疑问，尚未查清，既不便留在党内，又不宜开除党籍，因此必须停止党籍，加以考察者（即党外察看）。停止党籍者不享受党员的权利，不担负党员的义务，但党可以分配他适当的党外工作。

(三) 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的处分，须经高一级党委的批准。停止党籍的处分，须经高两级党委的批准。被处分者对处分不服时，得按级或越级申诉。

(四) 党组织对党员作出降为候补党员或停止党籍的决议时，均须在决议上规定每隔多少时间重新审查他的问题（例如每三月、半年或一年审查一次），考察他所犯的错误是否已经

改正，党对他的疑问是否已经查清。被处分者亦有责任按期或随时向党组织提供其已经改正错误或帮助党组织查清与疑问的材料。

（五）被处分降为候补党员者，如经党组织恢复其为正式党员时，候补期内一般的不算党龄。被处分停止党籍者，在党组织重新解决其党籍时，其被停止党籍的察看期内及其以前之党龄，是否计算，按具体情形决定之。

中 共 中 央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刘少奇关于新四军今后应采取背靠山东的战略方针给陈毅等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陈饶曾赖<sup>〔1〕</sup>：

(一) 我们已安全到达太行山，各方面情况我不很清楚。

(二) 目前我党正争取在战后继续国共合作的前途，竭力避免内战的前途。因此，新四军在反攻与战后时期亦不会主动采取向长江以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为了防止蒋介石在反攻时期以重兵出山东，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乘机打击围困新四军之阴谋起见，在目前努力巩固与加强山东阵地实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新四军今后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山东，应该背靠山东，努力协助山东阵地的加强与巩固。否则，山东如被国民党控制，则新四军将处于危险困难地位。

(三) 你们以后应密切与山东的联系，应在各方面帮助山东的工作，研究山东的情况。如有可能，在今冬明春陈毅或饶漱石亲去山东一次更好。以上系个人意见，望加考虑。

胡 服

十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注 释

〔1〕指曾山、赖传珠。

## 宗派主义在对党外关系上的排外性<sup>\*</sup>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董 必 武

宗派主义是我党工作中一种不正的作风，党曾经和它作过斗争，所以它现在在党内没有占着统治的地位，可是也没有根绝，它的残余还不时袭击我们党，使党受到损害。它在党内作起怪来，闹独立性，闹个人主义，且曾闹过派别和小组织，阻碍党的统一团结，这是大家很容易了解的。但如果认为宗派主义只有在党内才发生坏作用，在党外是无问题的，那我们就错看或小看了它。

有宗派主义作风的同志，在党内阻碍党的统一团结，对党外也阻碍党与党外人士的团结。他的个人主义与闹派别等等作风，对党外的嚣张跋扈，将比在党内更厉害些。什么缘故呢？因为党的组织比社会上别种组织严密得多，有领导机关及同志间的指导和监督、揭发和批评，宗派主义一被发觉，就会受到应有的纠弹。宗派主义者与党外人士相处，那些党外人士或者无组织，或者组织较松懈，大家都客客气气；如果别人知道宗派主义者的他是我党党员，因党在群众中威信的增高，别人对他更将另眼相看。而且宗派主义本身就植根在阶级社会里。这样它获得适当的园地而又很少受到抑制，怎会不更加嚣张跋扈

---

\* 本文原载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新华日报》。

呢？宗派主义在党外越能发挥其劣性，就越使党和党外人士隔离。它在对党外关系上是一种关门主义。

我党与党外的关系是有很好的成绩的，特别自抗战以来成绩更大。但我们还有部分的同志，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宗派主义的余毒。这种余毒的表现：首先是骄傲。犯这种错误的同志也许是不自觉的。他记得几句马列主义的公式，便自命不凡，摆架子，妄自尊大，瞧人家不起，不愿意听别人讲话，不喜欢人家提出不同的意见，不屑于和人家商量问题，一知半解，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吹毛求疵。对人则求全责备，对己则文过饰非。这正是孟子所说“诋诃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就无法和党外人士生活融成一片，也就无法了解党外的真实情形，更无法使党和党外人士密切的联系，而会走到孤立的路上去。实则我党是不能孤立而存在的。党要完成其革命任务，更非依靠党外人士（特别是劳动群众）作基础不可。任何时候，党外人士总比党员要多好多倍。不团结党外人士，党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其次是狭隘。抱持宗派主义的同志，在党外通常只和几个性情相近、气味相投的朋友往来，认为只有和这样的人才谈得来，才可与共事，对除此以外的广大人群，则不感兴趣，不求接近。不管什么人，在社会上有几位较亲密的朋友，原是无可非难的事。但除几位较亲密的朋友而外，再没有朋友，而又不再去结交朋友，那就把他自己和党的工作拘限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内。甚至以耳代目，蔽聪塞明，把狭小的圈子当作恢廓的宇宙，漠视圈外的实际情况及其变迁。这种人不看圈外的报纸和刊物，不听圈外人的言论，不见圈外的人物，以为这样可以保持自身的纯洁。结果，使党和广大人群隔绝，党亦不能迈步前进。

无论骄傲也罢，狭隘也罢，其所表现的只是宗派主义。这和马列主义毫无相同之处。马列主义认为：革命的政党必须与群众密切联系。也就是说，生活在群众中的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密切的联系，才是切实执行马列主义的原则。党员在社会上工作，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把这些呼声和需要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使党的领导机关能经常感应到党外人士的脉搏在如何跳动，这种感应越广泛越好。党借此可以测验它的政策和政策执行得是否适合客观的要求。党员在党外工作，不仅要善于依据党的政策去领导党外人士，同时也要善于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党外人士学习，向群众学习，是马列主义革命政党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如果还没有涤除旧染的骄傲和狭隘的余毒，那只能证明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还只学习了它的词句而抛弃了它的实质和精神，纵令读了一肚子马列主义的书，不仅于党于革命无益，反而有害。这是值得我们深省的。

骄傲和狭隘一类的作风，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不合于党的要求的，尤其在目前是严重地违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违反党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的。我党的宗旨是要成为群众的党，经过二十余年的奋斗，已获得不小的成绩。党要在全国范围内和群众融成一片，特别是在目前反法西斯战争中，反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寇，党的政策是联合全国抗日的各党派、各阶层以争取反法西斯反日寇战争的胜利。我们的敌国还很强大，不联合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的力量和它血战，是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的。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游击根据地所主张的“三三制”，保障人权、财权及其他关于租佃关系、劳资关系等等的决议，都是为着团结全国各抗日党派、各阶层而设的。要团结全国各抗日党派、各阶层，首先就必须与党外人士



民主合作，这是无须多说的。我党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是永久的，是不变的。这是因为我党不能脱离群众而存在。现在要与群众密切联系，党实行了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将来依然要与群众密切联系，所以党将来还是要实行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共产党除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其自身单独的利益。它不是谋个人或几个人私利的小团体。它经常在群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如果它违反群众的意旨，不仅群众会厌弃它，而它在受到敌人袭击时也就无法得到群众的帮助，它自身就有陷于灭亡的危险。“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这是共产党所不容许的。闭在狭隘的圈子内幽居而和群众隔绝，和党外人士隔绝，同样是共产党所决不容许的。

总之，宗派主义者骄傲和狭隘的作风，除了在理论上指明其错误外，还必须在实践中去克服。我们一定要和群众和党外人士进行切实的民主的合作。让我们去倾听群众和党外人士的呼声吧！去了解群众和党外人士的迫切需要吧！去向群众和党外人士诚恳的学习吧！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党员，有些不同于群众，不同于党外人士（这种不同是存在的，是必要的），只是去领导他们吧！我们还应该向他们领取宝贵的教训！群众和党外人士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补习学校，是马列主义的活页课本，是马列主义的实验所。我们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作指导去和他们一块生活和工作，可以告诉他们一些东西，同时也要从他们那里吸取新的东西，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董必武选集》刊印。

## 评柏林声明\*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

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被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亦非谓三国公约中的任何一国业已决定或被迫将主动地位给予敌方，此不过表示德国及其盟友在作战三年以后业已赢得一个不易被攻的地位，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

这后一段话是说谎的。但这个说谎对于目前法西斯的地位极其必要，这是因为今年希特勒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和去年他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大不相同的原故。

在去年，因为德国尚有余力，可以准备在今年再取一个攻势；因为日本法西斯和希特勒约好了不久就要爆发太平洋战争，而这就被认为是一则足以麻醉人民，二则足以牵制美国、削弱英国，而不致有第二条战线；此外还因为日本法西斯答应希特勒，在某种条件下（例如德国第二个夏季攻势达到了战略目的等）它可以进攻西伯利亚，和德国合力打击苏联：这三个条件，在那时都是存在的，或是可能的，所以希特勒在进攻莫斯科失败转入守势之时，他就不需要说出如像现时这类可怜的

---

\*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谎言，他就可以拿撤销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给他的军民人等看，说战争是由勃鲁齐区弄坏的，他自己当了总司令就自然有办法。

果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受了很大损失，日本闹得声势煊赫，这件事立即在德国及欧洲人民中起了麻醉作用，希特勒所遭受的夏季攻势失败与冬季红军反攻两个创伤，就被这副麻醉剂把他的痛楚减轻了许多。今年希特勒实施夏季攻势时，又果然没有发生第二条战线。

在去年，希特勒一面应付红军的冬季攻势，一面还补充了旧部队的兵力，重新装备了新的兵力，又从意、罗、匈等国拉来了几十师军队，所有这些，是被希特勒及其一切法西斯伙伴们认为是自己还有前途的最主要的基础，他们感觉自己还有实力。在此基础上，希特勒果然举行了今年的攻势，虽然不如去年那样煊赫，但在七、八、九三个月间也颇迷惑了一时，使得人们似乎觉得希特勒还有很大气力似的。

只有第三个条件至今没有动静。要说还有可能的话，那末，似乎只有一种时机，就是说，当英、美实行对德进攻或接近这种进攻时，法西斯们为了死里逃生起见，或者日本军阀们还会干一下。但是拿这个条件来配合希特勒今年攻势的预定计划是破产了。

在去年至今年，三个条件实现了两个，这就是德国法西斯们一年结账时他们还可以自鸣得意的一面。

但是还有另一面，就是说，三个条件一齐破产了。第一个，今年的攻势完全破产了。去年还有这个法宝，可以安慰自己，安慰人民，今年没有了。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他

的人力资源与军备资源即使再搜括，也不能组成一个像样的攻势了。过去所借以维系人心与借以延续法西斯生命的基础条件——德国的进攻实力，现在转到了它的反面，这个条件是基本上破坏了。就在这种时候，法西斯们需要以完全的撒谎来维系人心，但是世界上没有不拿实力而拿撒谎可以维系人心的。斯大林谦虚地说：“苏联力量不说较大，也不小于法西斯”，在希特勒攻势破产后，红军的力量是强大于法西斯的。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内部将发生分裂的危机，过去那样的团结不可能了。法西斯与人民间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民心军心都很难维系了。德国与意、罗、匈、芬以至日本间的关系有大闹别扭的趋势，意大利甚至有倒戈的危险。欧洲几个中立国的态度也将起变化，某些国家或有加入同盟国之可能。

讲到第二个条件，今年也是去年的反面。日本的胜利促起了美国的整军，美国以一年时间不但补偿了夏威夷一役的损失，而且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和柏林宣布守势的同一天，罗斯福说道：“关于开辟第二战场，吾人对于战略已有若干重大决定。其中之一，为吾人所共表同意者，即须要向德、日发动新攻势，以分散苏联与中国境内的一部敌人至其他战场。”日本是畏美如虎的。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情报部发言人说道：“自英国威尔斯太子号沉没后，美国即追加空军预算四十万万，将战舰改造为航空母舰或改变其设计者共十四艘，又改造商船二十艘及设计中之商船七十艘，改为航空母舰，这说明美国多么重视航空母舰。我国不能坐视美国建舰，要在美国建舰未成前采先发制人办法击灭之。”九月二十六日，东条说道：“英国逐渐整备了战略路线，美国反攻企图日益明显，两国依靠其丰富资源，急速增强其战斗力，待时进行总反攻，大东亚战争的正规发展还在今后。”总之，日本在美国面前，吓得全

身发抖了。德国呢？也是一样，十月十二日柏林发言人也说道：“美国业已开始大规模的军备计划。但无论其如何强大，若欲谋收复欧洲、非洲及亚洲，则非其力之所能及。”这后一句也是撒谎。实际上，法西斯们清楚地觉到，第二战场的魔影已一天一天地接近了他们的后门。八月二十八日，法西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机关报，竟至于借了红军的威风去恐吓英、美，鼓舞军心。这个报纸说：“曾在东线举行空前剧烈战争的人员与武器，将予英国以最后的清算。我们应该问一问在东线战争严格考验后调至西方应付第二条战线的德国武装人员，他们之中每一人都迫切希望向英国，或者还可说向美国这两个敌人，试验他们在东线‘无限壮大’的力量。当英国一九三九年宣战时，他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而我们更好地知道战争是什么，而现在我们完全知道战争是什么。”这就是向英、美说，我们是红军的学生，你们敢来吗！这就是向德国士兵说，我们是和红军交过手的，还怕第二条战线吗！法西斯们知道战争是什么呢？他们知道战争就是失败。十月四日，戈林恐吓人民说：“如果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则德国的命运将是悲惨的，德国人民将被国际犹太人的毒牙咬断，并被消灭，德国将在地图上被抹掉。”总之，法西斯们现在是专靠撒谎与恐吓吃饭，而不能靠实力吃饭了。他们的进攻实力已经完结，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还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故日本是否还要向北或向南举行一个大的冒险，此时还不能作断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了的，日本面前摆着一个美国反攻的大危险。拿日本现存实力和这个将来危险作比较，那简直是不能设想的。日本军部对于美国飞机、军舰的生产，表示那样彻骨的惊慌，就

是从这事实发生的。日本目前是站在这样的分歧点面前：还是照德国今年攻势那样来一个一定失败的冒险进攻呢？还是以德国作殷鉴保存这点力量以期在防御战中侥幸取胜呢？假定日本法西斯采取第一条路，那在德国说来，其意义是为了援助德国防御而使用日本的进攻，就是说，为了牵制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攻势而使用日本的进攻，这和今年为了援助德国的进攻而使用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及希望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大不相同。假定日本采取第二条路，那对日本当然有利些，但对德国就完全不利，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东西两个法西斯国家要闹起别扭来。德国在今天以前利用了日本的进攻英、美，但没有能够利用日本进攻苏联。今后呢？德、日情况都有了很大不同，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政策，还要等一下才能看清楚。

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法西斯的命运是决定了，只有十分怯懦的人们还在害怕法西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总政治部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 三风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

各级政治机关同志们：

在整顿三风的运动中，我们必须具体的仔细的来研究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

我军政治工作有其光荣的传统和显著的成绩，在整顿三风时，如果认为在我们政治工作中统治着的是三风不正，那是不合事实的错误的估计。然而假若自满自足，认为政治工作中没有三风不正的成分，一切都已尽善尽美，那也是主观主义的有害的错误的武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与整风文件，来观察我军政治工作的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下列三风不正的地方：

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应当是实行与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的有力工具。然而政治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对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不求甚解，粗枝大叶，生硬搬运，不具体化的现象。政治工作的计划，往往空洞抽象，往往从主观想象出发，不会周密研究客观情况；而其内容，又往往面面俱到，应有尽有而缺乏中心。许多政工人员思想硬化，工作方式方法总是老一套，缺乏生动的创造。上级对下级指示许多是不具体，不痛不痒。下级对上级的报告许多是空泛无内容。许多政治工作人员缺乏调查研究的习惯，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或者把书本上的、上级



指示上的东西背诵一番（教条主义），或者是局限在已有经验上，不管有无变化，重复老的办法（经验主义）。在政治工作作风中，简单粗鲁，不细致，重形式不重内容，重表面不重实效，以纸面计划代替细腻的组织工作，不讲求领导艺术。在组织关系上，军队对地方，主力军对地方军，部队中各种干部间的关系上，都还有宗派主义的残余。至于文风上，无论在口头或文字方面，党八股的风气更为普遍。这些就都是政治工作中三风不正的表现。

再就政治工作的各部门工作而言，也可以发现许多三风不正的地方：

在宣传教育工作中：关于干部教育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已见中央及军委总政指示。在宣传工作中，不问对象，背诵名词口号，抽象化，公式化，不通俗，不生动等等现象，不是到处都有吗？

在干部工作中：对干部的认识，许多是缺乏历史的全面的观察，而是带着片面性的，不懂得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看干部，而以孤立的停滞的眼光看干部。在干部提拔上，不知兼顾德才资者有之。对干部犯错误时，采取过分打击政策者有之，姑息放任者也有之。对干部的认识是个过程，我们不仅从言论上去认识干部，并且主要要从行动上去认识干部，而且我们的认识要在实践中充实纠正与修改，逐渐达到较正确较完备的认识。对干部问题上的粗枝大叶，其为害之大，我党历史已有证明。在新老干部，本地干部，外地干部，各部队干部等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宗派主义局部主义的遗毒，是存在的，急待我们检讨与纠正。

在党的工作中：一方面，民主生活极端不足，对党员权利重视不够，党务与军事管理不分。另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



象仍然存在，而民主集中制的真义没有很好的发扬。在发展教育与教育党员上，只求数量增加，不求质量改进。会议生活内容，或则陷于庸俗，或则过于空洞。

在锄奸工作中：神秘化的作风与闹独立性的习气还没有彻底扫除。在锄奸工作人员中，一方面，只靠主观推测，不靠客观事实，只靠肉刑口供，不靠侦察材料，儿戏他人的政治生命与肉体生命的现象，不是还没有肃清吗？另一方面，麻木不仁，不去找事实，不加紧侦察工作，对某些确有问题的人，一概视为无问题，不也是另一种主观主义吗？须知奸细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奸细，也不会把奸细的面目，充分的表露出来，奸细愈奸滑，则其隐藏本来面目的本领就愈高，锄奸工作的任务，就是发现隐蔽下面的事实，发现假面具下面的真面目。

在对敌伪工作上：对于敌伪情况我们知道的还不多，认真的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还太缺乏，传单宣传品写得很好的尚少，公式化、一般化的弊端仍旧存在。

在民运工作中：不认识民众是与士兵不同的，地方党政干部同军队干部是不同的，把军队的工作方式搬到地方上去，好像民众和地方干部都是同军人一模一样。不问时间与地点，不论根据地的开辟时期，发展时期和目前时期之不同，一律采取包办，不顾地方工作的独立性。把根据地的一套施于敌占区和接敌区。这些不也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吗？

在对友军联络上：把顽固分子当作汉奸，把中间分子当成顽固分子，把反共集团看成天衣无缝，不会利用矛盾，不会团结多数打击少数，而在政策的执行上表现时左时右。

总之，政治工作中三风不正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以上所述，并不是总结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而仅仅是提示与号召，以供各地同志之讨论研究。只有各地政治工作总结后，我

们才能集合材料，加以整理，作出一个总结。

在我们对于每一具体工作部门指摘出这些错误与缺点时，我们必须估计到自己的正确方面与成绩方面，我们有许多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也有许多实事求是的成绩；我们有许多宗派主义的错误，我们也有许多处理得正确的事实；我们有许多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我们也有许多生动活泼的创造性的作风，并且在每一具体部门与每一具体时期中，要恰当估计缺点与成绩所占的地位，何者是主要的，何者是次要的。只有这样历史的全面的观察，才能推进我们的工作，做出正确的总结。

为要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我们希望各级政治机关，进行下列几件工作：

（一）各级政治机关人员，特别着重的是团以上的高级人员（连、营两级主要的靠讲解，不是阅读）切实仔细研究关于三风的文件，以求了解三风的一般问题，以求更好的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三风的特殊问题——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同时，并帮助军事工作人员对于军事整风的研究。在研究文件时，须和军事工作人员一起进行阅读讨论，反省写笔记，但不得妨碍战斗。

（二）研究各部队政治工作现状，由研究个别问题起，而达到总结一般问题，先分析后综合，先调查后研究，先收集材料，后作判断结论。

（三）研究我军一般的与各部门自己的政治工作的历史与敌伪友的“政治工作”，以求得我们的结论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而是全面的，历史的。

我们希望各级政治机关，以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这个工作，操之过急，马马虎虎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希望对我们的报告一洗过去形式主义与党八股的遗毒，能有内容，能有创造，能

有批评，能有建议。

最后，我们还要说，在全军政治工作中统治着的不是三风不正的歪风（不是就某些局部来说，如果就某些局部与某些个人来说，也许有歪风占统治地位的事实），所以我们保证了我军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但是我们必须负责的认真的检讨我们思想中工作中三风不正的事实，我军确实存在着这种事实，我们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我们的干部，洗刷三风不正的现象，使之有利战斗，而绝不妨碍战斗。我们希望在本次研究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的过程中，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把整风运动看作奉行故事，不痛不痒的做一下就完事。

总政治部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 通讯社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

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

---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中央书记处  
十月二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整风等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周：

（一）二十七两电收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

（二）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可减缩万余人，经济问题有办法，困难可克服。敌后亦大施精简，统一领导，亦可克服困难。

毛泽东

二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附：周恩来关于林彪见蒋介石及同张治中、 刘斐谈话情形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

昨今两日致林电方到，林现在山下公馆，现扼要复如下，

余待林详复。（一）林第一次见蒋即提毛甚愿见蒋，惟适患伤风未来，蒋即问毛好，未及其他。（二）后隔三日张治中又约林与我往谈，张首先表示林对蒋谈话前数段甚好，蒋甚有兴趣听，后一段提到内战危险，蒋不能耐，数看手表，虽然态度甚好，故约走前再谈，虽对内战轻轻说过话，仍可谈下去。嗣林对张简略提出我们要求（三停三发两编），张即打断话头，故我们不要用老一套。如我们此次再缓和空气，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如欲解决问题，必须改变态度（□即我方也要有所让步）。张个人意见，则劝林先生与各方面多谈，然后再与他谈。（三）嗣林与我往见刘为章，刘表示一切都可谈，但他不劝蒋要我们应与张谈。（四）联络参谋（陈郭）来谈，公开表示谈判中心在看八路军能否接受命令，听候调遣。至防地不一定尽如皓电。但必须能移动。（五）至于林见其他人物，均谈一般问题，未及具体内容，而各人亦避谈具体问题。（六）我们意见昨电如何，请示。

恩 来

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关于整军问题\*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

贺 龙

## 一 为什么要提出整军？

1. 这与全党一样，因为我们部队还存在着三风不正，为了克服三风不正，执行中央的决定，达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全军的目的，我们需要整军。

2. 因为我们要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根据边区人力、物力的情况，我们要贯彻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使部队达到精兵的目的（部队组织精干，质量提高），把边区建设好，把全国友军团结好，支持前线抗战，准备反攻。

3. 根据党中央“九一”决定的党的领导一元化思想，要求边区军队统一在党西北中央局领导下，以及所有建制部队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作风，整理编制，所以也需要整军。

我们的目的，在于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

## 二 整军要整些什么？

抗战五年来，边区部队在党中央、军委、西北局、边区政

---

\* 这是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经毛泽东审阅修改。



府直接领导和培植之下，由于我们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及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奋斗，已经胜利的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并且在建军及生产建设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由于边区环境的特点，以及主观上的种种原因，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严重的，是普遍增长着的。部队在政策思想上，组织原则上，工作作风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弱点，甚至有原则错误。其表现：

（一）在政策思想方面：

甲、有些同志还不能有系统的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存在着等待发展形势之到来，希望打出去的思想，耐不过艰苦坚持的局面，缺乏长期保卫边区的决心。这些表现，既不合乎当前实情，也不适合党的团结抗战，并在抗战后还需争取合作建国的政策。这种“左”的思想，必然影响部队的巩固工作，生产建设工作，使部队情绪降低，逃亡严重，战斗力相对削弱；也就会不愿去彻底执行精兵简政，不直接参加边区的建设；也就会因人数减少，经济困难，而埋怨上级，责骂党与政府。故这种违反党的基本政策的思想，是必须克服的。

乙、由于对统一战线思想缺乏深刻了解，也同样影响到对建设根据地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没有深刻认识到部队参加生产是为了建设根据地。边区部队所处环境，与前方部队大有不同。前方部队主要是战斗任务，供给不能不主要的依靠政府解决；边区部队是后方环境，一般说生产与教育任务，就等于战斗任务。同时，军队有庞大生产力，是必需而且是能够生产自给的。解决军队的困难，也就解决了根据地困难的重要部分，等于实际的参加了根据地的建设，完成了党提出建设根据地的任务。不从军队积极参加生产来解决困难着眼，而以各种困难的不能解决，埋怨党与政府，责备老百姓，是错误的。同时，

有些同志不把军队生产服从建设根据地的目的，发生了只为自己，不顾政策法令；只有分散，而无集中，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偏向，这就使根据地建设受到阻碍，使军、政、民关系不协调，以至无法实现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个错误观点，也是必须克服的。

丙、由于对于统一战线政策及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均缺乏有系统的深刻的认识，因而对其他许多政策问题，在我们部队许多干部中认识也不深刻，或者根本不懂得，甚至采取了漠视态度，因而违反政策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边区建设上，部队建军上，以及团结友军和各党派人士上，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对这种忽视政策法令的现象，必须在部队中进行深刻的教育，认真加以克服，否则就是表现我们政治上的软弱，也不能贯彻我党的政策，这是我们领导干部应该警惕的。

## （二）在组织原则方面：

甲、一元化思想，亦就是统一的思想，在我们干部中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过去了解是不深刻的，甚至不愿意去了解。中央“九一”决定中指出，过去有些根据地领导不统一，主要是由于该地主力军某些领导同志，对于该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统一的认识。边区过去领导的不统一，正如中央指出的，应由军队负主要责任。不号召全体指战员拥护边区党及政府，保卫边区人民，以及不知道去协调军队与党政关系、军民关系等错误观念，都会妨碍党的领导统一，妨碍党的团结。过去在部队某些干部中，对西北中央局的领导不够尊重，有个别的只说拥护党中央，不说拥护边区政府，认为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政府是好的，一九三九年以后的政府是不好的，以及军队某些干部对地方工作人员的蛮横态度。所有这些错误言行，正是军队与党政脱离，甚至与党政对立的具体表现。这种

“军权高于一切”或者“三权鼎立”的思想，就是闹独立性的思想，都是反统一、反一元化的思想，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使军队干部增强党性，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达到党的领导统一，实现一元化。

乙、在干部关系上，正如毛主席在会议开幕时的演说中所指出的，存在着自由主义倾向。曲解宽大为放任，不了解“治军要严”的基本原则，因而对于干部思想上存在的许多毛病没有抓紧，采取了放纵的态度，这就是使部队某些干部发生了许多严重问题。

（三）在领导作风方面：

甲、对上对下的态度上，存在着对上拖延，对下马虎的作风。在我们部队某些同志中，对上级指示、决定，进行细心的研究讨论与坚决执行做得不够，也没有把下面情形更多的反映给上级；对下面情况缺乏周密详细的了解，甚至不愿意下去了解和揭露弱点，满足于自己的成绩，对下面的痛痒不关心。这种缺乏紧张严肃的作风，妨碍了工作的进行，甚至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乙、在工作作风上，表现部队中有很浓厚的形式主义，讲得多，做得少，计划多，报告多，工作少，成为部队作风上的普遍现象。以计划为成绩，缺乏真实的检查总结，因此工作中的真实情形不能反映，也就无法检查贯彻上级决议和指示的情况，以及发现病症和改进工作。

总之，这都是表现我们部队中还存在着三风不正的残余，阻碍我们贯彻精兵简政与实现一元化领导制度的执行。不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克服这些弱点，也就不能实现整军的目的，即使边区部队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

产生这些严重现象的原因，不能说客观环境是主要的。后

方环境，固然可以影响部队疲惫、厌倦与安于现状；经济困难固然也可使部队降低情绪、组织松散，但如果主观上能积极加以注意，这些现象是可以克服的。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后方环境来加强部队的建设与整训，使部队战斗力更加提高，这是前方部队所不能享受的。经济虽然困难，但我们可以利用边区的资源，运用部队的庞大生产力，来加以解决。因此，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领导上要负责，我们的干部要负责。因为我们没有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没有深刻去了解情况，没有抓住边区部队的特点，没有规定自己的办法，没有同坏的现象作斗争，反而放任坏现象，这些才是根本的原因。由于上述这些三风不正的残余的存在，我们就要加以整顿，这就是我们提出整军的主要根据。

### 三 怎样来进行整军？

#### （一）从思想上来整军。

要在部队中展开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使所有军队干部深刻了解我党领导下革命军队所应具备的本质与军队干部所应具备的品质，坚决克服军阀主义倾向。

要教育部队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党中央“七七宣言”的思想，要使部队明确认识并执行长期保卫边区与建设根据地的任务；要号召全体指战员，拥护中央与西北中央局，拥护边区政府，爱护老百姓，真实的拥护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只有明确的认识和克服过去思想上的错误，才能保证党的精兵简政政策与一元化制度的执行。

#### （二）实行精兵政策，部队进行改编。

原有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实行改编与合编，以充实主力并

统一领导，机关人员裁减，充实下层；取消勤务员，调整干部，抽调一批干部送到军事学院受训；对一批老弱残废及编余人员，作适当处置，并分配参加生产。为此，要注意做好解释工作，把这次整编搞好。

### （三）执行一元化制度，划分军队防区。

贯彻党中央“九一”决定，将部队重新划分防区，各旅担负一定防区，与党政配合，组成分区司令部，分区政委由地委书记兼任。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的一个部，但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军事政策（如扩兵及建军原则、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大政方针，须交党委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委决定之，这样统一在地委领导下，参加根据地建设，及担负军事防务，执行上级决定。

### （四）进行部队整训。

除担任一定防区之部队外，各旅集结一个团整训，进行半年到八个月有计划的训练。守备部队一样利用时间整训。在政治上，根据部队实际情况，进行整风及政策教育。干部战士都应增加时间并增拨经费进行文化教育，坚决执行联司颁布的军事教育计划，使部队战术技术水平提高一步。野外演习及体育运动还要提倡，为此需要党政给以帮助（如整训部队的房屋及柴炭之解决等）。

### （五）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

在部队中再来一次生产动员，每个军人都是生产者，都应参加生产运动，应当有信心自己养活自己，做到完全自给自足。各部队都准备学三五九旅，实行“南泥湾政策”。要以参加生产为光荣，参加生产就是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谁没有完成生产任务，谁也就没有很好的执行党的路线。各分

区要拟定全分区人员生产计划，统一收入支出，规定节约办法，进行爱惜公物教育，严格供给制度，达到生产供给方面的统一。避免各自为政，本位主义，贪污浪费的现象。同时，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中央机关解决困难，反对只顾下不顾上的现象。

（六）要求全体党员和指战员，注意巩固部队。

我们今天人员精而少，加上经济困难，民族敌人和反共顽固分子，都以破坏我军为目标。我们部队中过去存在的不利于巩固部队的悲观失望情绪，放任自流的惰性，以及拖延疲怠的迟钝性，均需加以克服，才能很好的与奸细破坏分子作斗争。要把爱护部属人员如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战士亦如爱护干部一样（因为今天的老战士都是将来的干部），以保证现有人员不再减员。要很好的依照归队条例进行归队，协助政府执行优抗，来巩固军队情绪，提高战斗力。

（七）刷新政治工作。

（1）政治工作应该保证此次整军任务的完成。号召全体指战员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执行精兵政策，拥护一元化领导制度，从思想上、组织上来保证整军（已有整军保证计划，全军应照执行，保证联政提出的整编、整训、整风三大任务的实现）。

（2）改进政治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要废除许多繁杂多头的计划与报告，取消多样形式而无内容的连队组织，要减少表册（由司令部统一规定几种表）。使政治工作保持紧张的、踏实的、生动活跃的作风。

（3）政治工作要注意提高党的质量，与地方党一样实行精党政策。加强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纪律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使党员确实先进于战士，不使党员降低于战士的水平。不

要求党员数量一定要占战士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而要求党员应该合乎一定的标准。我们军队精党亦应如地方党员一样，在最好党员的基础上，提高中等的，坚决清洗少数落后的及坏分子。

（4）政治机关亦要精简，提高工作效能，提高政治工作威信。要确定军政委员会与总支委工作范围与关系，要注意健全军政委员会领导，政治委员要确实研究并掌握政策，以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政治委员制度，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同时要求各级指挥员注意提高政治机关及政工人员威信，不容许有丝毫削弱政治机关及政工人员威信的现象。要知道，今天政治机关的威信不够高，固然政治工作本身有弱点，但某些指挥员照顾不够甚至阻碍亦是很重要的原因。

（5）要使政治工作保障生产计划完成，这是全军主要任务之一。生产任务不完成，政治工作亦是无法进行得好的，因此，生产中的政治工作不可忽视。

最后，政治工作应加强部队教育，但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教育方式。要注意巩固部队，上面讲过，不再多说。

（八）供给卫生机关，也要注意加强领导。

几年来，供给人员组织生产是有成绩的，应该给以表扬，并且继续鼓励他们积极领导部队参加生产，完成军队自给的任务。应该调些好的干部参加领导生产供给工作。应加强供给人员的教育（应该专门研究政府法令与政策）。鉴定供给人员的党性，是以能执行政策，能赚钱多、用钱少为原则。对于少数贪污腐化的供给人员，应该清查撤换。

卫生机关应注意加强充实人员，提高技术，解决必需的用具，很好的进行保健工作，保证部队人员的健康与伤病人员的安全。



(九) 号召全军遵守纪律，执行拥护政府、爱护老百姓的决定。

现在要讲的是：我们部队中过去的确纪律松懈，对党与政府不尊重，随意破坏政府法令，打骂老百姓及政府人员，损害群众利益等现象时有发生。固然有某些客观困难，以及缺乏统一的制度与规定来约束，但军队领导上某些干部对党政不尊重，采取蛮横侮辱的态度是错误的，在团结的责任上来说，是要负更多责任的。如果说政府同老百姓会压迫欺侮军队，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找不到的，是说不通的。何况边区政府、边区人民与八路军，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呢！有人说，今日政府与人民不比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政府与人民好，这是完全错误的。今天的问题是军民兼顾。老百姓是要发展私有财产的，我们要教育与组织他们分私为公，老百姓今天要发展私，才能更多的为公。我们军队在开辟根据地时，负有建立政府，组织人民的责任，在今天就应当负责引导教育人民，不这样做，只站在旁边责骂政府不好，老百姓落后，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消极的表现。以上这些现象，严格说来，这是军阀的态度，是党性、阶级性不坚强的表现，这不是我们党军的光荣，而是我们党军的耻辱，是必须受到严格批评与处罚的。今后，要求干部首先遵守纪律，尊重政府的法令政策，部队中战士犯纪律，首先找干部，干部犯纪律要加倍受处罚，这样才能制止目前违犯纪律的混乱现象。目前，应按照规定进行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运动，并且规定了许多军队应遵守的法令规则，在部队中要很好的传达解释，使军队与政府、人民的关系，在高级干部会议后有一新的转变，完全转变军队对政府、对人民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中，以及在今后的会议上，都须本着自我批评精神来批评军队的缺点错误，对政府与人民中



某些缺点，即使是怎样的严重，亦应该善意的帮助，而不能恶意的报复与攻击，这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对待革命政府、革命人民的正当态度，不然就是军阀的态度。至于某些损害人民财物的事件，尚未赔偿或退回的，应立即赔偿或退回。在此我向到会干部建议，处置违犯纪律事件，要注意区分情况及性质，有些是由于部队确实迫于困难而发生的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应设法解决其困难问题，否则不能停止违犯纪律的事件。某些仇视八路军的顽固分子，对军队的侮辱与不满，也要来加以适当批评。

（十）最后，讲讲团结全边区周围的友军和全国的友军问题。

我们把边区建设好，把军队建设好，如果不能团结友军，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过去少数干部存有打出去的思想，这必然放松我们团结友军的工作，这就违背了党中央团结友军，争取时局好转的方针，因此，这是不符合今天党的政策的。如果我们讲要忠实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边区周围几十万友军，都需要我们去团结，我们不去做，还讲什么忠实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呢？

党中央今天的政策，是决心争取抗战合作，战后合作。那我们对友军亦应照这个方针做，我们过去对这种工作重视不够，部队中对团结友军工作的教育亦不够，都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这必须在思想上来转变，要把团结友军看做是很重要的工作来执行。

最后，再着重说说干部问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在干部关系上，我们要执行毛主席指示，反对自由主义。
2. 在这次整编中，对于部队中严重贪污腐化的干部要撤换，要提拔一批历年来艰苦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要做到赏罚严明。

3. 要注意在整编中克服宗派主义倾向（如最近因干部调动，就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及一些干部因不满批评而散布小广播“某某有宗派主义等”）。

4. 要在干部配备上，做到每个连配备一个知识分子。把各级司令部、政治机关多余的知识分子，分配到连队中去。

5. 要注意提拔培养本地干部，但要认真培养教育，而不是用客气态度来团结。

以上所讲，我相信一定能够在全军执行。因为我们八路军有很好的品质，我们是全国最好的军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与人民结合的军队，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军队，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发扬光荣的传统，克服自己的弱点，完成整军的任务。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 施行宽大政策的解释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各抗日根据地发布的施政纲领或其他文件，曾宣布：对敌人、汉奸、及其他一切破坏分子等，在被俘被捕后，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这里是提示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并非片面地只有一个宽大政策。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是除外于宽大政策的，这就是镇压政策。这样同时提示的两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实行的。但各地有些同志只作片面的了解，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对于一切破坏民族利益的分子，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凡属破坏抗日政府、抗日军队、抗日人民、抗日政党的利益者，都是破坏民族利益的分子，对于此类破坏分子如不采取坚决镇压政策，即无异帮助敌人。对于此类分子采取放任态度，并谬托于宽大政策，是完全不正确的，是脱离群众的。凡在此类分子的行为上已经证明是坚决破坏民族利益者，即应依法严惩，绝对不应放任。只有那些真正表示改悔者，才应采取宽大政策。而对于一切曾有破坏行为、但是真正表示改悔、确有证据者，我们则必须采取宽大政策。在实施时，又必须区别首要分子与胁从分子。在首要分子中，真心表示改悔者也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在胁从分子中，真心表示改悔的可能性

最大，过去经验证明也最多。根据此种情形，我们在惩治破坏分子时，主要的应是惩治那些首要分子，其次才是惩治那些胁从分子。同时，我们的宽大政策，主要的是施于胁从分子，其次才是施于首要分子。总之，以表示真心改悔与否为决定政策的标准。

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应根据本件作明确正当的解释，并根据此种解释去实事求是地、有分别地实行镇压政策与宽大政策。而镇压与宽大是必须同时注意，不可缺一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毛 泽 东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 周恩来关于东江游击队工作 方针给尹林平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

东江游击队林平：

两月情况报告收悉。

（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需准备好对付顽方及日寇两方面的可能进攻形势。自今年四五月间第三次反共高潮（企图进攻陕北）被苏联军民胜利的保卫南俄使日寇不敢北进，反而进攻滇、浙、赣，及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等事实所打消，目前两党关系稍趋缓和，但局部进攻、封锁边区、肃清大后方党的政策仍未放弃。在军事上，如最近湖北以十万兵力进攻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因此顽之集中兵力在惠、淡一带号称反攻港九或广州，显然是在威吓你们，决不会真正反攻省港。他们会一面谈判，一面进攻。这是你们必须警惕的，但也不要拒绝谈判。

（二）你们对外应以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不仅在谈判如此，对群众也应如此。你们的民运工作，报告中并未提到，望告。

（三）在南委<sup>31</sup>及粤赣大破坏之交，为了善后和整理粤南沿海各地方党组织之工作，决定成立临时粤南委员会，由林平、连贯、梁广三同志组成之。林平任书记负召集会议和统筹

之事，但林本人中心工作仍是部队工作。关于部队工作，应在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在临时委员会上只作一般通知。连贯负责善后工作、营救被难同志、审查干部、整理失联络的组织，按照长期隐蔽、勤职、勤学、交友的原则，务使他们能独立地在社会上生根，完成这一工作后再去广州湾。梁广负责指导省、港、澳及广州湾等城市工作，如果不能在港立足，即应到东江游击队。以上三种工作，在组织关系上，仍各保持其独立系统不要混淆，但各部分工作（部队工作除外）均应在委员会上共同讨论及检查，执行情形随时报告中央、南局。该委员会设在东江游击队。

（四）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以林平为主任，指挥东江及中路两部游击队。委员会的名单（文彬<sup>(2)</sup>所提的），你们认为必须有些变动，可提出意见，交中央及南方局批准，如无问题则按文彬所提批准。

（五）同意你们对于整顿组织的意见，并须按照以前给你们的指示努力执行。在敌后大城市的党，更须注意长期隐蔽、巩固职业（可以在敌伪工商及行政机关中去找职业）、勤学交友、单线领导、疏远联系（最多一月一次，甚至数月或半年一次）、停止会议生活、禁止横的关系，培养干部独立工作的信心和能力，以备在万一失掉联络时能独立长期存在。

恩 来

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 注 释

〔1〕指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

〔2〕即张文彬。



## 提高领导 改造作风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解放日报》社论)

陕甘宁边区的党，正在根据党中央整顿三风的精神进行着整党工作。这一工作的正确执行，是有赖于各级党的组织领导作用的提高与工作作风的改造。因为方针提出、任务确定之后，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来做。做的成绩好坏，就是要看领导机关是否胜任，而后者和工作作风是否正确是大有关系的。所以，在整党的工作中，提出并解决领导与作风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的说来，边区党的领导作用，是相当强大的。它曾领导过广大群众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它领导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设，把陕甘宁边区变成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它领导着边区二百万人民支持前方，爱护军队，为抗战的胜利而努力。边区所有的一切成绩，都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在这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也形成了工作作风上的许多优良传统。我们的干部们在抗战动员工作中，表现了战斗的精神。工作的任务，能够以突击的姿态去完成。同时他们在工作中又表现了踏实的朴素的作风。华而不实的毛病，在边区大部分领导干部是比较少的。这些好的方面，都应加以发扬。

然而在领导与作风问题上，边区党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这弱点主要表现在许多党的组织对于领导的任务和作用，没有

正确认识，因此，自己的日常业务没有建立，应做之事，有许多反没有做，每天忙的，有许多倒是不必管的。这就是边区党领导与作风上弱点的根本所在。

党的领导作用，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重要的，是表现在政策上。在自己工作的地区内，党的各种政策，应当如何具体化，如何监督其执行，如何研究总结执行中的经验教训以改进工作、提高干部——这一切都是党的领导机关所应当管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经常不断的去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正如党中央所屡次指出的，党的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离开这两件事，是不能有领导的。

我们的某些党的组织，却不是这样。它们所忙的不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不是教育党员，提高干部，而是另外的事。什么事呢？一是代替政府的工作，一是柴、米、油、盐等日常事务。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大部分时间是做政府工作去了。甚至这样的事情，如规定选举日程，处理征粮中的尾欠，它也要去管。至于日常事务，那更多了。在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党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往往是管理生产的。此外，他还要参加八九种委员会，仅仅开会，他就忙不过来了。因此，政策问题无时间处理，调查研究也不能进行，工作老是在一个地方打圈子，难以改进。有一个党的机关发了一个关于三三制的指示，都是说的叫下级了解并执行三三制的话，但三三制是什么，却没有讲。有一个党的机关所发的关于金融政策的指示上，由大西洋说到太平洋，而关于金融政策的本身，却没有说明。这样，又何怪下边有些同志对三三制只从数字上去了解（即只是着重于党员占三分之一，而三三制中应包含些什么人则不大管），对于金融政策的执行犯了许多错误呢？这样，又何怪有些地区负责同志来延安开会，而对于自己工作地区的情形，并

未了解，只能说些夸夸其谈的空话呢？这样，又何怪有些地方调查研究根本还未开始，有些地方，则调查的材料堆得桌子一般高，而研究则无人进行呢？这样，又何怪有些地方对于工作的检查，只看数目字，而政策问题反不过问呢？

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事务主义就是每天在日常事务中忙得不亦乐乎，没有时间来处理政策问题。结果，人虽然忙，但群众的情形也不了解，群众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这样下去，就要走到脱离群众的道路。脱离群众，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直接的脱离群众，就是蜕化为官僚，这种官僚主义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家都反对的。间接脱离群众，是人所不注意的，对于负领导责任的机关来说，是更危险的。不了解情况，不使党的政策在一定的环境中具体化，不检查政策执行的程度，其结果，同样是脱离群众。这种间接的脱离群众，其实质也是官僚主义。在根据地内，党是领导政权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要。因此，反对事务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是应当特别提出的。

必须明白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应和政府建立正确的关系，不代替政府工作，而且要从日常琐事的泥坑里跳出来。它应当对自己工作地区及其周围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它应当研究党的政策，规定实现这些政策的具体办法。它应当在实际的执行中来检验这些政策，使这些政策得到推进和发展。它应当定期的、有系统的审查党的决议执行的程度，总结经验教训，以教育干部和党员。它应当掌握干部及其思想的倾向，进行思想教育与思想斗争，把整顿三风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

党的领导机关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业务，正确进行自己的业务。要从琐事堆中解放出来。要多进行调查研究，多思考，解

---

决有关政策的问题。这样才能提高领导，改造作风，才能改进工作，提高干部。

根据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解放日报》  
刊印。

#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陈 云

今天我讲四个问题。

## 一 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

这次会议讨论了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要做到党的领导一元化，首先必须反对闹独立性的倾向。与此同时，地方党委工作也要照顾全局。如果地委、县委的工作不照顾全局，在客观上就会帮助闹独立性倾向的发展。所以，要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就必须把反对闹独立性倾向和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这两者结合起来。

过去地方党委领导不了军队，也不敢领导。现在中央已给了这个权柄，西北局也给了这个权柄，地方党委就要实行对军队的领导。今后如果地方党委和军队的关系再搞不好，一方面要责备闹独立性倾向的单位和个人，另一方面也要责备地方党委没有尽到责任。

地方党委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照顾全局这个问题呢？以前地委、县委只管党务，今后除管党务外，还要管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工作。就是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后，地方党委

要管党政军民四方面工作，责任大大加重了。地方党委只有照顾好全局，党的领导才能稳固。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指明方向，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帮助人家做好工作。地方党委千万不要把军队的、政府的、民众团体的事统统自己揽起来，甚至包办代替，指手画脚，这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地方党委不能只是自扫门前雪，也不能代替人家去扫他们门前的雪，而是要领导大家去扫，指挥大家去扫。

军队问题也是地方问题，军队是地方人民的一部分，养兵就是养民。这样的观念，在地方干部中间是不是弄得很清楚呢？我看不一定。延安有些地方同志和我谈过，感到有关军队的动员工作太多，老百姓很苦，不如少一点好。这话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有些同志把老百姓和军队对立起来，没有把军队看成是老百姓的一部分，不懂得没有军队就没有老百姓的道理。要知道，陕甘宁边区如果没有联防司令部，没有留守兵团，老百姓过去土地革命革来的东西就都保不住。

照顾全局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无论地委也好，县委也好，或者其他领导部门也好，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情况不完全熟悉，一下子要求人们照顾好全局，恐怕还不行，在某些事情上可能会发生一些缺点和问题，对此，军队不要挑毛病。总之，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互相谅解，互相帮助。

## 二 老干部要带头学文化学科学

今天讲提高文化是指哪些人呢？是指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我们要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学文化不仅是识字，还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自然科学知

识，等等。我们过去十年进行的土地革命，是在山里、在乡下革命。参加革命的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起来革地主阶级的命。所以在我们党内、军队里面，干部也好，战士也好，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打仗很勇敢，但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社会制度不好，旧社会穷人不能进学校读书。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比较好，有条件让他们学文化。但也有一些同志不相信文化的作用，说打仗时老子一冲就行了。毛主席经常讲，打仗一冲就算了吗？不算！要有两冲：第一冲军事，第二冲政治。应该看到，我们的干部将来要担负的责任更重、任务更大，那时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办不好事。

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很愿意学习，但先学文化好呢，还是先学政治好？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比方在党校的学生，叫他学文化，但他看到人家学《六大以来》，他也要学《六大以来》，结果挤来挤去就把文化课挤掉了，而政治也不能学懂。所以，文化低的，要尽心尽力学文化。政治是重要的，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但是搞政治要有一个基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这些不是电影，是写的书。如果连字还认识不多，许多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去学？所以，要搞通政治，就先要提高文化；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学懂政治。

现在不学文化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革命的世面将越搞越大，新环境、新事物会更复杂，没有真本领是掌握不了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进来一批有本领的新人物。你们没有文化，他们有文化；你们没有知识，他们知识很广泛，你们怎么同他们共事呢？当然不是说有新人物进来了，党会把老的一脚踢开。党不会做这样的事。但也不是一定要把老的摆

在前面，新的摆在后面。革命是不能论资排队的，后来的可以居上。这要看什么呢？要看他有没有本领，有没有高明的政治眼光，有没有工作经验。你说我是老干部，有经验。但青年也会有经验，新的知识分子也会有经验，他们可以在实践中锻炼出经验。所谓新、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靠老资格，不求进步，就不行。革命需要我们的干部更进步，更高明。可否让革命等等我们？说我还没有进步，革命先不要发展？那可不行，革命不能等你，你不赶上去就要落后。所以说现在不学不得了。学了怎样呢？我们把它掉一个头，叫做了不得！为什么呢？同志们想一想，我们是老干部，是经过十年内战的，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如果再加上文化知识，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经验、文化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样东西都有了，而且能够把它们结合起来，那还了得！

许多同志讲，我年纪这样大了，还有什么信心学文化知识呢？我的家乡有一句老话：“六十岁学吹打。”六十岁的人气短了，但他还要学吹鼓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许多同志说，我记忆力差了。我们要承认，老年人的记忆力是比青年人差一些，但理解力要比青年人强。比方从前我在学校学英文，觉得难得很。一九三五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以前英文文法学不通，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学懂一点呢？因为平常接触东西多了，也就容易学懂了。还有，我十五岁在上海当学徒，开始连报纸也看不懂，几年以后就能读懂了。我们应该有可以学好文化的信心。

同志们可能要说：“好呀！我也非常盼望学习，陈部长你就把我送到学校专门去学习吧！”这就很难了。我们学习主要



的还是靠自修。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因为进学校学习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过是两年。如果我们下决心要学文化，是不是住两年学校就可以解决问题呢？我看不可能。学习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要做长期的打算。第二，大家都进学校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作离不开。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主要的办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只要身上揣着几本书，摆在干粮袋里，闲的时候就看一看。以后有了钱，不要做新衣服，而是买几本书，买一本字典，买一部《辞源》，有不认识的字就翻开字典、《辞源》查一查，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字翻上三五次就认识了。《辞源》比什么先生都好，那是许多人编出来的。商务印书馆编《辞源》的时候，就请了几十个人，这些人都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

提高文化水平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党要帮助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提高文化水平，这对我们党的领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如果党没有帮助他们提高文化，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老同志自己要努力，如果不努力，只是党的帮助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多种办法使这些同志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起来。

### 三 认真开展自我批评

在这次高干会上，许多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我和军队的同志接触不很多，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这次高干会上军队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自我批评有什么必要呢？毛主席那天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讲自我批评的。世界上第一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总结

了几十年奋斗的历史，一共有六条经验，其中有一条也是自我批评。可见，自我批评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忽视它。我们要同一切反革命作斗争，同党内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进行这些斗争中，我们还要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这就是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的党就搞不好。自我批评对于我们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要决定政策，就要研究情况，用脑筋去想问题，如果自己脑子里所想到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相符，那就会犯错误。既然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我们的革命工作在错误之中又是不会成功的，那末，有了错误，发现了缺点，我们就要纠正。怎样纠正呢？就是要作自我批评。同时，人家批评得有道理，就应该接受。

我们批评同志，不是批评别的，是批评他的错误。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列宁说过，一个政党是否郑重，要看这个政党对自己错误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我今天同军队的同志们谈这个问题，因为你们不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而是军队里的党员，是军队里的党员干部。你们要好好地想一想，你们肩上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中国革命靠的是什么？就是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叫做武装斗争。武装就是指军队。当然，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还要做好政权工

作和民众团体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现在哪一个工作最重要呢？我看军队工作最重要。当然，军队是党领导的。我们没有党不行，没有党连在这里开会都不可能。没有党领导的军队也不行，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开会。军队是革命队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军队干部的好坏，对革命成败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今天决定中国革命的成败，不单纯是军事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如果我们搞不好，中国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的解放，不知又要拖后多少年！既然是这样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肩上，那末，我们有毛病，有缺点，有错误，就一定要改正。

有同志认为，开展自我批评会失掉自己的信心。他说我们军队是硬的，如果搞自我批评，今天批评一下，明天批评一下，军队就不能打仗了。我说，这样想是不对的。自我批评是否会失掉自己的信心呢？比如贺老总<sup>[1]</sup>，在这次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就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他的这种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使我们对工作丧失信心呢？我想不会的，相反，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只要我们对自已的缺点、错误估计得客观，不夸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地把毛病找出来，我们以及我们的士兵，都不会失掉信心。我们不抹煞成绩，同时也不掩盖缺点、错误，这样对整个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末，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丧失我们的威信呢？威信在军队里头是很重要的。如果军队领导干部没有威信，下级就不听命令，那就不能指挥作战。但是要知道，靠上面发给你一个威信，靠招牌来建立威信，都是靠不住的。威信是建立在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平时工作上面的。进行自我批评，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会使你的指挥更正确，工作做得更好，因而你的威信就会更高。有些同志认为，有了什么毛病，

要不分场合到处作自我批评。如果是那样，当然也不好。应该弄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批评是对待革命同志的。在敌人跟前，我们不能作自我批评。不能把党内处理问题的原则用来对待敌人。

我们自己应该有自我批评，这一条要经常注意，同时有很多事情还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见不一定是客观的，而别人对我们的缺点、错误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处理问题可能要更客观些。要做到客观，首先要对自己客观，对自己客观了，就可以把人家也看得客观。开展自我批评，会使一个人更虚心、更客观。如果军队干部自己不虚心、不客观，其他部门的干部也就不敢批评军队干部。在军队里，横行霸道的作风有没有呢？我想还是有的。霸道的作风，也就是不客观。霸道作风应该是对付敌人的。比如打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搬到党内来，也不能把它搬到革命队伍里来。如果把它搬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和党外人士，这就不好了，应当改正。

#### 四 坚决反对自由主义

对犯错误的同志既不能进行打击，搞残酷斗争，也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

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自抗战以来，我们曾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有的同志讲了三个原因：一是由于过去搞过火的打击，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是统一战线环境；第三是由于我们队伍里新的知识分子成分大量增加。我很同意关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过去我对知

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也估计不足，我有责任。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讲演，只讲了季米特洛夫的六条干部政策，没有讲到对干部本身的四条要求，即：第一，对党忠实；第二，同群众有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纪律。

我们对于党内的错误倾向，反对得也少，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这是有普遍性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工作是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去做。组织部长的责任是，看到一种错误的现象，就要问，就要批评，说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这项工作应该是主动地去做。如果是被动的，人家不找来就不讲，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才讲，那就来不及了。第二，只注意组织上的问题，不注意思想上的问题。如果思想根子不挖一挖，是不能够去掉毛病的。第三，只注意下层，不注意上层。一般来说，下面有一种什么倾向都是小倾向，大的事情是闹不出来的。闹独立性也不见得是下面能闹起来的。反对错误倾向，最重要的，是在高级干部身上。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我这样说，是不是对下面的小问题就不要管？那也不是。下面的小问题还是要批评，但是更应该注意上面的大问题。第四，过去我们只注意个别现象，不能够把某种突出的个别现象作为典型进行一般教育。中央的同志、尤其是毛主席就不同，他们很注意通过个别事例教育大家。

以上这些毛病，实际上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自由主义好不好？当然不好，因为它会助长错误。其结果，只能损害人，损害党。那末，怎样才能克服自由主义呢？第一，我们要像毛主席讲的那样，嗅觉要灵敏，要主动地发现问题。第二，共产党员看问题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第三，在反对错误倾向时，态度一定要坚决，一次不行就几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能够逐步克服错误倾向。第四，要注意纪律。要有赏有

罚，赏罚分明。目的是使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正确的同志更前进一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 注 释

〔1〕 即贺龙。

## 总政治部关于在对敌工作中对付 敌人特务宪兵办法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各战略台：

最近以来，日寇宪兵特务机关为破坏我之对敌工作，以左的同情面貌制造圈套，陷害我工作干部之事已层见叠出，由于我之不加警惕，被骗因而变节者有之，被捕及遭受杀害的更多，我之工作关系，因此暴露者亦复不少。

宪兵是敌特务体系的核心组织，它的内部成分是经过挑选与严格训练的，它在防止间谍破坏，巩固自己军心上是负有全部责任的。宪兵中某些分子之所以公开出面与我接头会面，其目的在于抓我干部，发现我在敌伪军中的工作线索，以便利他们的破坏。因此，敌之宪兵机关及其内部人员如同敌人其他特务分子一样，是我对敌工作中最凶恶的对手，是必须加以戒备的。对敌工作愈深入愈有成效时，敌之宪兵特务对我工作实施破坏、阻挡，对我工作人员的引诱、危害及其技术之高趋势必增强。因之，在对敌工作上我们必须有对策，必须讲求对策。

为对付特务宪兵所加于我对敌工作的危害，特提供下列的办法：

一、凡敌人特务宪兵机关与我通信经过伪军伪组织人员与我接头谈判时，得旅级机关许可指示后，由对敌工作机关统一

进行。严禁其他任何部队及个人私自通讯接头。

二、规定我方干部原则上不得与日寇特务宪兵直接会晤，彼此均可经过中间人进行接头谈判。如必须直接会面时，会面地址必须在根据地边缘，并有武装掩护，在敌伪区应禁止接头会面。如敌方人员愿意在我占地与我会面时，我应对之作确实的保证，不给他们任何留难与危害。

三、与敌方人员通讯或会面时，不得涉及我方秘密（包括对敌工作中的秘密，如敌伪工作关系等），信件内容除属于公开宣传性质的以外，一切可资敌方造谣诬蔑的语句与内容应极力斟酌避免之。此类信件应用个人名义，不应用部队番号及军职。

四、凡公开的书籍报章杂志可实施交换，但必须注意敌人利用书籍寄送以暴露我之秘密组织关系。我们不应把宣传品的寄送散发寄托在交换书报的希望上。对方书报送来之后，应交指定机关接收，禁止随便阅读。

五、教育敌伪军工作干部必须懂得宪兵的性质，应当善于区别谁是敌军中真正反战的分子，谁是特务宪兵做成的圈套。虽然敌军中厌战情绪与同情我军的情绪是在往前增长，但公开找我接头大胆逃来我军是不容易的，在目前为数也不会多。对于公开与我通讯，公开约我会面的敌方人员，是应当怀疑与应当戒备的，不分皂白把敌方出来的人员都当成同情分子与明知是特务宪兵却想在他们面前企图拉关系作宣传是幼稚的，势必大大上当。

总政治部

十一月十七日



## 建设根据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 改进党政军民关系\*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徐 向 前

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是我们检讨边区工作的大会。要把过去的工作作个总结，把以后的工作方针和办法，确定出来。贯彻这样的方针，我们就要拿起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我现在说的问题，就是在边区怎么样建设根据地？怎么样来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怎么样来改进我们党政军民的关系？在大会的检讨中，互相批评中，自我检讨中，我们批评什么东西？互相批评什么东西？自我批评什么东西？

首先，关于过去的成绩问题（主要的讲我们军队方面的事）。毛主席告诉我们，不要抹煞成绩。过去我们边区的军队有什么成绩？我想在整军草案中，我们贺<sup>〔1〕</sup>师长的整军报告中，高岗同志的报告中，都讲了，都指出我们边区的军队，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军委的路线，保卫了边区，巩固了根据地，部队巩固了，生产能够自给了。这种估计非常正确，我们都同意。关于成绩方面我不准备多讲，关于过去的缺点我准备多讲一点。

---

\* 这是徐向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发言。

其次，关于过去边区军队的缺点，我同意整军的报告草案上说的，同意贺师长的报告，同意高岗同志的报告，我还要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过去我们说，边区的军队，对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问题，认识非常不够，因此，就形成了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比如，有人说西北局不能领导边区的军队，这就形成军队与党的不正确不正常的关系。当然，党对于军队的帮助也就会减弱，联系不密切，领导也就发生了问题。又如，我们军队里边有的同志不相信党的组织，只相信个人。不错，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这是哪个人也不能否认的，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因为他能正确地领导我们。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代表，总代表，但我们党不仅有毛主席，有党中央，还有各级党的组织。在我们边区有西北局，西北局能不能领导边区的军队呢？我们对于西北局这样的党组织，应不应该相信呢？应该相信。有些同志认为，相信党就是相信毛主席。我们说，毛主席应该相信，但党是有组织的。我们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也应相信党的组织。西北局是党中央决定成立的，西北局是不是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领导者呢？是的，我们应当相信。

第二，军队对于党所规定的一些政策研究不够。我们的军队是党军，是党领导的军队，是拥护党、服从党的。那么拥护党服从党从哪个地方表现出来呢？就是表现在对于党的政策认真地研究，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称为党军。有的同志说，我可以打仗，打仗就是执行了党的政策。不错，我们的军队主要的是拿起武器保卫边区，主要的是拿起武器抗拒日本，主要的是拿起武器反对顽固分子，进行武装斗争。但是武装斗争仅仅是党的政策之一，而不是党的政策的全部。我们党的政策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武装斗争这一个政策。如果

仅仅执行武装斗争的政策，那我们的军队就没有办法存在，这是事实证明了。不管建设根据地政策也好，拥政爱民政策也好，财政经济政策也好，等等，我们的军队都要研究和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保卫边区。

第三，建设根据地问题。我们边区的军队，过去对于这个问题认识也不够。许多同志讲到“想打出去”，打出去还要什么根据地？不知道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长期的，也不知道我们的边区是经过军队、群众好多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换来的。这不是容易的事啊！有些同志想不要这个根据地，想打出去。“打出去”，到哪里能找到像这样好的根据地呢？这种思想，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是违背的。正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这些同志不懂得团结斗争是互相辩证的内部有机的联系。只强调了斗争，忽视了在统一战线中联合、团结的一面。“打出去”的思想还在于想另开一个局面，认为我军在抗战中创造的如晋察冀那样大的根据地，晋西北的根据地，晋冀鲁豫的根据地，都得到了大发展，而我们边区军队还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不可另创造一个局面呢？要知道我们陕甘宁边区是那些根据地的后方，陕甘宁边区的根据地要是没有了，那些根据地要坚持也很困难。老实讲，我们建设这个根据地，巩固这个根据地，比那些根据地还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所在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是华北、华中一切敌后根据地的首脑。同时有些同志也不了解毛主席告诉我们的，究竟是和平好呢，还是流血斗争好。当然我们希望和平，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希望和平，不希望内战。如果已经到了万不得已时，我们也必须打。我们应利用相对和平的环境，加紧对根据地的建设，加紧对部队的教育，把质量提高。

第四，关于军队拥护政府问题。有些事例说明，军队中有

人对于政府是不尊重的。正如毛主席那天开幕时讲的，我们的军队过去不号召军队来拥护我们的政府。因此，就形成军政的不协调。这是在基本的认识上，不了解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列宁说：革命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的军队不仅要拿起武器把统治阶级推翻，夺取政权，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巩固政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夺取了政权就完了，夺取政权才是革命的真正开始。但是我们的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不尊重我们的政权，不号召我们的军队起来拥护我们的政权。同时，有的同志不了解政府的法令就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政府颁布的法令也好，决议指示也好，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们党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根据革命的需要，来规定具体政策的。政府是根据这些政策来规定它的法令和办法的。随便破坏政府的法令，就是不尊重政府。军队是最有组织的，行动是最一致的，领导也是最集中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用这个组织，用这个行动的一致，用军队严明的纪律，来帮助政府，拥护政府。在好多同志讲话中已经讲了许多例子，关中也好，陇东也好，三边也好，直属县也好，警备区也好，都有这种坏现象。比如，军队可以随便破坏金融政策，可以随便骂政府人员，随便打政府人员。我们留守兵团的商店因为税务局要检查他们的货物，他们不让检查，反而说税务局检查了他们，就在外面随便写个条子“本店被税务局捣乱，停止营业”。经联防司令部批评，把条子收回去，但隔了几天，又贴出来了。这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呢？我们自己辛辛苦苦经过流血斗争得到的政权，自己又来破坏它，这是不允许的。

第五，在军民关系上，危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军队中个别人把老百姓打死，随便把老百姓抓起来吊打一

顿，抓赌打死人等，影响很坏。边区的政权，是最民主的政权。边区的群众过去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奋斗了多年，才产生了我们的军队，而今天军队却来欺负群众，压迫群众，危害群众的利益，甚至于危害他们的生命，以为枪杆子可以高于一切。政府也不要，群众也不要，你这个军队要什么？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群众不要，政府不要，什么是我们要的？革命是有目的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打死一个人，杀死一个人，要偿命的。军阀的军队，他们的坏处就是不要群众。我们军队中发生的这种行为，也可以说是军阀的行为，军阀思想残余的行为。这种思想上的错误，就造成军队只是埋怨党，埋怨政府，埋怨群众。群众也不好，政府也不好，党也不好。这样搞下去行不行呢？是不行的。在我们党军中，在党领导的军队中，决不能这样胡作非为，横行霸道。

#### 第六，军队本身的问题。

1. 下级对上级也闹独立性。因为上面有闹独立性的，下面闹独立性的就会发生。上行下效，学不会的看会了。同志们的发言中，过去的材料中，反映了不少。某部五团副团长听说部队要整编，自己不经批准把数十万元买了毯子；部队中调动工作讲价钱；上级派人去检查工作，叫下面封锁打埋伏；调人调不动。这种现象，在我们部队中也是严重的。

2. 自由主义思想相当浓厚。毛主席所讲的自由主义十一条中，军队中检查起来，我看条条都有，并不是只有一条或者几条。比如，我们四团某营中，有一个副官包庇用法币的老百姓，违反政府法令，区长出面干涉，这是他的责任，应该干涉的。可是我们的副官却把区长在院子里打了一顿又打一顿。教导员在外面走过，泰然自若地过去，不管，不处罚副官。以后司令部派人查，查出来是包庇，于是给该副官判处徒刑三日。

该团的干部都不满意，并说，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干了。大家起来威胁。军队对于政府法令可以随便破坏，自己营部的副官打区长，教导员在那里看着不管，上面查出来，还起来反抗，明明晓得是不对的，还来庇护。五团供给主任现已开除党籍，他贪污腐化，在群众中影响很不好。这样坏的东西，上面查出来，调他调不动，团部也不反映材料，自由主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

我们再在干部政策上，来检查一番。有些同志的方针是什么？就是“团结”。其实那样的所谓团结，是错误的团结，团结中没有斗争，一团和气。究竟把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敢正面批评与彻底的解决。对错误不作斗争，只求团结，是曲解团结的方针，也可以说是个人的团结方针。团结里面一定要有斗争，只有先把错误批评以后，才能团结起来。所谓团结是思想的一致，政治的一致，不是一团和气，不是自由主义，不是有些问题放在那里不去解决。

各部分的相互帮助、友爱也非常不够。在生产、吃饭问题上，似乎大家争饭吃。我吃得好，你饿着我也不管；我穿得好，你冻着我也不管，甚至因为生产相互争利而发生磨擦。我们的军队都是党领导下的军队，不管哪一部分都为革命的目的而奋斗。哪一部分没有吃的，大家都应该负责，哪一部分没有穿的，也应该大家负责。大家应该在党的领导、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我声明一句，我今天在大会上指出这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现象，不是同大家来算账。我认为主要的是要从思想上来改造我们自己，使我们以后的工作做的更好。上面说的一些问题中，成绩也说过，缺点也指出了，我想这都是重要的。过去有成绩，摆在那里，不能抹煞；有缺点，同样也摆在那里，不能



忽视。今天这个大会是检讨的会议，那一天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假如仅讲成绩，那就成绩、成绩，成绩……这样讲，讲它一天，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要解决问题，所以对于缺点、错误批评多一点，批评得严重一点，是必要的。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有一致的认识。有些同志说，贺老总的报告中批评得太厉害，我们过去有没有成绩呢？怎么尽讲我们的缺点、错误呢？我想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认识，是根本不对的，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要根据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对成绩固不应抹煞，但主要的是检讨出缺点与错误，并认识它们的根源，找出彻底纠正的办法。

这些问题的发生，思想上的问题是主要的呢？还是组织上的问题是主要的呢？我认为思想方法是主要的，因为思想是行动的根源。水要有源，树要有根。思想有缺点，或者有错误，甚至于有严重错误，那么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也就是缺点错误，或是严重错误。如果说组织上保证不够，那也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思想问题。比如，闹独立性——对党闹独立性，是思想问题还是组织问题呢？显然是思想问题。因为个人主义的出发点是以个人利益来看问题的，自认为成绩很大，对党可以闹独立，不受党的领导。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是不是思想上的问题？我认为是的。我们党内不仅有党的领袖且有党的组织，我们要服从党的领袖，相信党的领袖，因为党的领袖代表党的组织，相信党的领袖和相信党的组织是一致的。党内哪一条也没有告诉我们，要我们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我们是反对只相信个人的。自由主义表现那样多，那样严重，是思想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不认真研究和执行党的政策，是思想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对于建设根据地缺乏长期打算，想打出去，另创造一个局面，独霸一方，是思想

的问题。不号召军队拥护政府，不爱护群众利益，甚至于把群众打死，这是不是思想问题？当然是思想问题。上面讲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不拥护政府、想打出去，种种问题，我认为原则性的问题，不是非原则性的问题。这些现象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那么，这些严重现象的发生，究竟由于主观的原因，还是由于客观的原因？不错，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客观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比如部队分散，边区地瘠人稀，日寇、顽固分子的经济封锁和破坏。但是有这些困难条件，总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军队就一定要产生这些现象。相反的，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我们应该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应该很好地研究和执行党的政策、政府的法令，应该很好地建设根据地，应该利用边区相对和平的环境，提高部队的质量。把部队的问题归罪于客观的原因，是不合乎道理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而是诡辩和唯心论。

这些严重的错误现象怎样克服呢？归根结蒂一句话，即是要开展两种思想的斗争，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反映，没有用无产阶级思想武器来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方法，还不是毛主席的思想方法，还不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究竟这些错误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关键在什么地方？除了思想方法是主要的外，关键在上级，不在下级。很多同志这样讲，上面能搞好，我们下面就能搞好，下面学不会也看得会。所以，关键还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在我们到会的许多高级干部身上。毛病、缺点、思想方法，主要是在上级。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上说，上级的任务是什么呢？领导机关的任



务是什么呢？就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我记得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时候，王<sup>〔2〕</sup>主任告诉我们，关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基本任务有五点：第一，执行上级的指示。第二，了解情况。第三，决定政策和办法。第四，实现这些办法。第五，检查督促。这些，我们做得够不够呢？是不够的。

上面所讲的这些问题，总的一句话，我们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或自我反省，检查过去，总结过去。以后的工作要搞好，就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要取消要打倒闹独立性、自由主义，要拥护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主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干。当然，我们要指出，部队干部基本上是好的，是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干部，一般地完成了党中央、军委给我们的基本任务——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努力教育，努力生产。虽然我们有许多缺点，但这些任务我们是基本完成了。错误的东西是可以改造的，可以克服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土包子是可以学习到理论的，理论不但洋包子可以学，土包子也可以学，而且学习得很快。党的政策是可以掌握的，思想方法是可以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努力学习，我们就可以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方法，可以掌握党的政策，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完成党给予我们的更大的任务。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徐向前军事文选》刊印。

## 注 释

〔1〕指贺龙。

〔2〕指王稼祥。

##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 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我党的决议案，略谓：总裁盱衡时局，对内对外作政策上的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集会，详细研究，一致认为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敬谨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彻底觉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果能如此，则不问其过去之思想与行动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为个人，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但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等语。同时，十中全会发表宣言，其中关于对待我党者有云：

---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对外必须互相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又云：三民主义非但国民党所信仰，实为全民必循之途径，顺此者昌，逆此者败。时至今日，不应再有所谓政见之异，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牵制妨碍之现象。吾人愿提示全国，凡能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无扰乱社会秩序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我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为个人，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为标举，以冀引起全国有识人士之共鸣者。等语。

国民党从一九三九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一九四〇年一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一次反共大磨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一月解散新四军事件的第二次反共大磨擦（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磨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滇缅路被切断及英苏订立二十年同盟条约之后，更有好转。最近苏联在斯城的伟大胜利及英美在北非与在太平洋的胜利，增强了国民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国共关系好转，亦有促进的影响。在国内，一九三七年以来，我党我军的极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但至今年，我党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损失及根据地的缩小，减轻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他们估计，我党我军在今后抗日期间，还会有大的损失（这种估计是适当的）。同时，在日寇侵苏危险减少以后（过去国民党长期地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日寇必然要加重对中国的压迫，国民党

需要利用我党的抗日力量（日寇在华三十一个师，我党担负了十五个师）。再则，自从远东慕尼黑危险消失之后，我党停止了反对投降危险的宣传。而从去年四月直到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批评甚少，坚持地求得和他们改善关系。虽则国民党在这一期间内，仍然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压迫（在大后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击新四军，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大的特务破坏活动与经济封锁），我们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国民党。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国民党广大人士的同情。再则，国民党自己有很多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存在着。其中，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及农民的骚动，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企图经过缓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去缓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这里特别有严重意义的是河南六百万灾民的自发斗争，某些部分已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最后，一九四〇年与一九四一年两次反共大磨擦，国民党企图利用武力压迫把我们屈服，但遇着了我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企图动员舆论赞助他们的反共，但多数舆论的同情却站在我们方面。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促成国民党不得不对国共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十中全会的这一处置，是我们和他们长期接洽及他们经过许多的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

决。十中全会的决议，在某一点上和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所谓“根绝赤祸”的那个决议案有些类似，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各地对于十中全会的决议，应本解放日报发表之态度进行解释。根据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所列四条（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革命，苏维埃改为民主政府，以期政权统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统辖），与国民党十中全会向我党要求的各点相比较，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处，我们不但过去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在将来也准备遵守这一诺言。关于组织军队一点，过去是为了抗日的需要而组织游击队，并且是遵照二十六年蒋介石“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一宣言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在十中全会后，国民党会放弃军事压迫而加强政治斗争，磨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中共中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发言人 评国民党十中全会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全会坚持抗战、加强团结之意图，吾人深具同感。如宣言称：“最后胜利达成以前，必须经过最艰苦最猛烈之大决战，方能消灭敌寇，永绝祸根，守定自力更生之要义，作最艰苦之打算”，“吾人今日尤应尽忠尽勇急起直追，集中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全力于战斗。”“对外必须互助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并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这些都是很对的，由此足证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政策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基本上并无二致。十中全会这一表示，实足庆幸。抗战以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即始终站在祖国战争的最前线，虽孤悬敌后，饷械弹药异常缺乏，饥寒交迫，困难万分，犹始终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坚持阵地，未尝后退一步。蒋委员长曾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共产党员及敌后人民，本此训示，组成游击队，与主力军配合一致，抗拒敌军，用能坚持五年有半，至今尤屹若长城，抗击敌军十五个师团，占在华敌军之半数，其所以能够如此，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其在各抗日根据地之设施，悉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蒋委员长之抗建纲领，暨国民政府之各

种基本法令，参照地方民意，定出许多具体办法，致使民情悦服，协助抗战，达成长期支持之目的。本党曾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其中列举如下四端：“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凡此所陈，五年以来，吾人未敢稍有逾越，并且不但在抗战期间吾人是竭力遵行的，而且准备在抗战完结之后继续遵行。凡此均所以求得与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各党派各阶层达到精诚团结，完成抗战建国之时代使命。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中所列各项，与中共上述宣言所列四端，其基本精神，亦并无歧异之处。至对待共产党之态度，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在标举各项要求之后，宣称：“政府当一视同仁，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此种表示，实为吾人多年以来之竭诚要求，今获此种明确之宣告，庆幸尤深。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一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凡合乎团结抗战之利益者，无不诚意实行，这是坚持不变的。深望中国国民党人士谅解吾人此种为国为民之诚意，达到进一步之合作，则敌寇虽强，终当被我驱除出境，一个强盛独立之中华民国，是不久就可以建设成功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苏中反“清剿”斗争总结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粟 裕

日伪去年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对苏中大举“扫荡”，就有伪化苏中的企图。今年伪苏北行营在泰州设立，更图加强对苏中之控制，积极准备举行对苏中的“清乡”。但一年以来，由于我军不断的胜利的打击敌人，由于全苏中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于反日伪的斗争，使日伪屡次伪化苏中的企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与阻止。

日伪鉴于历次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了大举“扫荡”和反复“扫荡”都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又鉴于去年在江南“清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事倍功半，同时又鉴于在华北地区一年来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的教训，乃阴谋以“扫荡”、“清剿”为手段，达到“清乡”的目的。敌人自称：“如果清剿任务不能完成，清乡也就无从谈起。”

敌人自六月十二日开始对海启（四分区）进行所谓“第一期清剿”之后，至七月上旬，转至三分区虾蟆圩地区进行所谓“第二期清剿”，至十月中旬又转向江高宝地区（一分区）进行所谓“第三期清剿”，但由于兵力不足，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先向临泽以北地区进行“清剿”，后于十月十六日转向临泽以南地区“清剿”，至十一月初又转移兵力至樊（川）北地区



“清剿”。

兹对反“清剿”斗争总结如下：

（一）敌人发动“清剿”的原因

第一，由于苏中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

1. 政治上：上海、南京是敌人侵华的大本营，而在其北侧的苏中地区，却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与京沪成对峙形势，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巩固，这对敌人对占领区人民的欺骗是一个有力的回答；尤其苏中交通方便，我军的胜利消息很快的可以传到外洋去，这对敌人政治上的威胁极大。

2. 军事上：不仅现在不断给予敌人严重打击使其无法安定，尤其将来反攻时，我有首先截断其交通命脉——长江的可能，直接威胁京沪。

3. 经济上：棉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今天广大产棉地区尚控制在我手中，敌人无法任意掠夺，其他各种物资苏中亦很丰富。苏中是上海的重要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因以上缘故，敌人不允许我们顺利地建设抗日根据地，所以必须进行“清剿”，企图赶跑我们或削弱我们的力量。

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敌虽取得了某些胜利，但物资人力等方面消耗极大，必须设法来补充，故在此次“清剿”中大批捉壮丁，大量掠夺物资原料，以弥补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损失。

（二）敌人“清剿”的特点

敌人由于在军事上不断遭我打击，逐渐认识到单纯的军事“扫荡”是不可靠的，必须以各种政治手段配合才能收效，故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清剿”前大办训练班，训练“清乡”人员为其爪牙。

在宣传上提出“只打新四军，不打老百姓”的口号，以离

间我军民关系。散布“不交公粮给新四军，皇军就不来扫荡”，“赶走了新四军才能得太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并夸大其在太平洋的战绩，迷惑民众，企图孤立新四军。此次敌人在政治上欺骗确实绞尽了脑汁，不但成立了“清乡队”随军宣传，更印发了大批传单、画报。在艺术上也相当新颖，颇引人注意，如将新四军的战绩列了一表，但在每次胜利底下都画个“？”号，以暗示在新四军胜利后这些地方（东台、盐城、海安、丰利等）究竟属于谁的呢？这样来迷惑民众。这是相当毒辣的，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清剿”区附近的据点成立办事处，使用“清乡”人员进行调查户口、编制保甲，且事先就布置特工人员先来我地区秘密活动，如收买流氓、散布谣言、刺探军情等，更积极收买地头蛇以进行破坏工作。

但敌人此次“清剿”提早进行，因此很仓促，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也是其不能得到预定效果的原因之一。

### （三）敌在“清剿”中对各阶层的政策

第一，对上层士绅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如下委令、送聘书，请士绅当参议，给予较高薪水；伪造士绅反共谈话在报上发表，挑拨离间我和士绅的关系。

第二，对乡保长则笼络争取，威胁利诱。要他们做事，不愿者则以烧杀威胁之。在三分区捉了乡保长就审问：“你是什么时候担任乡保长的？”如果是我军东进后担任的，就加以监禁或杀戮；如果是顽韩<sup>〔1〕</sup>时当乡保长的，则可以马虎一点。此外，向他们查问公粮下落以及抗属、农抗人员情况，以图破坏我基层力量。

第三，对农抗会员采取自首政策。先与之谈话，后交给任务，迫其为他们工作；若拒绝工作或工作做得不好即行杀戮。

第四，对抗属中的干部家属，先利诱之，要其迫使子弟回来为他们工作，以图瓦解我军，不然就以烧杀威胁；对战士家属则大肆烧杀。

第五，对地方武装采取内奸政策。派遣奸细混进来，组织拖枪逃跑与集体叛变。甚至绕过我主力专打我地方武装，以达到消灭我地方武装，孤立我主力的目的。

第六，对地痞流氓进行收买，为日伪收集情报与散布谣言，破坏我地方工作。

#### （四）敌在军事上的动作

敌人原计划先集中三个大队的兵力，以一个月的时间，“清剿”四分区海启地区。实际上到海启的并没有三个大队。敌在二分区、三分区各留下一个大队，牵制我主力在外围活动。

“清剿”海启时，首先切断交通，实行水陆封锁，在海上、江上以汽艇巡逻，在陆上则从吕四到四甲坝、九门闸到青龙港完全封锁，使我主力处于三面临水的狭窄地区不易机动转移，便利其以主力突入“清剿”，以实现其撒网捕鱼与梳篦战术的美梦。在三分区“清剿”时，也同样采取这些办法。敌人又采取轮流“扫荡”的办法，以一部分兵力守据点；用另一部分兵力“扫荡”，每日轮换一次，使我们不能休息而疲惫不堪，而他们则可轮流得到休息。在实行分进合击时，先派出一支兵力直往我中心区，其余各路只进到我中心区周围五六里到七八里的地方分别埋伏，使我不易跳出其合击圈；若一听到哪个方向有枪声，四周部队都向响枪处合击，使我部队不易应付。抽调后方兵力加强前线作战，如南通只留下宪兵。敌酋南部也亲自到前线。

#### （五）敌在经济上的政策

设立统制委员会，以控制一切物资。同时加强对我封锁，

只要是日伪可利用的东西都全部抢去，甚至连桌子等家具也运至上海，不要的就把它毁了，也有以门板、屋梁去填坝塞河的。在某些地区实行“三光”政策。

为了进一步欺骗民众，就以抢掠来的物资或从日本运来的大批日货进行倾销贱卖，而且宣传说：“新四军打走了，才有便宜货买，民众才有福利。”

#### （六）我们的收获和缺点

在反“清剿”之前，党政军各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恐慌现象，经过这次实际的锻炼，取得了经验，提高了干部、士兵及群众反“清剿”的胜利信心和斗争能力，今后粉碎可能再来的日伪的“清剿”更有了把握。

在反“清剿”中，开辟了边缘区工作（在过去这工作是不够的），因这时再不去边缘地区，我们的机关可能要遭受很大的损失。证明在反“清剿”中，边缘地区和敌占区是便于我们开展工作和进行战斗活动的。

不但保存了原有力量，而且还发展了新的力量，在海启反“清剿”中，地方武装只损失了四五十人，可是发展了好几百人；主力只损失了几个人，大都是伙夫等，部队和群众团体都能很好的转移与坚持原地斗争。

在军事上，我能在外围予敌不断的打击，尤其一旅、二旅、十八旅等部队在各地配合战斗，更有了大的收获，缴获了不少胜利品。在六、七两月反“清剿”中，日伪伤亡和被我们俘获的总计达四千余之众。

最大的收获是，在反“清剿”中，我能运用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相配合，能在日伪统治下进行合法斗争，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如控制了一部分伪军和伪组织，这对今后斗争将发挥很大作用。

我们的缺点则表现在：

1. 思想上准备不足。如对“清剿”的严重性认识不够，认为不会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过去“扫荡”一样；甚至有的同志认为“总不会比内战时的‘围剿’更严重吧？”但当“清剿”到来时，则产生了恐慌。在直属队中，为了便于机关行动，分散了一部分人去单独行动，他们就不高兴，认为自己是没用的人，被精兵简政减下来了。也有的干部把老婆从别的机关调到自己身边带着一起走，引起下面的反映和议论。但这些现象不久都被纠正了。

2. 准备工作不充分。我们赢得时间是幸亏敌人的准备也不充分，若不是敌人的准备也不充分，我们要取得胜利困难就更多了。有些地方有等待主力来打走敌人，自己不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的倾向；有的地方武装则为了不愿离开家乡而不接受上面机动转移的指示，甚至进行硬拼，结果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3. 在政权中，下层机构的动摇比较严重，也还有投敌的。这也说明没有经过改造的下层机构，在严重的斗争环境中是不能坚持的。

4. 党的支部还不善于运用各种适应环境的斗争方式，不善于领导群众开展公开斗争或合法斗争。群众组织也不能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好地转变工作方式，灵活地进行各项工作。

5. 锄奸工作虽有成绩，但还不能普遍的成为群众性的锄奸运动。

6. 反“清剿”开始时，地方武装与主力都有“挂免战牌”，单纯等待敌人走时再打的现象，但很快就纠正了。

7. 还没有充分执行华中局关于反“清剿”中“控制了伪军、伪组织即是等于取得胜利”的指示。

### （七）反“清剿”的经验教训

第一，基层政权工作：当“清剿”快要到来时，对接敌区的乡保长必须加以审查，有的要撤换，或动员其离开“清剿”圈；对地主、士绅有的也应劝其离开本地区，以避免被敌人利用。当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威胁乡保长回去时，我们则应秘密布置一些我能控制住而又能应付敌人的人回去。在反“清剿”中与敌争夺基层政权和基本群众，如当敌采取高压手段胁迫乡保长和基本群众时，我政府必须派有威望的干部去慰问救济，告诉他们有关反“清剿”胜利的消息和若干应付敌人的办法，加深其对敌人的仇恨，以保持经常高涨的斗争情绪。

第二，两面派工作：主动的去培养两面派是不对的，而且那样的两面派也不会取得敌人的信任。只有在我力量弱敌人力量强的情况下才可布置两面派工作。在布置前应对人选和能否取得敌人的信任及是否有大的作用慎重考虑。在斗争中争取过来的两面派比我们布置的两面派较能收效。在政治上对两面派分子还应公开的与之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还要作公开号召反对投降妥协，这样才对我们有利。至于对两面派的要求不能过高，要估计其是否能够应付得了。在两面派遇到困难时也应设法给予帮助，使之便于应付敌人。对坏的两面派，即对那些对敌忠实，对我敷衍的两面派，则可采取“杀一儆百”的办法对付之。

第三，锄奸工作：在敌“清剿”开始时，就应对坏分子进行镇压，以打击伪化气焰。要把锄奸工作做好，首先必须加强内线情报，以我之秘密工作对付敌人的秘密工作。这个工作在反“清剿”开始时比直接对付敌人还重要，应放在第一位。对日寇派遣的特工和伪军派遣的特工应加以识别，他们的任务、作用是不同的。日寇直接指挥的特工是最坏的，而且有相当的

反动手腕，大部在“清剿”地区活动，我们可以加强便衣短枪队来对付此种特工。我们还可组织便衣短枪队迫近日伪据点打游击，甚至深入到敌人据点里面去积极活动，打击特工，造成敌人营垒内部的恐怖。

第四，武装工作：在“清剿”快要到来时，首先应对不巩固的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工作，妥善处理老弱残疾及有政治问题的分子，将不可靠的，可能动摇的分子调离或先行遣散。这样才可保证在斗争尖锐残酷时不致发生问题，不致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在兵力使用上，平时短枪队在基本地区的外围活动，主力在基本地区内部休整；“清剿”一到来，则主力跳出“清剿”圈在外围打击敌人，短枪队转入中心地区开展活动。这样才能收到内线和外线配合作战的效果。主力部队如何配合内线斗争在外围打击敌人，必须视形势而定，因敌人亦会在外围布置兵力可以随时对付我。为要有力打击敌人，则以较大的机动兵力深入敌人后方为有利。敌人撤退时很隐蔽，如在海启撤退时大部队即在海上行动，所抢财物也往海船上装走，而且行动时往往另以一部分兵力向我中心地区迫近扰乱，以转移我视线，故我必须时刻注意抓住机会打击撤退中的敌人，并截夺其所抢的资财。

第五，党和群众工作：“清剿”开始时，有些干部应有计划的撤退，政治上不可靠或可能动摇的干部应调走，留下坚强的有能力的干部坚持原地斗争。在“清剿”严重时，要善于采取秘密的和合法的斗争，但“清剿”告一段落时，仍应以公开斗争为主，以便迅速恢复群众情绪。干部和党员能否善于团结积极分子和群众共同斗争是能否坚持斗争的关键。环境愈严重就愈需要我们自己内部的团结和团聚广大群众，不然是难免要遭受损失的。



总之，这次反“清剿”斗争，敌我双方准备都不充分，虽然敌人兵力强大，我可利用日伪间的矛盾进行斗争。有了外线各部队的配合；有了苏南反“清乡”的经验教训（情况虽不全都，但有部分是可适用和参考的）；加之党内外的政治动员，尤其是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土生土长的干部，所以能坚持斗争和取得胜利。

有很好的干部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干部间亲密团结，善于运用各种秘密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又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是争取反“清剿”胜利的决定条件，也是今后坚持斗争，渡过难关，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前提。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出版的  
《粟裕文选》第一卷刊印。

## 注 释

〔1〕指韩德勤。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 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区党委：

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中心，许多人谁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矛盾着，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必须认真的讨论这一问题，根据中央统一领导决定及精兵简政政策，在今冬明春做到如下各项，以便对付明年的严重环境，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

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几个次要工作人员为部长处长，若干个办事员，助理工作，其余干部一概派往各分区、各县。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并加强所属各县的领导。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相类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有些可以合并的分区加以合并。

二、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手研究，实行精简，

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不是小小的不痛不痒的），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情况特殊者例外），作战损失后两团并为一团，两营并为一营，两连并为一连，旅的架子也可取消一些，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全军五十七万准备缩至二十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一人兼做两人、三人、四人之事，大批干部人员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空虚而需要的部门去，派到敌区游击区敌占区去。尤其是知识分子须令经过下层锻炼。军队（包括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四分之三与四分之一的比例。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提倡降级使用干部，号召干部安心做下层工作，这不但因为目前环境需要如此，也因为我们的很多干部降一级或降两级使用更为恰当。学校有些停办，有些缩小，有些改为训练班。各地干部凡可能来延安的，由中央局、分局筹划派送大批来延保存学习，保存干部仍是目前要注意的任务。

三、干部相互间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严格地痛快地清除自己的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而被分配到下级的别地的别部的或学习的新岗位去。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不应谁也不服谁，闹到群龙无首。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着重地注意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告诉他们如何自觉的形成这种核心，将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中的第九条（论建立领导核心）运用到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与地委的领导建立上去，只要我们有了这样坚强的各级领导核心，我们会胜利的。

四、此电除各中央局、各分局及冀中、冀鲁豫边、皖东、

湖北四区党委外，其余各区党委由你们转达。实行时要预先周密研究，不要草率从事。

中 央

十二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刘 少 奇

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是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

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可作为晋西北参考。晋西北和华中不同的是地大、人稀、经济落后，但某些原则是可以通用的。

党中央曾提出发展华中、巩固华中的任务。经过对敌伪的抗击和反磨擦的胜利，建立了我们的根据地，建立了政权，华中的发展基本上是完成了。接着的问题是巩固根据地，其中心一环，就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以提高其觉悟。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容易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参加各项建设，才可能真正发扬民主，把政权搞好，把财政经济工作搞好。这样，党才能巩固，统一战线也才会真正搞好。基本群众的极广大发动，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关，不能跳过这一关。过好这一关，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础，否则，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拿统一战线来说，如果群众工作搞得不好，群众还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没有站起来，那末，抗日统一战线就会只是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广大基本群众和

---

\* 这是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

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如果群众工作没有做好，应该加紧做，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以至十年八年，都非要把这一工作搞好不可。

因此，在党员中，干部中，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非常薄弱，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纠正，不解决，党性就成问题。

我们革命，不是为老婆，为吃饭，为出风头，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马克思、列宁常常讲，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加强和巩固与基本群众的联系。又讲到，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基本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联共党史》结束语第六条中说，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日本特务机关整天窥视着我们，时时想找我们脱离群众的弱点，来勒死我们。我们在太行山曾截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示，说破坏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共产党对群众的强迫命令。共产党如果单靠枪杆，单靠同地主、士绅、商人搞统一战线，是没有前途的。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不可在行动中有任何违背。

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口头讲的是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一到行动就忘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对群众利益不关心，妨害群众利益，以官僚主义对待群众，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受到严厉批评。还有的同志把群众工作的地位看得很低，这是非常不对的。把人分成等级，把各种工作也分成等级，把群众运动的工作看成很低的等级，这不是共产党应有的观点，而是封建社会的等级观点。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

放在第一位。农会工作搞好了，青、妇团体也会搞好的，工会工作也同样。

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是这样的：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

中心区、村在开始发动群众时，由政府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召开士绅、地主座谈会，说明群众运动要来，讲清政策，减少顾虑；同时工作团挨家挨户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联络和发动更广泛的群众。在群众酝酿成熟的基础上，召集全村农民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问题，选举农会筹备会。应找出当时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问题下手（比如借粮），通过这些斗争的胜利，提高农民的热忱和信心。还应加紧教育和训练积极分子。然后成立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成立农会时要悬榜，农民对于悬榜，非常重视；县长、军队首长也要去出席，并讲话鼓励，以示对农会的重视。影响一传开，非中心区的农民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这时候，中心区、村即可留下一部分干部做巩固工作，其他干部转移到非中心区。这时到非中心区，群众就会自己找来了。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发动千百万群众，形成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潮流。

群众运动一起，积极分子涌出，就要抓紧教育。要认真准

备好一篇讲话：世界是什么人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创造的。饭哪里来的？房子哪里来的？一切都是工人农民创造的。但是未创造世界的，却占领着世界。这里要注意打破农民的迷信，说明人受两种压迫，一种是自然的压迫；一种是人的压迫，人剥削人，人吃人。世界没有地主资本家可以成为世界，没有劳动者就不行。应以外地农民起来斗争的经验以及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说明工人农民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一了解这个真理，会非常兴奋，就会主张：索性把这世界推翻吧，把那些地主老财都干掉吧。这时要特别向他们说明统一战线的重要，今天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和地主老财讲统一战线，共同打日本，这是为了全民族利益，同时也就是为了农民工人的利益和前途。这种革命阶段的性质一定要给他们说清楚，并要说明根据地的重要等等。这篇讲话，一定要准备好，语言和举例应当是当地农民容易懂而又切身感到的。农民听懂了，觉悟会提高的。华中那些刚觉悟的农民，常常兴奋得睡都睡不着，跑来问这问那，提出许多问题。这样，农民的革命思想树立起来了，农民说“换了一个脑袋了”。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教育农民，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这个教育搞好了，农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摇。

农民在提高了觉悟之后，心也发痒，嘴也发痒，会到处去讲，进行宣传，那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农民起来了，就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

进行减租减息，农民说要斗理、斗力、斗法。所谓斗理，就是进行说理斗争。地主是很狡猾的，他会用种种方法来恐吓农民，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宣传力量，造成“不减租减息没有道理”的舆论潮流。有了理，就会得到社会的同情，能大大增强农民的斗争信心和勇气。所谓斗力，就是较量力量的斗争，依

靠有觉悟、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去斗垮地主破坏减租减息的一切阴谋诡计。减租减息时，可从开明的地主先减起，因为容易一开始就做好，促使地主内部的分化。对那些不减的，就和他斗争。可选择一个最顽固的大地主，只要把他斗下来了，其他地主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谓斗法，就是依据法律进行合法的斗争。发动农民到地主家里去谈，说明为了抗日而减租减息。农会并可开会，请地方长官和地主参加。在会上表扬开明地主的大义，对地主的普遍减租表示感谢，以消地主的积恨。遇敌人扫荡时，农民就去帮助地主空室清野，以示共同抗日，互相团结。抗日民主政府应用自己的法令来保障农民的利益，制止地主的破坏活动，同时又适当照顾地主的利益，使地主服从和拥护抗日政府的政策。

要有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一切工作才会做好。农民起来了，为防止地主打黑枪，自动要求发枪，民兵也就起来了。他们关心政权了，政权也就巩固了。农民“换了脑袋”之后，加上一个决心，不怕死，参加共产党的多了，党的力量就壮大了。

在群众运动中，还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

过去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常常代替、干涉群众团体，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关系搞得很混淆，表现在政府代替群众团体，干涉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派群众团体干部做政府工作等。

如果是政府代替群众与地主作斗争，就会失掉政府立场，不能兼顾地主的利益；而群众未发动起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是八路军、共产党给他们的利益，减租成了“恩赐”。结果，把地主闹翻了，群众又不拥护。这样做的人本意要做好事，结果是做了坏事。应当了解，脱离群众，少数人与地主斗争，是不允许的。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劳动者自己解



放自己。我们应该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党、政府、军队代替群众减租减息的方式应该禁止。

政府过多地集中群众团体的力量突击征粮、征税、扩兵等，就会使群众团体放弃了自己本身的任务和工作，使群众不能正确认识群众团体。比如好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说农会是八路军的、政府的农会，而不说是自己的。我们要组织农民自己的农会，工人自己的工会，不依靠劳动者以外的任何英雄豪杰。党、政、军派去农会工作的干部，应以农会名义进行各项活动。一切好事，于农民有利益的事，都应交群众团体去做，而群众团体要教育群众拥护政府、拥护八路军。群众团体干部被派去做政府指定的工作时，应完全以政府名义，不用群众团体名义。如果群众团体代替政府征粮、征税、捕人、审案等，就成了两个政府，结果变成了无政府。至于群众团体代替党的现象，有时表现为不去搞经济任务，只去搞政治宣传。自然，不能把经济任务与政治任务完全分开，但它们是有所区别的。

因此，党、政、军、民关系要区别清楚，同时又应该相互很巧妙地结合。是巧妙的结合，而不是混合。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领导一元化，是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统一，不是绝对的，不是取消各种组织。从单细胞到高级动物是发展，越是高级动物，细胞的分工越细密。我们今天的各种组织分工要科学、明确，不能混淆。划分职权之后，然后统一。现在客观要求分工，主观却分不清，把结合变成了混合。

党不能直接领导群众团体，而应通过自己的党员去领导。政府与群众团体，应互相协助。

怕群众团体威信高是不对的。群众团体是党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桥梁，群众团体威信提高，也即是党的威信的提高。群众团体有极高的威信，号召群众拥护政府才有力量。农会如果威

信扫地，就难以号召农民拥护政府。所以，群众团体在群众中的威信越高越好。这种威信高，是党的领导的结果。

第二，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

党和军队的领袖可以委派，而群众领袖是不能委派的。因此，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有威信的群众领袖。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巩固的群众运动。有领袖、有纪律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运动。群众领袖应是成千成万的，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的群众领袖。党应培养、教育干部成为群众领袖，这是重要的事。应派干部下去经常做群众工作，长期培养，成为群众公认的领袖。在华中，派干部去作县长，先不派到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工作做好了，在群众中有了威信，由群众选他出来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至于外来的做群众工作的知识分子，只要与群众密切联系，熟知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也可以成为群众领袖。

第三，群众运动中如发生“左”倾过火的情形，必须正确地对待。

群众运动起来了，可能有掌握不住的情形发生，因为群众不动则已，既动起来，往往超过我们的主观愿望，有些过左、过火的现象。有的同志对这种现象，感到害怕。应该认识，群众运动起来发生过左是一回事，领导的过左又是一回事。应该把群众行动上的过左，和干部领导上的过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这是有原则差别的。领导上的过左，是“左”倾机会主义，是犯错误，是不允许的，应该禁止的。群众起来有些过左的现象，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应该害怕的。

因此，应加强我们主观领导能力，力求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防止右倾和“左”倾。群众运动本身有时左有时右，无论如何我们的方针要拿得稳，我们主观领导决不能左右摇摆。怕

左而不发动群众，或以为左一点不要紧，而用左的领导思想发动群众，都是不对的，要切实避免。

我们不怕群众过左，而怕自己的干部过左。四项动员<sup>〔1〕</sup>时，不是群众左，而是派下去的干部左。结果，把地主弄翻了，群众未起来，把自己孤立了。

我们对群众运动，一定要在领导上控制得住。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思想上、领导上的控制，出于群众的自愿。比如大革命时，武汉码头工人自发地驱逐巡捕，占领了英租界，一二十万工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陈独秀等当时害怕群众过左，要想停止群众的游行示威，并要全国总工会负责。全总负责同志说明停止是不可能的，当晚找了群众领袖，提出示威时绝不能动手，不要损坏东西，这在思想上控制住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示威，包围领事馆，搞了一天，没有发生一点事情。这是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没有秩序、没有纪律的群众运动，不算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一次的群众运动，对于收回英租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正确的领导下，群众中个别的左是能够纠正的，群众自己是能够建立起纪律的。群众中的领袖，也可能搞得过火，但我们应该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教育，爱护他们的革命热情，绝不能向群众泼冷水。如果有的同志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不知道爱护，而是站在群众之上指责群众，这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就不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 注 释

〔1〕指一九四〇年晋绥地区动员筹粮、筹款、做军鞋和参军。

## 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各地出版 报纸刊物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有关区党委：

敌后环境，日趋严重，“扫荡”频繁，物质困难，在报纸宣传工作上，亦有适应环境，贯彻党的精兵简政政策。为此有下列提议：

(一) 每一战略根据地可以出版一种四开的二日刊或三日刊，刊载国内外重要新闻及本地区新闻，将重点放在后者，以增强对于本地区工作之指导推动作用。日刊及同时数个报纸之存在，徒耗人力、物力，在目前环境内是不适合的。

(二) 报纸发行以各该地区之不受敌人封锁阻隔的基本地区为主，使用大批人力财力，去组织通过封锁线的发行网是不必要的，对所属地区之指导及新闻报导除给新华总社广播，各地区对于自己根据地范围内，可有本地新闻、社论等等广播，但亦应力求精简。

(三) 新华分社与当地日报社在组织上可以合一，分社即以报社之材料择要供给总社，分社应以收听总社广播为主。环境较好的地区或可兼收中央社消息，遍收各国广播的办法是浪费的。

(四) 关于报社通讯社，党委应加强领导，切实掌握西北

局通过之关于解放日报决定，可作各根据地的一般原则。

（五）对敌伪宣传应以传单、不定期印刷物为主，不必办专门的定期刊，杂志应尽量减少，书籍应以供给中级干部教育用者为主。

（六）对于报纸工作人员之物质待遇应较优厚，注意其保健工作。

中央宣传部

十二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国共关系的 报告提纲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于重庆）

甲、国民党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

（一）日寇入滇，浙赣战起，直接促成了国内形势的转机，而停止进攻边区，是一个主要的关键（时间在五六月）。

（二）蒋<sup>(1)</sup>委员长两次见周及林<sup>(2)</sup>师长来渝，造成了两党关系的缓和及谈判之门重开（时间在七至十一月）。

（三）郑延卓赴延放赈，其意义在恢复两方关系，宣示中央德意，试探我党真意（时间在十一月）。

（四）蒋委员长在十中全会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其基本意思，是趋于政治解决的。

（五）特种研究委员会的讨论，表现了国民党中有三种意见的存在：第一种，认为中共问题无法解决，只有打才能了之。第二种，认为现在还不是解决的时机，只有拖，只能造成有可能于解决的时机。第三种，认为现在是解决的时机，而且应该解决，但解决的方案又有多种：只有谈，只能互相了解，得到两党解决方案。这三种意见只是三种主要的倾向，还不能包括尽国民党全方面的意见。有些人还摇摆于第一、二意见之间，可以半拖半打，上面宽下面紧，上面好下面坏。有些人只动摇于第二、三种意见之间，认为一面拖，一面谈，并不矛盾，可以徐图解决或能相机解决，不过完全主张打的人已渐渐少了。

（六）十中全会的宣言的精神是好的，是值得称赞的，但尚有尾巴——两面政策的尾巴（叫抗战中的怠工、民主中的党治、联共中的反共等），尚有缺点——一般政策的缺点（如统治人民，管制经济等）。

（七）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是趋向于政治解决的，但条件尚多，局部压迫并未取消，在国民党内仍能作可好可坏的各种解释。

（八）然而可总结一句：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已不是内战危机的扩大，而是由军事解决转向政治解决的开始，也就是好转的开始。这虽是数的变化，但如发展下去，将要起质的变化。

#### 乙、我党的表示：

（一）我党中央发言人的表示（见《新华日报》十二月九日二版）在强调好的，同时并重申我党立场，以推动其好转。

#### （二）我党中央的指示要点：

一、历史的估计——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两次反共磨擦均有国内国外的因素。

二、从去年停止大的冲突到今年的好转，其中经过显然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推动和影响。

三、国民党十中全会决议，给四个年头的国共关系作了一个总结，这总结指出了国共继续合作及具体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的解决（我党中央指示文）。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在某一意义上与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决议的精神，是相同的，即表面好像很凶，实际上是好转。

四、我党的态度，在于根据党中央发言人的表示，进行解释说明我党立场及将来仍准备遵守的诺言，关于军队我们可以不扩充，关于作战地区，战后当然要有所调整，关于边区，我们早就

要求合法化，关于对共产党员，我们要求实现国民党十中全会的诺言，予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但必须估计国民党以政治解决代替军事解决，其政治进攻和压迫，还会有的，虽然某些方式会有所改变，我们一方面应防止这种压迫，另一方面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自大，有损无益的态度，以争取更多的好转（我党中央指示文）。

丙、国民党的干部会——国民党对待共党三个阶段的变化：

（一）第一阶段：（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西安事变到武汉撤退；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是重在组织上解决，即图融化共产党时期。

（二）第二阶段：（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二年；迁都重庆到经营西北；五中全会到十中全会）是重在军事上解决，企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时期。

（三）第三阶段：（一九四二年——从经营西北，十中全会开始）是重在政治上解决，即图控制共产党的时期的开始。

三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都有其各个时期的国内外因素为之推动的，各种条件是相互影响的，但每一个范围内，都有其主要的内在因素存在，在第二阶段中，经过两次反共高潮，而第三次反共高潮未得最后形成，这也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因之也促成了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丁、目前国内的形势和国际的情况：

（一）希特勒德国先败，日本后败的形势是定了的，因之国民党对世界战争胜利的信心是增加了的。而今年击败希特勒，明年击败日本的口号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原因在未能开辟欧陆第二战场。

（二）德胜或苏德两败俱伤而美独胜是不合理的想法，已经幻灭了，世界民主的前途是定了的，因之某些对法西斯的崇



拜者多少给予了些精神上的打击，因之国民党对世界民主的前途也不得不认识和承认。

（三）日寇的战略是保存主力，待机发动，因为要保存主力，所以他不攻苏，攻印澳，而加紧南洋的掠夺和开发，加紧在华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加紧南洋的交通战和某时期对某一方面的和平攻势，因为日寇待机而动，所以只能够付少收多，仍会有军事上的进攻，而主要的方面会在中国，在中国他可不增加新的力量，便能击溃中国一方，因之这就使国民党对日寇局部进攻的可能性及其严重性也可以有新的认识。

（四）由于国民党对美的依赖性，不能不使他对于美国朝野的舆论有着极大的顾虑，美国要员访华后的观感，威尔基的备忘录，美国对于援华军火与兵力的控制，美国对于苏联的友好态度，英美对华某些特权的取消，英美民间的舆论都不能不使国民党在目前放弃其进行内战的企图。

（五）苏联的伟大胜利，日寇攻苏危险的减弱，英苏同盟，美苏协定，丘吉尔、威尔基先后访苏，苏联对中国态度的一贯，都不能不使国民党重新趋于联合苏联。

（六）国际间民族解放的趋势，多少给了国民党一些弄好国内关系的影响。国内情况：

一、军事上反共的失利，及其目前消灭我党我军之不可能，相当教训了国民党的当局。

二、我党我军在敌后的困难增加，减低了对国民党威胁。

三、我党一年一年对国民党进攻的隐忍，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的表示，国民党至少相信在目前我们是决无推翻他们的企图和可能的，虽然即在抗战后，我们也不会有这种企图。

四、目前国内人力物力的艰难，财政经济粮食危机的增加，民众生活的痛苦，行政效率的低能，军队战斗的减弱，国

国民党部工作的涣散，人心的动荡和不满，都不能不使国民党需要集中内部力谋改善和缓和。

五、国民党内主张政治解决的呼号，引起各地方势力的离心，发制各小党派的民主结合，各中间分子，自由要求，都不能不使国民党考虑到国内分裂时的不利条件。

六、蒋委员长与国家民族的胜败不可分离，其不能不有前途究竟如何和目前实际作不通的考虑，这是一个直接的决定因素，因此这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发展，各种条件的错综复杂和相互影响，便不能不使国民党决定了以政治解决代替了军事解决，以控制共产党代替了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办法，但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而是孰为主从的意思，也就是后者附属于前者的意思。

戊、前途的估计：虽然如上所述，国共关系趋向于好转，但并非无坏转的一面，国民党矛盾存在，国内矛盾存在，而国民党的两面政策、矛盾政策亦仍然继续。国民党领导机关的意见，亦未臻统一，故坏的一方面并未取消，可是好转已渐增长，坏转已渐减弱。一般讲实行政治解决，控制我党我军，不外乎下列几个主要条件：

- 一、要我军听调动，
- 二、缩小我军防区，
- 三、限止我军数目，
- 四、统一军制军政，
- 五、缩小边区范围和权利，
- 六、统一法令政令，
- 七、统一币制税收，
- 八、加紧思想统制，
- 九、加强特务活动，

十、限制我党发展和活动，

十一、强调除奸，

十二、进行挑拨。

目前空气是缓和了，关系是恢复了，但好转是一个趋势，能否具体解决问题，还在两可之间（或拖或相机解决），因为在好转开始中还存在两个应极端注意的重要事实：一个是两个解决问题的看法和办法还有很大的距离，另一个是局部的压迫还没有放松，如在大后方政治上的压迫，对新四军区域军事上的进攻，对华北边区经济上的封锁，仍然继续着，这须我们十分警惕。不过前途的发展，国内外因素的增长，使国民党不得不继续改变，由量变走到质变，这种变化仍然不会彻底，因为是带被动性的，但变得多或少我党的政策也是有关系的，这与世界战争胜利的彻底与否，战后民主政治扩大与否，我国也是有关系的方面之一。总之，国民党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是有可变性的，而且已向好的方面变，可能国民党十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和各项实施其意图是好的，但实际方案是错的，或者是矛盾的，等到实行不通，会仍然有变的可能，我们的任务便在促进其变，欢迎其变，而不在阻止其变，反对其变。

己、我党的基本方针是不变的，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与民主是不变的。我们的目前方针即在现阶段促进国民党好转的方针应该是：

（一）争取好转，勿忘防御，即是说加强策略教育，不刺激，不挑衅，以诚恳协商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争取国共关系的好转，问题的解决，加紧秘密工作，严格党的纪律，以防御意外的袭击，局部的事变。

（二）争取合作，勿忘斗争，即是加强统战工作，多主张少批评，以争取和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别各阶层关系的无间的合

作，加强学习，加紧调查研究，改造自己以利思想斗争。

（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即是说坚持大后方立场及任务（勤于学，勤于业，勤于交友）以开展党的社会基础，加强党性锻炼，实行精兵简政的精神（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一笔钱作两笔用，机关小工作多，架子小效能大），以巩固党的队伍和存在。

为实行这些方针，整风仍是目前不可懈怠的任务，为实行目前方针，我们必须准备克服行将到来的空前的困难。世界战争趋向于好转，而情形会更加复杂和艰难，要克服艰难，要有胜利的信心，只有团结的意图是不够的，必须有具体而切实的办法。我党今后应一方面努力于敌后，坚持边区的建设，大后方的埋头苦干，沦陷区的隐蔽待机；另一方面努力向国民党及各党派各地方，各中间分子多提积极的建议，多提有效的办法，少作消极的批评。为圆满的实行目前方针，党必须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防止由于目前趋势而走到“左”倾的过分乐观情绪，同时也要纠正由于不相信可以争取好转的右倾悲观情绪。在大后方特别要防止由于局势好转而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和工作的积极性，要防止满足于表面上的和缓，而忽视努力推动以争取实际上的好转，要防止从局部的光明出发，过高的估计全部好转，同时也要防止从片面的黑暗出发，否定这一好转的开始和可能。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  
编》（下）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周恩来、林彪。

## 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朱<sup>(1)</sup>总司令从前方回延后，竭力提倡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富的劳动力，投入有用的活动，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朱总司令这种克服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抗战的远大的打算，在三年以前，有些人曾是不了解的。为了实行这一正确主张，朱总司令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看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当时，南泥湾曾是荒无人烟的地方，那里鸟兽纵横，蒿蓬塞路，当朱总司令去踏看的时候，晚上只能找到一个茅棚住宿。但是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

三五九旅是执行朱总司令屯田政策的模范。在旅长兼政委王震同志与副旅长苏进同志的领导之下，全旅的生产热潮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上自首长下至勤务员伙伙都编入生产小组，积极参加劳动。并展开生产竞赛，某团政治委员所领导的一个小组，在竞赛中创造了每天每人平均开荒六分的全团最高纪录。在各部队中涌现了无数的劳动英雄，这些名字都曾在部队中普遍传诵着。他们胼手胝足辛勤劳作，建筑了千余个平整光

洁、舒适宽敞的窑洞，开垦了一万一千亩的荒地，种植了粮食、蔬菜和棉麻，供给了自己的需要，节省了公家的费用。

今年该旅的收获是惊人的。全旅收细粮五千四百五十一石，蔬菜十万斤，瓜五万个，养猪一千八百十九只，鸡七四三只，鸭一〇七只，并且还在秋收之后，准备了冬季用的木炭和柴，预计每连生产木炭一万斤。

这些生产的成绩，使部队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了。他们节省了公家的粮食，在伙食方面，每人每月吃二斤肉，每天每人五钱油、五钱盐、一斤半菜，会餐时还常吃鸡鸭大米。战士们穿着自己劳动果实换来的新棉衣，盖着新棉被、羊毛毯子。棉鞋、手套齐全。战士们不仅有舒适的物质生活的保证，而且有他们活跃的体育活动和文化生活。

在农业生产已有成绩的优良环境中，正是部队整训的好机会。贺<sup>(2)</sup>师长说过“边区部队是后方环境，一般的说，生产与教育任务，就是战斗任务。”王旅长也说过“我们现在的环境，对于整训是空前的机会。”因为部队有着自己建筑的营舍，自己生产的优良物质供给保证及集中守备的环境。该旅确定了军事教育计划，在今年七、八、九、十四个月中，除进行农业生产外，曾利用时间进行军事学术科的教授与操练，教完队列条令，练习投弹及射击，进行特种部队教育如通讯、侦察、炮工等。同时，并进行干部及战士之整风学习，上文化课以提高文化水平，该旅的战斗力和文化政治军事的素养都更为提高了。

据今天消息，该旅根据过去成绩与经验教训，又拟订了明年的农业生产任务。预计全旅各部队明年种粮地三万九千亩，生产细粮五千二百石，草五百八十余万斤。棉麻生产之外，菜蔬全部自给自足。这个计划的实行，花百余万元的本钱，将生产价值千余万元的农作物，它不仅可以供给部队更多的衣食穿

着，使部队整训更有充实的物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帮助边区国民经济之发展。

三五九旅今年的生产与整军的成绩，是边区部队足以自傲的，不但驻守边区的十八集团军其他部队应该效法，而且也可以供全国许多友军的参考，这是毫无疑义的。本报特将该旅今年度的生产成绩，与根据许多经验而订定的明年度农业生产计划介绍给大家。

贺师长在今年十月革命节本报特刊上，号召边区各部队实行朱总司令“南泥湾政策”说：“军队有庞大的生产力，是必须而且能够生产自给的。解决了军队的困难，也就解决了根据地困难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实际的参加了根据地的建设。”“在前方，拿起枪战斗，在后方，拿起锄种地。”让边区各部队都像三五九旅一样，执行朱总司令与贺师长的指示，在边区各军驻地，都建设起自己的“南泥湾”，来克服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根据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刊印。

## 注 释

〔1〕指朱德。

〔2〕指贺龙。

## 中央总学委关于文风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 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

(二) 对于文风的学习，各学委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与党风的精神，来学习文风。其已经学完的地方，要重新研究，没有学完的要深入的学习。

(三) 在文风的学习中，要求每个同志，认真去检查自己过去与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论文、文件、指示、报告、演说、会议、谈话、教课、文艺、整风笔记、工作方式等），借以坚决的彻底的肃清党八股的余毒。

(四) 十二月及一月上半月内专门学习文风，个人学习总结可移到明年一月去。

中央总学委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给周恩来、林彪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周林：

两电均悉，兹复于下：

(一) 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

(二) 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

(三) 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地境不动一点请注意）。

(四) 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皖东、皖北、苏北、鲁南、鲁西我地均大大缩小，原地部队极感困难，明年是否被敌消灭大成问题，李先念部实在无法移动，不是不让而是无法让）。但东江曾生部在适当情况下，目前即可加以调整。以上各点（除曾生部外）毛对郑延卓均有明确表示，请据此交涉。

中央书记处

巧午于延安

---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 附一：周恩来、林彪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的请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主席并书记处：

（一）林见蒋情形另电。

（二）在林见蒋前，原料有两可能：一拖，一相机解决。现蒋表示愿快解决，反对零碎解决。这证明在十中全会之后，蒋一方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另一方面见到我党表示同意。“中央发言人谈话”认为我党亦确愿和确须解决，故有此肯定表示。

（三）蒋所提两点，一点显然对军队数目、组成、地区及干部使用有若干不同意见，一点对于党及边区所谓政治团体集中领导语意含混，显然他还未能定具体办法。

（四）我们为推动局势好转，拟乘林在此，主动的找张治中谈下列问题，以促蒋之进一步表示：

A. 中共要求合法化，也欢迎国党至边区敌后组党办报。

B. 军队扩编一定数目，实行统一军制。

C. 边区改行政区，人员不动，实行中央法令，华北各省政府改组，应划行政区。

D. 作战区战后当然重新区分，目前依情况，可作适当调整（意指东江、湖北两区的让步，但暂不具体提出，因为不提此点，我们便无让步）。

E. 你们同意否？请立即电示。

渝 恩来、林彪

十六日亥

## 附二：林彪关于同蒋介石谈话经过的报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主席并书记处：

（甲）十四日接到召见通知，本日上午恩来同志指示了见蒋时谈话要点。午后由张文白陪同见蒋，谈约四十五分钟，彼问我何时回去，行前还有甚么话要向他说，我当即谈：

（一）我党对党内、党外均发了拥护十中全会宣言与决议的文件。我赞扬了此次会的新精神，赞扬了他在十中全会中演讲。

（二）我党拥蒋为民族领袖确是诚意。

（三）两党将来关系。

（四）现在须求彻底实行三停，并力求二编，并如何实行二编。

（五）双方今后当更接近。感谢郑延卓去延安，并说明毛有信托郑带来致谢，郑已抵达西安。

（六）请他发点药品给我们。

（乙）蒋表示如下：

（一）统一团结问题，他们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

(二) 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求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零碎碎。

(三) 只要他一天活着，解决问题与问题解决后，总会更合乎公道的，不让我们吃亏的，他死了就管不了。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不会偏私的，一视同仁的。

(四) 过去革命五年的、十年的随便过去了，现在当求国家问题解决后，国家必能一日千里的进步。

(五) 答应发给药品。如果我不离重庆有了时间可去找他，离重庆后，如果要再来亦可以的。

(丙) 谈完后，张治中陪同退去。在回来途中张说：“蒋先生既说愿意解决问题，你们可以提出具体意见，可以与他商量。”并说，蒋此次是很诚意认真的。

(丁) 我在向蒋报告时，我提到新四军三字时，他即插言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再提他是不听的。面红耳赤的唧唧说了这一遍。说完了才让我继续发言。他说我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才告诉我这话，他还未向别人说过此话。

以上情形望中央研究与指示。我们正准备向张治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林彪

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sup>\*</sup>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彭 德 怀

### 一 什么是革命根据地？

在某些地区（如北岳区、太行山、山东）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

上述的四种组织，必须明确分工，而且各种组织内部又应有它自己的分工，如政权中有民政、财政、实业、教育等工作，党里面有宣传、组织、青年、妇女等工作，各种组织各有其一定的任务，起一定的作用，又相互配合，密切联系，在共产党统一的领导与计划下，对敌进行斗争。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如果四种组织都是巩固的、健全的、有能力的，那么这个根据地也就是巩固的、健全的、坚强的。但是除了这四

---

\* 这是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报告的一部分。

种组织必须巩固、健全与坚强有力以外，还有另一个决定革命根据地能否坚持的条件，这就是党的路线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某一个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也将会影响这个根据地的坚持。如果错误小，且能及时纠正，那就能坚持，否则就可能受影响。中央苏区时，上述四种组织都是健全的，但由于李德军事指导的错误，致使中央苏区未能坚持，最后退出了，即是一例。

北方局去年十一月即提出华北根据地游击性增加了，某些同志以为这就是根据地变质，这种认识是不妥当的。根据地游击性的增加，并不就等于根据地的变质；自然，假定上述四种组织不健全，群众未能充分发动，革命武装不强，党的领导也弱，游击性的增加，也可能使根据地变质。

为什么根据地游击性的增加，并不等于根据地的变质呢？根据地游击性的增加，表现在战争的频繁，敌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可能随时向我进行“扫荡”，随时打入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在目前情况下，由于敌后战争的长期性，与我之装备不如敌人，得不到大后方的接济，我方军事指导原则主要只能是游击战争。在平原，今天已完全是游击战争；在山地，虽然还有部分的、一定限度内的运动战，但由于我们技术落后，物质困难，可能性已更缩小了，主要也是用游击战争打击进入根据地的敌人，疲惫它，消耗它，经过一定时间之后，迫使敌人退出根据地。我山地还有一定限度的运动战，如出敌不意，乘敌疲惫，集中适当的兵力，予敌打击。这一定限度的运动战也是可能与必要的。在平原则不同，因为敌人碉堡主义的发展，我之装备不如敌人等，运动战已不可能了。各军区、军分区在军事指导上，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能机械搬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提出“集中对付敌人，分散争取群

众”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直到苏维埃战争时的第五次“围剿”初期都是正确的，适用的。但今天机械地搬用就不对了。第五次“围剿”初期，假定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导原则不曾被不正确的路线打下去，仍能执行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将我主力指向闽浙赣边，配合福建事变，破坏第五次“围剿”是充分可能的。粉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没有像第五次“围剿”那样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如红军空前的强大，兵精粮足，福建事变等）。当时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原因即在于领导的错误。虽由于红军英勇卓绝，取得不少战役战术上的胜利，但结果仍退出中央苏区。因之，我们不能单看战术的胜利来评判战术上的价值。一定要看这些战术的胜利，是否符合于战略的要求（当时，战略任务是要能坚持根据地）。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战略策略是一样的原理。“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并为战略而服务的”。如不了解这点，或者了解得不深刻，往往把策略孤立起来看，这就一定会犯错误。在五次“围剿”时，红军“短促突击”的英勇，虽则取得了不少战术上的胜利，但在客观上是促使国民党强化了堡垒主义，特别在后期，假使没有短促突击，国民党堡垒政策不一定会发展到那样的高度。因之，毛泽东同志的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军事指导原则，在五次“围剿”之后一阶段，基本上还是正确的，不过由于当时具体情况的变化，要有一部分改变。正确的指导，应该是以一部分红军主力（相当大的部分）分散于中央苏区，配合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坚持已有阵地，而把红军的大部主力，转移到战略外线，配合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粉碎五次“围剿”。基本观点仍是坚持中央苏区，而不应放弃中央苏区。大部主力的转移外线，应作为粉碎五次“围剿”的战略出击去看的，但这样的方针，当时的领导者是不了解的，因而采取了搬

家式的战略转移，结果就抛弃了根据地。

为什么产生这一观点呢？第一，是不懂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就已深刻认识，他在井冈山特委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要性。第二，不懂得创造根据地的艰苦。一块根据地是经过多少同志经年累月努力，花了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才建立起来的。李德就是不懂得这个艰苦性的典型。第三，不懂得武装斗争如不与根据地结合，是非常脆弱的，容易为敌人所消灭。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次农民暴动就失败于没有根据地；石达开在大渡河安顺场被消灭，只身就擒，也就是这个缘故。同志们，必须深刻认识没有根据地是多么严重，多么痛苦的事！第四，单纯的军事观点。起初夸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军事上稍一受挫，又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害怕敌人，又犯逃跑主义的毛病。

今天我们是处在敌后，敌人武装力量的顽强，是超过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时的敌人的。那时，阶级敌人的军队，武装配备虽也是现代化的，但士兵在政治上的顽强性，则远不如日本士兵。苏区时期敌军的许多士兵同情土地革命；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则受武士道的麻醉相当深（敌虽顽强，数量少），虽经五年抗战使他们一天天觉醒过来，今天毕竟还未到应有的动摇时候。讲到敌人的堡垒主义，据统计，今天敌人在华北修筑的封锁沟、封锁墙的长度，已远超过中央苏区时代了。这一点，我们又要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远见。抗战开始不久，他就提出坚持敌后军事斗争的指导原则，“基本的游击战，及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代替内战时代的旧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在华北各个地区，对这一新的指导原则，或多或少地都认识得不深刻。华北各地对加强地方武装的忽视，



吞并地方武装的行为，即是对这一军事指导原则了解不够的明证。这就是把游击战争估计过低，把运动战估计过高所犯的错误。今天敌后，无论山地或平原，尤其在平原，只有正规军分散的游击战，与老百姓的群众游击战密切结合，打击敌人，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关于群众游击战，是从平型关战斗之后，更加认识到其重要性。平型关是一次完全的伏击战，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没有能俘获一个日本兵，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敌兵将枪打碎，伤兵自杀。敌兵的这种顽强性，启发了我们的认识。如果不是群众发动起来，组织游击战，民众大家来打它，要想随便歼灭它，是不那样容易的。只有群众的力量，才能削弱敌军的顽强性，群众性的游击战，当时就强调的提了出来。这是斗争中的教训，可是，还有未能认识这些教训者。在今后的斗争中，尤其是明年，只有正规军的分散作战与群众武装密切结合才行。群众武装，特别在初期，如果没有正规军帮助与领导，则是脆弱的；而没有群众武装的协助，正规军要给予敌人重大打击，也是不容易的。只有群众武装发展起来，正规军才有所依托。群众武装的发展，是坚持根据地的必要条件，群众武装不仅仅给予正规军许多帮助，而且有维系民心的作用。群众的抗战信心和积极性，是需要有武装作基础的，有了武装，胆量才会大，精神才会振奋，他的力量也才会有所表现。哪个战略地区能使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结合更好，则打击敌人的成绩就最大，积蓄力量也较多。敌人一旦深入，就会“行不安，坐不稳”，在疲惫消耗之后，就不能不退出根据地，我们的党、政、军、民四种组织，仍能公开合法存在。这样，根据地是仍未变质的，只是战争频繁而已。如果没有地方武装打击敌探奸细及敌之袭扰，掩护群众，根据地就可变质。

那么，为什么要提出根据地游击性增加呢？这就是战争既然频繁，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形式和机构，以及各种建设事业，都应力求适合这种客观环境，适应游击性，适应频繁的战斗，否则，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失。

游击根据地（今年七月间提出的）不同于根据地游击性的增加。

什么是游击根据地呢？游击根据地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从根据地变质而成，或者是根据地创造过程中，尚未发展完备为根据地。但就目前华北来看，主要的是从大块根据地变为无数小块游击根据地。所谓根据地变质，是有一定限度的，虽有变为敌占区的可能，但也不全如某些同志所想的，一定变为敌占区。这要看在根据地里党、政权、武装、群众四种组织健全的程度如何，也要看坚持该地区的领导的具体策略如何。如果领导是正确的，四种组织也是健全的，那么，不一定变成敌占区；也可能在经过一定时期后，由游击根据地恢复为根据地。

变质的表现，是武装斗争的形式受到各种限制。由于堡垒、封锁沟、封锁墙的增加，正规军不能不更加分散，甚至分散到以班、排、连为单位，进行游击战争；与公开的、半公开的、隐蔽的群众武装相结合，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甚至群众武装的活动更多于正规军的分散活动，而运动战在客观上已根本不可能。至于党、政、军、民四种组织的公开大规模的活动，也受到严重限制，甚至不可能；也要采取分散活动，更多地帮助下级组织。至于如何具体运用，就完全要取决于各地领导机关的机动性、灵活性，甚至在某些地区还要有两套办法（公开的与秘密的），一套专门用于应付敌人。这些都说明，在游击根据地里，人民基本上仍在我领导下，但斗争方式非常复

杂，有时还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依据具体情况，对敌人作临时性的、或断续的应付。当然这种方式，只是斗争方式的一部，决不是全部，而且不是主要的部分。

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在斗争方式上有哪些区别呢？第一，在我根据地里，是党领导各种组织进行全部公开的对敌斗争；在游击根据地里，主要的斗争方式也是如此，不过游击根据地中，某些区域在一定时间，需要革命的两面政策。第二，武装斗争上，在根据地里虽以游击战为主，但还有某种限度的运动战；游击根据地则完全是分散的游击战，且群众游击战是主要的。要运用隐蔽的武装，打击汉奸。根据地游击性增加，各种机关需要缩小，而游击根据地的各种机关需要更分散。第三，根据地内除了侦察敌人的特务活动以外，不采用秘密的斗争方式，而游击根据地某些斗争是要采取隐蔽性质的。

游击区即是一切抗日组织均不可能公开存在，只有隐蔽的地下抗日组织，其形式与根据地根本不同。许多经验教训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组织形式，也可采取民族的联合组织形式，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性别，自愿的自由结合的方式；还可以利用当地的各种合法形式，进行隐蔽的抗日活动，秘密协助抗日，以不妨害其秘密为主。这些地下抗日组织，可以掩护我武装游击队之活动，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进行宣传，可以为我根据地送情报，而我游击队的活动，则可以积极配合地下组织与敌进行斗争，并促成某些合法斗争的开展。在党有工作基础的地区，还可以作为我游击队、武装工作队临时休息之所。但游击队与武工队必须注意不能经常去，以防暴露，而遭到敌人的破坏。另外，还有一种游击区，那里没有秘密的抗日组织，武装游击队和武工队要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临时性的、并且是经常性的游击，使敌伪组织不能巩固，促其动

摇。这一种意义，往往为我游击队、武工队忽视，只有老百姓才知道这种临时性、经常性的游击意义之重大。我游击队、武工队应利用机会，深入没有我秘密组织的地区去打击伪组织，建立我秘密工作基础。提出武装工作队这个名称，就包含着这个重大的意义，要经过他们，把游击区变为游击根据地，把游击根据地变成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敌占区是我武装组织根本不能进入的地区。

目前在华北，上述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在军事上敌占相对优势。因为敌人握有交通干线，转移兵力迅速，在一定时期，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于某一区，军力上对我某区形成绝对优势，进行严重的“扫荡”。但一定时期之后，又在我游击战争的消耗之下，被迫退出。就冀中来看，冀中虽则已变成游击根据地，但同时我分散游击，却大大扩张了游击区，直到天津附近。也由于我之军事力量，一般地占相对劣势，及我在政治上一般地占绝对优势，这就形成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变化性，造成在某些地区此落彼起的形势。领导同志要善于掌握这一特殊变化性的特点，及时予以正确具体的指导，抓紧空隙，不厌烦地进行活动，这里垮了搞那里，等到敌人去压制那里，又把这里搞起来。这决不是无意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熬时间，积蓄力量，教育群众的重大意义。但须注意党的秘密组织，经常巩固地下堡垒，以便恢复工作。

## 二 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形式，主要是武装斗争，配合以其他斗争

根据地总是产生与生存于反革命的包围中的，甚至在根据地内，也还有敌人（内战时是阶级敌人，现在是民族敌人），

因之，要创造根据地与保卫根据地，主要是依靠武装斗争。敌人采取武装来进攻，我也必须以武装来回答，这种武装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但这只是主要的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如果武装斗争不与改善民生、实行民主斗争相结合，不与生长武装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群众是生长武装的母亲），那就孤立了武装斗争，就是把主要的形式看成唯一的形式。这是错误的。如果注意民生、民主的斗争，而不注意党的路线和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及掌握具体政策，不在武装斗争中去建立党，那同样也是错误的。必须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是创造根据地的，也是创造党的。武装斗争培植了党，而又服从于党的领导，否则就成为单纯军事主义。单纯的武装斗争是非常危险的，脆弱无力的，更谈不上发展，一定会失败，历史上这种单纯武装斗争，没有不失败的。中条山二十万友军之所以不能坚持，是明显的例子，我们不能去重复。

我党在大革命时及大革命前，只注意群众运动，但对组织武装与武装斗争，没有注意或者注意得不够，这就是由于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今天有些同志还是不懂得这个特点，不懂得创造八路军是主要工作之一，不懂得如果没有八路军就不会有敌后根据地，也就不会有华北几十万党员。有了八路军，就有了根据地，有了党；我党又来领导这个武装，成为党的革命的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抓紧了武装，组织了军队，这是对的，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要求的。不过今天有某些同志又发生另一种偏向，即不关心群众运动，不关心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他们不了解革命问题基本的是发动群众，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建立新的基础；不了解单纯军事主义必然失败。上面两种偏向，一种是忽视武装斗争，另一种是只晓得武装斗争，认为“武装斗争”是唯一

的，不注意群众运动，那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不懂得党与群众的关系，这必须认真引起我们注意，都须要纠正。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边区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

### 一 简政的意义与目的

简政，是精兵简政政策在政权工作方面的贯彻，是为要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目的。

陕甘宁边区还是地广人稀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加以目前抗日战争处于空前困难的阶段，更使边区在物质条件方面增加了很大的困难。为要熬过困难，准备反攻，我们必须坚持实行节省民力、物力和财力的精简政策。实行这个政策，需要党政军各方面的努力，而在政府方面，首先需要简政和减政，需要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依据边区条件和抗战情势，目前政府工作必须集中力量于急要和首要的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以保证军队和干部的给养，以进一步改善民生和培养民力。第二是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和军队教育的增强。这就是目前政府工作中两大急要和首要的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两大任务的需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两件事，也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这两件事，才能胜利的渡过难关，准备反攻力量。为此，就必须纠正干部中“百端俱举”的思想和事业中“缓急不分”的现象。虽然在实际中已经碰过许

---

\* 这个文件是李维汉主持起草的。



多钉子，但这种思想，这种现象，仍旧没有纠正过来，而现在则必须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简政和减政的另一个方面，就需要实行减员，实行减去一些不急需的机构和人员，以符合集中力量于急要首要任务的原则。因此这次简政，除地方武装外，我们要把政府系统（连学校在内）内脱离生产的人员缩减至七千五百名，并力矫以前头重脚轻的弊病。

其次，二届参议会以来，政府工作又有许多进步，又有许多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正的缺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具体的政策和实施方面，还存在着某些不切实际的现象。军民关系还不够密切，还需采取必要的办法以发扬民众爱护军队的精神。三三制的推行虽已获得了成绩，但亟需检查和总结其经验。在政权机关内部，在业务方面，还存在着“平分秋色”分散精力的现象；在职权方面，还存在着职责不明，权限不清的现象；在机构方面，还存在着叠架骈枝，头重脚轻的现象。特别是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贯彻，而存在着某些政策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干部管理不统一与政纪不严重的现象。此外，正确的领导作风还没有认真的建立起来，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还在束缚着我们。所有这些缺点都须加以清算和改正，所有这些问题都须给以解答和解决，才能有效的实现精简政策，有效的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

## 二 划清职权，审定业务

各级政府机关的职权与业务，应该依据政府的任务，依据民主集中制，依据精简政策，重新划分和审定之。

一、边区政府是边区政权的首脑部。它应该以掌握政策，



掌握干部，组织和领导政策之执行，为自己的基本业务，而首先重要的是政策的掌握与贯彻。

各厅和保安处是边区政府的工作部门，在政府的统一意志、统一方针和统一领导之下，各分掌一部分业务，同样以掌握和贯彻政策为首要的业务。高等法院的工作，也首先要掌握适合于边区社会情况的司法政策。

专员公署虽不是一级政权，但鉴于各专署所辖地区，各有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的特点，加以交通困难，边府直接指导各县殊为不便，应当确定专署为边府的代表机关。专署须负责领导所属各县政权，把边府的政策法令和指示运用到当地的具体环境中去，同时对于带地方性的应兴应革事宜有负责计划与处理的权力，对于边府驻在专署境内的各种附属机关有监督指导的权力。由此，专署的主要业务是：一、掌握并贯彻边府的政策、法令与指示；二、熟悉和掌握各县情况，负责计划与领导各县行政事宜；三、协同驻军维持地方治安；四、监督和指导驻在该地区的边府各种附属机关。

二、县政府是边区各级政权的枢纽。今天以前，县政府大半忙在动员工作上面，而对于人民经济生活的组织注意不够，尤其对乡村政权的建设，注意甚少。县政府既是各级政权的枢纽，民、财、建、教、保、法各方面工作，自然是它的任务，推行政府法令和战争动员工作，同样是它的任务。但不应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任务，而应当依据当前的主客观条件，找出它的基本任务来。依据目前的政治环境和政权工作的具体情况，应该认定组织人民经济和健全乡政权，为县政府的两大基本任务。目前的政治情况，就全国来说，我们是处在战争环境中，就边区来说，我们过的却是相对安定的后方生活。如果这种情况大体上不发生变化，则战争性质的动员工作虽是

重要的，必须完成的，但不是频繁的，不是经常的，而趁此情况，集中力量组织人民经济，发展人民生产，以培养民力，以保证军队和干部的给养，以提高抗战力量，援助抗战前线，却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所以组织人民经济，应当是目前县政府的基本任务。然而无论是基本任务，或是一般任务，归根到底不能离开乡政权来实现，相反，只有依靠乡政权才能实现。可是，我们的乡政权依然很弱，今天以前，“以上代下”的方式成了完成任务的主要法宝。因此，健全乡政权，也就同样应当作为县政府的基本任务。

由此，除临时的动员工作外，县政府的经常业务，即经常工作，也就要拿组织人民经济与健全乡政权两项工作作中心，有计划的、坚持的做下去。

县政府的权力，在过去，是不集中的（如各科多各自直接秉承上级办事），今后必须使县长和县政府委员会有统一领导本县民、财、建、教、保、法的权力，在不抵触边区政府一般政策和一般法令的条件下，有处理地方上应兴应革事宜的权力，并对驻在该县的边府附属机关有监督之权。

区公署是县政权的助理机关，它的业务是帮助县政府了解乡村情况和乡政权的情况，传达上级的指示给乡政权，并帮助乡政权建立它自己的工作。

三、乡政权是边区政权的基层组织，是人民直接的政权机关，其作用就在于一方面要团结全体人民，坚持抗战，维护抗战秩序，又方面要管理和组织人民生活。因此，它的任务是：一、实行纲领法令，二、发展农村生产，三、爱护帮助军队，四、进行抗战动员，五、维护革命秩序，六、建设人民武装，七、贯彻民主制度，八、发展乡村文化，九、调解民间纠纷，十、举办公益事宜。我们每个乡村工作同志必须深刻的认识，

本乡人民生活的好坏，我们要负责任，而在目前边区环境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尤应以发展农村生产为第一个重要任务，其他的工作围绕在它的周围进行之，并力求有助于生产的发展。

四、此外，各级政府机关的其他工作部门和事业机关，均须重新审定业务，划清职权，以达到简政目的。这里首先要纠正一部分同志间“百端俱举”和“平分秋色”的平均主义观点。

### 三 加强乡政权

乡政权任务实现的程度，乡村人民生活组织的好坏，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和法令是否能变成人民大众的武器，归根结蒂要看乡政权的能力和效能来决定。但目前乡政权的能力还不强，效能还不高，加强乡政权，便成了当前的急务。怎样加强乡政权呢？

一、要实行二届参议会乡政权增设文书的决议。现在乡政权只乡长一人常驻办事，确有顾此失彼的困难，加以乡长文化过低，对上级政策和法令有解不开的困难，对分析情况和总结工作有吃不消的困难，因而限制着乡政权工作能力的提高，而“以上代下”的沿习也难于改革。如添设一个有相当文化程度的文书，则上述困难就易于克服，乡政权的工作能力就易于提高，如果文书能积极帮助乡村干部学习，则期以两年，乡级干部的文化问题，亦能初步解决。但文书除文化外，必须在政治上和能力上也有适当的条件，不可滥竽充数。

二、要改造某些被敌视新民主主义的坏分子所把持的乡政权。在部分地区内，这类敌视新民主主义的分子把持了一些乡政权，利用它来鱼肉民众，反抗二届参议会及边府的政策和法

令，因此必须改造这些乡政权，使之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政权。

三、要贯彻乡政权的民主集中制。乡参议会是乡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乡参议会闭幕期间，乡政府就是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村主任由乡参议会通过委任之，但自然村村长须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

四、要依据政简民便的原则，重新审查并调整乡政权的机构和制度。

五、要改进乡政权的工作方式，纠正强迫命令主义的残余；要纠正滥用动员方式的习惯，今后只有战争性质的动员，才采用动员方式，而关于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工作，一般不要采用动员方式。

六、要精确总结乡政权的经验，制定“乡政权的任务、组织及工作方式”颁布之。

#### 四 区以上须精简机构精简人员

机构和人员，首先是由业务来规定的。我们既已依据精简政策，重新审定了各级政府机关的业务，并指明了业务的主要方面，就应该进一步审定我们的机构和人员，使之合于精简的原则。

我们的政权机关，愈往上看，愈见庞大，形成了头重脚轻，一级代替一级的严重毛病，这又是同精兵简政政策相违背的。这种毛病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是有各种原因的，至少有这几种原因：一、对事业与业务的平均主义观点，二、下层人员较弱，三、上层人员不精，四、上代下的领导方式，五、个别部门和个别人员一味的抄袭外国的或外边

的做法，六、官僚主义与事务主义的作风。因此区级以上精简机构与精简人员之所以必要，要从整个简政的精神来看，从这个纲要的全部内容来看，才更容易明白。

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的共同原则，就是少而精。精简机构，就是要裁撤不急需的机构，合并性质相近的机构，缩小庞大的机构；精简人员就是要裁减不急需的人员，精选称职的人员，又从各种业务的需要来调整人员，使之各得其所。这样来实行精简，不但不致减低工作效能，反会提高工作效能。

二次精简后，除地方武装荣誉学校及母亲婴孩外，边府所属吃公粮的人员尚有一，五〇〇名，计：各级政府及其附属机关八，二〇〇名，各中等学校及保小三，三〇〇名，这次精简决定总额减至七，五〇〇名，即减去百分之三十五弱。其具体方案另行规定。

各级精简办法如下：

一、区公署——大区及边境区设助理员三人，小区助理员二人，秘书由助理员兼任。每个区署须配备一个适当的知识分子干部。

二、县政府——县长兼自卫军大队长及裁判员。设政务秘书一人，襄助县长处理政务。减少科的编制，加强政务人员的质量，每县至少配备二个比较得力的知识分子干部。减少技术人员和杂务人员。

三、专员公署——专署现既提高其职权成为边府代表机关，则仍须保留处、科的编制，并加强干部质量。又为便利人民上诉，专署须设高等分庭，由专员兼庭长。

以上区公署、县政府、专员公署的组织条例，须重新修改之。

四、边区政府之机构、制度和人员，依下列的原则精简之：一、坚持政务与事业分开，领导与事务分开的原则；二、

应该移下的业务移下之，应该分给事业机关的业务分出之，应该取消的空头机关取消之，应该合并的机关合并之，应该紧缩的机关紧缩之；三、改正视察、研究与领导分立的不合理制度，取消视察室及与此类似的机关，使调查研究工作成为各科的重要业务；四、重新审定各科的业务与职权，并紧缩之，但须加强干部质量，使之皆能掌握自己的业务；五、设立合署办公机关，统一秘书工作和总务工作；六、因职设人，不因人设职，并提倡一人能做几人的事。边府编制另订之。

五、尽量减少人员编制中杂务勤务人员的比率，尽量减少马匹的数量，各级政府机关实行统一的编制。

六、各种附设机关，须本同样的精神分别实行精简，由各主管部门首长负责督促执行，呈报政府审核批准。

七、各事业机关（金融、经济、贸易等机关），依整财方针和原则，由各主管机关负责督促实行精简，呈报政府审核批准。

八、各中等以上学校的精简方案，由整学委员会研究提出，经政府审核批准。小学教育亦须再度实行精简。

九、各级人员的精简，采取自上而下的步骤进行之。所有编余人员，须慎重处理，务期各得其所。除缺乏劳动力的残废老弱妇孺另行处理外，一般处理办法，主要有二：一、加强下级，二、转入生产战线。

## 五 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

新民主主义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是不能分开的，我们需要民主，同时又需要集中，在战争环境里，尤其需要集中。各种政策法规是根据人民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制成的，基本的政策法规是由边区参议会议决

的，这是民主；但政策和法令等等，一经决定发布，就必须通行，必须遵守，这就是集中。这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在政权机关中要切实贯彻，给人民做出榜样来。关于民主，在政权机关中，大家比较注意了，可是关于集中，就常被忽视。在政府和参议会间的关系上还存在有不明确的认识。尤其在政府工作的实际生活中，还存在有政策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制度不统一，以致下级无所适从的现象；还存在有县长无权统一领导各科的现象，还存在有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现象，还存在有独断专行，不尊重统一领导的现象；还存在有对政策和法令阳奉阴违不守法纪的现象。因此，集中权力，统一领导，就成了今天政权机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就是要坚持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政令，统一的制度，统一的领导与统一的政纪——上上下下一律遵守政府的纪律。换言之，就是要坚持政权工作的一元化。没有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政令，统一的制度，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政纪，没有政权工作的一元化，我们就没有可能率领全边区人民以统一的步伐，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

因此，我们特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作为简政目的之一。为实现此目的，又提出如下的原则和办法：

一、边区的参议会固然不是苏维埃时代的工农代表会议，但也不是三权分立的外国议会制，它是人民代表会议，是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必须遵守和执行参议会的决议，并对它负责。但在参议会闭幕期间，由参议会选出的政府就是代表人民的行政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常设委员会对政府只负监督其执行参议会决议的责任；同时，此种监督，不可了解为一般的制约作用。

二、边区政权既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则行政与司法的分立



也就没有意义。司法工作应该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进行，在未成立法院的地区，行政长官应兼负审判责任。

三、边区政府本身需要首先贯彻民主集中制及统一领导的精神。各厅、处是边府分掌政务的各别工作部门，尤须严格的遵守统一领导的原则。今后凡关于政策、法令、制度之设施，人事的进退，以及重要的指示，均须经正副主席裁决。

四、县政府各科须统一在县政府委员会及县长领导之下，县长对上级负责，上级的指示不可超过县长。

五、依民主集中原则，制定政纪总则，制定政务人员规约，制定政务人员奖惩条例。

六、在全体政务人员中深入的进行民主集中制与政纪的教育。

## 六 要改善领导作风

首先要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高级机关和高级人员领导上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掌握政策与贯彻政策，换句话说，就是要会出主意，又会指导实行，做好了这两件事，就算得尽了领导的责任，也只有做好这两件事，才算得尽了领导的责任。没有好政策，好主意，只有整天忙碌，会流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有了好政策，好主意，却不会指导实行，也会流为空谈。

好主意，好政策，不能凭主观愿望和感想得来，也不可单凭昨天的经验，更不可以盲目的抄袭外地的经验。好主意，好政策，要从调查研究中得来，要从实际情况的研究得来。不熟悉工作环境，不了解人民需要和下级情况，不周密的研究它们，就不能产生好政策，好主意，就一定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要掌握政策，就必须学习调查研究。以边区政府而



论，有许多在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的问题等待我们研究，有许多重要的经验等待我们总结。干部政策问题，农业建设问题，农业累进税问题，减租减息问题，合作社政策改进问题，司法政策问题，金融政策的改进问题，国民教育及干部教育的改造问题，农贷经验及治安工作经验的总结问题，三三制经验检讨问题，军政关系问题，政民关系问题，改变工作作风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有关政策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加以研究，不加以总结，我们的领导就会赶不上边区建设的发展，就会落在它的后面，而领导上思想统一、政策统一的要求，也就难以实现，朝令夕改的现象，更无从根绝。所以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成了目前边区政府领导人员的头等重要任务。

其次就是贯彻政策。政策从实际中产生，又须贯彻到实际中去。要做到这一层，领导的责任才算完成。然而要做到这一层，第一需要善于掌握和使用干部，熟悉下级情况，善于指导干部和下级把领导机关的政策、法令和指示灵活的运用到当地具体情况中去，并为贯彻这政策、法令和指示而进行各种必要的宣传组织工作。第二需要及时的检查干部及下级执行政策、法令和指示的情况，指导他们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和发扬成果。第三需要善于积累和总结执行的经验，用来教育领导人员自己和干部。可是我们常常没有能够这样做。相反的，由于对干部和下级了解差，由于干部的管理和使用的不统一，以致指导不具体，由于上级对下级代替多于领导，以致不能提高下级的积极性，责任心与创造能力；由于检查少，或是检查不深刻，以致不能及时纠正错误和缺点，以致有些工作弄得有头无尾或重复错误；由于不会积累经验和总结经验，以致有些碰过的钉子又重复在碰。所有这些缺点，都须加以改正。

专员公署代表边区政府领导一个地区的政权，它必须一方

面掌握边府的政策和法令，又方面熟悉各县的具体情况，在边府政策法令与各县具体情况适当结合的基础之上，去指导各县政务，并独立的计划和处理地方性的事宜，因此，也就要学会调查研究，学会掌握政策与贯彻政策的作风，才能实现它应有的领导作用。

县政府主要是领导执行，即领导各乡政权具体的执行上级的政策、法令和指示，因此，县政府和它的助手——区公署的领导方式，应该是：一、对上级的政策、法令和指示，自己首先研究清楚，又帮助乡政权干部也能大体弄清楚；二、同乡村干部一起调查研究清楚各乡具体情况；三、指导和帮助乡政权依据本乡具体情况执行上级的政策、法令和指示，以及办理乡村公益事宜，但不是代替他们执行，代替他们办理；四、帮助乡政权检查乡上工作，把每件工作执行到底，但也不是代替他们检查；帮助乡上总结工作经验，用这些经验并配合上级政策和法令，教育乡上干部；五、区署干部更须注意在平时多多接触乡干部，熟悉他们的情绪和困难，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和他们建立亲密的同志关系。此外区署对全区工作，县政府对全县工作，应注意及时的检查，并总结经验，用来教育自己和干部。

在我们的领导作风上，还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倾向，这种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某些计划、决议、指示的制定，还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或虽有计划而不去认真组织计划之执行。表现在缺乏积极联系群众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创造性；表现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好表面铺张，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只在公文程式上兜圈子；表现在事务主义的忙碌于琐屑细节，忽略了大事，看不见新的环境与新的中心任务。表现在对于工作的消极应付的态度，做一日和尚撞一日

钟。表现在执行上级决定指示时不很好的向群众解释，而滥用强迫命令的一套办法；一切这些都是脱离群众的，必须努力克服，才能建立和发挥正确的掌握政策与贯彻政策的作风。

## 七 统一干部管理，调整和提高干部

边区各级政权干部的情况，有如下的几个特点：一、百分之九十的区、乡级干部，是从当地农民革命斗争出身的积极分子，他们熟悉乡土情况，同民众有联系，能积极完成任务；但一般缺乏文化知识，缺乏独立工作能力，同时相当浓厚的乡土观念、家庭观念，也成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的重大限制。二、县级干部中同样是工农出身（主要是农民出身）的占绝大多数，其中初中、小学程度各占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八十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实际经验，成为边区政权干部的中坚；但理论水平低，文化仍然不足，不免带着若干狭隘经验主义的作风，在新的复杂环境面前，常感到束手无策，缺乏新的创造，在长期不动的岗位上，有厌倦无味之感，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三、边区一级的工作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抗战后陆续参加进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多富于新鲜的感觉，热情很高，工作积极，但缺乏实际知识，缺乏工作经验，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四、许多干部犯着相当严重的自由主义，一部分干部中还存在着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残余。财经战线上首先是商店和税局的一部分干部，发生了思想意识腐化蜕化的现象，并发生个别贪污逃跑的分子，县、区、乡级的干部中也发生了贪污腐化分子；此外，某些环节中还隐藏着破坏分子；这些都应该引起严重的注意。

依据上述的情况，目前政权中的干部政策应该是：

一、统一干部的管理。过去干部的任免和干部的管理是各自为政的，干部的了解、使用、调整、培养和待遇等等，都缺乏统一的政策与制度，更说不上统一的计划。于是任意管，无人管；本位主义，各抓一把；用非其才，才不适用；苦乐不均，待遇不一等等不合理的现象，都随之而出。这应该承认是政府对干部没有能负起应有的责任。今后应该由民厅统一干部的管理，在该厅设坚强的干部科进行日常工作，并由边府制定干部管理通则，以利进行。

二、在目前简政期间，宜由民厅负责协同各厅处院及各专署县府负责同志，依据精简原则及干部情况，商定边府以至县区各级干部调整方案。此调整方案应注意调派大批外地青年知识分子下乡，首先使专署及县区配置必要的知识青年，而将一部分有长期斗争经验而可以暂时脱离职务的工农干部调到干部学校学习一时期；同时注意在调整时，清洗坏分子和破坏分子。外来青年知识分子和地方工农干部的结合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一、使政权工作中获得新鲜的血液；第二、使工农干部在学习上获得帮助；第三、使外来青年获得实际经验。各级和各部门领导同志须负责使外来青年和本地干部在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精神下，很好的团结起来。

三、今后在干部教育上，一方面要改造行政学院，使之成为区县级干部学校，在各中学师范学校内接受一定比例的地方干部，设立特别的班次；另一方面改造在职干部教育，重新制定适合于各级政权干部的学习计划与学习材料。在民国三十二年的整个一年中，要坚持贯彻整风的思想教育，务必做到每个干部深刻检查自己的思想，每个工作环节深刻检查自己的工作，都要作出具体的结论，报告上级审查。此项学习和检查，必须由各级各部门负责人直接领导进行，使获得应有

的效果。

四、改善干部待遇，注意干部保健，也是干部工作的重要问题，宜制定干部待遇条例和保健条例施行之。

五、关于干部的任免制度，亦须重加审查，关于考绩奖惩，均须制定明确的条例。

以上关于干部管理通则，调整方案，考绩条例，奖惩条例以及学习问题，都要在这次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详细讨论，以便把干部工作好好建立起来。

## 八 拥 护 军 队

边区的巩固，人民民主民生利益之保护，全赖有八路军。且在近年来物质困难的境遇中，八路军之自给运动，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即以今年而论，军队每人生产自给平均至三、五七三元之多。此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应该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称赞与爱护。但近年来，发现许多拥军不够的现象，优抗归队及动员工作都有缺点，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不够，且对军队有所非难。考查其原因，有如下几方面：一、边区处在相对的和平环境中，容易忽视军队，容易忽略“一切服从战争”的原则，而把保护人民利益与拥护军队对立起来；二、少了解军队的困难，多看到自己的困难；三、忽略了我们的军队是本质上最好的军队，不免片面的夸大军队缺点，而对人民中的误会没有作积极的解释。因此，必须积极的改善拥军工作。

一、深入人民关于爱护和拥护军队的教育工作，向干部和人民说明军队的困难，如果军队因此受到削弱，则一切人民利益都将不保；并依据人民对军队的认识程度和情绪，进行具体

的解释工作，人民对军队发生误会时，尤须随时随地加以解释，以发扬和提高人民拥护军队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干部和工作人员必须注意尊重军队，一切埋怨军队，不替军队解释误会，不积极帮助军队解决困难的情绪和现象，必须说服纠正之。

二、各级政权机关，特别中下级政权，必须加强人民拥护军队的组织工作，即加强慰问慰劳，招待食宿，做鞋缝衣，公平买卖，优抗归队等等组织工作，以经常的实际行动去拥护军队。

三、一方面照顾军队的需要，又方面照顾民力的节约，改善动员工作的制度和办法。

四、立即重新审查或制定拥护军队的各种制度和办法，这些制度和办法一经公布，各级政府即须在人民中进行普遍深入的宣传解释，并举行拥军运动，为今后拥军经常工作建立思想的和组织的基础。

五、在军政关系及军民关系上所发生的缺点及纠纷，由各级政府负责人直接找军队负责人协商解决，不能解决者，呈报上级解决。

## 九 巩固三三制

自去年“五一施政纲领”颁布及边区二届参议会召开以来，三三制已在各级政府中认真实行了。各县参议会议员，常驻议员及政府委员，经过第二次县参议会开会时的变动，已有二十二县完全实现了三三制，只有八个县还未完全实现。至于乡参议会议员、乡长及乡政府委员的情况，在绥德、吴堡、合水、米脂、安定、镇原、环县、新宁等县里，非共产党人士都

占大多数；例如这八个县的乡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十九点八，国民党员占百分之四点九，其他无党无派人士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三。经过土地革命的其他各县，去年乡选结果，虽仍是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但今年乡选时，据安塞、甘泉等县材料，共产党员所占比例，已接近到三分之一。一年来实行三三制的收获，是很大的。首先是许多共产党以外的人士有在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机会，加强了边区内部各阶层的抗日团结。其次，是一切负担动员均经过参议会的讨论，做到了人民敢于说话，政权联系民众，发扬了民众的积极性，使二十万石公粮的艰巨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其三、改造了许多脱离民众的原有乡政权人员，而代以新由民众推出来的积极分子，因而更加密切了乡政权同民众的联系，活跃了乡政府工作。其四、由于一部分开明能干的人士选进政府，各级政府机关都有机会听取许多有益的意见，以改进自己的工作。这些收获证明了三三制的正确。今后应当继续为贯彻三三制而努力，而对于已得之成果，则尤应使之更加充实，更加巩固。

一、还没有完全实现三三制的乡、市、县参议会及政府委员会，均须于下届选举时贯彻之。

二、除参议会及政府委员会外，各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共产党员还占绝大多数，今后须尽量吸收拥护边区施政纲领并有工作能力的非共产党人士参加工作。

三、各级政府机关对于参议会的非常驻议员，未脱离生产或未任专职的议员和政府委员，须设法联系和团结他们协助政府工作，或参加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务期人尽其才。

四、一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员，无论有党派或无党派，在忠实于二届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与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下，务必互相开诚布公，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以期不负边区



人民之委托，而真正尽到自己的责任。一切有关原则性的争议，应当平心静气的商讨，在施政纲领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之下，求得合理解决，以达到巩固三三制之目的。

## 十 力行节约

今后一个时期，物质的困难还会比现在更加严重。为要渡过这困难，所以实行精简，为要渡过这困难，我们还须力行节约。精简本来也就是为了节约，但在这次精简之后，还须力行节约，才能贯彻精简的目的。为此必须：

一、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

二、除保证给养外，其他消费，概须力行节省。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要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要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

三、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

四、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

五、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 十一 从组织上贯彻，从思想上贯彻

从上面讲过的看来，这次简政工作涉及了政策问题，制度问题，业务问题，机构问题，干部问题，民主集中问题，领导



作风问题，以及拥军问题，三三制问题等等。由此可以明白，简政工作是一序列的组织问题，又是一序列的思想问题，而且许多的组织问题，从里面来看也是许多的思想问题。在简政工作中，诚然要在制度、机构、人事等问题上提出许多具体的方案，以实现精简的目的；但同时又必须在思想上求得一致，组织上才能畅行无阻。精兵简政是一个重要政策，不对这个政策有清楚的认识，就无法着手精简。我们是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精简，如果不把这个政策同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统一起来研究明白，也就无法实行精简。如果存着“百端俱举”与“平分秋色”的思想，就无法精简业务与机构。如果存着某种脱离实际的“正规化”观点，就无法精简制度与机构。如果存着本位主义与成见，就无法调整干部。如果不认识生产的重要和加强下级的重要，就不可能有大批的干部和人员自愿的下乡，自愿的转到生产中去。如果存着不顾大局，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就无法坚持民主集中制与整饬政纪，无法统一政府的领导。不对三三制有正确的认识，就无法总结三三制的经验。如果不纠正脱离民众和下级的官僚主义倾向，不纠正事务主义倾向、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的倾向，不纠正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无法掌握政策与贯彻政策。由此可以明白，为要正确的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为要真正实现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目的，我们的简政工作，就必须从组织上贯彻，又从思想上贯彻，要从两方面同时贯彻，才能达到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一方面把简政工作同整风学习沟通起来，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观点，来从事简政；又方面把简政工作同检查工作统一起来，同政务人员的思想检查和政府系统的工作检查统一起来进行。首先边区政府自己这样做，同时帮助各县这样做，用思想来指导行动，又

---

用行动来贯彻思想，期于三十二年上半年彻底完成简政工作与检查工作，看谁做得好，谁做得更好。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刊印。

##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sup>\*</sup>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

---

<sup>\*</sup>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的第一章，原题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固了。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〇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一九四一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

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

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这个趋势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准备这样做。

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辩论，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共产党和边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总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党和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一定有办法，足以渡过任何严重的困难。我们现在的困难，有的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我们曾经历过比现在还要困难到多少倍的时候，那样的困难我们也渡过了。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甘宁边区要大得多，那里天天有严重的战争，那里已经支持了五年半，那里也一定能够继续支持，直到胜利。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

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

延安县同志们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

---

\*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的节选。



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

## 二

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一九四二年的计算及一九四三年的预算看来，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还在内战时，中共中央曾经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那时，为了补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经发动过各机关学校种菜养猪的事。那时，只有军队还无生产的经验。那时，因为江西农民比较富庶的条件，还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这是历史的原因。抗战以来，我们是处在一

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的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迫得我们不得不从事生产自给，维持抗战的需要。这是现时的原因。

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在那时，我们还只是令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其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后来看见试办的战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们果然能于教育之暇做出许多生产工作了，他们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们因生活改良，逃亡现象也减少了。由于看见这些成效，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普遍地应用到那时留守边区的部队，由留守处下命令叫各部队都学着这样做。但也还是为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为着解决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时政府方面，开始注意建立了几个小的工厂，但对机关学校，则连种菜养猪我们也还没有叫他们做。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曾经指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那时我们又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

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别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的军队全部都是劳动力，没有女人，没有老人小人，又没有租税重负，为什么还会发生饿饭的事？我们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关，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住用问题？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这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比一九三八年不同了，不是仅仅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决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动员的范围也不限于军队，而是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发出了开展一个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号召。《开荒歌》是那时唱出来的，《生产大合唱》也是那时产生的。这一号召，不仅动员了几万党、政、军、学人员，也动员了边区的老百姓，这年老百姓开荒达一百万亩之多。这一号召又传播到了华北，在战场上作战的八路军也有许多在战斗间隙中从事生产的。这是我们的生产自给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及一九四〇三个整年。在这一阶段中，政府的工业建设发展了一步，军队与机关、学校发展了农业生产。

一九四一年至此次高干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为第二阶段，生产自给的基础已经坚固地打下了。在这两年中，人员增多了，许多人因外边顿不住来到边区要吃饭，为了增强河防三五九旅也来了。军队增加了而外援全断，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

与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而在取之于己这一方面，两年努力的结果，从总量上说来，是超过了取之于民那一方面的。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发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是，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已经过去了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于农业，政府则发展了工业；第二阶段则着重了商业，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需要，除一部分部队与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的方针外，其余都讲究做生意，没有像在第一阶段那样地重视农业了，但政府、部队与机关、学校都发展了工业与手工业。此次高干会后将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 三

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第二，每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照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

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

#### 四

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

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 五

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

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 六

总之，所有延安及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不但供给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切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公营经济的基础，使我们能够依据这个基础继续发展生产，解决今后的问题。

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 七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



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林 伯 渠

在政权工作中，一部分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闹独立性（特别在上层）与自由主义的倾向，这已经是清楚的了。其根源有两个：政治思想上的与组织思想上的。政治思想上的更重要。政治上同党的路线有违反，必然表现于组织上。要解决组织问题（关系问题，纪律问题），必须检讨和解决政治思想问题。

组织思想上的问题，许多同志说过了，我只讲政治思想上的问题。不能详细讲，只能讲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一次解决问题不可能，希望大家继续展开研究。

第一个问题：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问题。

这是党在边区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

但有些同志，在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上却发生了偏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形式，忽视内容。

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要鉴别新民主主义，首先就要看政权的阶级性与政策的阶级性。要建设新民主主义，首先就要使革命的基本群众有政权、有饭吃，用高岗同志的话说，就是要农民有小米吃，要反

---

\* 这是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帝反封建。

这在过去内战时期，曾经是反帝、反地主资产阶级，是土地革命，是工农苏维埃；而现在，则是抗日、反汉奸，是减租减息，是三三制。

所以无论在抗战以前以后，无论参议会成立以前以后，边区的政权都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对此是不能怀疑的。

今天，边区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内容就是《五一施政纲领》，其中心问题就是打日本，就是生产，就是减租减息，就是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与斗争。三三制，参议会选举，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我们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这个内容的。我们的干部基本上也是努力执行这个内容的。自然，形式也很重要，例如选举就是重要的工作。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缺点，还需要改进。但离开了内容来强调形式，如离开《五一施政纲领》来强调团结党外人士；把选举看作保卫边区的基本工作，看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就是不对的。然而，这种观点是存在的。

第二，强调民主，忽视集中。

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真正有效地表现民主的意志和力量。

共产党历来是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不因统一战线而动摇改变。

一九三七年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四条说：“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一九四〇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说：“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至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意

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

但是，这个思想，在我们一部分同志的头脑中是模糊不清的。如参议会常驻会制度和权限问题，参议员小组问题，各级参议会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正确的解决：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政府由参议会选举；参议会闭会期间政府就是最高权力机关。这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立法行政的并立，不是参议会和政府之间的互相制约。

第三，只要团结，忽视斗争。

今天，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大团结，但必要的斗争正是为了巩固团结。共产党是代表老百姓的革命利益的，要联系广大群众，也要教育落后的群众。只顾到群众的表面的暂时利益，并不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譬如有些同志跟着落后群众埋怨负担太重，或在选举问题上认为党不需要准备名单，就不免做了尾巴。

统一战线包括各个抗日的阶级，但首先是代表基本群众的利益。基本群众与地主资产阶级在抗日的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不可能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减租减息就是斗争过程，而有些同志，忽视这个斗争，是错误的。

三三制不是无原则的各阶级各党派大联合，而是共产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三分之一，实施共同纲领，不能容许反共分子在内。乡长由坏人做不行。那种把三三制笼统地了解为党外人士占三分之二的观点是不对的。对中间分子要有批评，那种随声附和的办法是有害的，结果徒然增加分歧。在三三制政权中，党一定要领导，一定要在政治上占优势。没有党员不行，党团一定要受党领导，党员一定要受党团领导，绝对不允许党员随随便便闹独立性。那种认为三三制是各阶级各党派的互相制约，说党不要多干涉，党的意见不一定能代表人民，党员有无、多少没有关系等等意见，是错误的。党员目中无党，

自己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绝对不许可的。

宽大政策要与镇压政策相辅而行。宽大政策是为了有利革命斗争，而不是为了取消革命斗争。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对于破坏边区的分子，对于破坏政府、军队、人民及我党的分子，不采取坚决镇压政策，却采取放任态度，并谬称为宽大政策，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保安锄奸工作中，麻木不仁的现象，把违警工作推到第一位而把锄奸工作推到第二位的错误，以及司法工作中轻重倒置（牢里关的极大部分是穷苦人），缺乏明确政策的现象，是亟须改正的。

在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上也有“左”倾，如关门主义残余，有些地方很严重，需要克服。但整个来说，右倾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是不能团结人家的。我们反对右倾，正是要加强团结。自己有了立场有了组织，才有团结人家的基础，只有自己脚跟站得稳，才能团结别人。如果因反右倾就放松统一战线、三三制，那自然是完全不对的。对新民主主义认识的三个方面，右倾都是主要的危险。无视民主内容，两权并立，实质上也是帮助地主向我们进攻。

这是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因此，必须彻底弄清楚，必须教育全党，使大家能有一致的明确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对环境与任务的认识问题，也分三个问题说。

第一，革命战争问题。

掌握政策必先了解情况。边区情况有各种特点，都须好好研究。而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边区处于革命战争的环境中，绝对不可有一秒钟忘记。所以，边区必须有军队。

养活军队、拥护军队，是边区政权工作中的第一等大事。养兵爱兵就是养民爱民，养兵爱兵是养民爱民之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边区是党中央与军委所在地，是八路军、新四

军的总后方，是全党全国唯一安全的革命根据地，所以，边区对华北华中与全中国的抗战，负有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没有华北华中的抗战，没有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边区也不能存在。希望边区关起门来，单独建设，显然是一种幻想。

过去政权工作中的有些干部没有认识这两点，因而发生了偏向。

对负担问题，往往抱应付以至抵抗的态度；只求节流（量入为出），不重开源（量出为人）；要管军队时说军队应隶属于政府，要养军队时，又说军队是中央军。

对军政关系的认识不明确（平时主要是军队服务政府，战时主要是政府服务军队，但这决不是说军队不要尊重政府），对军事动员拥军优抗的努力不足，优抗反不如优工，抗属婚姻问题往往处理失当。要知道军队的困难，他们又要作战又要生产，他们的生产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应有负担（王<sup>①</sup>旅的南泥湾政策尤其是模范，希望大家学习），他们是天下第一好军队。军政纠纷中，政府要多责备自己，不要多责备军队。

## 第二，生产与教育问题。

边区尚未直接发生战争，所以有可能有必要集中力量于两大基本任务——生产与教育，并以此来为革命战争服务。生产是为革命战争解决物质问题；教育是为革命战争解决干部问题。边区全部工作都应自觉地围绕于这两个中心。但过去许多同志对此认识不足。

### 先说生产。

只有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才能解决财政问题，才能解决教育问题，才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所以生产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

中央与西北局一贯地坚持了这个方针，但政府许多同志对

于这样一个性命交关的问题，却认识不足，采取应付态度，甚至采取消极抵抗，有时还积极抵抗。

仁政主义的思想：（一）反对发票子；（二）反对运盐（从积极抵抗到消极怠工，从去年到今年）；（三）对移民政策不积极。其结果，或者妨碍革命事业，或者最后更加重老百姓负担。所以仁政不免走到苛政；无为而治，不免走到束手待毙。

不从经济来解决财政，而从财政来解决经济；公开贷金代替了“官督民运”；农业中心变为商业投机；表面上解决了问题，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是本末倒置的错误。

这些错误，必须彻底改正过来。各级政府都要把如何更好地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当作工作中的第一个重要问题。

再说教育。

为革命与战争服务的教育，必须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应该是：第一，干部在职教育。第二，干部学校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儿童教育。但现在教育工作的次序正与此相反，这又是本末倒置了。

边区现在一切工作的提高，都有赖于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与文化水平。提高边区的干部水平，对中国革命将来有着重大意义。

要实现毛主席和西北局领导同志的指示，不要使他们失望，还要有为各敌后根据地保存和训练干部的准备。国民教育也要重质不重量。质有政治、文化两方面，老区文化差、新区政治差，都要纠正。政治文化都要从边区实际出发。

为了加强教育，教育系统需要一个通盘的改造。改造教育厅和各县三科的工作，改造在职教育，厉行整风和学习业务，改造边区一级、分区一级的干部学校（米中绥师要顾到特殊情形）各部门首长要亲自负责领导。



第三个问题：所谓正规化问题。

边区的全部政权工作，都要从革命与战争的环境出发，都要从边区的其他地方条件出发。合于这两种条件的制度，才算是真正的正规化，才叫做科学。这种正规化我们不但需要，并须努力建立起来，实际上也在逐渐建立。违反这种条件的所谓正规化，就是反科学的，就要反对。

这种不正确的正规化思想近来很有发展。它表现为：百端俱举，“简政不要减政”；为全国为将来，却不要为边区为今天；各树一帜，系统林立；工作作风上的形式主义与文牍主义。不去掉这些各种各式的不正确的正规化思想，彻底的整政和简政便不可能。

这种错误倾向，主要是有些同志的教条主义在作怪。他们的教条，有的从欧美、日本搬来，有的从国民党搬来，有的从中国历史上搬来。可是，既不合于革命战争的环境，又不合于边区的地方特点，也就都不合于我们的需要。

我们今天最急需的正规化，如党要领导政府，政府中的党员要严守党纪，党员与非党员都要严守民主集中制的政纪，他们却不了解或不赞成。现在首先要整饰这种正规化，才像个样子。这不是说在其他方面就不需要正规化。但必须从实际出发，了解实际，才能改造实际，才能建立真正的正规化。我们是做革命工作的，要完成严重的任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有一种严肃的态度。

以上是环境与任务认识中的偏向，主要也是右的。

这种右倾与前一种右倾（对新民主主义认识上的右倾）是有联系的。党的立场站不稳，对党的斗争任务就必然缺少一种严肃的积极态度。

上述两个政治思想问题，都是必须彻底解决的原则问题。



中央和西北局对这些问题都已有了正确的解决，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弄错了，或者因为有意无意的抵抗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坚持自己的错误；或者因为忽视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对党的政策不注意研究不执行。这就是政府工作中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源。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共产党所以要存在，无产阶级所以要斗争，要流血，就为着要改变政权。

根据地党的一切政策，除开党内政策与军事政策，都要经过政权来具体实行，来公开影响天下人的生活，而天下人也于此来认识党的面目。所以在政权工作中的党员要对阶级对人民负严重的责任。尤其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员数量既少，又须与其他阶级折冲尊俎，责任更重。陕甘宁边区是中央所在地，党内党外观瞻所系，一言一动，更须特别负责。

边区政权工作中的同志，特别是高级负责同志，应该努力做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家，以求不负中央与西北局的信托！应该密切注视敌人和朋友的动态，坚持自己的革命立场！应该服从党的领导，用心研究和全力执行党的政策决议，认真的组织检查，总结经验！不如此，就会降于普通党员之下，就会降为政治上的庸人，就会降为官僚主义者，事务主义者，就会降为旧社会的公务人员。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内部一定也不要互相闹独立性，犯自由主义。现在的政府系统就有这种不统一的情形，不尊重党的领导系统，不尊重政府的领导系统，目无党纪，目无政纪。这种情形非禁止不可，非消灭不可。如果让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党的一元化的阵容就乱了，党在政权中的堡垒就要垮，人民对党的认识与信赖就要动摇。

现在，边区政权工作中的党当然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必

须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原则问题。政权战线上的全体党员，必须一致的团结在西北局的领导之下，在高岗同志的领导之下，反对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清算自己和旁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倾向，贯彻党在政权工作中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在高干会之后，我们必须上上下下一致这样做去。

根据华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林伯渠文集》刊印。

## 注 释

〔1〕指王震。

## 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笔记

(一九四二年)

任 弼 时

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主要精神，是正确地提出了对待马列主义态度问题。告诉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它的字句，而是要学会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找出革命的发展规律，来便于我们具体决定政策。要反对党内两种主观主义，即：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尤其教条主义是现在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因为它能装腔作势地吓倒人。我们要在这种斗争中来转变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

中国党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经过在复杂条件下长期残酷的斗争应当是可以总结一些新的经验，成为适合中国环境的马列主义理论。但是实际情形表明我们党的理论还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问题，还没有一本系统的带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著作，还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而党内一些知识分子，既没有生产斗争的知识，又缺乏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的知识。知识应当是由感性知识发展到理性知识。而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因为实际斗争接触太少，甚至没有，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不

能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去。对于这种人的办法就是进入实际工作中去，使学得的书本知识能接触实际，学习运用于解决实际的斗争问题。这是防止成为教条主义最重要的办法。

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或是局部的，没有发展成为理性与普遍的东西。这种人也要使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完全的理论。

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联系应如矢与的的关系一样，应当是有的放矢。无的放矢的则将弄坏革命。也就是说只有拿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才叫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我党过去很长时期内，对于党内思想理论问题一向是未被重视的。党内干部，即算是高级干部并不了解理论的重要性。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许多党内干部，只是埋头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少数干部曾在国内外学过一些书本上的理论，但这些人既少有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实际生活，又不会真正把学到的原理原则与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相溶合，结果只是教条公式的搬运。这种不重视理论学习和搬运，对中国革命的确是造出了很多的罪恶。陈独秀主义、立三路线、苏维埃后期就是这种结果。这还只是大的方面。至于各个局部工作中，也就不知走了多少曲折的路，使党的工作受了不少的损失。

回想过去工作过程，自己只知如何把工作做好些，根据决议不怕困难地去干，在工作真正走不通时，对于决议可能产生一些怀疑，但是不能了解那个决议的原则上的错误。比如立三路线时代，只要政治罢工，组织工人武装，准备暴动。但当时

白色恐怖严厉镇压下的旧武汉，工作既没有组织，又没有强大党的领导，政治罢工、政治示威都很难于组织。硬干的结果，只是使少数先进坚决的分子遭受牺牲。而经济斗争是比较可能发动的。因此觉得只要政治罢工，不从群众最迫切的经济斗争做起，是很难使工作开展的。当时对于只要政治罢工，组织政治示威和暴动的方针是怀疑，但是还不能从原则上去考虑当时路线上根本错误。推究其原因，一方面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被当时的一些情况（如国内战争、红军打下长沙、人民对国民党不满情绪）所迷惑，觉得真正硬干把暴动弄成也是好的；更重要的是没有马列主义的修养。列宁论暴动的几个条件虽然是读过，但是并不能够联系中国具体情况来运用。而实际情况不容许组织暴动的实践，也不能够领导来反对当时的错误路线。

不依马列主义的方法，不根据真实的阶级力量变动的分析，不考虑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按照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不是用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决定我们的具体政策，是过去我们党内领导上最严重的缺憾。

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党内思想理论方面的领导与教育是太不注重了。这一问题在党内认真的正确的提出恐怕要算最近的一年。就是从去年五月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始（虽然六中全会已提出了问题，但并未真正被党来重视，或者是走入偏向），继之有《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今年的整顿三风报告，以及最近的学习运动——所谓整顿学风的号召。

过去的二十一年，虽然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但是真正自觉的认识普遍真理与革

命实践要密切结合的重要性，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

要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互相结合，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党成立以后，就要她领导革命的实际斗争，并且很快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国共合作大革命中）。这应当给我们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如何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在实践中来发挥马列主义。但是事情也奇怪。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虽然在中国出版问世，公开发表，恐怕也有许多人读过。但读是读它，并不能运用它来根据中国情形解决问题，否则可以减少一些严重的错误。我们那时看这些书籍，只是平淡地读过去，并未真正意会其内容，了解其实质，不求甚解，似乎与中国实际斗争无关，自然是不能运用国际斗争经验、他们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的革命斗争问题。后来在秘密工作的环境里，或者是在工作忙碌的环境中，就连许多理论的书籍也不注意去看它了。现在想起，也真奇怪，也错过了时光。

中国党经过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的实践，照讲是有很丰富的经验可以抽出成为理论，然而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种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系统地总结这一具有丰富经验的革命运动。这是最能□□□□□□教育全党教育干部的学校，这显得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的确还是非常之低。只有近几年来泽东同志□□□□□□□□可以说是综合了过去一些斗争，是一种带创造性的文献，对于党对中国人民确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这次党内提出反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包含《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关于党员干部教育问题的决定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如何正确的来提高我党

的理论水平，也就是说如何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根据中国的革命实践来解决中国问题。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时也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清除党内那种不根据客观实际只凭主观愿望热情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真实地密切地能够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带有创造性的马列主义。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是非常迫切急需的工作。因为我们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是一个能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有几十万党员和军队的党，它若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将使革命受到重大的损失。但这种思想革命必须视为长期不懈的工作，而首先是从干部并且是比较高级干部作起。我们党只要有几十个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的干部，能够负责地独立处理问题的干部，那对党的事业的胜利才可以说是有保障的了。

泽东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整顿党的作风》）。

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我们过去教育工作的基本缺点是“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学习马列主义“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



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整顿党的作风》）

“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

“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所有以上的引语，指明了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态度与方法，批评了学校教育干部教育的缺点，指出了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重要。

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力量在于能在任何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了解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来确定我们的方针。

一般斗争的环境是复杂的，而中国的斗争环境尤为复杂，如果不能精确的了解分析客观条件及其可能的变化，那就会做出不正确的结论，使我们的工作多走许多曲折的道路。

比如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革命斗争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在各省区甚至于在一省之各县区都有深浅之不同。



可是在立三路线、盲动主义时代，以及在苏维埃运动很长时期内，不知道，或者重复地忘记了这种不平衡现象，而采取全国暴动、各地建立苏维埃，这种不合客观情况的决定，结果徒然使革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又比如六次大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与估计，就没有了解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再度参加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可能，虽然由于许多条件的限制，它是不坚定、不彻底、软弱的。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资产阶级内部虽然有了分化，国内的一部分不满国民党统治，具有民族意识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代表进行的带有进步性的活动，以及福建事变，这种具体的客观事实，硬没有引起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注意，而认为这是比国民党还更加反动可怕的东西。

主观的教条主义者，他常是离开革命的实际变化凭自己的愿望来决定问题的。在自己房子门外闹的一些事情，似乎与党的政策之决定无关重要。他只是死死地啃着中国要如何……要暴动，苏维埃化……这一个死公式，以为这是十足的马列主义的最革命的方针，不管能否办得通，不管情况变化，不管你死了多少性命，他想我只是发号施令又不要我去拼命，侥幸革命成了，是我们正确领导，失败了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这种人不问天高地厚，儿戏革命斗争和人的性命，还能把革命弄好吗？还能算得马列主义者吗？

还有一种人在学校里学到一些书本知识，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把普遍的原则与中国当前斗争的实际连结起来。他学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富农、中立中农、依靠雇农、联合贫农等等的一套，但是又不说明目前中国是抗战，是统一战线，要联合各抗日阶层，建立民主政权，不是反对富农、中立中农。毕业出去工作的学生，无从着手工作，甚至他还是照本宣

科的主张要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这又多么危险呢！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党对革命的危害，确实是很大的事。失败的血的教训，使我党近年来才能深深感觉到党对思想理论上的领导与教育的重要性。“只有被先进理论所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从许多教训中，使我们领会到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精通马列主义，必须善于区别字句与实质，必须领会其本质，必须善于运用这种实质于具体环境，并且要善于以革命的新经验来丰富它、发展它、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这就是说读马列著作，不是死记背诵其公式条文，而要了解究竟是讲了什么问题，为何这样说，必须了解它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提出了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必须学它那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另一种情况下去观察、提出和恰当地解决另外一种问题。并且要注意吸收新条件新环境下正确解决了问题所获得的经验，来发展丰富马列主义科学。

要真正用这种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真正如此去做，而且确实做出成绩（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的人，才能算得是理论家、政治家。这样的人今天在我们党内确是太少了。

所谓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提出和解决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是一个什么事？立场，应当是不仅为着无产阶级今天的利益，而且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将来远大的前途，忠诚于无产阶级利益等是立场；观点，应当是唯物的，即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只是愿望或可能，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方法，用辩证的方法，即是要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的环节，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

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是一个极精致的科学的艺术。所谓领导艺术，是不容易的。要用全面的客观的细致的冷静的科学

的头脑，去思索、考虑，去提出和解决问题。环境的复杂以及其变化的迅速，时常可以纷乱人的头脑，容易走入迷途，或者是成为事变发展的尾巴。

比如无产阶级基本远大的利益是要消灭阶级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一极终目的要经过多少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这又是绝对必须的！只有善于正确地经过这些道路就可以加速它达到极终目的。比如中国无产阶级首先主要的还是要努力求得民族的解放，这就产生要与资产阶级合作；合作破裂了，为着这种目的又要与资产阶级战争；外敌侵入国土，再度与资产阶级合作；合作中又免不了磨擦，而反磨擦又是为着要团结，要能有理有利有节；为着它本身远大的利益，又不得不暂时地牺牲某些局部利益以求得今天能达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然而牺牲局部利益又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样限度，又会损害它的基本利益；强调了目前局部利益，又会使团结破裂，也就是使本身远大利益受损害，因而不得不在一定时候要采取让步妥协的政策。这是如何复杂的斗争过程！这种斗争过程的领导者，如果不能以精确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及时恰当地提出问题、决定政策，使着这一斗争按照无产阶级最基本的利益前进，则可以产生“左”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李立三、苏维埃时期的错误也就是没有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提出问题、指导运动的结果。

领导这样复杂斗争的领导者，须要学得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学得思想方法，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但要运用得正确，就得要了解中国的事情，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过去与现在，各个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指导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生产部门工作的同志，也就要熟悉周围上下左右的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就会成为无

的放矢了。

我过去在了解中国事情方面，是非常的不够，许多问题的决定，只能是根据大概的情形，是缺乏准确性的，没有精确的调查研究。如各抗日党派的统一战线口号叫出很久，但我是很久时间内对于究竟中国有些什么党派，它们各是代表哪个阶层，有何政纲，有何人物，有多大的组织和力量，是不知道的，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记得在莫斯科时曾有人问过我，我简直是难于置答。恐怕党内还是有不少高级干部与我有同样的情形，对于中国事情的确是若明若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〇年就提出的。我那时（一九三一年）的感觉，认为只凭调查的情况，而不是根据一定原则去解决问题，是会走入偏向、离开原则，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今天才感到这句话是真理。就是说只凭原则，不详究实际情形去决定问题，将不精确，将成为主观的东西，成为教条式的解决问题。自然若调查的情况不代表一般的，不是典型的，又不能用正确的观点、方法去找出问题、解决问题，那同样会走入偏向。这里的问题就是理论如何真能与实际相联系。与实际无联系的理论，将不成为理论而是空论，它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

中国人办事，大都是粗枝大叶草率的，就是说缺少精细的科学的作风，这种情形不能不传染到我们党内来。现在我们党在这方面还须有很大的努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有与众不同的情形，他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培养这一优良的作风，他是我党恐怕是唯一能注意调查研究，并且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的结果，即是能够锐敏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的人。

党内粗枝大叶的作风，急需改变（某些部分与地区已开始注意），否则理论与实际也将无从联系起来。中央调查研究决

定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但要切实转变这一作风，还须在思想上做许多工作。这次全党的学习运动，将有助于这一作风的转变。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刊印。